

华夏文史博览书系珍藏版第二辑

江阴市人民政府澄江街道办事处
江阴市档案局

主编

『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

刘半农



邬丽雅 著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刘半农 / 邬丽雅著. — 上海 :
文汇出版社, 2014.1

(华夏文史博览书系珍藏版. 第 2 辑)

ISBN 978-7-5496-1047-1

I. ①五… II. ①邬… III. ①刘半农(1891 ~ 1934)
— 传记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319177 号

华夏文史博览书系珍藏版 (第二辑)

主 编 / 卞 宏

责任编辑 / 唐 麒

乐渭琦

装帧设计 / 马红玲

出 版 人 / 桂国强

出版发行 / 文匯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政编码 200041)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 无锡童文印刷厂

版 次 /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700 × 1000 1/16

字 数 / 1620 千

印 张 / 122

书 号 / ISBN 978-7-5496-1047-1

全套定价 / 258.00 元

编委会

名誉主任：蔡叶明 龚振东

主 任：张国兴

副 主 任：谢洪兴 刘建国

主 编：卞 宏

副 主 编：许曹军

编 委：张国兴 卞 宏 谢洪兴

刘建国 许曹军 吴红敏

缪红珍 张 明

总序

江阴是一个拥有7000年人文史、5000年文明史、2500年文字记载史的江南古城，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科学、文学、艺术、宗教等领域里，都涌现出无数的杰出人物。我们试图用人物传记的形式，记载他们的光辉业绩、人文品格和渗透在骨子里的江阴精神，以缅怀先人、启迪来者。抱着这样的目的，去年，我们江阴市档案局与有关镇、街道合作编纂了《上古圣贤季札》、《徐霞客评传》、《铁面仁心杨名时》、《国乐之魂刘天华》、《抗日英雄朱松寿》5本人物传记，这些传记被收录于文汇出版社策划出版的《华夏文史博览书系珍藏版第一辑》。时隔一年的今天，我们又撰写了《东林英烈李应昇》等5本人物传记，收录于《华夏文史博览书系珍藏版第二辑》。

这套人物传记的传主也都是出生在江阴的名人。东林英烈李应昇，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中进士，授江西南康府司理，以清廉著称，到任后处理积案600多件。天启二年（1622年）任西台御史，力陈改革时弊，抨击阉党暴恶。天启四年（1624年）密疏魏忠贤十六罪状，遭阉党痛恨。天启六年（1626年）三月，李遭诬陷被逮捕，受尽酷刑，闰六月初四，被害于京都狱中。崇祯初年（1628年）平反昭雪，著有《落落斋集》。本书不仅填补了国内研究李应昇的空白，还为研究明代东林党人与阉党的殊死斗争提供了很多珍贵的资料。《矢志抗清的老贡生黄毓祺》是一部江阴抗清守城八十一天的壮丽史诗。1645年，清军兵临江阴城下时，黄毓祺被江阴守军主帅聘为参谋。城破前夕，阎应元典史请他出城讨援兵，途中被清军逮捕，1649年农历

八月在南京英勇就义。留下《江上九子歌》、《古杏堂集》、《大愚老人集》、《江上二黄先生遗稿》等诗稿，有其独特的风格。“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刘半农，是现代文学家、语言学家。1917年任北京大学教员，曾参与编辑《新青年》杂志，与胡适、陈独秀、鲁迅、钱玄同等一起从事新文化运动，宣传新思想，抨击保守派，倡导文学革命，后留学英法。回国后，历任北京大学教授、中法大学国文系主任、北平大学女子学院院长等职。著有《半农杂文》、《半农谈影》、《四声实验录》、诗集《扬鞭集》、方言民歌集《瓦釜集》等。中国植物育种学家叶培忠，是中国树木遗传育种学科创始人，在上世纪40年代就成功地培育出“叶氏白杨”和“叶氏狼尾草”，他培育的亚美马褂木和培忠杉，商品名为“东方杉”，在他去世20多年后，相继在北京推举为“奥运树”，在上海推举为“世博树”，正式获得美国专利。现代文学家胡山源，在1923年与钱江春、赵祖康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新文学团体“弥洒社”，出版《弥洒》月刊。抗战期间，先后在之江大学、东吴大学、沪江大学、大夏大学任副教授、教授。建国后历任福建师范学院中文系主任、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晚年定居江阴，从未辍笔。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散花寺》、《三年》、《龙女》，译作《莎士比亚译传》、《欧亨利短篇小说集》等。本辑5本人物传记以简朴的语言描写了这些传主壮丽辉煌的人生。

为震古烁今的江阴名人撰写长篇传记，是一个长远的文化工程。我们要将笔触深入江阴历史文化的内涵中去，挖掘整理并潜心研究浩瀚档案中的文化遗存，撰写出更多更好更贴近史实的江阴名人传记，使这套大型丛书更加具有历史文化特色。

编者

2013年11月

目 录

“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刘半农	1
序言	3
第一章 少年时期	4
一、家境寒伧	4
二、幼年聪慧	7
三、常州求学	9
第二章 痛苦的试飞	12
一、美满的旧式姻缘	12
二、痛丧慈母	13
三、到革命队伍中去	15
第三章 去上海	18
一、开明剧社来了个小伙子	18
二、初涉文坛	22
三、杀出旧文学营垒	25
第四章 北大执教	32
一、投稿《新青年》	32
二、北大来了位年轻教授	34
三、改名	39
第五章 “五四”先驱	43
一、文学革命的急先锋	43
二、骂倒“王敬轩”	48
三、战火洗礼	53
第六章 辛勤播种	58

一、白话诗歌的功臣	58
二、民歌研究的领头羊	63
三、永远开拓的杂文家	67
四、首倡新式标点和“她”与“它”	71
第七章 出国留学	76
一、文学的守望者	76
二、教我如何不想她	79
三、荣获博士桂冠	84
第八章 回国治学	92
一、组建“数人会”	92
二、坎坷“词典”路	95
三、实验语音学的奠基人	97
四、博学多才的智者	100
第九章 在教育的田野上	104
一、逆境办学	104
二、创办进步“副刊”	106
三、严格治校	110
第十章 爱憎分明的斗士	115
一、亦“恨”亦爱徐志摩	115
二、“欺侮”不可一世的陈西滢	118
三、悼“快绝一世的徐树铮”	121
四、不惧强盗的勇士	124
五、高举“反日救国”大旗	130
第十一章 多维的空间	132
一、天华之死	132
二、《桐花芝豆堂》与《双凤凰砖斋》	136
三、初纂《赛金花本事》	139
第十二章 生命的夕照	144
一、为李大钊题碑立传	144
二、痛斥戴传贤	145
三、不落的星光	151

刘半农年谱	156
-------------	-----

刘半农作品选	201
“作揖主义”	203
她字问题	207
汉语字声实验录提要	210
国语运动略史提要	215
《扬鞭集》自序	218
“好好先生”论	219
答《对于〈新青年〉之意见种种》	220
北大河	222
致北平市长周大文	226
关于新诗致胡适之的信	227
敲冰	230

缅怀与研究	239
刘半农先生不死	蔡元培 241
论刘半农的《扬鞭集》	沈从文 243
“五·四”时代的一面影	胡 风 248
刘半农与五四文学革命	汪馥泉 260
析刘半农诗文中的故土情结	邬红梅 266
中国文物保护先驱者——刘半农	唐雷霆 273
刘半农摄影作品赏析	王晓娟 277

“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刘半农

序 言

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大地风雷激荡，政治、思想、文化，犹如白垩纪山崩地裂的造山运动，以前所未有的力量挤压、拉伸、碰撞，塑造出了巍巍群山，也留下了沟沟壑壑。文化历史的长河，荡涤了多少污泥沉渣，一泻千里，浩荡东去。当人们被时间裹挟、被时代裹挟着走过整整一个世纪的时候，我们总算可以毋庸置疑认真肯定地说出“人性”两字，并可以以人性的眼光，心平气和、客观公正地去看那一段特殊的历史，那一段特殊的文化，以及在这个特殊年月中为新的文化诞生而拼命战斗的文化巨人刘半农了。

集战士、诗人、学者于一身的刘半农，就如集“南人”与“北相”于一身的江阴城一样，因为他的独特的个性，因为他的闪光的智慧，因为他不懈的追求，因为他温暖的人性而风骨特异。

从才子到战士，从战士到先驱，从诗人到学者，刘半农在那样一个新旧文化大搏杀的时代，向着光明，向着真理，苦苦求索，虽然有过一些坎坷，有过一些弯路，但他奋斗的主题依然是洪钟大吕！他对中国文化的贡献依然是日月煌煌！刘半农的一生，鲁迅其实早就给予高度评价：“我愿以愤火照出他的战绩，免使一群陷沙鬼将他先前的光荣和死尸一同拖入烂泥的深渊。”（《且介亭杂文·忆刘半农君》）但是，正如鲁迅预料的那样，“陷沙鬼”出于种种目的，从没停止对刘半农的非议、诋毁、歪曲，然而，尘埃掩盖不住金子的光芒。刘半农传奇的经历，传奇的人生，刘半农勇猛无畏的战斗精神，刘半农硕果累累的文化业绩，早已彪炳史册，这是无人可以否认的！

第一章 少年时期

一、家境寒伦



刘氏兄弟故居

1891年5月27日（清光绪十七年四月廿四日），江阴小城西横街的刘家小院，传来一阵初生婴儿呱呱坠地的哭声，这孩子的哭声，稚嫩，但清亮。这婴儿，便是日后的文化巨人刘半农。

刘半农，原名寿彭，后改名复，初字半依，后改半农，晚号曲庵，世以字行。笔名有寒星、范冬奴，堂号有含辉堂、灵霞管、桐花芝豆堂、双凤凰砖斋等等。

对于九里十三步的老江阴城来说，西横街可算是一条大街了，老江阴城里，东横街、西横街，街名都有一个横字，而街，却是南北走向的。

西横街，顾名思义是在城西，其实，几乎就是西门了。刘家，虽不富有，原本却是西门一带，不，就是江阴小城里名声显赫的人家。

半农的曾祖父，字荫荣，名廷赞，号大镛（清嘉庆十一年四月十一日生，清同治三年二月二十日卒）。享年59岁。刘荫荣平日居家，生性淡泊，为人谦和，但面临危局却慷慨仗义，不畏艰险。1860年，庚申之

变时，面对太平义军咄咄声威，浩浩兵勇，他曾率子侨寓东乡，纠集民众进行殊死抵抗，后因兵败而被杀。

半农的祖父刘汉，字步阶，号梅钦（清道光十二年十一月十四日生，清同治三年三月初三卒）。刘汉为刘荫荣长子，原为国学生，庚申之变时随父转战，毙命沙场，年仅33岁。

太平天国运动，是19世纪中叶中国农民的一场大规模反清运动。1851年（清咸丰元年）至1864年（清同治三年），由洪秀全、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石达开组成的领导集团，在广西金田村发动了对满清朝廷的武力对抗，后建国号“太平天国”，并于1853年攻下金陵，号称天京（今南京），定都于此。1864年，太平天国首都天京陷落，洪秀全之子兼继承人幼天王“洪天贵福”被俘虏。1872年，最后一支打着太平天国旗号作战的太平军部队，翼王石达开余部李文彩，在贵州败亡。因清朝推行剃发易服，太平天国均不剃发、不结辫，披头散发，故太平军被众人称作“长毛”。刘氏父子纠集民众，抗击“长毛”，用今天的眼光看，似有逆历史潮流而动之嫌。但用历史的眼光看待历史人物，刘氏父子的举动，不失为一种保家护院的举动。

太平天国运动，虽然波澜壮阔，历时14年，纵横18省，战争规模与激烈程度，军事筹划和指挥水平，都达到历代农民战争的高峰。但是太平天国运动同所有失败的农民起义一样，有着类似的通病，这就是，没有远大的战略眼光（如陈胜吴广起义、绿林起义、赤眉起义、黄巾农民起义、隋末农民起义、黄巢起义、明末李自成、张献忠农民起义），虽然参与人数有上千万群众，但由于领导集团政治上过早的封建化，组织上不能始终保持领导核心的团结，军事上战略决策一再失误，以及外交上缺乏经验，管理上缺乏秩序，最终陷于失败。在民间“长毛”滥杀无辜的故事俯仰可拾，故而，百姓为了生存，对一支不明来历的队伍进行保家护院的抵抗，实在是无可厚非。刘氏父子的侠义行为，再次凸显江阴人民性耿直、刚悍、倔犟的个性特点。也为刘半农、刘天华、刘北茂兄弟豪爽、直率、狭义、执著的个性找到了社会和血缘的基因储存。

刘荫荣父子之死，虽然其勇毅无畏的精神名躁小城，但刘家的平淡、温暖、兴旺的日子，在刘半农出生前就戛然而止了。

接下来的刘家，该是怎样一副模样呢：一个寡妇，领着一个嗣子，这就是刘荫荣父子死后凄惨的刘家。这个寡妇，就是刘汉之妻夏氏，这

个孩子就是半农之父刘宝珊。

夏氏是个善良而坚韧的女性。在刘家壮年男丁先后被杀的日子里，她领着儿子苦撑住了这个家。在贫苦的日子里，母亲守住织机在抽丝浆线中讨生活，儿子守住油灯孜孜不倦苦读书。十几个春夏秋冬过去，刘家在凄风苦雨中度过最艰难的时光——刘宝珊终于成为了一位知书达理的风华少年。

半农父亲，名玉珂，字宝珊。生于清同治九年庚午闰十月十二日。这位自幼只有母爱没有父爱的年轻人，在母亲夏氏的精心培养下，眼下已经成为江阴城里有名的才子了。清光绪二十二年，26岁的宝珊，乡试及第，成为江阴县儒学生员。春风得意的宝珊准备在人生舞台大干一场，艰难度日的刘家也似乎看到了否极泰来的曙光。

另一位女性也不能不说的，她就是刘半农的母亲蒋氏。

蒋氏，是城东大桥镇西塘圩蒋坤赐的女儿。蒋家世代务农。就如中国旧时千百万农民一样，怎一个贫苦了得？贫苦的日子加上蒋锡坤被病魔纠缠，蒋家这日子就没法儿过了。当蒋坤赐病歿之后，妻子实在没法养活一家老小，无奈之下，只能将还在襁褓中的小女儿丢了出去。她期望小女命大福大，落到一个好人家。

这是一个隆冬的清晨。年轻的夏氏与可怜的弃婴蒋氏邂逅。这一定是上帝的安排。年轻的夏氏抱起冻得发紫，气若游丝的婴儿，泪水从她脸上滑下：“真正作孽啊！谁的孩子啊！”她看见躲在远处窥视着女儿的衣衫褴褛的女人。夏氏叹口气，这世道啊，不是走投无路，谁愿意将亲生骨肉弃之若敝履呢？她在窥视，说明她心里舍不得啊。母性的光芒是苦难遮不住的。自己还在艰苦度日的夏氏，毅然带回了这个上帝送来的女儿。蒋氏正如她的生母所期盼的一样，命大福大，找到了一位善良坚强伟大的母亲夏氏。找到了一个虽然清贫，但温暖可亲的家庭——刘家。

夏氏、嗣子、养女，一家三口来自不同人家，却和睦融洽。转眼宝珊长大成人，英俊儒雅，知书达理。姑娘也长大了，亭亭玉立，善解人意，他们兄妹相称亲如手足。看着一对宝贝的金童玉女，想想自己坚守的这个刘家的悲欢离合，夏氏常常暗自唏嘘。真的是天无绝人之路啊——孩子们总算长大啦。

让这一对自己一手抚养大的孩子永远不要离开自己，这是夏氏最大的期盼。夏氏做主，明确了这对情同手足的孩子，将来要做夫妻。



刘宝珊

蒋氏爱戴尊敬着养母夏氏，她处处学着夏氏的为人处世，她勤劳善良坚毅。唯有说到自己的生母，心里总有过不了的坎。这也难怪，哪个弃婴没有生割血脉之痛呢？而生母呢？自从丢了老幺女之后，留下了一块心病。这块心病常常隐隐作痛。不是吗？看着孩子在别人家里健康成长，看着孩子就在眼前，却不能相认，那是什么感受？心痛是老天对她的惩罚，蒋氏的母亲从此终年吃斋念佛，为孩子祈福，为自己消除孽障。刘家其

实没有忘了蒋氏生母，在宝珊、蒋氏成婚之后，他们双双拜见了这位曾经孤苦无奈的母亲。母女重逢的场景，是快乐并心痛着，泪水和哭泣、歉意和原谅将漫长深厚的坚冰逐渐融化……

刘家的由兴到衰，刘宝珊夫妇坎坷苦难的人生经历，是旧时中国社会民众生活的一个缩影。刘家的传奇经历和苦难生活，无意间也为后辈子孙壅筑了一方认识社会、认识人生的坚实厚土。刘宝珊夫妇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们正在用平淡的生活，用发自内心的率真、善良、坚毅，以及他们坚守的中国传统的道德精华，点点滴滴地培育着日后中国文化的栋梁。他们的三个儿子：长子刘半农，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文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次子刘天华，中国近代作曲家、音乐教育家、演奏家；三子刘北茂，著名的翻译家、二胡演奏家、作曲家和音乐教育家。一门三巨匠，这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传奇，更是中国文化的福音！

二、幼年聪慧

水之南谓阴。江阴，便是长江之南的一个诗意小城。汹涌浩瀚的江水，婉约迷漫的苇塘，浓浓淡淡的远山近峦。以及弯弯的石拱桥，窄窄的石板小巷，高飞的纸鸢，豆腐花芝麻糊的吆喝。这是刘半农幼年生活的背景。这些背景，以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时空密度在半农灵魂深处的每个细胞里精耕细作。

老家太美了，对家乡的热爱，在日后半农的著作中不时出现。在《北大河》中他描写道：“我是个生长在南方的人，所谓‘网鱼漉鳖，在河之洲，咀嚼菱藕，拊拾鸡头；蛙羹蚌脍，以为膳羞（饕），布袍芒履，倒

骑水牛’，正是我小时候最有趣的生活……”半农虽然生活在城里，但是，当时的江阴城市实在太小，太逼仄。抬脚就可以跨入乡下原野。而且父母老家均在农村，下乡就更有充足的理由。

凉爽的席
松软的草
铺成张小小的床
棚角里碎碎屑屑的
透进些银白的月光
一片唧唧的秋虫声
一片甜蜜蜜的新稻香
这美妙的浪
把我的幼稚的梦托着翻身
直翻到天上的天上！
……

——《稻棚》

这美妙的浪托着半农幼稚的梦，也托着半农无限遐想的兴趣。这时候他除了撒开脚丫子在原野上调皮玩耍，另一个爱好就是喜欢画画。父亲给他买来小画谱，让半农临摹。“我学了不久，居然就知道一小点加一大点，是个鸭，倒写‘人’字是个雁；一重画之上交一轻撇是个船，把‘且’字写歪了不写中心二笔是个帆船。”（《北大河》）

看着聪慧的儿子，做父亲的宝珊由衷地高兴。他不时邀请懂画的朋友到家里来观摩儿子的“大作”。叔叔伯伯们一边看着半农的画，一边评论鼓励着孩子，艺术的山水与自然的山水一起悄悄画进孩子幼小而灵敏的心田。

江南的景色是美丽的，水墨山水也是美丽的。但是，生活却并不是那么如意，在乡下的生活，让半农早早地接触了社会的最底层，让他知道什么叫有钱人，他们的钱是从哪里来的？什么是穷人，他们的钱都到哪里去了？城里贫民式的生活，让他知道一个字——“饿”。半农自小聪慧持重，饿了，就依着门看大街，看残缺的兴国塔，看大场子上嬉戏的小朋友。有时他吮着指头想跟小伙伴们一起玩儿，可是，咕咕乱叫的肚子让他一点也没兴趣。他想对妈妈说“饿”，可是看见妈妈，妈妈总是一

只脚摇着摇篮里的弟弟，两手不停地帮人洗衣赚两个零钱。他就识趣地不说话了，忍着，吮着指头忍着了。难道妈妈不饿吗？饥饿折磨着孩子，也历练着半农。顶得住饥饿，还顶不住什么呢？

不过，在那时的社会，饥饿的半农还算是一个幸运儿。宝珊好歹是个读书人，知道再穷也得给孩子读书学习的机会。读书才能摆脱饥饿。读书才能出人头地，这是中国人信奉了几千年的真理。小小的刘半农就在这真理中三岁会唱了儿歌，四岁接受了启蒙教育，父亲在家里教他识字。六岁入私塾读书已能作对吟诗。1901年，半农11岁时进入宝珊与人合办的翰墨林小学（今为澄江中心小学）读书。在新思想、新潮流的影响下，这所学校新学旧学并重，尤其注重国文、算数、英语教育，为半农打下了扎实的国语和外语的基础。

半农在家开蒙较早，本来又天资聪颖，进入翰墨林小学之后不久就出类拔萃。他的作文常常喜欢独出新意，让国文老师赞不绝口。老师曾在批语中如此评价：“此小子不同凡响，其前途无可限量。”这个老师也算是最早发现千里马的伯乐了。

三、常州求学

1907年11月的一天。常州府里人来人往，各县的莘莘学子都来报考刚刚建立的常州府中学堂。这人群里有少年刘半农。

17岁的刘半农从翰墨林小学毕业，以江阴考生第一名的成绩考取由八县联办的常州府中学堂。同期录取的还有后来蜚声海内外的国学大师钱穆。刘半农天资聪颖，每次考试各科成绩平均都在90分以上，深受学监(校长)屠宽的赏识和喜爱。

屠宽，字元博。屠敬山之子。屠敬山，名寄，敬山是其字。1856年生于江苏常州。他19岁考中秀才，30岁中举人。光绪十八年(1892年)37岁才考中进士，入馆翰林院庶吉士。两年后散馆，只授个工部主事的小京官，晚清时又贬为浙江淳安县令。他对科举、官场都不热衷，毕生研究经世致用的史地之学。他继承乾嘉诸老的考证传统，不仅博览群书，而且十分重视实地勘察，对西北史地，尤其是蒙元史研究有划时代的成就。

屠敬山是在洪钧撰写的《元史译文证补》的基础上进一步广泛收集

史料，潜心研究，从48岁开始，历时18年，到66岁逝世前才基本写成煌煌巨著《蒙兀儿史记》卷，极少数未了部分由其四子孝宦完成，雕板印刷共28分册。王国维晚年在清华大学研究蒙元史时，还盛赞屠的《蒙兀儿史记》。

刘半农在常州府中学堂念书时，去屠家拜访，结识了屠敬山。与这位远近闻名的史学家交谈中，屠敬山发现这个少年学子才识双全，可堪造就，于是破例将他收为弟子。可以说刘半农深厚的国学史学功底多半出自于屠家父子。此事在当地一时传为佳话。但枪打出头鸟，出于嫉妒，有人说他好钻营取巧，好出风头。但他没有理睬别人的非议，决心用实力证明自己的能量。

不久，机会就来了。一次，酷爱旧学的知府黄步瀛到学堂视察，临时出了一道命题作文，想考察一下学生的成绩。结果刘半农又以第一名的成绩再夺花魁，并得到知府亲自嘉奖。这样一来，连原先嫉妒他的人也心服口服。刚入常州府中学堂第一年，刘半农每次考试几乎都名列第一，被学校“列入最优等”。一时间半农声名大噪。钱穆晚年回忆说：“不三月，寿彭连中三元，同学争以一识刘寿彭为荣。”

就这样，刘半农才子的名声一下子传开了。

常州府中学堂以“整肃”为校训。校规校纪极其严格。学生一律住校，一周只有一天的假期。但学校在严格的治校纪律前提下，另有放飞学生个性的举措。这就是在文化课程的教学之外，非常重视多种多样的课外活动。其中开设摄影、图画、雅歌（昆曲）、手工、竞漕、篆刻、测量、演说、器械操、击剑枪刺、英语会话等等。这些科目，都根据学生兴趣爱好自己选择，自由参加。

半农选择了摄影。当时，摄影才刚刚传入中国，老百姓对这个新玩意儿又好奇又害怕。有人甚至传说，拍一次照片会伤一次元气。也有人说，拍照会摄去人的灵魂。从小就喜欢独特、新鲜东西的半农，偏偏就爱上了那个小魔盒儿。他们几个爱好摄影的同学，节衣缩食，省下钱来，假期里结伴而行，足迹踏遍了周边地区，长江、黄山、太湖，原野、农舍，所到之处尽得山川河流之美景，桑林田园之意趣。不久，校方举办学生作品展览，学生的才艺一时轰动了社会，发放了两千张入场券仍是供不应求，参观者络绎不绝。半农作品也在展出之列，收到观众好评。

1911年秋，震惊全国的辛亥革命爆发。常州府中学堂的年轻学生们

热血沸腾了。民族尊严和爱国情绪如滚烫的岩浆喷涌而出。最简捷的事情就是剪去拖在背后的辫子。当人们还在为剪不剪犹豫不决的时候，刘半农已经义无反顾地清除了那根拖在背后的累赘，心中感到无比畅快。

一个个性鲜明、热爱艺术的小苗，在岁月的磨砺和时代的历练中正在迅速成长，这棵小荷已经露出了生机勃勃的尖尖角。

第二章 痛苦的试飞

一、美满的旧式姻缘

1910年6月，中学还没有毕业的刘半农，突然接到母亲病危的消息。半农赶紧向校方请假后匆匆返回江阴。

看着日夜操劳的母亲重病恹恹的样子，刘半农心里非常焦急。他的心思是赶紧找医生，想方设法帮母亲看病，让母亲身体赶快好起来。而母亲的心思却是要儿子立即结婚。她知道自己的身体撑不了多久了。

半农的未婚妻叫朱惠，说起他们的姻缘还真的有些传奇色彩。

刘半农的母亲蒋氏，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逢年过节经常到离家不远的一个小庵堂里烧香拜佛。礼佛的时间一长，就与另一个烧香拜佛的城东朱家女人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刘半农11岁那年，母亲带他到庵堂里烧香去，碰巧朱家女人也带着自己两个活泼漂亮的女儿来庵里玩。这次见面，让双方有了意外的惊喜。11岁的刘半农相貌端正，稳重自持，聪明灵活，朱家女人看得是满心欢喜，便萌生了将长女朱惠许配给半农为妻的念头。巧的是刘半农的母亲也相中了朱家的长女朱惠。但朱惠比刘半农大3岁，14岁的朱惠已经出落成一个亭亭玉立的美丽少女。刘半农的母亲对朱家长女十分喜欢，回家就把朱家意思和自己的想法与丈夫说了，谁知宝珊极力反对，认为朱家与刘家门不当户不对，便以女方年长儿子3岁为由拒绝了朱家的想法。谁知，朱家却认准了这门亲事，诚恳地说，如果嫌老大太大了，那就把老二许配刘家。话说到如此恳切的地步，宝珊再推脱就有点不近人情了，没办法，就勉强答应了这门亲事。然而命运不知是不是早就安排好了，好景不长，不久，朱家二女儿天不假寿，年轻轻的竟患病去世了，交往时间虽然不常，但是到底刘家对二姑娘也有感情，叹息一阵子之后，刘家想，也好，这门亲事黄了就

黄了吧。不想，朱家却又重提出把老大许配给半农的事，刘半农的父亲被亲家的诚意感动了，他终于无话可说，同意了这门亲事。

旧时代的习俗，男女双方订婚后很少见面。刘半农却不管这个规矩。庵堂相见时虽然年幼，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已经悄悄地喜欢上了朱家的长女。之前，不好表现出来，现在订婚了，半农不再顾忌什么，这个“毛脚女婿”一有机会就悄悄地往朱家跑。一次，朱惠在井台上打水，无意中露出长裙下的一双用红布裹着的三寸金莲，看着心上人走路一瘸一拐的样子，他很是心痛。回家后坚决反对未婚妻缠脚，经不住他的软磨硬缠，后来两家达成一个折中的协议，白天朱惠遮人耳目仍然缠脚，晚上就悄悄放开。刘半农的体贴，深深地打动了少女的心，两人的感情也在时间的流逝中越来越深。

刘半农到常州府中学堂读书后，考虑到家务事多，父母便将朱惠接到家中做了童养媳。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毕业前一年，母亲突然犯病，并且情况不妙。为了冲喜，双方家长要让两个孩子匆忙结婚。六月初的一天，刚满20岁的刘半农和朱惠正式成婚。看着龙凤花烛摇曳摇曳的温暖火焰，看着低头端坐的温柔端丽的妻子朱惠，刘半农在腴腆中感到无限欣喜。他多么希望他们的婚姻真的能为母亲的生命力挽狂澜啊。

婚后的朱惠吃苦耐劳，细心侍奉病榻上的婆婆，由于过度劳累，先后两次流产，为了刘家香火，父亲还曾希望为儿子纳妾。此刻接受新思潮影响的刘半农，对父亲的想法十分反感。他珍爱着妻子，为了避免正面冲突，他后来把妻子带到了上海。1916年，他们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女儿。

二、痛丧慈母

家中长辈病重，让小辈匆忙结婚，在坊间叫“冲喜”。意思是将喜气冲掉病魔的晦气。这看起来虽然很有唯心色彩，但其实是长辈知道不久人世，希望孩子完婚，以了却心事。当然，也有因为心情愉悦了，病情慢慢好起来的。原本，刘家也希望半农的婚姻能够换回母亲的健康。但事实上并不如人所愿。兴奋几天的蒋氏健康状况每况愈下。

这位一生坎坷的母亲，是旧时中国千万忍辱负重女性的缩影。年幼时被走投无路的父母抛弃，收养她的夏氏虽视她为己出，终因家贫不可

能给她更多的呵护和娇惯。童养媳的蒋氏和苦命婆婆夏氏为了生计日夜织布，换钱糊口。那日子过得苦胆挂在黄连树，苦上加苦啊。

织布织布，
朝织丈五，
暮织丈五，
尚余丈五！

——《刘半农·织布》

蒋氏结婚之后，生活还是不宽裕，十个秀才九个穷。刘宝珊并没本事给妻子荣华富贵，蒋氏还得为一家老小的生计日夜操心。旧式的贤妻良母有一口吃的总要让丈夫吃饱，因为丈夫是家里的顶梁柱；让孩子吃饱，因为孩子还小饿不起；让老人吃饱，因为老人已经苦了一辈子了，没几天活头了。唯独只有自己是金刚不坏之身，饿得起，耗得起。殊不知，劳累和辛苦日积月累，正在做一个永不回头的加法。这个累积到了一定的时候，它便会宣布一个生命的崩溃。蒋氏就是这样撑不住的。半农常常忆起：黄昏时孩子们睡着了，后院的月光下，静静的水声，是母亲替他们洗衣裳……每每回忆起在家的点点滴滴，回忆起母亲言传身教的慈爱，半农总是泪流满面。

母亲是孩子们的启蒙老师。虽然蒋氏没有读过诗书，但凭着她的聪慧和在刘家的耳濡目染，以及江南丰富的民间文化的熏陶，她还是略通文史，通情达理。半农常常回忆起小时候母亲有空就教他们的儿歌。坊间的儿歌，简约而质朴，诙谐而放达，唱起来朗朗上口。既有情趣，又有寓意。半农念念不忘，后来成为著名的白话诗人的时候，耳边还常常响起母亲的歌谣。他用吴方言写诗，以及对民俗文化倾注大量心血，这与母亲的发蒙和江南文化的滋养是分不开的。

半农在新婚中，母亲就不行了。1910年6月19日蒋氏与世长辞。悲伤笼罩着刘家，更撕裂了半农的心。

年仅二十，就经历了娶妻、丧母的大喜大悲，这让半农更早地成熟了起来。

三、到革命队伍中去

1911年9月，辛亥革命爆发。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次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革命的浪潮不仅赶跑了清朝皇帝，还使中国绵延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从此永绝。

革命的春风不会错过江南这块富庶之地，更不会错过学校这块思想活跃神经敏感之地。常州府中学堂学生在革命精神的鼓动下，求进步、求民主的声浪一浪高过一浪。无奈，学校只能停学。半农、天华只能中途辍学。晚清的中学堂须修满五年方可毕业，这样，兄弟俩只能以肄业的身份返回故里。

回江阴后，半农受翰墨林小学校长王翊唐先生之聘回母校任教。对知识的渴望、对真理的追求，时时煎熬着这位心胸开阔、抱负远大的年轻人。他怎么可能在母校的讲台了却一生？

一天，朱惠看着郁郁寡欢的丈夫说：“你们兄弟肄业回来，父亲的埋怨，世人的冷眼，都可以不顾的。关键只要我们自己不甘堕落啊。”

听着善解人意的妻子的话，半农心中一阵温暖，知我者莫如吾妻也。半农一把抓住朱惠的手摁在自己心口说：“只有你才懂我的心啊，惠。”朱惠接着说，“你想读书，结交贤人达士，那别忘了南菁书院啊。书院里有我父亲一个熟人，很有修养。开始我父亲对你肄业也有想法，那位先生劝我父亲说：‘甘瓜抱苦蒂，美枣生荆棘。’我说你是不是该去找找他呢？”

南菁书院坐落在江阴小城的中街，离西横街咫尺之遥。是清光绪年间，江苏学政黄体芳在江阴时呕心沥血的杰作，书院继承发扬古代书院的优良传统，且形成了自己的鲜明特色：崇尚经史词章、重视学术研究、强调自学为主、引导学生关心时局。因此，一时名噪大江南北。

走进书院，半农在这里看到了让他咋舌的浩繁卷帙，更结识了日后成为中国著名教育家的吴研因、著名科学大词典编纂者薛晓升等，并应他们之邀参加了鼓吹革命、启迪民智的《江阴杂志》的编辑工作。

革命的浪潮汹涌澎湃，上海成立军政府、无锡光复、苏州光复、常州光复，好消息不断传来。半农的心再也按捺不住，他哪里愿意蛰居故居做一个“粉笔先生”呢？他每天和朋友以及弟弟天华，议论的都是国家大事、人生抱负。心潮难平的时候，兄弟俩恨不得立时三刻离家出走

投笔从戎。但是，看着上了年纪的父亲、新婚的妻子，半农还是左右为难。兄弟俩商量来商量去，却商量不出个名堂。

天华说：“看看家里的情况呢，确实不能走啊，母亲不在了，剩下父亲，我们一走，他太孤独。别怪他你一说北伐他就光火。嫂子呢，新婚燕尔，你一走，她怎么办？”

半农沉默了……

“这样吧，”半农思忖半天对天华说，“我先去投军，你暂时先参加本乡青年团抗贼，等我熟悉了军队那边的情况，再来接你出去。这样，家里也可以有个适应和缓冲。”

这是缓兵之计，要想两头兼顾，只能如此了，哎，其实忠孝哪里可能两全呢？这样，弟弟天华就在半农的支持下在江阴光复前秘密参加了本乡青年组织，出没四乡，宣传革命。

半农要走，父亲说什么也不同意。刘家小院里这段日子天天不得安宁。父亲要他安心教书，做好家里的顶梁柱，大嗓门儿小嗓门儿的怎么也说服不了儿子。妻子当然也不愿意，不仅自己要独守空房，还得天天挂念半农的生死安危，她受不了。但是刘半农的心已经铁了，不可更改了。半农认为身处这样的时代，只有投笔从戎，才是仁人志士的大作为，即使血洒疆场也在所不惜，不求青史留名，就不是热血男儿。故土再也拴不住一个跃跃欲飞的心，大鹏要展翅试飞了！

这天晚上，朱惠还在泪水涟涟。半农虽然心疼，却嘴上不肯服软。他对妻子一会儿婉言安慰，一会儿又慷慨陈词。时至半夜，辗转反侧难以入睡的朱惠仍在哭泣。半农倔脾气上来了，一撅嘴，不理朱惠，干脆一个人睡到露天晒酱台上去。立秋就不能睡在露水里，这是江南人的生活经验，别说现在时过中秋啊，朱惠心疼丈夫，却怎么劝都劝不回怩气的半农。朱惠心软了，她知道，丈夫有大胸怀，大目标，拽着人也拽不住心啊。那还不如让他去吧……

1912年初春，春寒料峭。半农在城北的江边，和前来送行的妻子和弟弟依依惜别。他挑着简单的行李，怀着一颗投身革命的滚烫的心，站在江岸上，听着江水拍打黄山山脚的哗哗声响，看着一浪推着一浪滚滚前行的滔天白浪，他的心中，蓦地升腾起一股浩然的英雄正气。

跨过长江，就是苏北。刘半农从水路转至陆路，辗转参加了清江地区的革命军队。由于他文才出众，不久就担任了作战旅的书牍翻译工作。

清王朝还在做垂死挣扎，刘半农所在部队，经常出没在淮河泗水之间，与敌人做过多次交锋。

刘半农是怀着美好憧憬来到革命队伍的。入伍之后，他剃了平顶头，换了一身灰色戎装。他本想金戈铁马驰骋沙场，施展人生抱负。但一件件意想不到的事屡屡发生，着实让他感到错愕。原想清江都督府里应该只有革命党人彭其山是最高权威，革命的方针政策都得由他来制定。不想，清江居然还有另一个“都督”。那人依然拖着辫子，开口闭口皇帝皇上，明里一套，暗里一套，竟然把他领地里宣传革命的三个学生的脑袋割下来示众。这个都督原来是袁世凯的手下。这让年轻的刘半农一头雾水，这是怎么回事啊？

原来，曾被清廷任命为内阁总理大臣的袁世凯，攫取北方军事和政治权力，一边与帝国主义勾结，一边笑容满面拉住革命党的手。而在暗地里令其爪牙抢权位、争地盘、放冷枪、搞暗杀，彭其山纵有一腔革命热情，也难敌这一群恶棍。面对袁世凯的阴一套阳一套，面对他们制造的惨不忍睹的血淋淋的场面，半农的眉头紧锁：“这哪是革命啊，他们比狼还狠毒啊！难道光复光复，就是剪掉一条辫子，将龙旗换成白旗，将花翎换成宽檐帽那么简单？”半农觉得自己书生气太重了，他太失望了，他再次陷入迷茫——啊，何处是我施展抱负的地方啊！在痛苦的抉择中，他毅然辞去军中职务，回江阴，回故乡！

第三章 去上海

一、开明剧社来了个小伙子

春天的江南，美丽如画。大片的菜花金黄得近乎夸张，成片的紫云英红得如梦如幻。就连门前兴国塔顶端砖缝里的几枝小树也冒出了绿生生的嫩芽，抖擞着十分精神。唯有半农和天华，这春风春雨怎么也催不起他们的精神。故乡虽是家园，虽是港湾，但没有事业的支撑，这家园，怎么个“焐”得住呢？

回想刚刚过去的年关，父亲因为家贫出去躲债，那债还是自己结婚、母亲过世欠下的。父亲拍拍屁股往外头一躲，家里一拨一拨的要债人只好由他们兄弟俩来对付。虽然用这几个月在清江赚的薪饷还了一小部分，要债人总算是打发走了，但债不是还欠着许多吗？半农似乎体会着了父亲的无奈了：蒋氏过世，长子虽然结婚，但仍无子嗣，次子、三子均未成家，而自己却毫无阻挡地在老去。唉，父亲不容易啊。宽慰父亲，唯一的就是要做出一番事业啊。

逐渐老去的父亲与想干一番事业的长子，许多目的是相同的，但达到目的的路径和想法却不一定相同。不同的想法一定会通过某个具体事件表现出来，甚至发生碰撞。这个碰撞，来了，仍是刘半农的婚姻问题。

父亲说：“惠儿到现在肚子没有反应，你该纳个小妾了！”

“什么？”半农抬眼看着父亲，怀疑自己的耳朵听错，不会吧，自己和朱惠感情笃深，父亲也是个秀才，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来？

“父亲，我好久不在家，再说我才二十来岁，还谈不上无后吧！我不会纳妾的。”

父亲有些激动：“儿子啊，你有没有清头啊？人生就是一场梦啊，两个弟弟都还没出道，老子不晓得那天给阎王爷点了名收了去，你说怎么

办？你怎么一点不体谅大人的心啊。”

父亲的话，透着凄凉，透着沧桑，半农何尝不能理解，自从母亲去世，父亲衰老得可快了。“但是，”半农说，“但是，人，难道除了繁衍子孙外，就没有别的更重要的事情可做了吗？”

宝珊有些发抖：“是有好多事情值得我们去做，但是，难道你不睁开眼睛看看这是什么世道啊？你在外头也算闯过一闯了，开过眼界了啊，怎么就不知道这天多高，地多厚呢？你一个小小平头百姓，不信你能翻天啊！”

“我，”半农觉着一时语塞，“我，反正不会纳妾，我不会把朱惠的幸福当儿戏的。”

“你是老子还是我是老子啊，啊？”宝珊真的动怒了。

浪涛拍岸的江边，半农、朱惠和天华伫立于此。

一江春水向东流，唯有江阴这段江水，执拗地不肯东去，竟然倔强地“向西流”，这是源于黄山脚下怪石嶙峋、水下漩涡暗涌奇多的缘故。人称，在镇江丢十支筷子下去，在江阴可以找到五双。这里的江水，江阴本邦人称“迁跟斗”水。喝“迁跟斗”水长大的江阴土著，个个性格倔强，豪放不羁，不达目标不肯回头，人称“民性刚”。江阴个性最最典型的就是，1645年，由“剃发令”为导火索引起的江阴百姓九九八十一天悲壮抗清的故事。历史上“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江阴抗清”，这“江阴抗清”是最最残酷最最惨烈的。激战过后，江阴军民杀死清军七万五千人，折损清军三王十八将。清军破城后，逐户血洗，江阴人无一投降。整个江阴城死尸满地，血流成河，死者达九万七千多人。仅有躲在寺庙等隐蔽之处的五十三人幸存。江阴人面对屠刀都不会眨眼，还怕什么坎坷呢？

仰望黄山，遥望长江，弟弟天华情不自禁吟诵着苏轼直抒胸臆的《念奴娇·赤壁怀古》。而半农却沉默寡言，世道的捉摸不定，与父亲的激烈碰撞，寻寻觅觅难找的人生目标，心心挂念的故乡亲人，让他左右为难。他此时的心情阴云密布。哦，人生，何其艰难啊！



1917年时的刘天华（刘寿椿）

哦，是什么声音，耳朵特别灵敏的天华正在侧耳细听。是纤夫号子。嚯嚯，任凭白浪滔天，任凭狂风怒号，总会有人在它们恣肆的威风上踩出一条达到彼岸的通道。半农一个激灵，仿佛这号子给他带来了什么灵感，什么启示似的，他说：“天华，我们去上海吧！”

早先上海书店有个熟悉的编辑介绍刘半农去开明剧社当编辑，当时，半农的志趣不在新剧，便搁置了下来，现在，辛亥革命虽然宣告了中华民国的诞生，但革命的成果除了剪掉了辫子，还没有看到给百姓带来什么好处。几个月的军旅生涯，既让他开了眼界，也让他充分认识到成功的艰难。加上父亲让他“纳妾”的苦苦相逼，他唯有带着弟弟离开故园。

酷爱音乐的天华，一听去上海，高兴得跳起来，他似乎已经听到那繁华都市里传来的摄人心魄的琴声……我们不妨也去闯一闯，出路，走出去才有路啊！

但是，说说容易，出去的盘缠呢？半农身上的所有钱都派发给了债主，身无分文啊。六目相对，唯有苦笑。真的是“一钿逼死英雄汉”啊！朱惠说：“别急，等我。”说完，姑娘撒开脚丫消失在阡陌之上。

几天之后，兄弟俩拿着朱惠从母亲哪儿借来的几块私房钱来到了上海。初到上海，哥俩借宿在朋友家里，合穿一件袍，盒盖一条被，个个艰辛唯有咬牙忍着。他们白天黑夜瞪大眼睛，看着帆墙林立的黄浦江、异国风情的高楼大厦，还有在中国土地上趾高气扬的各色人种，光怪陆离的霓虹夜景，天方夜谭式的尔虞我诈。他们一边熟悉着环境，一边托人寻找工作。终于一天，朋友带来了好消息，还是开明剧社，那里需要半农去做编辑，天华呢去做他的爱好——教授西乐。

开明剧社坐落在上海西门外鑫顺里。这个剧社，专门演出穿着现代服装的文明戏。剧团曾经下过南洋，去过日本。开明剧社的负责人是李君磐，这人就读南京格致书院，后去北京办过江苏旅京公学，不知为什么，其时，跟着潮流搞起话剧来了。

新剧是舶来品，就是在潮流前线的上海，也刚刚开始。新的文艺样式一出现，沪上的文人雅士来了劲头，纷纷为这个新生的文艺样式编写剧本，有的编剧甚至还亲自穿西装，着皮鞋，化妆一番登台演出，或者就为演员配器配乐，这在当时，是一种新颖的创举。用现在话说，就是时尚。

这天晚上，开明剧团上演《好事多磨》，剧团人手不够，不是演员的

半农也凑合着演一个诙谐幽默的丑角儿。上海滩上的红人徐半梅也来了，徐半梅和李君磐是老朋友，他是给李君磐拉来做化妆的。徐半梅虽是《时事新报》的编辑，平日里却以写诙谐幽默的消闲小说著称，以“徐卓呆”的笔名蜚声沪上。也喜欢编写和翻译剧本。他也是一个新剧的支持者和倡导者。这时，李君磐领着一个刘半农，向徐半梅介绍：“这位饰演顽童，你给化个妆吧！”化妆的时候，半农礼貌地问：“先生贵姓？”

“免贵姓徐。”

“台甫呢？”

“徐半梅。”

半农一惊：“该不是常用卓呆笔名发表小说的作家徐先生吧？”

徐半梅注意起眼前的这个小孩子。宽宽的额头，大大的脑袋，乌黑的双眸，一言一语间透着机灵。徐先生微微一笑说：“文字游戏罢了，请问先生您的尊姓大名呢？”

“免贵姓刘，名复。江阴人，今后还请徐先生多多指教。”年轻人彬彬有礼地回答着。

“你喜欢谁的作品？”

“爱尔兰伯伦柯德，他的《火焰诗》，《悲天行》啊，那些作品里都充满了强烈的爱国之情和献身精神……”刚刚相识的半农和徐半梅，热烈地讨论起文学来了。

在开明剧社，虽然半农结识了一些有识之士，但在一些斜眼看人的“阿拉上海人”的眼里，他是个“乡下瘪三”。他很看不惯那些人，为人处世刁钻刻薄，就是自己内部也锱铢必较，他们有了钱就喝酒闹事，没钱就饿肚皮吵相骂。这样，半农慢慢就成了不合群的内向的孤独者了。

孤独内向的半农，不想和那些自视高贵的人发生任何摩擦，但是，越想不惹事，事情还真的就来惹你呢。不久，“假发事件”发生了。

剧团为了上演新戏，托人从法国买回来了一只假发套，价值五十元，专为演洋装戏而购，不知怎么，突然就不翼而飞了。这么昂贵的道具，剧团肯定要追查，一时间就沸沸扬扬，闹得人心惶惶。不过，见鬼似的，不知凭什么，人们都把怀疑的眼光落到了“乡下人”刘半农身上。面对流言蜚语、明敲暗诈，刘半农忍无可忍，当机立断，卖掉自己的结婚戒指和弟弟天华的手表。跑茶馆，查剧团，顺藤摸瓜，寻找蛛丝马迹，终于揪出了真正的窃贼方某，使案情真相大白。这一下，刘氏兄弟的清白，

和他们的勇敢、果毅，赢得了不少善良人的赞许。他们威信大增。算计他们的小人也受了当头一击。

新剧社红火了一阵，慢慢冷落下去了。票，也不是那么好卖出去了。而浙江嘉兴宁波的一场演出，更是让剧团大伤元气。本来已经租好了场地，订好了戏码，剧团已经到了宁波，宁波方却说不要就不要了。细一打听，原来是宁波的县知事是个思想守旧的胆小鬼。生怕演新戏演砸了他的乌纱帽，硬是不让演了。剧团反复前往疏通关节，就是水泼不进针插不进。无奈，剧团只能囫囵去，囫囵回，连布景道具都没拆散。

打回的时候，他们坐在一条“新北京”船上往回走，仿佛飘荡在无边无涯的海上，冷风鞭打着他们的脸，所有人感到无助和悲凉。

船到黄浦江口，半农坐不住了，他站起身来，让江风猎猎地吹拂自己的脸面，他在问自己：就这样半死不活地混下去吗？我难道不能干点别的什么了吗？他的心里浮起徐半梅。耳畔又想起那次快活的交谈……

二、初涉文坛

开明剧社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是啊，任何新生的事物，到底有没有生命力，都得经过岁月的砥砺。是存是亡，不是一个因素可以决定的。任何历史事件的形成，都是许多力的平行四边形作用的结果。通俗点说，这就是合力。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动力理论。

开明剧社处在多种力量的作用下，而刘半农眼下也处在多种力量的作用下。



年轻时的刘半农

开明剧社前途渺茫，刘半农不能不为自己的生存去向考虑。去向何方呢？徐半梅的身影又浮现在他的眼前。那次交谈，他们是非常快乐的。刘半农讲的是自己喜欢的文学，而徐半梅呢，不仅阐述着自己驾轻就熟的文艺职业，更是抱着欣赏的目光看着这个聪明而有才情的江阴小伙。一个尊崇，一个欣赏，这种情愫或许就叫缘分吧，这种缘分，在气候适宜的时候，它一定会发芽萌叶的。

对，刘半农想起了徐半梅。最近，他刚刚

看到徐半梅在《时事新报》上翻译了列夫·托尔斯泰的新作。是啊，自己何不投稿试试？刘半农即时就将手头翻译好的两篇稿子寄到了徐半梅手上。不久，徐半梅将一篇稿子刊登在《时事新报》上，另一篇，则推荐到了中华书局的《小说界》上去发表。

两篇翻译小说的发表，使得刘半农这个“文学青年”激动不已。从此，一发不可收，在上海过上了五年“卖文为生”的日子。

文学是他心仪的辉煌殿堂，不想他刚刚叩响它的大门，大门就为之敞开了热情的怀抱。刘半农是幸运的。他遇见了古道热肠的徐半梅。徐半梅以及后来引荐半农的江焕卿也是幸运的，他们在刘半农最困难的时候帮助了他，事实上为中国文坛以后崛起的新星做了人梯。

1912年夏天，经徐半梅推荐，刘半农担任了《中华新报》社馆外特约编辑。这时，他在开明剧社的编剧、演剧之暇，几乎将所有的精力投身到了文学之中。而可观的稿酬，也缓解了刘半农拮据的生活。

1913年，开明剧社关门歇业。而刘半农经徐半梅介绍，正式进入中华书局编辑部工作。这段时间，半农的作品不断出现在《时事新报》等刊物上。他除了翻译还创作小说。他的作品形式灵活，内容新颖，直切时弊，不久就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阿拉上海人”，都知道一个江阴才子刘半农“勿得了”。崭露头角的半农，更坚定了自己笔耕的信心。

1914年底，父亲刘宝珊病倒了。这位终身致力于家乡教育事业的老教育家，突然患病，情况非常不好。1915年1月，弥留的刘宝珊，什么念头都没有，唯一的要求，就是要见半农和天华。半农匆匆从上海赶回，与天华一起，默默守候在父亲的病榻之前。眼泪，不断从他们脸上潸然流下……祖父遇害，祖母守寡，家业艰难，母亲早逝，一幕幕岁月如过电影似的在半农眼前经过。想想自己为了事业，为了理想，顾及不了家里，年轻气盛时还与父亲屡次碰撞，半农的心犹如打翻的五味瓶。唉，人不经历世事的艰难，何以理解父母的不易啊？他奋笔疾书了一部《金刚经》，将经书和纸马纸轿等冥器，按老家风俗一起烧化给了仙逝的父亲，祈祷父亲的灵魂早升天堂。然后按照遗命，将父亲与母亲蒋氏合葬在西郊青山。

父亲的去世，让半农似乎对生命又多了一份体味。他一直认为父亲是个强者，但怎么说倒下就倒下了呢？父亲一直把自己在文学上的成就作为他最大的骄傲和快乐。而自己在这个领域的成就，半农自己清楚，

跟那些大腕儿级的人物是不能比拟的。慰藉父亲的在天之灵，自己唯有努力耕耘啊。

在守丧期间，半农为天华和未婚妻殷尚真成了亲。但是，半农发现，虽然在新婚喜庆中，天华却时时显示出一种莫名的恐慌和郁闷。那迷乱的神情到底是为了什么，半农知道，天华一直对民乐情有独钟。在乡下某学校任教音乐，一边教学，一边还在不断研究民乐，那次，他向街头的落魄艺人学吹唢呐，被学校当局认为有损师道尊严，甚至遭到辞退。天华的心遭到了重创，他不能接受这个现实啊。

面对弟弟低落的情绪，半农心有忧急，他对天华说：“冷眼和势利，哪朝哪代都有，看看古今中外的成功人士，谁没有那样的心酸经历？认准的路一定要坚持着走下去，成功只会拥抱人才，不会拥抱庸才。”他们谈历史，谈现实，谈文学，谈音乐。天华的心在哥哥的开导下仿佛从低落的山坳里慢慢爬上了山巅，放眼望去，眼界开阔了许多。他看着满天的星斗，指着一颗，对哥哥说，那是国乐，我认准它奔去。半农紧紧地搂着弟弟的肩头说，对，那是北斗！

料理完父亲的丧事，半农带着妻子朱惠一起回到上海。

这段时光，是半农人生中安逸快乐的时光。由于发表的文章众多，稿酬颇丰。一家子居住在民厚里一号，生活也安定下来了。更让刘半农开心的是，不久朱惠就有了身孕。1916年9月30日，半农喜得千金。刘小蕙的出生，使得半农的心情如阳光般光明灿烂，挥笔写下《题小蕙周岁造像》：

你饿了便啼，饱了便嬉，
倦了思眠，冷了索衣。
不饿不冷不思眠，我见你整日笑嘻嘻。
你也有心，只无牵记；
你也有眼耳鼻舌，只未着色声香味；
你有你的小灵魂，不登天，也不坠地。
呵呵，我美你，我美你，
你是天地间的活神仙！
是自然界不加冕的皇帝！

诗歌对长女的爱怜，对新生命的礼赞跃然纸上。半农轻松惬意的心

情也可见一斑。

这一年，对于刘半农来说，还有一件不能忘怀的事，就是在朋友家中与近代著名的文学家苏曼殊相识。苏曼殊能诗擅画，通晓日文、英文、梵文等多种文字，可谓多才多艺，在诗歌、小说等多种领域皆取得了成就，后人将其著作编成《曼殊全集》（共5卷）。作为革新派的文学团体南社的重要成员，苏曼殊曾在《民报》、《新青年》等刊物上投稿，他的诗风“清艳明秀”，别具一格，在当时影响很大。半农与之相识，都有相见恨晚的感觉，然而，他们之后只通过三次书信，而两年之后，曼殊飘然仙去，半农不禁怆然，特写《悼曼殊》，以怀念故友。



苏曼殊

这一个人死了，
我与他，只见过一面，通过三次信。
不必说什么“神交十年”，“嗟惜弥日”，
只觉他死信一到，我神经上大受打击；
无事静坐时，一想到他，便不知不觉说——“可怜！”

记得两年前，我与他相见，
同在一个上海朋友家里。
那时候，室中点着盏暗暗的石油灯，
我两人靠着窗口，各自坐了张低低的软椅，
我与他谈论西洋的诗，
谈了多时，他并不开口，只是慢慢地吸着雪茄。
到末了，忽然高声说——
“半农这个时候，你还讲什么诗，求什么学问！”

三、杀出旧文学营垒

1916年冬。中华书局的冬天似乎更加寒冷难熬。书局的财政出现了

危机。无奈，刘半农只能辞职。辞职后的半农，暂且又回到了老家江阴小住。

从1912年开始，半农用“半农”的笔名撰稿，在上海已经有五年了。这个五年，整个上海就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缩影。黄浦江畔租界麇集，十里洋场魑魅横行。辛亥革命表面轰轰烈烈，但由于资产阶级自身的缺陷造成革命的不彻底性，很快胜利成果就给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北洋军阀篡夺。那时的中国，就如陷入了不能自拔的泥潭，郁闷、瘀滞、猥琐、“瘴疠”丛生。很快，为迎合这种社会现象的各种低级趣味的报刊应运而生。这也为从清末开始出现的“鸳鸯蝴蝶派”小说推波助澜。一时间，各种“鸳鸯蝴蝶派”的杂志和黄色小报充斥街头。

刘半农恰恰正是这个时候走上了文坛。五年中，他著、译的作品有四十多篇，优劣杂陈，而交际的人物也有不少属于鸳鸯蝴蝶派作家。不仅初入文坛时有“鸳鸯蝴蝶派”作家徐半梅、江焕卿引领，就是后来，与张恨水、包笑天等也有交往。他发表的阵地《小说海》、《礼拜六》、《小说月报》、《小说时报》、《小说丛报》、《小说画报》、《小说新报》、《小说大观》、《中华小说界》等等，也往往是“鸳鸯蝴蝶派”小说的主要阵地。这样，有人认为，刘半农就是属于“鸳鸯蝴蝶派”作家。其实，刘半农与那些真正的“鸳蝴派”是绝然不同的。

首先，他的作品涉猎内容广泛：警世、侦探、滑稽、社会、哀情、醒世、实业、言情、实事、宫廷、国事、历史、哲理、政治、刺世等十多种。这与当时鸳蝴派文人专写“消闲”、“娱乐”的“红男绿女”是不同的。他的作品，大都反映了一定的思想深度。如《小说月报》连载的《稗史罪言》，作者用一万五千字的篇幅，给人们展现了当时城乡官绅结合，鱼肉百姓，横行乡里的生动画面。刊登在《小说画报》上的《催租记》在揭露阶级对立，描写劳动人民苦难方面比《稗史罪言》更深一层。作者在文中通过巧合的故事和强烈的对比，狠狠鞭笞为富不仁者，立场明显站在王老五、七哥这些工人形象一面。而《小说画报》上的《奴才》，则运用冷嘲热讽的手法，鞭挞了洋大人屁股后的中国叭儿狗。明显体现了他振奋民族精神、疗救媚外痼疾的思想。《小说画报》的《可怜之少年》，通过一个贫苦少年，初到上海骤然发迹又迅速败落的演变史，为那些崇尚浮华、不务正业的青少年敲响警钟。他的这些作品在当时旧中国腐败堕落的气氛中，无疑是一阵清风，一副清醒剂。只不过，这时的

刘半农毕竟年轻，出道时间不长，还没有太多的话语权，那强大的陈腐和微弱的呼喊不成比例。

其次，刘半农是从翻译作品走上文坛的。五年中，他向读者介绍了俄国的列夫·托尔斯泰、屠格涅夫，丹麦的安徒生，美国的夸德氏，英国的柯南达里、马夏尔尼等等，还与人合作翻译了《福尔摩斯探案全集》，这在当时，对开阔人们视野，促进中外文化交流，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所以，就是当时代的鲁迅也曾高度评价刘半农“他跳出鸳鸯派，骂倒王敬轩，为一个‘文学革命’阵中的战斗者。”（《花边文学·趋时和复古》）挚友钱玄同说：“半农在上海任日报编辑，整日写那些人所谓的红男绿女派小说，普通人即谓礼拜六派人物。但实际说来，半农写小说，绝不与那礼拜六派相同，他有他的主张，绝不与那一般红男绿女派同流合污……”（《刘半农先生追悼会上的报告》）

但是，不可否认，早年的半农，受过旧文学旧文化的熏陶，步入文坛时又是鸳鸯派火红一片的时候。他的言情、哀情一类文章，也写过才子佳人两情相悦的故事，历史宫廷一类，也有宫闱秘史之类的消闲作品，侦探、滑稽一类以曲折离奇、逗乐开心取悦读者。

然而，半农来自社会底层，坎坷的家世，艰苦的生活，军营的生涯，独特的地域文化造就的善于独立思考，不肯同流合污的个性，决定了他早期与鸳鸯派的貌合神离，也决定了他日后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名旗手。

半农带着他最初五年的文学实践和探索，带着他从中获得的快乐和郁闷以及体味和思考回到老家江阴。他多么希望天边划过一阵惊雷，打破这摇摇欲坠的大厦，荡涤这漂浮着恶臭的旧文学之风，出现一片清新灿烂的文学创作天空啊！

南菁书院的图书楼里，又出现了一个久违的身影，这是刘半农。在家小住，小城，毕竟是小城，只有书院才有最新的书刊。

半农随手翻阅着最新的《中华学生界》、《小说海》、《小说大观》，那里几乎都有他的新作。然而，当他翻阅到《新青年》二卷五号的时候，他的眼光被一篇文章吸引了：《文学改良刍议》，作者是胡适。文章开门见山提出：“吾以为今日而言文学改



胡适



陈独秀

良，须从八事入手。八事者何？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滥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半农一口气将胡适对“八事”的详细诠释认真读完。这一读，犹如在本来泛着涟漪的心中投下了一块巨石。那感觉是又疼痛又惊喜。疼痛的是，原本老师们谆谆教诲的典故章法，文章先贤们的示范是金科玉律，怎么说不是就不是了呢？如果这样的话，那是不是自己这五年的文学创作，就是一文不值的东西了呢？这，这，这简直太让人猝不及防啦！而惊喜却不那么清晰，是胡文将自己有别于那些消闲文人哼哼唧唧的思想进行了厘清和诠释呢？还是胡文在这个沉闷的铁桶里捅了个窟窿使人感到空气清新的畅快呢？说不准，但总是有丝丝的快感。

从书院出来，半农刚才的激动，渐次平静。哎呀，充其量是一篇文章，在这个世道里，一篇文章能有多少威力呢？就如自己在作文做人方面做出的努力一样，会闹得出什么大动静来呢？

这种平静，大约持续了个把月，一本新的《新青年》让半农感到了文化界的气候要变了。这是第六号《新青年》，半农读到了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如果说，胡文给刘半农是一记鸣钟，那么陈文就是一声炮响了。这阵炮响，将半农的灵魂震得猛烈发抖：

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何自而来乎？曰，革命之赐也。欧语所谓革命者，为革故更新之义，与中土所谓朝代鼎革，绝不相类；故自文艺复兴以来，政治界有革命，宗教界亦有革命，伦理道德亦有革命，文学艺术亦莫不有革命，莫不因革命而新兴、而进化。近代欧洲文明史，直可谓之革命史。故曰，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乃革命之赐也。吾苟偷庸懦之国民，畏革命如蛇蝎，故政治界虽经三次革命，而黑暗未尝稍减。其原因之小部分，则为三次革命，皆虎头蛇尾，未能充分以鲜血洗净旧汗；其大部分，则为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底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莫不黑幕层张，垢污深积，并此虎头蛇尾之革命而未有焉。此单独政治革命所以于吾之社会，不生若何变化，不收若何效果也。推其总因，

乃在吾人疾视革命，不知其为开发文明之利器故。孔教问题，方喧嚷于国中，此伦理道德革命之先声也。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国风”多里巷猥辞，“楚辞”盛用土语方物，非不斐然可观。承其流者，两汉赋家，颂声大作，雕琢阿谀，词多而意寡，此贵族之文、古典之文之始作俑也。魏、晋以下之五言，抒情写事，一变前代板滞堆砌之风，在当时可谓为文学一大革命，即文学一大进化；然希托高古，言简意晦，社会现象，非所取材，是犹贵族之风，未足以语通俗的国民文学也。齐、梁以来，风尚对偶，演至有唐，遂成律体。无韵之文，亦尚对偶。“尚书”、“周易”以来，即是如此。〔古人行文，不但风尚对偶，且多韵语，故骈文家颇主张骈体为中国文章正宗之说。（亡友王无生即主张此说之一人）。〕不知古书传钞不易，韵与对偶，以利传诵而已。后之作者，乌可泥此？东晋而后，即细事陈启，亦尚骈丽。演至有唐，遂成骈体。诗之有律，文之有骈，皆发源于南北朝，大成于唐代。更进而为排律，为四六。此等雕琢的、阿谀的、铺张的、空泛的贵族古典文学，极其长技，不过如涂脂抹粉之泥塑美人，以视入股试帖之价值，未必能高几何，可谓为文学之末运矣！韩、柳崛起，一洗前人纤巧堆垛之习，风会所趋，乃南北朝贵族古典文学，变而为宋、元国民通俗文学之过渡时代。韩、柳、元、白，应运而出，为之中枢。俗论谓昌黎文章起八代之衰，虽非确论，然变八代之法，开宋、元之先，自是文界豪杰之士。吾人今日所不满于昌黎者二事：

一曰，文犹师古。虽非典文，然不脱贵族气派，寻其内容，远不若唐代诸小说家之丰富，其结果乃造成一新贵族文学。二曰，误于“文以载道”之谬见。文学本非为载道而设，而自昌黎以訖曾国藩所谓载道之文，不过抄袭孔、孟以来极肤浅极空泛之门面语而已。余尝谓唐、宋八家文之所谓“文以载道”，直与八股家之所谓“代圣贤立言”，同一鼻孔出气。以此二事推之，昌黎之变古，乃时代使然，于文学史上，其自身并无十分特色可观也。元、明剧本，明、清小说，乃近代文学之粲然可观

者，惜为妖魔所厄，未及出胎，竟尔流产，以至今日中国之文学，委琐陈腐，远不能与欧洲比肩。此妖魔为何？即明之前后七子及八家文派之归、方、刘、姚是也。此十八妖魔辈，尊古蔑今，咬文嚼字，称霸文坛，反使盖代文豪若马东篱，若施耐庵，若曹雪芹诸人之姓名，几不为国人所识。若夫七子之诗，刻意模古，直谓之抄袭可也。归、方、刘、姚之文，或希荣誉墓，或无病而呻，满纸之乎者也矣焉哉。每有长篇大作，摇头摆尾，说来说去，不知道说些甚么。此等文学，作者既非创造才，胸中又无物，其伎俩惟在仿古欺人，直无一字有存在之价值，虽著作等身，与其时之社会文明进化无丝毫关系。今日吾国文学，悉承前代之敝，所谓“桐城派”者，八家与八股之混合体也；所谓“骈体文”者，思绮堂与随园之四六也；所谓“西江派”者，山谷之偶象也。求夫目无古人，赤裸裸的抒情写世，所谓代表时代之文豪者，不独全国无其人，而且举世无此想。文学之文，既不足观，应用之友，益复怪诞：碑铭墓志，极量称扬，读者决不见信，作者必照例为之；寻常启事，首尾恒有种种谰词；居丧者即华居美食，而哀启必欺人曰“苦块昏迷”；赠医生以匾额，不曰“术迈岐黄”，即曰“著手成春”；穷乡僻壤极小之豆腐店，其春联恒作“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此等国民应用之文学之丑陋，皆阿谀的、虚伪的、铺张的贵族古典文学阶之厉耳。际兹文学革新之时代，凡属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均在排斥之列。以何理由而排斥此三种文学耶？曰，贵族文学，藻饰依他，失独立自主之气象也；古典文学，铺张堆砌，失抒情写实之旨也；山林文学，深晦艰涩，自以为名山著述，于其群之大多数无所裨益也。其形体则陈陈相因，有肉无骨，有形无神，乃装饰品而非实用品；其内容则目光不越帝王权贵，神仙鬼怪，及其个人之穷通利达。所谓宇宙，所谓人生，所谓社会，举非其构思所及，此三种文学公同之缺点也。此种文学，盖与吾阿谀、夸张、虚伪、迂阔之国民性互为因果。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使吾人不张目以观世界社会文学之趋势，及时代之精神，日夜埋头故纸堆中，所目注心营者，不越帝王、权贵、鬼怪、神仙与夫个人之穷通利达，以此而求革新文学，革新政治，是缚手足而敌孟贵也。欧洲文化，受赐于政治科学者固多，受赐于文学者亦不少。予受卢梭、巴士特之法兰西，予尤爱虞哥、左喇之法兰西；予爱康德、赫克尔之德意志，予尤爱桂特郝、卜特曼之德意志；予爱培根、

达尔文之英吉利，予尤爱狄铿士、王尔德之英吉利。吾国文学界豪杰之士，有自负为中国之虞哥、左喇、桂特郝、卜特曼、狄铿士、王尔德者乎？有不顾迂儒之毁誉，明目张胆以与十八妖魔宣战者乎？予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

刘半农一口气读完陈独秀的文章，头上蒸腾出一头的汗气，他喃喃地说：“振聋发聩，振聋发聩啊！”

这声响确实大了些，文学革命的序幕由此拉开，当人们站在遥远的历史欣赏那段时光时心情显得轻松，而身处革命之中的人们，又如何轻松得起来？任何一句肯定或否定的言辞就会关系到一个个具体的人、具体的事啊。但是，即便如此，当革命的潮涌已经到了你的面前，你是必须做出严肃的选择。

上海滩的泥淖，没有淹没刘半农的果敢勇毅的个性，独特深刻的审视社会的眼光以及对时代风云变化的敏感。刘半农多么希望来一场疾风暴雨，荡涤这令人窒息的沉闷空气。他已经做好准备，勇敢地站上了潮头。他要冲出旧文学的堡垒去了！

第四章 北大执教

一、投稿《新青年》

胡适与陈独秀的文章，仿佛两座思想的丰碑，兀地矗立在刘半农这个文学青年的面前，让刘半农在猝不及防之下，却感到阵阵欣喜。他们的观点太新鲜了。闭关自守的中国太落后，尊孔复古的思潮太窒息人，上海滩文学红男绿女的奢靡之风太销蚀民族斗志。对，国家的希望确实应该寄托在广大的青年身上，时代的进步要借助先进的思想。胡适、陈独秀、李大钊、钱玄同……一个个新鲜的面孔，春风雨露般的思想与精神，让刘半农觉得前所未有的神清气爽。刘半农回想之前自己认为的那些写作大腕儿，在与《新青年》的这些人相比之下，其思想深度，精神境界，真的是天壤之别呀！真的是那句老话，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这些人才是自己要找的良师益友啊。



《新青年》杂志封面

1916年深秋的一天，《新青年》编辑部来了一位新青年。这是刘半农。刘半农这阵子认真拜读了每一期《新青年》，他想拜访一下思想敏锐、言辞激进的陈独秀。陈独秀来了，还未开口，那浑身透出的精气神，就如他的文章一样硬朗，让刘半农感到春风扑面。陈独秀十分欢迎刘半农的来访。两人畅谈了许久。刘半农深深为陈独秀敏捷的思想和矫健的谈锋所折服，为他热情、诚恳、傲视一切的精神和追求真理的执著而感动。他想，中国如果没有这样的脊梁，这沉默的空气，不知要到牛年

马月才会消失。“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刘半农从他们的身上汲取了追求真理的动力，从他们指引的方向看到了文化发展的前途。

陈独秀热情地向刘半农组稿，刘半农真诚地答应了约请。

《新青年》正在向读者热情介绍外国先进思潮的文章，如：《法兰西人与近代文明》、《现代文明史》、《现代欧洲文艺史谈》、《近世思想中之科学精神》、《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等等。他就努力从这方面搜集材料，分析研究，形成文字。1916年10月，他以《灵霞馆笔记》为总题，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二期上，发表了翻译作品《爱尔兰爱国诗人》，文中介绍了柏伦克德的《火焰诗七首》、《悲天行三首》、麦克顿那的《咏爱国诗人 On a Poet Patriot 三首》、皮亚士的《割爱六首》、《绝命词两章》。刘半农的译著，宣扬了爱国主义、英雄主义、个性解放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使当时的读者耳目一新。如柏伦克德的《火焰诗》：

我昔最惧死

不愿及黄泉

自数血战绩

心冀日当天

日当天

血腥尽散如飞烟

我何有

有两手

洪水可治之

敌来斩其首

投荒蹈海我不辞艰难

欲喋我血我不走

天道欲战 我则操戈

帝心欲战 我剑是磨

我唯顺帝命

不问我敌之文野如何

异日歼敌

听我凯歌

诗歌爱国的精神，激昂的斗志，以及与敌斗争视死如归的英雄主义精神，深深感动着读者，激发了人们爱国的情绪。

接着，刘半农又连续发表了《欧洲花园》、《拜伦遗事》、《阿尔萨斯之重光》、《缝衣曲》、《马丹撒喇倍儿那》等文章，以昂扬的斗志宣传科学，宣传民主。

《灵霞馆笔记》的发表，是刘半农与《新青年》关系的开始，也是刘半农从一个旧式文人，杀出重围登上新文化运动前列的开始，也是他杂文写作的发轫。刘半农，在那样一个鱼目混珠的年代，做出这样的选择，走出这至关重要的一步，需要多大的智慧和多大的勇气啊。刘半农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作家，但更主要的是，他是一位极有开拓精神，敢于站在时代风口浪尖上前行的作家。而这一切，都是建立在他尊重历史，尊重事实，追求光明，追求真理的精神之上。

二、北大来了位年轻教授

刘半农在《新青年》上崭露头角，立刻引起了国立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注意。

蔡元培（1868.1~1940.3），字鹤卿，又字仲申、民友、子民，乳名阿培，并曾化名蔡振、周子余，汉族，浙江绍兴山阴人，原籍诸暨。革命家、教育家、政治家。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1916年至192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革新北大，开学术与自由之风。蔡元培数度赴德国和法国留学、考察，研究哲学、文学、美学、心理学和文化史，为他致力于改革封建教育奠定思想理论基础。曾任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人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他为中国新文化教育事业，建立中国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做出了重大贡献，堪称“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蔡元培

1917年，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职务不久，正是他意气风发锐意改革之时。蔡元培广延厚德积学、革新开拓之教员。在灯红酒绿的上海冒出来的刘半农备受他的关注，同时，陈独秀

和原常州府中学堂校长屠元博也力举了刘半农，这样，当时只有26岁、常州府中学堂肄业的刘半农，在1917年，被蔡元培破格聘请为北京大学预科国文教授。



1917年的北大

刘半农接到蔡元培的聘书时，感到仿佛在

做梦。要知道，这时的刘半农从中华书局辞职之后回到江阴老家，生活上又经历了一个非常艰难的时期。没有经济来源，常常靠变卖家里的什物维持生活，有时连猫食都买不起。妻子朱惠不得不常常到娘家借钱对付日子，而娘家也不是有钱人家啊。突然，北大那个神圣的学府要自己去当教授，这个反差来得太快也太大了吧！这时，只有弟弟刘天华相信，他一向佩服哥哥的才华，相信以哥哥的聪明才智早晚会出人头地，做出一番大事业，现在机会终于来了，天华为哥哥高兴啊。

1917年的夏天，确实是刘半农人生道路的一个极大转折。这么多年来寻寻觅觅，这么多年的苦苦探索，刘半农终于登上了一个不平凡的新台阶。这个台阶，蕴藏着中国深邃的国学资源，包容着传统与新锐的文化与思想。刘半农终于得到了一片肥沃的土壤。

初到北大，刘半农独自一人前往。面对一个陌生的环境，自己还没有任何立足的资本，拖家带着多有不便。一个人，多自由，可以专心投入工作。他借住在北大三院教员休息室后的小屋里。三院的门前，有一条蜿蜒的小河，河水清澈，垂柳依依，晨钟暮鼓里，刘半农经常在这里闲庭散步，一边散步，一边思考问题，从嘈杂的上海，来到这样一种神圣、宁静而飘满书香的环境里，刘半农真的是心旷神怡，他把这条河叫作“北大河”。

但是，小环境安静，不等于世道太平。

这时的北京，正是“五四”前夕。清皇朝的龙幡早已被民主共和的五色旗所替代。1916年3月，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被迫取消了帝制，然而，各路封建军阀的明争暗斗愈演愈烈。以北京为中心，政治动荡不安。先有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后有张勋复辟帝制；十一天后，段

祺瑞组织“讨逆军”又赶走张勋；之后，直系军阀冯国璋又当上了代理大总统；第二年，段祺瑞又挑起了“武力统一”的南北战争，并操纵国会选举清朝大官僚徐世昌为大总统；曹锟、吴佩孚等人也相继崛起称霸一方。在各个帝国主义列强的操纵下，北京乃至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如走马灯似的上演一幕幕傀儡戏。走在北京的土地上，就连空气里都仿佛弥漫着硝烟和血腥。在北京，刘半农对国家民族担忧的感触，比在上海时更加清晰了。刘半农常常徜徉在天安门前，看着那斑驳陆离的雕梁画栋，抚摸着冰冷的石狮子，心中翻滚着不可言状的心酸与愤懑。这头睡狮，你何时醒来，何时腾跃啊？刘半农常常在心中这样痛苦地发问！

初到北京，刘半农为北京古老的文明吸引着，他喜欢那温馨的四合院，窄窄的小胡同，拖着京腔的叫卖，琉璃厂、正阳门桥头小摊上的古籍、折扇、笔墨纸砚。但也厌恶那形形色色杂色人种的不可一世的喧闹，国人卑躬屈膝脸面，以及随地吐痰解溲的恶习。

刘半农最最喜欢的还是香山。香山是他神往的地方，第一次游香山，他心情非常激动。他租了一匹马，迎着朝阳走去，一路上，北方原野的风景使他心旷神怡。农舍、炊烟、老牛、牧童，这恬淡的情景令他想起



北京香山公园

远在千里之外的江南老家。来到香山脚下，那景致更让刘半农流连忘返。满山红叶此时是碧绿碧翠，山峦起伏，白云飘飘，刘半农想，要是秋季来赏红叶更

是一件神仙美事了。正当他沉醉美景之时，只听一阵嘈杂，原来一群公差正在鞭打一个欠租的老农。刘半农大声呵斥他们住手，一问，原来是欠了五斗租粮。这活生生的一幕，不仅让刘半农一天的好心情烟消云散，忧国忧民的阴云更浓重地笼罩了心头。这世道，哪里是个头啊。他写下了《游香山纪事诗》：

公差捕老农，牵人如牵狗
老农喘且噓，负病难行走
公差勃然怒，叫嚣如虎吼
农或稍停留，鞭打不绝手
问农犯何罪，欠租才五斗

——《扬鞭集》

中国的科举制度在清末“新政”中，因学习西方及日本学制而改变，于1905年被废除。到了民初，高等教育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尤其是北京大学，在校长蔡元培的领导下，引进了开放的学风，提出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李大钊、陈独秀、章士钊、胡适、辜鸿铭（教英国文学）、刘师培、鲁迅（教中国小说史）、钱玄同（教音韵学）、吴梅（教戏曲史）、刘半农（教新文学）等都被聘请来北大任教。北大同时注重培养学生独立自主开放进步思想和精神，这种思想和精神成为了“五四”运动的重要动力。

北大的成就，与蔡元培的杰出贡献分不开的。蔡元培自己是科举出身，但他冲破封建藩篱，大胆革新教育，其勇气和胆略可嘉。1917年，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之后，力主学术平等，设立了英、法、日、德、俄各国文学系。拓展了解各国文化。同时主张男女平等，大开学禁，允许女生入学；尤其是兼容并包的用人主张，括三江而襟四海，无论政治态度如何，只要有一技之长都可罗列进北大。其胸襟之开阔，旷古少见。这样，一时间群贤云集，学派林立，一派生机。激进的民主主义革命家陈独秀担任文科学长；早期的共产主义者李大钊担任图书馆主任；来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博士胡适以及鲁迅、沈尹默、沈兼士、朱希祖、马幼鱼、钱玄同、周作人等也被聘为执教。但在一批新锐的身旁，另一批行为怪癖的遗老遗少也还在校园里煞有介事地高谈阔论，目空一切地品头论足。如，“八部书外皆狗屁”的黄侃（季刚）、脑后拖着黄毛辫的辜鸿铭，穿西装留光头的许守白，以及刘申叔、林公铎等。

年仅26岁，既没有博士头衔，又不是科举及第，仅仅高中肄业的刘半农，偏偏就这时风风火火闯进这个外界看来是高深莫测的最高学府。可想而知，他周遭的人际关系便十分的敏感和微妙了。从大洋彼岸回来的海归派胡适，便是瞧不起刘半农的一个。一个喝了洋墨水，吃了面包

奶酪的博士，与一个高中肄业的寒士，自是不可相提而论。甚至在某些场合，明白着说出，北大的教员，应该讲究学历之类的话。周作人在《知堂回忆录》里这样说：“英美派的绅士很看他不起，明嘲暗讽，使他不安于位……”这确实很伤自尊。但是即便如此，刘半农还是非常冷静地看待这一切。他不气馁，不退缩，唯有加班加点地苦读进修，士为知己者死，他要为蔡校长争口气。

第一学期，他在预科班上课，不久就调到本科班任教。并且在北大文科研究院担任诗歌、小说、文典编纂法、语典编纂法的教学工作。站在讲台上，年轻的刘半农精神充沛，朝气蓬勃，同时，他天生的幽默和机敏不时激发授课语境的智慧火花。就是枯燥的文法，他都能讲得口若悬河，妙语连珠。尤其使学生为之倾倒的是，他不仅对讲课内容进行独具匠心的安排、革新，其讲课风格上也时时闪烁着哲理的思辨和文学的迷彩。学生太喜欢这位年轻的教授了。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语法学者中，一批希望不更动《马氏文通》体系的学者，称之为“修正派”，而另一派企图推翻《马氏文通》，在研究对象、内容、方法上进行引进、借鉴、充实的叫“革新派”。刘半农的《中国文法通论》就是革新派的主要著作之一。

《中国文法通论》（1920年，群益书社）是刘半农这一时期的教学讲义。该书模仿斯维特在《新英语语法》中的研究方法，以先秦古文为主要研究对象，兼收一些现代汉语的例证。说明文法是什么，其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论述了词的分类、搭配关系及句子的结构与分类。主张研究现代口语。语法著作他还有《中国文法讲话》（上册）（北新书局，1932年）一书。刘半农的语法著作，为青年对国文的理解，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这一时期，刘半农还和周作人、胡适等一起成立了北京大学国文门研究所小说科研究会，他参加了历次会议并作讲演。他讲演的内容有《中国之下等小说》、《通俗小说之积极教训与消极教训》等。刘半农强调要用历史的、系统的、比较的方法研究小说。他的演讲，结合实践，旁征博引，深入浅出，十分受学生的欢迎。

《中国之下等小说》一文，是刘半农依据常年搜集的两百多种小说，进行综合研究的成果。他在文中要求创造平民派新小说，肯定了大鼓、宝卷、唱本、俚语等民间文艺、通俗文艺的价值。要求描写民间生活，

吸取民间文艺和通俗文艺的营养，创造平民文艺。

《通俗小说之积极教训和消极教训》一文里，他认为：“通俗小说”就是“合乎普通人民的，容易理会的，为普通人民所喜悦所承受的”小说。如《今古奇观》、《七侠五义》、《三国演义》等等。这类小说，有“纪述善事，描摹善人，使世人生羡慕心，摹仿心”的“积极教训”；有“纪述恶事，描摹恶人，使世人生痛恨心，割除心”的“消极教训”。他认为，写通俗小说的人，首先要有社会责任感，不写那种海淫海盗的东西。其次，在方法上，与其用“消极教训”，不如用“积极教训”；与其谩骂，不如婉讽；与其正面直写，不如侧面曲绘其愚等等。最后，他还说，在“通俗小说”盛行之时，要加以积极的研究和引导。而有朝一日“到将来，人类的知识进步，人人可以看得陈义高尚的小说”的时候，“通俗小说”将自行消亡。

刘半农以一个有着丰富实践经验的小说家的身份，北大教授资格，站在广大劳动人民的立场上，深刻系统地分析了为学院派文人所不齿的下等小说和通俗小说，不仅开辟了一片文学研究的处女地，也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推波助澜。人们即使站在 21 世纪的今天，回眸他的研究成果，依然不能不心生佩服！

三、改名

从上海滩的知名小说家到北大教授的刘半农，让人怎么看都觉着新鲜。新鲜的是，他年轻，身穿干净的长衫，脚蹬铮亮皮鞋的年轻的刘半农骨子里透着朝气。短短的头发，脑袋瓜又十分发达，炯炯有神的眼睛和棱角分明的嘴角，总是透着一种江南人的细致和江阴人的执拗和倔强。

但是，由于从小接受旧文化的教育，以及较长时间进出在上海小说圈，他还是不时流露出一一点“才子气”。周作人回忆说：“当初刘半农从上海来北京，虽然有志革新，但有些古代传来的‘才子佳人’思想还是存在，时常在谈话中间要透露出来，仿佛有羡慕‘红袖添香’的口气，我便同了玄同加以讽刺，将他的号改为龚孝拱的‘半伦’，因为龚孝拱不承认五伦，只余下一妾，所以自认为只有半个‘伦’了。刘半农经不起朋友的攻击，逐渐放弃了这种旧感情和思想，后来出洋留学，受到西欧尊崇女性的教训，更是显著有了转变了。”（《知堂回想录》）

鲁迅在《且介亭杂文·忆刘半农君》中也说到：“几乎有一年多，他没有消失掉从上海带来的才子必有的‘红袖添香夜读书’的艳福的思想，好容易才给我们骂掉了。”

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刘半农一边在北大教书，一边仍然在给《新青年》撰稿。同时也为《小说画报》、《小说海》、《小说大观》、《小说月报》、《小说时报》等刊物写小说。《看护妇》、《目光杀人案》、《失魂药》、《髯侠复仇案》、《女侦探》、《兄弟侦探》等一系列小说，就是这个时候的作品。这时，他与旧文坛实际还没有彻底脱离关系。

独自一人在北京工作的刘半农，不时会有思乡感，这也难怪啊。世事艰难，除了紧张的教学工作，参加社会活动，他还要认真地编写讲义、撰写小说。常常忙碌到夜深人静，看着窗外明静的新月，或微微的细雨，温柔攀援的紫藤，或凋零飘飞的落叶，耳畔听着隐隐狗吠和沙沙作响的夜风，一种孤独的感觉弥漫周遭。诗人的情感本来就敏感，这样，刘半农更加：“转侧不成眠，何事梗心头”了。他从担忧国家民族，到思考人生前途，到思念故乡亲人。是诗人天生的抑郁气质呢，还是这社会，这人生将太多的素材提供给了刘半农呢？

我来江北已半年，今日初听一宵雨。

若移此雨在江南，故国新竹添几许？

——《扬鞭集》

河水结冰坚，刁斗中宵静。

相见江南人，独把寒砧打。

——《扬鞭集》

岁月流转，刘半农熟悉着人们，人们也在熟悉刘半农。不久，鲁迅、周作人、钱玄同等都成了他的好朋友。

钱玄同，为人耿直，治学严谨。1913年到北京，任国立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国文、经学教员，之后，长期在国立北京大学兼课。1917年加入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为会员，兼任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常驻干事，致力国语运动。他讲授的课程，以音韵学为主，还有“说文研究”、“经学史略”、“周至唐及清代思想概要”“先秦古书真伪略说”等。并长期任国文系主任。1917年，他向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杂志投稿，倡导文学革

命，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揭幕人之一。1918年至1919年的《新青年》杂志，钱玄同是轮流编辑之一。在这期间，他曾动员鲁迅给《新青年》写文章。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就是钱玄同催促他写出的头一篇作品，并且头一次用鲁迅作笔名。《狂人日记》不但是篇白话文，而且是攻击吃人的礼教的第一炮。钱玄同在教学和学术研究方面的贡献也是很显著的。他所著的《文字学音篇》是中国高等学校最早的音韵学教科书。数十年来，影响颇大，迄今仍为音韵学家所称引。

鲁迅，原名周树人。二弟周作人，三弟周建人，号称“周氏三兄弟”。鲁迅是中国著名文学家、思想家、评论家、革命家。当时他虽然也是北大兼职教员，但是，一来因为周作人的关系，二来因为《新青年》的关系，他和刘半农在这时期交往甚密，两人经常有书信来往，刘半农还常常去鲁迅家造访。空闲时经常相约宴饮，交流思想，探讨时事。朋友之间就连家中许多私事也互相关照帮忙。周家兄弟



鲁迅

和钱玄同，都把这个年轻的刘半农视作小弟，不仅在生活上多有关照，就是思想上也是经常引导、影响着他。上海滩上带来的“才子气”，也就是在这样的氛围和关系下，慢慢被摆脱。共同的革命理想，共同的斗争目标，使得他们不仅成为忘年交的老朋友，更是成为了革命的战友。

由于早年刘半农写过五年小说，所以，往往当他批评某些人的陈词滥调时，他们就反戈一击，讽刺说：“你以前呢？半依不是你么？阿要面皮嘎？”这使得刘半农心中非常愤懑。1918年，他在《新青年》发表《应用文之教授》时，毅然将“半依”改为“刘半农”。决心不再用原来的软绵绵的上海人的“依”。而要用手中的笔为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去鼓吹去战斗。这一字之改，其实反映了刘半农思想的又一次革命性的升华。鲁迅在《辱骂和恐吓绝不是战斗》一文中说：“一个作者自取的别名，自然可以窥见他的思想。”刘半农的改名，其实是他和旧我、旧文化、旧文化圈的一次决裂。

1918年时的北大，犹如当时中国社会一般，鱼龙混杂，教员中间，有表面道貌岸然，暗地里出没花街柳巷的；有沉迷赌台，热衷“红中白

皮”的；有当了教授休了糟糠之妻的；也有在外兼着一官半职，操着政治支票的。蔡元培为改变校风，在北京大学成立“进德会”，对会员作出规定：“甲种会员——不嫖、不赌、不娶妾；乙种会员——于前三戒之外，加不作官吏、不作议员二戒；丙种会员——于前五戒外，加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进德会成立后，有较为严明的罚章，并有纠察严加监督。

是年7月，刘半农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公开声明加入该组织。署名同意恪守规定。表现出他做好破旧立新的思想准备和心理准备。一个朝气蓬勃崭新的刘半农已经站到了革新浪潮的前头，做好了搏击风浪的准备……



刘半农手迹

第五章 “五四”先驱

一、文学革命的急先锋

中华民国成立之后，新文化运动进入新阶段，后来被人称为“五四”新文化运动。1912年，蔡元培、唐绍仪、宋教仁、汪精卫等26人奉孙中山命令从上海坐船到北京去迎接袁世凯南下就任临时大总统。就在船上，他们讨论民国成立了，老百姓的素质跟不上怎么办。他们组织社会改良会，发表了宣言，号召“尚公德，尊人权，平贵贱等……以人道主义去君权之专制，以科学知识去神权之迷信”。提倡“有财产独立权”，“个人自立”，“实行男女平等”，“提倡自主结婚”，“承认离婚之自由”，“提倡改良戏剧及诸演唱业”，等等。

蔡元培任教育总长，下令废除读经；确立新的教育方针，“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应剔除这陈腐内容；提倡自由、平等、博爱，为新的道德规范。新文化的要求被纳入学校教育。包括袁世凯在内的历届北洋政府，总的说来都没有废除这些改革成果。民国成立，言论和出版自由达到新的高度，思想文化空前活跃，法治、宪政、男女平等、妇女参政的争论纷至沓来。这些活动推动了新阶段的思想文化变革。

1915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很快成了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的旗帜。创刊词《敬告青年》提出6条宗旨，概括起来是“以科学与人权并重”，“若舟车之有两轮焉”。从1919年开始，改为“民主与科学”，但基本内容未变。

新文化运动是自由的思想文化活动，在认同大方向的前提下，各说各话，有的观点甚至颇为偏激。但新文化运动的成果是有目共睹的：

新文化运动改变了中国知识阶层的基本观念。自由、法治、民主，

这些外国的东西慢慢变成中国知识阶层的共同语言，为中国的社会转型打下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同时，这次运动推动了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制度的建立。从清末慢慢开启，社会转型、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逐步法制化，辛亥革命后，更成为不能侵犯的公理，并有法律保障。袁世凯时代有一些法律限制言论自由，随着他退出历史舞台，那些限制被取消了。有的军阀干政、杀人、杀记者。但基本制度建立起来了，违法勾当有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这就保证“五四”前后，出现了一个学术文化的黄金时代。

现代教育制度特别是大学制度的建立，也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部分。1912年，蔡元培出任教育总长，废除读经，确立新的教育方针，提倡新的道德规范，意味着一个新的文化教育制度的诞生。1917年他接任北京大学校长，把中国的大学引向与国际接轨的康庄大道：学校自治，教授治校，学术自由，影响了全国。甚至中学也起而仿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成果。

新文化运动使语言文字合一，实现了表达工具的转换，满足了社会信息快速交换的需要。1920年1月12日，教育部接受全国教育联合会的建议，通告国民学校一二年级的国文课本改为语体文，大大减轻了儿童的负担。

思想的解放使中国人文社会学科出现了高潮迭起的可喜景象，造就了大批大师级的人物。翻开20世纪学术史，所有的现代人文学科都是在此时奠基。

文学艺术也由此进入黄金时代。白话小说、白话文学不再是不登大雅之堂的读物。在思想和表达工具双重解放的推动下，文学创作出现新高潮，小说、诗歌、戏剧、散文出现了传世之作。国画吸取了西洋成就而有了新生，各种西方艺术也开始在中国生根。

当东方的科学与艺术遇见西方的缪斯，该会发生怎样的情景呢？现在的人们想来，那一定是幻化出漫天的灿烂。这从结果上看是不错，但从过程去看，却何其一个艰苦了得呢？

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八不主义”，这“八不主义”大都说了形式上的改良，没有太多触及文学内容的革命。

1917年2月陈独秀在《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上发表《文学革命

论》，明确提出了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腐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社会文学的主张。



北大的教授们

1917年5月刘半农在《新青年》第三卷第三号上发表《我之文学改良观》，明确表态：“绝端表示同意”胡陈二人的观点。

《我之文学改良观》，先从明确“文学之界”起笔。刘半农认为，“文字”和“文学”不可混为一谈。文章对医学、哲学、新闻、公文等文体一一做了说明，厘清了它们是有别于文学的种类。再对“酬世之作”包括颂辞、寿序、挽联、祭文、墓志铭等做了剔除，最后他断言：“凡可视为文学上有永久存在资格与价值的，只有诗歌戏曲、小说杂文二种也。”

在明确“文字”与“文学”的界别后。他论证了非文学作品该注意的问题，以及文学作品该注意的问题。

然后，以大量的篇幅论证文学的改良。

他认为，散文的改良应当注意三个问题：第一曰，破除迷信。这是文学改良之先决条件，破除对古人的迷信，破除对今人的迷信。要言为心声，尽情发挥。

第二是，文言白话暂时可以处于对等地位。因为二者各有所长，又各有不相及之处，所以不可偏废。既然已经认定白话文是将来文学之正宗和文章之进化的必由之路，那么就应该做到“言文合一”。或“废文言而用白话”。但是这种改革并非一蹴而就的事，应当力求使文言浅显与白话对接，使白话尽量吸收白话凝练、传神的优点，化文言为白话，促使文言早日淘汰。

第三，不用不通之文字。用典不通，用字不通之现象必须彻底扫除。

在谈到韵文时，刘半农认为：第一，要破坏旧韵，创造新韵。这是

主要针对旧诗用韵袭古现象而说的。他认为这种“今但许古人自然，而不许个人自然，必欲以人籁代天籁，拘执于本音转音之间，而忘却一至重要之‘叶’字”的现象很是可笑。就如鲁迅所说“做了人类想成仙，生在地上要上天，明明是现代人，吸着现代的空气，却偏偏要勒派朽腐的名教，僵死的语言。”至于重新造韵的方法，有三种：一者，作者可以各自就土音押韵。二者，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三者，新“撰一定谱，行之于世。”如今来看，刘半农观点虽然不完全周延了新诗歌发展的事实，但新诗歌的发展，基本就是朝着这个方向前进了。

第二，要发展诗歌体裁。他列举了英国“诗体极多”则“诗人辈出”；法国“戒律极严”则诗风衰弱的现象，两相对比，大声疾呼，要“增多诗体”。他甚至提出了“无韵诗”的主张。在传统小说、散文、诗歌和“先锋派小说、散文、诗歌”竞相开放的今天，在当今文人可以挣脱各种人为桎梏放飞心灵，自由深入探讨人类生命形态、生存状态的今天，我们蓦然回首，发现这一切滥觞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滥觞于刘半农的呐喊。我们便不能不为其高瞻远瞩而钦佩！

第三，提高戏曲在文学上的地位。他认为，在白话戏曲尚未成长起来时，作者不能死守陈规，要“吾辈所填者为吾辈之曲，自宜取材于近，而不宜取材于远。”并提出改革戏曲的四点意见。

最后，刘半农就文学作品形式的改革再提意见。

《我之文学改良观》，出现在1917年文学革命之初，从文学形式、内容上提出了改革的呼声，使胡适、陈独秀首倡的文学革命有了进一步的深化，在理论上更加完整、系统、丰富，在实践上更具操作性。《我之文学改良观》一文，不仅推动了新文学革命向纵深发展，也成为现代文学史研究的珍贵的历史文献。刘半农《我之文学改良观》和后来的《诗与小说精神上之革新》、《应用文之教授》等一系列文章，为文学革命率先呐喊，积极推进，其历史功绩不可磨灭。其“五四”新文化运动闯将的形象巍然屹立。

刘半农在理论上不断探索，在实践上毫不懈怠。“五四”前夕的文坛，萎靡而颓废，形形色色的旧文学、诲淫诲盗的新帮派充斥文坛，加上封建统治者和御用文人大肆推行“尊孔读经”，散布封建思想毒素，完全形成一种背离中国传统文化精神，阻碍文学健康发展的逆流，也成为当时思想启蒙的严重阻碍。横扫一切阻碍历史潮流的污泥浊水，就成了

当时非常迫切的任务。在这场战斗中，刘半农表现得英勇无畏，足智多谋。

由鲁迅、周作人、陈独秀、李大钊、刘半农、钱玄同等组成的“《新青年》作家群”都是当时文坛上的先锋，其杂文有十分敏锐的现实针对性，或侧重社会政治问题，或侧重思想文化批判，虽然多是应时的“急就章”，却形成了富有论战色彩的共同特点，而在风格上又形成了各具个性的艺术特色。周氏兄弟的成就尤为突出。



周作人

陈独秀是《新青年》和《每周评论》主编，新文化运动首倡者，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五四”时期声望极高的政论家。他的《敬告青年》、《本志罪案之答辩书》、《偶像破坏论》、《下品的无政府党》等政论文，多用杂文笔法写成，视野开阔，气势磅礴，而又情境交融，咄咄逼人，几乎每一篇都产生过较大的影响。鲁迅曾感叹：“独秀随感究竟爽快”。



李大钊

李大钊也是新文化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他的杂文在内容和形式上都与陈独秀相近，但更擅长说理，富有激情和鼓动性，《青春》、《今》、《新的！旧的！》、《Bolshevism 的胜利》、《庶民的胜利》等名篇，都写得大气磅礴，热烈奔放，具有诗人的气质和抒情诗的特点。

刘半农是语言学家和歌谣爱好者，新文化运动中的猛将。他的杂文具有较强的艺术想象力，好用反语，善于夸张，语言明白晓畅，在当时的杂文中独显其活泼可爱的个性特点。《复王敬轩书》，以其不容置疑的雄辩力量和寓庄于谐的喜剧色彩名噪一时。《作揖主义》也以“游戏的笔墨”嘻笑怒骂，皆成文章。

1918年4月开始，《新青年》第四卷第四号开始专门设立“随感录”栏目。刘半农是专栏作家之一。他在《随感录·七》中用白话作文，针对当时一些封建余孽名为“保存国粹”，实为贩卖封建思想的状况。他毫不留情，入木三分地剥开他们的嘴脸：

这等人，恒以“融会中西，斟酌新旧”八字为其营业之商标，然其旧学问，固未尝能做得一篇通顺之文字；其新学问，亦长久未能读毕日本速成示范之讲义。以此之故，彼辈虽日日昌言保存国粹，灌输新知，而其结果，则凡受彼辈熏陶者，文字必日趋不通，知识必日趋浮薄。

在《随感录·十五》中，他对整个封建文学又是当头棒击。在《答Y.Z君》，对鸳鸯蝴蝶派，也作了深刻的批判和犀利的讽刺。在《辟〈灵学丛志〉》一文中，对上海一些人设“感德坛”扶乩，组织“灵学会”宣扬迷信复古，予以斩钉截铁的痛斥。

《新青年》的随感录的建立，成为现代杂文的策源地。后来，许多刊物都先后开辟了这样的栏目，这样就促进了现代杂文的繁荣与发展，也促进了新文学运动向纵深发展。追本溯源，刘半农等人确实有首开之功。

毋庸讳言，刘半农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一开始，就旗帜鲜明地成为这一革命的急先锋。1917年10月，他在给钱玄同的信中，将这场革命比作一场话剧，并声称：“你、我、独秀、适之四人，当自认为‘台柱’”。其无私无畏、毁誉不计的勇毅精神实在令人钦佩。体现了一个成熟的革命战士的形象。对在这场战争中始终站在反帝反封建一线英勇作战冲锋陷阵的刘半农，鲁迅在《忆刘半农君》一文中给予高度评价：“他活泼，勇敢，狠打了几次大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员猛将，刘半农无愧这个称号。

二、骂倒“王敬轩”

文学革命的蓬勃兴起，引起了封建复古派们的惊恐。但这些“桐城谬种，选学妖孽”们对新思潮，采取的扼杀手段十分讲究策略，他们首先营门紧闭，不予应战。阴死你。

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说“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没有人来反对”，郑正铎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导言》中也说：“旧文人的反抗言论竟是寂寂无闻，他们便好像是尽在空中挥拳，不能不有寂寞之感。”

如何进一步推动斗争的深入呢？

1918年3月15日，《新青年》杂志6大主编中的刘半农和钱玄同，共同导演了一出双簧戏：钱玄同假“王敬轩”之名，在《新青年》第四

卷第3号上“通信”专栏发表了给《新青年》编者的一封信，对主张新文化的人进行攻击；而刘半农则以《新青年》记者名义，在《新青年》同期的编辑回信中刊发了长达万余言的《复王敬轩书》，对王敬轩所提出的观点逐一加以驳斥。钱刘二人导演的这出双簧戏，引发了新旧两派的激烈论战，震动了“五四”运动前中国的思想界和文学界。



钱玄同

1918年初，为方便对《新青年》杂志的编辑，时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的陈独秀，将《新青年》编辑部从上海迁到了北京。当时陈独秀正忙着进行北大文科学制改革，一个人办《新青年》有点忙不过来，便在与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人的商量后，把《新青年》改成了同人刊物，由任职于北大的钱玄同、陈独秀、胡适、李大钊、沈尹默、刘半农6人轮流编辑。

《新青年》编辑们几乎绞尽脑汁，寻求扩大《新青年》的社会影响，推动当时所提倡的文学革命运动。刘半农曾在上海开明剧社做过编剧，他首先想到了双簧戏。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好友钱玄同。钱玄同是国学大师章太炎的门生，虽旧学根底深厚，却十分讨厌旧文学的做派和风格。刘半农和钱玄同两人性情相近，一个豪爽，一个坦率，在北大的教授圈子里一向过从甚密，无话不谈。刘半农的提议，两人一拍即合。于是，一个扮演顽固的复古分子、封建文化的守旧者；一个扮演新文化的革命者。两人之间展开针锋相对的笔墨大战，并期望用这种双簧戏的形式把正反两个阵营的观点都亮出来，从而引起全社会对文学革命的关注。当时，他们也为此种炒作手法有所顾忌，但为了斗争的效果，斟酌再三，他们还是决定实施。于是，便有了中国近代史上有着重要意义的“双簧”戏开场。

王敬轩的“信”，用文言写成，不加一个标点，通篇对新文化运动提倡观点加以攻击。他在“信”中说：“贵报大倡文学革命之论，权舆于二卷之末，三卷又大放厥词，几于无册无之。四卷一号，更以白话行文，且用种种奇形怪状之钩挑以代圈点……”罗列新文化运动诸多罪状，甚至攻击主张新文化的人是不要祖宗。

在《复王敬轩书》中，刘半农使用了幽默、诙谐的文风和流利畅达、

泼辣尖锐的语言。他高屋建瓴，条分剖析，切中要害，又旁征博引，于嬉笑怒骂中将“王敬轩”代表的封建文化、封建思想和封建国粹派一伙人的谬论批判得体无完肤。信中，还针对“王敬轩”提出的“且用种种奇形怪状之钩挑以代圈点”，刘半农起句即以“闲话少说”回敬之，接着展开阐述：“句读之学，中国向来就有的；本来采用西式句读符号，是因为中国原有的符号不敷用，乐得把人家已造成的借来用用。”接着讥讽王敬轩：“知识如此鄙陋，记者惟请先生去读了三年外国书，再来同记者说话；如先生以为读外国书是‘工于媚外，惟强是从’，不愿下这个功夫；那么，先生！便到了你‘墓木拱矣’的时候，还是个不明白。”对王“信”中所提出的“能笃于旧学者，是能兼采新知”说法，刘半农却答复道：“记者则以为处于现在的时代，非富于新知，具有远大眼光者，断断没有研究旧学的资格。否则弄得好些，也不过造就出几个‘抱残守缺’的学究来，犹如乡下老妈子，死抱了一件红大布的嫁时棉袄，说它是世界间最美的衣服，却没有见过绫罗锦缎的面；请问这等陋物，有何用处？”等等，与王文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

这两封信一发表，思想界和文学界引起了巨大震动，一些人再也按捺不住，一场热烈争论，迅速演变成了新旧两派的激烈对骂，这样客观上推动了这出“双簧”戏的发展。

两封信刚发表的时候，思想稍显守旧的胡适，即认为这样“有失士大夫身份”，认为这种“不登大雅之堂”的文章不应该发表。但钱玄同、刘半农的行为却得到了陈独秀的坚定支持，陈认为：“这样制造一点气氛，也无不可。”甚至于一个月后当一位自称“崇敬王敬轩先生者”写信质问《新青年》编者为什么对王敬轩的议论肆口谩骂时，陈独秀还复信说：“对于违背常识，闭眼胡说的妄人，不屑与辩，唯有痛骂一法。”

3月19日至23日，卫道者林纾（林琴南）便率先在《新申报》发表《妖梦》一文，对支持双簧戏中新思潮的陈独秀等人进行谩骂。《妖梦》以荒诞的故事，表达了以作者为代表的封建主义卫道者对于陈独秀等新文化运动倡导者恨不得“食肉寝皮”的极端仇恨心理。依附北洋军阀政府的官僚政客集团安福系的喉舌——北京《公言报》，也直接攻击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等人，并于1919年3月18日除了发表林纾的《致蔡鹤卿书》外，还发表题为《请看北京学界思潮变迁之近况》的长篇评论，再次攻击陈独秀等人“绝对的废弃旧道德、毁斥伦常、诋诽孔孟”的言论，

并说其“祸之及于人群，直无异于洪水猛兽”，企图唆使北洋军阀干涉新文化运动。

论战也在北京大学展开。守旧派们开始了对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等人的疯狂攻击。辜鸿铭宣扬“尊王尊孔”大义，与新文化运动对抗，他指出“中国优秀的文言文的特点是优雅，非白话文可比。”指责陈独秀倡导的文学革命是“可笑的，伪善骗人的”。黄侃在其所编《〈文心雕龙〉札记》中，大骂白话诗文为“驴鸣狗吠”；梁漱溟在北大积极宣扬孔子哲学，组织“孔子研究会”，与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等人提倡的新文化运动相对抗；刘师培、黄侃、陈汉章及北大学生陈钟凡等数十人，还“慨然于国学沦夷”，出版《国故》月刊，宣扬旧文化、旧道德，反对新文化运动。守旧派人物桐城派古文家、安徽孔教会会长马其昶拿了几本《新青年》和《新潮》杂志，并加以“非圣乱经”、“洪水猛兽”、“邪说横行”等批语，面送总统徐世昌，要求干涉北京大学，惩处陈独秀和蔡元培等人。

钱玄同与刘半农导演的这出双簧戏及其引发的新旧两派的激烈争论，更使得腐朽的反动政府坐卧不安。他们遂开始酝酿对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等人的进步活动进行压制。这年3、4月间，徐世昌几次召见“宴请”教育部长傅增湘和北大校长蔡元培等人，名为“磋商调和新旧两派冲突之法”，实际上是为干涉北京大学内部的新文化运动而施加压力。

3月26日，傅增湘在徐世昌指令下，写信给蔡元培，要求约束双簧戏开场后思想日益激进的北大师生。傅增湘在信中将矛头直指陈独秀，说：“自《新潮》出版，羣下耆宿对于在事员生不无微词。……近顷所虑，乃在因批评而起辩难，因辩难而涉意气，稍稍逾学术范围之外，将益启党派新旧之争，此则不能不引为隐忧耳。”“凡事过于锐进，或大反乎恒情之所习，未有不立蹶者。时论纠纷，喜为抨击，设有悠悠之辞波及全体，尤为演进新机之累。甚冀执事与在校诸君一扬榷之，则学子之幸也。”3月初，张厚载第三次在《神州日报》发表通讯，造谣说“北京大学文科学长近有辞职之说，记者往蔡校长，询以此事，蔡校长对于陈学长辞职一说，并无否认之表示”。由于陈独秀、蔡元培、钱玄同、刘半农等皆为名人，因此这类谣言传播很快，很快便成风雨满城之势。

一时间，黑云漫天，各股封建反动势力便皆拿起“依靠权势”和“暗地造谣”两种武器，向钱玄同、刘半农以及陈独秀等新思潮的支持者袭

来。

引火烧身，双簧戏引来了那些居心叵测的谣言和无端的攻击。胡适、陈独秀、钱玄同和刘半农等人给予了坚决的还击。胡适即于1918年3月10日致函《北京大学日刊》：“两个星期以来，外面发生一种谣言，说文科学长及胡适等四人，被政府干涉，驱逐出校，并有逮捕的话，还说陈先生已逃至天津。这个谣言越传越远，竟由北京电传到上海各报，惹起了许多人的注意。这事乃是全无根据的谣言。”

胡适和陈独秀公开驳斥张厚载谣言后，蔡元培亦发表《致神州日报函》，替陈独秀“辞职”辟谣，并依据大学规程，令张厚载退学。

针对林纾的攻击，陈独秀载文称其小说也不会受到旧文学家欢迎，因为其代表作中的主要人物荆生正是孔夫子不愿会见的阳货一流人物；钱玄同对林纾使用的卑劣手段甚为蔑视，他使用“金心异”这个名字撰写多篇文章，来“回敬”林纾的诽谤；而刘半农也以自己的文采，发表数篇令人叫绝的文章对林纾之流的诬蔑进行回击。至此，钱玄同和刘半农导演的双簧戏达到高潮。

1919年4月10日，蔡元培主持北大教授会议，陈独秀没有出席，会上正式决定废除学长制，改而成立由各科教授会主任组成的教务处，马寅初出任首任教务长。至此，新文化运动领袖、守旧派攻击众矢之的的陈独秀的文科学长之职自然解除。虽然由于蔡元培的坚持，陈独秀此时仍为北大教授，并由校方给假1年，但事实上陈独秀从这时起就被迫离开了北京大学。

这出“双簧”戏的结局，表面上以封建守旧派的胜利、新文化运动倡导者的失利而告终。实际上，“旧式文人的丑算是出尽，新派则获得压倒性的辉煌胜利。”一些原来还在犹豫的人也在其影响下开始倾向新文化。而最为重要的是，双簧戏落幕后，陈独秀的思想更加接近马克思主义，这为其以后与李达联手共建中国共产党，走上职业革命家道路，在更广的地域从事职业革命活动打下了基础。

陈独秀被免职后不久，中国即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陈独秀是这场运动的总司令，钱玄同是这场运动的重要组织者，而刘半农亦作为北京大学教授临时会议干事负责人，于“5·4”当天游行“坐守北大指挥部”，组织社会支持，声援被北京政府监禁的学生和教员。他们与胡适一道，被后人称为“五四运动”四大台柱。就这样，《新青年》双簧

戏的导演者，以及戏中新思潮的支持者，遵循戏中所蕴含的战斗精神和人文追求，在声势浩大的“五四运动”中写下了他们人生的永恒乐章。

三、战火洗礼

“五四”新文化运动主要是思想文化领域里的反封建斗争。“五四”新文化运动因“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而发生重大转折，启蒙运动逐渐演变成政治运动。“五四”运动倾向爱国反日，新文化运动侧重在思想启蒙。新文化运动为“五四”运动作了思想文化上的准备，“五四”运动促进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开辟了道路。“五四”运动后中国文化的走向是“救亡压倒启蒙”。“五四”启蒙运动没有结束，热血的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都投身到了政治革命中去了。这是“武器的批判”代替了“批判的武器”，启蒙运动让位于政治革命。1927年瞿秋白曾说，我们还需要新文化运动，不仅农民不觉悟，而且工人也不觉悟。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也讲，反封建仍是革命道路上一个大工程。这些都是值得注意的，陈独秀等人倡导的民主与科学，仍然是中国今天所需要的。

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所谓的“和平会议”，中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之一，参加了会议，中国代表在和会上提出废除外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在中国的军队，取消“二十一条”等正义要求，但巴黎和会不顾中国也是战胜国之一，拒绝了中国代表提出的要求，竟然决定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此消息传到中国后，北京学生群情激愤，学生、工商业者、教育界和许多爱国团体纷纷通电，斥责日本的无礼行径，并且要求中国政府坚持国家主权。在这种情况下，和会代表提交了关于山东问题的说帖，要求归还中国在山东的德租界和胶济铁路主权，以及要求废除《二十一条》等不合法条件。但结果，北洋政府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壓力，居然准备在《协约国和参战各国对德和约》上签字。最终，英、美、法、日、意等国不顾中国民众呼声，在4月30日还是签订了《和约》，协约国和参战各国对德，即《凡尔赛和约》，仍然将德国在山东的权利转送日本。在巴黎和会中，中国政府的外交失败，直接引发了中国民众的强烈不满，从而引发了声势浩大的“五四”运动，在这样



“五四”运动游行队伍

强大的压力下，中国代表最终没有出席巴黎和会的签字仪式。

1919年5月1日，北京大学的一些学生获悉和会拒绝中国要求的消息。当天，学生代表就在北大西斋饭厅召开紧急会议，决定1919年5月3日在北大法科大礼堂举行全体学生临时大会。5月3日晚，北京大学学生举行大会，高师、法政专门、高等工业等学校也有代表参加。学生代表发言，情绪激昂，号召大家奋起救国。最后定出四条办法，其中就有第二日齐集天安门示威的计划。这四条办法是：（一）联合各界一致力争；（二）通电巴黎专使，坚持不在和约上签字；（三）通电各省于1919年5月7日国耻纪念举行游行示威运动；（四）定于1919年5月4日（星期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之大示威。

1919年5月4日，北京三所高校的3000多名学生代表冲破军警阻挠，云集天安门，他们打出“誓死力争，还我青岛”“收回山东权利”“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废除二十一条”“抵制日货”“宁肯玉碎，勿为瓦全”“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等口号，并且要求惩办交通总长曹汝霖、币制局总裁陆宗輿、驻日公使章宗祥，学生游行队伍移至曹宅，痛打了章宗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北京师范大学前身）数理部的匡互生第一个冲进曹宅，并带头火烧曹宅，引发“火烧赵家楼”事件。随后，军警给予镇压，并逮捕了学生代表32人。

烧掉赵家楼的学生游行活动受到广泛关注，各界人士给予关注和支持，抗议逮捕学生，北京军阀政府颁布严禁抗议公告，大总统徐世昌下令镇压。但是，学生团体和社会团体纷纷支持。1919年5月11日，上海成立学生联合会。1919年5月14日，天津学生联合会成立。广州，南京，杭州，武汉，济南的学生和工人也给予支持。1919年5月19日，

北京各校学生同时宣告罢课，并向各省的省议会、教育会、工会、商会、农会、学校、报馆发出罢课宣言。天津、上海、南京、杭州、重庆、南昌、武汉、长沙、厦门、济南、开封、太原等地学生，在北京各校学生罢课以后，先后宣告罢课，支持北京学生的斗争。

由于学生影响不断扩大，《五七日报》和学生组织宣传，学生抗议不断遭到镇压。1919年6月3日，北京数以千计的学生涌向街道，开展大规模的宣传活动，被军警逮捕170多人。学校附近驻扎着大批军警，戒备森严。1919年6月4日，逮捕学生800余人，此间引发了新一轮的大规模抗议活动。

1919年6月5日，上海工人开始大规模罢工，以响应学生。上海日商的内外棉第三、第四、第五纱厂、日华纱厂、上海纱厂和商务印书馆的工人全体罢工，参加罢工的有两万人以上。1919年6月6日、7日、9日，上海的电车工人、船坞工人、清洁工人、轮船水手也相继罢工，总数前后约有六、七万人。上海工人罢工波及各地，京汉铁路长辛店工人，京奉铁路工人及九江工人都举行罢工和示威游行，自此起，运动的主力也由北京转向了上海。1919年6月6日，上海各界联合会成立，反对开课、开市，并且联合其他地区，告知上海罢工主张。通过上海的三罢运动，全国22个省150多个城市都有不同程度的反应。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等人到北京前门外闹市区散发《北京市民宣言》，声明如政府不接受市民要求，“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陈独秀因此被捕。各地学生团体和社会知名人士纷纷通电，抗议政府的这一暴行。面对强大社会舆论压力，曹、陆、章相继被免职，总统徐世昌提出辞职。1919年6月12日以后，工人相继复工，学生停止罢课。1919年6月28日，中国代表没有在和约上签字。

在这场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中，刘半农“坐守北大指挥部”。5月4日那天，半农以送书为名，拜访鲁迅。两位战友在这样的特殊时期相见，真是心情激动一言难尽。

6月3日，斗争继续发展，军警大肆逮捕学生，北京大学三院也成为他们关押学生的场所，上千学生被拘捕关押，空气中弥漫着硝烟和血腥。市民们看着稚嫩的孩子被送进“牢门”都痛哭流涕。政府派兵包围法学院，企图进行血腥镇压。这天下午，刘半农相约周作人、陈百年、王星拱，赶赴北大三院，想去慰问学生，但到入口处，几经交涉仍被拒之

门外。在这样严酷的形势下，刘半农起草《致本校全体教职员诸君函》，积极活动，征集签名。并于6月4日，他和钱玄同等二十多人署名，发表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坐守北大的刘半农为援助被监禁学生和教员积极奔走呼吁，并想方设法做好饮食等后勤工作。

一天，商讨援救被捕学生应急办法的教授会议正在进行，一位事务员探头进来叫刘半农出去。不久走廊里就传来刘半农大声的呵斥：“混账！”过了一会儿，刘半农重新走进会议室，他的脸上分明写着愤怒。他对与会的教授们说道：“诸位，刚才教授会的事务员找我报告，被拘学生伙食费用，王学长居然不同意报销。要知道，这是我们教授会的共同决定请学校报销的费用，他王学长居然拒不执行，不知是什么意思？”刘半农激动地喘了口气，继续说，“学生们示威游行，散发爱国传单，他们何罪之有？现在各界人士都在援助被捕学生，我们北大难道准备点伙食不应该吗？我刚才一时火起，失口骂了句粗话，‘混账’，现在我当着诸位的面还要再骂‘混账’！请诸位原谅我的粗俗，也请带个口信，请王学长方必执行教授会决定！”

刘半农旗帜鲜明的讲话，坚定不移的战斗风采立刻博得教授们的热烈掌声。

“六三”以后，学生运动演变成以工人阶级为主，包括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以及广大群众参加的全国性的运动。封建卫道士们和反动文人丧心病狂地跳出来，对新文学家发起更猛烈进攻。

自称清室举人的林纾，一边作文谩骂，一边想借助“荆生将军”（徐树铮）的武力来镇压新文学家。

1919年6月，陈独秀被捕。

面对高压的态势和残酷的斗争形势，刘半农和战友们没有退缩。他和李大钊等人呼应相和不断撰文揭露敌人，赞美真理，讴歌光明。他在近百行长诗《D——！》中写道：

我已八十多天看不见你。

人家说，这是别离，是悲惨的别离。

那何尝是？

我们的友谊，若不是泛泛的“仁兄”“愚弟”，

那就凭他怎么着，

你还照旧的天天见我，我也照旧的天天见你。
威权幽禁了你，还没有幽禁了我，
更幽禁不了无数的同志，无数的后来兄弟……

长诗，犹如匕首，插入敌人胸膛。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的气焰，也表达了作者坚定不移的战斗立场和革命信念。

刘半农以革命者的姿态，站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前列，为追求真理，追求光明矢志不渝，冲锋在前，他不仅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写下光辉的一页，也为自己的人生写下了灿烂篇章。刘半农已经不是一个文人才子了，他是一个有着清醒头脑、坚定立场、勇毅斗志和横溢才华的革命者。



刘半农手迹

第六章 辛勤播种

一、白话诗歌的功臣

白话诗指的是“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后打破旧诗格律、不拘字句长短、用白话写就的诗歌，也称“语体诗”、“白话韵文”。现代常说“现代诗”，把传统格律诗称为旧体诗。

中国是一个诗歌的国度。早在春秋时期，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就出现了，《诗经》收集了西周初至春秋中叶，约五百多年间，三百零五篇诗。它按音乐标准分为“风”、“雅”、“颂”三部分。“风”是周王朝京都之外的地方乐歌，“雅”是周王朝直接统治地区的乐歌，“颂”则是宗庙祭祀时的乐舞曲。《诗经》音调流畅，语言朴素，常用赋、比、兴的手法来表情达意。后世把《诗经》奉为学习的最高典范。

战国后期，在南方的楚国，以屈原为代表的楚国诗人，创造了具有楚文化独特光采的新体诗——楚辞。以六言、七言为主，长短参差，灵活多变。诗歌充满着神奇瑰丽的想象，洋溢着楚地特有的文化浪漫。屈原运用这种诗歌形式，创作了古代文学史上第一抒情长诗《离骚》，优美动人的《九歌》十一篇，言志述怀诗《九章》九篇以及《天问》等，共25篇楚辞作品。屈原的后继者有宋玉、唐勒、景差等人。《离骚》作为楚辞艺术的颠峰之作和代表，在文学史上与《诗经》并称“风骚”，垂范于后世。

春秋战国时期，列国纷争，游说之士蜂起。在百家争鸣的政治文化环境中，产生了一批政治家和思想家，写作了大量以说理透辟、逻辑严密、言辞锋利、善用比喻为特点的论说散文，又称诸子散文。

两汉要求用文学来歌舞升平，于是一种以铺写帝王和都市生活为主的文学样式——辞赋便应运而生。“赋”是两汉最流行的文体，是一代文

学的标志。其体式导源于荀子的《赋篇》，并吸收了楚辞的某些形式要素而形成的。汉初贾谊、淮南小山的赋，尚未脱楚辞形迹，被称为骚体赋；枚乘的《七发》奠定了汉代大赋的形式格局；至汉武帝时代，献赋诵赋风气大盛，产生了一大批赋家。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极写帝王苑囿之盛、田猎之乐，稍后的扬雄，有《甘泉》、《羽猎》诸赋。这些赋写得铺张扬厉，多以歌功颂德为宗旨。到了东汉，班固的《东都赋》、《西都赋》，张衡的《东京赋》、《西京赋》仍是散体大赋中的煌煌巨作。随着社会矛盾的日益激化，帝国强势不再，一些有识之士开始用辞赋来抒情志、刺时世。张衡的《归田赋》，赵壹的《刺世疾邪赋》，蔡邕的《述行赋》等是这方面的名作，其创作突破了大赋原有的体制，对以后魏晋时期的抒情小赋和唐宋时期的散文赋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唐诗宋词是诗歌发展的黄金时代。唐诗宋词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两颗明珠，唐代被称为诗的时代，宋代被称为词的时代。词源于民间，始于唐，兴于五代，盛于两宋。宋代物质生活的丰富，人们对文化生活的追求也更加强烈。唐代的诗人多是供皇室及其统治者御用的工具和玩物。宋代的词人已被别人欣赏而一跃登上了政治舞台，成为宋代政治舞台上的主角。宋代，皇帝个个爱词，大臣个个是词人，政治家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等都是著名词人，女词人李清照也成为一代词宗，名垂千古。全社会的认同和推崇，使宋词得以佳篇迭出，影响久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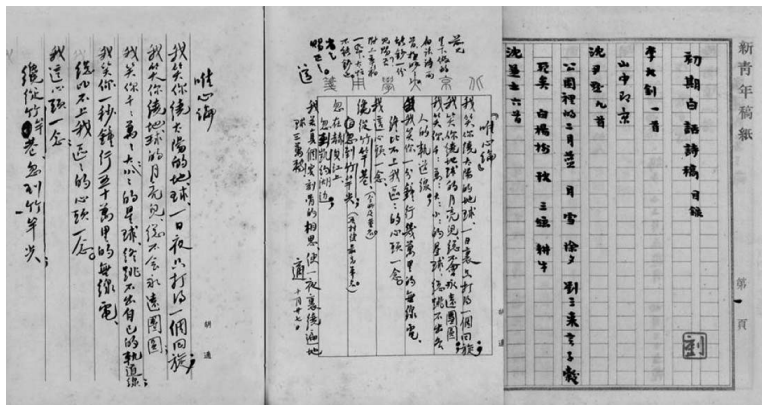
元代散曲的崛起把当时的文学世界装点得万紫千红；清代诗词的爱国主义精神也不时响起震撼九州的风雷……但是，从总体看，虽然历朝历代诗歌精品迭出，却总是摆脱不了封建旧文学的禁锢。到了清末民国初期虽有梁启超们的“诗界革命”，但这些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文学主张，仍然未能从根本上改变诗歌的封建主义旧文学的阴影。

“五四”文学革命，开创了文学创作的新纪元，诗歌也迎来了一个脱胎换骨大发展的时代。新诗歌，一种用白话写作，表现新时代、新生活、新思想、新感情的体裁，随着民主与科学的两翼一起腾飞。

刘半农是我国新诗发展期的功臣。他的贡献首先体现在他的文艺理论方面。他一手抓创作，一手抓理论。《我之文学改良观》和《诗与小说精神之革新》等文章，具体阐述了他对新诗发展的观点。他的思想，较之钱玄同、胡适的一些关于诗歌的理论都要早。这两篇文章涉及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两个方面，其内容具有鲜明的革命色彩。在内容上，他

主张新诗应该反映现实生活和真情实感，反对弄虚作假和无病呻吟。在艺术形式上，他主张新诗要在格律上来一次彻底的解放。“破坏旧韵，重造新韵”，同时要“增多诗体”。强调诗歌格律的大解放，这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一大精神，更是刘半农文化贡献的最精彩的一笔。

新诗从1917年1月至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一般称为白话诗。刘半农是最早整理白话诗的人，他选的《初期白话诗稿》，宣布了中国新诗史上第一个流派的出现。这本现代新诗草创时期的白话诗集，是刘半农根据自己在1917至1919年搜集到的手稿编成。计收入李大钊《山中即景》1首，沈尹默《公园里的二月兰》等9首，沈兼士《山中西风大作》等6首，周作人《两个扫雪的人》1首，胡适《鸽子》等5首，陈衡哲《人家说我发了疯》1首，陈独秀《丁巳除夕歌》1首，鲁迅《他们的花园》、《人与时》2首等，共26首，这些诗除了鲁迅的《他们的花园》是由周作人代抄、鲁迅签了唐俟的名字以外，其余都是作者的原稿。刘半农也是初期白话诗的名家，但他却以找不到当时原稿为由没有编入。这些不同作者的诗作，风格多样，有的保留了旧体诗的影响，多数显示了白话诗活泼清新的长处，它们不同程度地反映了“五四”时代精神，起了对封建文学示威的作用，是新诗草创时期的重要史料。1932年底由刘半农写序编辑，作为纪念1917年《新青年》正式提倡白话诗15周年，交北平星云堂书店，于1933年影印出版。刘半农的序略述了白话诗产生的艰难及其进步，对于了解新诗发展足迹，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初期白话诗稿》

刘半农对新诗发展的重要贡献，还体现在他身体力行的诗歌创作。他的新诗创作和他的新诗理论一呼一应，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诞生的新诗的范本。鲁迅在《坟·论睁了眼》中说：“没有冲破一切传统和手法的闯将，中国是不会有真的新文艺的。”刘半农就是呼唤新文艺，开创新文艺，播种新文艺，耕耘新文艺的闯将。他的白话诗在初创时期，面对的是封建遗老遗少们的百般阻挠、嘲笑、打击、扼杀。如果没有坚定的革命立场、勇敢的创新信念、扎实的国学功底、深厚的生活基础是断断不敢做出对旧文学的彻底背叛的。

刘半农诗歌，塑造了许多劳苦大众的形象，他始终为社会底层的百姓立传。潦倒的读书人、市民、工人、农民、铁匠、木匠、船夫、渔民、学徒、士兵、奶妈、牧羊人、卖菜人、人力车夫甚至娼妓，这些形象，组成了那个时期中国社会的画卷，是一部平民的血泪史，他的现实题材和批判风格是当时作家中少有的。

《拟装木脚者语》同情战争致残者，表达渴求世界和平，反对非正义战争。《饿》描写一个被饥饿折磨得索索发抖的孩子。《学徒苦》通过店主和学徒不同的生活境遇，深刻剖析了旧中国剥削与被剥削的社会关系。

相隔一层纸

屋子里拢着炉火，
老爷吩咐开窗买水果，
说“天气不冷火太热，
别任它烤坏了我。”

屋子外躺着一个叫化子，
咬紧了牙齿对着北风喊“要死”！
可怜屋外与屋里，
相隔只有一层薄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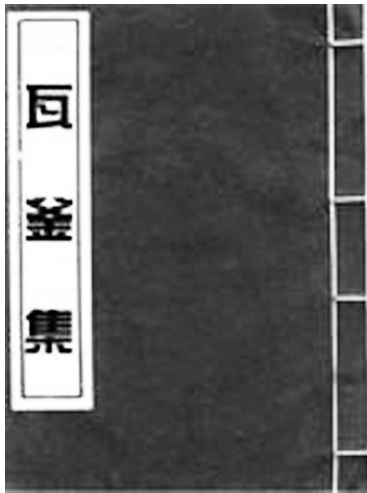
屋里与屋外，老爷与叫化子，天气冷与太热，烤坏我和要冻死，形成强烈对照。揭示贫富悬殊、社会不公的现实。最后以“相隔只有一层纸”归纳全诗，表达作者同情人民鞭挞黑暗社会制度的目的，真正做到“用我的泪，写在我的泪珠上，用我的血，写在我的血球上”的情真意切

的血泪控诉。除了对贫苦百姓的同情外，刘半农的诗歌还反映了五四时期“劳工神圣”的思想，他以赞美的笔调塑造了一批劳动者的形象，歌颂他们的坚忍不拔和吃苦耐劳的创造精神。

而创作于1920年的《敲冰》，是新诗中最早的长诗。诗歌豪迈旷达，借敲冰行船，喻写追求光明追求真理，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体现了劳动者与知识分子默契的配合，洋溢着革命者无私无畏勇猛进击的精神。（诗附录于后面《刘半农作品选》）

从艺术表现形式上看，刘半农的诗歌体裁翻新，花样迭出。他说：“我在新诗的体裁上是最会翻新鲜花样子的。当初的无韵诗，散文诗，方言拟民歌，拟‘拟曲’都是我尝试。至于白话诗的音节问题乃是我从1920年以来无日不在心头的事。”（《扬鞭集·自序》）刘半农极其自觉地、有意识地对诗歌形式进行改革，不断寻找适合表达新时代、新内容的诗歌形式。这种文化和文学的责任感让人感到由衷的钦佩。这别说在当时的文坛上，就是在整个文学史上，能够有这样的责任担当的，能有几个？

我们看到，在他的《扬鞭集》、《瓦釜集》里，有意境清新隽永的小诗、黄钟大吕的长诗、参差错落的散文诗，还有活泼天真的童谣、神韵天成的民谣、大气自由的无韵诗。他的诗歌敢于冲破一切清规戒律，抒发自己的真情实感。朱自清说：刘半农是“自由诗派”的奠基人。



《瓦釜集》

从艺术表现手法上看，刘半农也是综合调度一切手段的大师。他以白描为基础，融入暗示、对比、象征、点染等一切手段抒发感情，表现意境，表达思想。如《窗纸》，诗人写早晨醒来，看见窗纸尘渍斑斓，脑中产生许多幻想，象征人间的黑暗和不平。《晓》，则用白描和象征手法，诗人不是直接说出自己的思想，而是塑造形象营造意境，用江南春晓的情景书写自己对黎明敏感的感受。

在风格上，刘半农诗歌在明白、晓畅中蕴含深刻与机敏。他的

《奶娘》朴实而让人回味；《一个农家的暮》平白中富有温馨，而温馨中蕴含深邃；《雨》在清新中充满天然童趣，充满诗人幽默的机巧；《教我如何不想她》更是一首情深意切的传颂佳作……

刘半农是新文学运动的一员闯将、猛将。这回让一些对刘半农的认识或浅尝辄止，或带着有色眼镜去看待，有人误读他是一介武夫，有人则以为他有勇无谋。其实不然，几千年的封建文化，如果没有一点江阴人的“刚”性，是断然不可攻破的。而攻克旧文学“城门”，获得一片新天地之后，该怎么耕耘怎么播种，刘半农可谓是费尽了心机，耗尽了心血。如果在初创时期，没有刘半农们的革新和探索，就没有现如今的新诗，也没有现在的白话文学，但所有这一切，如果光有勇气，没有自己扎实的文学功底和出众的文学天赋，以及敏锐的目光和深刻的思想都是做不到这样的成就的。刘半农对新文学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而后世人们因为种种政治或历史的原因，淡化或曲解刘半农都是太不应该的！

二、民歌研究的领头羊

任何民族的文学之根都在民间，任何文学要是衰退，就是他离开了民间这块土壤。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说，希腊神话是希腊艺术的土壤。

刘半农不仅自己创作文学作品、翻译介绍外国文学作品，他对中国民歌的整理研究也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提倡诗人应向民歌学习，从民歌的源头活水中汲取营养。这种抱着研究、保护、学习态度对待民间文化，并做出贡献的，刘半农也是最早的一个。

民间歌谣，产生在人们生活和劳作过程中，往往随性而唱不着雕琢，内容大都反映底层百姓的喜怒哀乐，风格往往古朴而率真。历代的封建文人一直鄙视排斥它们，认为它们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五四”时期，随着封建旧文学大厦的倒塌，白话文学成为文学的正宗。但是，随之而来又有另一种思潮，那就是彻底否认自我，要“全盘欧化”。墨守成规不可取，割断历史更不可取。清醒的刘半农是最早提出搜集民歌的发起人之一。

1918年1月，冬季的冰雪还没消融。北大校园皑皑白雪中走来两个穿着长衫的教授，他们是刘半农和沈尹默。他们走在雪后初霁的暖阳里，



沈尹默

时而悄声议论，时而高亢争辩。他们在商讨一个话题：“民歌”。

刘半农：“民歌民谣中也有很好的文章啊，我们是不是来征集一下？”

沈尹默：“好，你这个动议好啊！我看，不如你拟个方案，让蔡先生用北大的名义征集更好？”

不久，一份详尽的方案，放在了蔡元培的案头。蔡元培看后，旋即批交北大文牍处印刷。分寄各个省官厅学校。同年二月，《北京大学日刊》也刊发了《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新青年》第四卷第三号加以转载。征集歌谣工作正式启动。

各地各民族的歌谣，插上了翅膀竞相飞来，仅一年，就由刘半农亲手编订注释，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刊发的歌谣达到148首。面对如此丰富的民歌资源，刘半农欣喜若狂，他在与顾颉刚、常维钧、罗家伦、沈兼士等人的通讯中说：研究民歌，原是我极喜欢的一件事。如有此项稿件寄来，无不竭诚欢迎……1919年3月刘半农在北大学术讲演会上，作了《歌谣之科学的研究》报告，发表了《越谚序录》、《民间文学中的死》等论文，在民歌研究领域迈出了开创性的一步。

1920年，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正式成立。刘半农成为该组织的骨干力量。此时他已赴欧洲留学，但是仍然时时刻刻牵挂着民歌研究。在国外，他有机会关注其国家的民歌，他在聆听、研究他国民歌的同时，与本国民歌作比较，也研究本国民歌在海外的流传状态。1922年12月，北京大学创刊《歌谣》周刊，他把《江阴船歌》二十首交给杂志发表外，又撰写了《海外的中国民歌》、《太平天国时代的民歌》等文章。国内其他学者研究民歌，他则无私提供自己的资料和研究成果。他搜集整理研究民歌真的是倾尽心血，无怨无悔。

刘半农对民歌的热爱，甚至到了偏爱的程度。1919年夏，他回到家乡江阴休假，仍然念念不忘民歌。他把西门的一位说唱艺人请到家里管酒管饭，让人提供歌谣。返京时坐在航行的小火轮里，听着身边船夫们高亢悠长的船歌，刘半农激动不已，当即记下，后来又归纳整理，成为

《江阴船歌》20首。他再次回江阴的时候，又采集到了短歌三四百首，长歌两首。1934年去各地区调查方音民俗时在紧张的工作之余，仍不忘记录当地民歌。听着那些民歌中呼喊的血泪怨愤，刘半农感慨万千，他令助手跟随三日，采集曲调唱腔。

不仅搜集整理研究民歌，刘半农还用江阴方言和北京方言创作民歌。这样的尝试也是他的首创。《瓦釜集》就是中国现代诗歌史上第一部方言创作民歌体新诗集。刘半农在《瓦釜集·自序》中说：“我觉得，中国的‘黄钟’，实在太多了，但看一部《元曲选》，便有那么许多‘万言长策’，真叫人痛哭，狂笑，打喷嚏！因此我现在做这傻事，打在地狱里而没有呻吟机会的瓦釜的声音，表现一部分出来。”刘半农写作的立场鲜明而突出，完全符合时代潮流，符合文学革命要求和政治革命方向。

《瓦釜集》收歌21个。有《开场的歌》、《短歌》、《劳工的歌》、《情歌》、《农歌》、《女工的歌》、《悲歌》、《渔歌》、《船歌》、《滑稽歌》、《失望歌》、《牧歌》等。

诗歌广泛运用江阴方言俚语俗语，书写社会现实，鞭挞社会丑恶。如《女工的歌》中，用女工怨愤的反问倾诉她们经济上受剥削，政治上受压迫的悲惨现状，也隐含着一种潜在的反抗意识：

我勿晓得为啥靠仔十只指头要吃饭吃
为啥来要碗饭吃就是勿要面孔

如《人比人来比杀人》更是一篇劳苦大众对吃人社会的诅咒：

人比人来比杀人！
人比人来气杀人！
你里财主人吃饱仔末肚皮浪弹上去像个三白西瓜冬冬响
我里穷人饿仔要死末只好穷思极想把裤带束束紧

人比人来比杀人！
人比人来气杀人！
你里财主人穿仔羊皮狗皮热得鼻头管里出起血来末还可以请个郎中来吃帖清凉药

我里穷人冻仔要死末只好躲勒门角落里破席片里破棉絮里阿大阿二

阿三阿四阿大里娘来阿大里老子大家轧轧紧

人比人来比杀人！

人比人来气杀人！

你里财主人闲空得生起懒黄病来末还有铜钱买点梨头吃

我里穷人吃力仔要死末只好送把阎王伯伯当点心

人比人来比杀人！

人比人来气杀人！

你里财主人家养鸡养鸭养猪养狗末都还要把白米喂

我里穷人家里糠也吃不一把末只好卖男卖女卖夫卖妻卖公卖婆一齐
卖干净

人比人来比杀人！

人比人来气杀人！

你里财主人死仔末还好整千整万带到棺材里去开三十六并钱庄七十
二并当

我里穷人死仔吃不私佣送把阎王小鬼末只好自家爬到油锅里去必律
剥落寻开心

诗歌寓控诉于诙谐之中，揭露出当时贫富悬殊的阶级对立和社会黑暗，反映出作者同情百姓的阶级立场。

而另一种表现男女情爱的诗歌，刘半农则写得轻盈、风趣、淳朴清新。如第十四歌：

你叫王三妹来我叫张二郎，
你住勒村底里来我住勒村头浪。
你家里满树格桃花我抬头就看得见，
我还看见你洗干净衣裳晾勒竹头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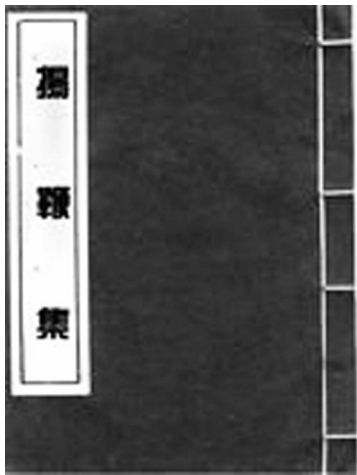
第四歌：

姐园里一朵蔷薇开出墙
我看见仔蔷薇也和看见姐一样

我说姐倪勿送我蔷薇也送个刺把我
戳破仔我手末你十指尖尖替我绣一绣

寥寥数语，表现男女双方复杂的爱情情怀和一连串的微妙动作，这种委婉的爱情表达和突破时空的爱情表现，真的是没有超凡脱俗的功力是实在办不到的。

除了方言民歌之外，刘半农还在《扬鞭集》里创作了多首《拟儿歌》、《山歌》、《拟拟曲》。他的这些诗歌创作及发表，震撼着诗坛，是“盘古以来一大奇谈”。遭到复古派的反对这是预料之中的事情。刘半农说：“我应当正对着一阵笑声、骂声、唾声的雨！”其泰然处世的精神反映出他的自豪、自信与坚定。



《扬鞭集》

不仅如此，刘半农的翻译工作从未停止，在诗歌方面，他搜集、翻译了大量的外国民歌。1927年4月出版的《国外民歌译》，集了世界民歌大成。为民族文化的交流做出了贡献。

总之，刘半农用生长在民族土地里，飘着永远清新馨香的，具有旺盛生命力的野花，有力地对抗了装腔作势、腐朽虚伪的贵族文学。刘半农从文学母体中捧出的大把金子，震撼着当时的文坛，也震撼了文学史的舞台。他的文学理论和文学实践将在历史长河中永远振聋发聩！

三、永远开拓的杂文家

有人说刘半农是兴趣广泛的聪明人。这话一点不错，刘半农不仅写小说、诗歌以及理论研究文章，他的散文也是五四时期独树一帜的。

广义的散文，包括了杂文。刘半农的散文虽然大都是以叙事、抒情、议论为主，但就内容和功能而言，一部分就是现在说的杂文。在当时的文坛，没有这么细致的分类。但刘半农通过研究，觉得应该明确这个分



《半农杂文》

类。1934年6月，他亲手编订的散文集，在确定书名的时候，就曾自题《半农杂文》。从《灵霞馆笔记》到逝世前的《南无阿弥陀佛戴传贤》，刘半农一生创作了一百多篇杂文，约五十万字。这些成果都可以见诸《半农杂文》一、二两集。

刘半农早期杂文，主要是配合新文化运动服务。“五四”运动前夜，正是中国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泥淖最黑暗的时期。社会充斥着沉滞、糜烂、衰颓之气。封建军阀和御用文人大肆宣扬“尊孔读经”、“昌明国粹”，利用文坛散布封建毒素，麻痹人们。这样，文坛就势必充满庸俗低级的风气，与真正的传统道德和人文国粹相背离。《新青年》关于“文学革命”的主张提出之后，最先撰稿“绝端同意”的是刘半农。作为一个在上海滩旧文学圈子里沉浮五年的文人，能够反戈一击，杀出重围，保持战斗的姿态登上文学革命的舞台，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他的《灵霞馆笔记》充满了革命的精神，之后的《我之文学改良观》就诗歌小说戏剧改革提出了一系列革命性意见，对文学革命的迅猛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而《诗与小说精神上之革新》、《应用文之教授》、《中国之下等小说》、《通俗小说之积极教训和消极教训》等文章，成为狙击封建文学的组合武器。为文学革命向纵深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再后，与钱玄同合演的双簧更是轰动一时。《奉答王敬轩先生》成为现代文艺斗争史上的重要文献。刘半农在《新青年》首期“随感录”专栏撰文，商讨封建文人罪行，从此“随感录”成为中国杂文的发源地。刘半农具有开先河之功。

1924年11月17日，由鲁迅支持、孙伏园编辑的文艺性周刊《语丝》在京创刊。此时，刘半农正在法国留学。不久收到鲁迅寄来的《语丝》杂志。针对徐志摩宣扬的神秘主义艺术观，他立刻重操战刀，于1925年3月，写下了《徐志摩先生的耳朵》。直至回国从事语言教学后，

仍然保持着与《语丝》的联系。到1928年初，他在《语丝》发表的诗文有80多篇。而同时的鲁迅，则在《语丝》发表了140多篇作品。《语丝》最初撰稿的十六人大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参加者和《新青年》、《晨报·副刊》的支持者。在给《语丝》撰稿期间，刘半农依然保持着破旧立新的战斗姿态。之后，他又在其他一些刊物发表杂文，如：《质问法使馆参赞韩威德先生》、《介绍黄种巡察团》、《反日救国的一条正路》、《好聪明的北平商人》等。其风格和战斗精神与先前文章一脉相承。

1931年之后，他在林语堂等人创办的《论语》、《人间》刊物上，发表了较多的读书笔记之类的文章。1934年在他逝世前写就的《南无阿弥陀佛戴传贤》，将矛头直指国民党元老和日本侵略者，是一篇令人拍案叫绝的好文章。

刘半农杂文的思想性、战斗性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建立的卓越功勋，使其在文坛独树一帜。而刘半农杂文艺术性更使其成文彪炳史册。

刘半农同时期的杂文创作，作家众多。鲁迅、李大钊、陈独秀、胡适、周作人、沈尹默、钱玄同等等。他们的文章，思想性和艺术性各有特色，使得这个时期的杂文成为文学史上一道瑰丽的风景。但是，在这高手林立的作家群中，刘半农杂文在艺术性上仍是十分突出的一位。

刘半农杂文，“信口直说，全无隐饰”。他心中如何想，笔下如何写。流流畅达，无拘无束。并且坦率而自然，诚挚而恳切。任意挥洒，毫无造作。在《留别北大学生的演说》、《北旧》、《词律研究序》等文中，他侃侃而谈，谈吐自如，给人亲切随和之感。而在揭露批判时又是一针见血，酣畅淋漓。《奉答王敬轩先生》、《奉答陈通伯先生》等文，都是旗帜鲜明，气势惊人，抓住矛盾，穷追猛打，使得对手无还手之力。鲁迅在《且介亭杂文·忆刘半农君》中这样评价说：

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半农却是令人不觉其有“武库”的一个人，所以我佩服陈胡，却亲近半农。

刘半农浩荡率真胸无芥蒂的精神，使得他的文风纵横捭阖，大气磅礴。有人因之讥讽他“浅”，对此，鲁迅说得公正客观：

不错，半农确是浅。但他的浅，却如一条清溪，澄澈见底，纵有多少沉渣和腐草，也不掩其大体的清。倘使装的是烂泥，一时就看不出它的深浅来了；如果是烂泥的深渊呢，那就更不如浅一点的好。

刘半农杂文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幽默夸张，善用反语，泼辣尖锐，形象生动。在《作揖主义》、《徐志摩的耳朵》、《南无阿弥陀佛戴传贤》、《骂瞎了眼的文学史家》等文章里，作者善于把抽象的事理具象化，把生涩的道理浅显化，制造通俗易懂，滑稽幽默却又鞭辟入里的效果。如《作揖主义》：

沈二先生与我们谈天，常说生平服膺红老之学。红，就是《红楼梦》；老，就是《老子》。这红老之学的主旨，简便些说，就是无论什么事，都听其自然。听其自然又是怎么样呢？沈先生说：“譬如有人骂我，我们不必还骂：他一面在那里大声疾呼的骂人，一面就是他打他自己。我们在旁边看看，也很好，何必费着气力去还骂？又如有一只狗，要咬我们，我们不必打它，只是避开了就算；将来有两只狗碰了头，自然会互咬起来。所以我们做事，只须抬起了头，向前直进，不必在这抬头直进四个字以外，再管什么闲事；这就叫作听其自然，也就是红老之学的精神。”我想这一番话，很有些同（托尔斯泰）的不抵抗主义相像，不过沈先生换了个红老之学的游戏名词罢了。

不抵抗主义我向来很赞成，不过因为有些偏于消极，不敢实行。现在一想，这个见解实在是大谬。为什么？因为不抵抗主义面子上是消极，骨底里是最经济的积极。我们要办事有成效，假使不实行这主义，就不免消费精神于无用之地。我们要保存精神，在正当的地方用，就不得不在可以不必的地方节省些。这就是以消极为积极：不有消极，就没有积极。既如此。我也要用些游戏笔墨，造出一个“作揖主义”的新名词来……

刘半农杂文在结构和手法上也是灵活多变，信手拈来。他为自己的这一批文章定名为“杂文”的时候，就有明确的解释：“今称之为杂文者，谓其杂而不专。无所不有也：有论记，有小说，有戏曲；有做的，有翻

译的；有庄语，有谐语；有骂人语，有还骂语，甚至有牌示，有供状；称之为‘杂’，可谓名实相符。”

“做文章只是努力把我口里要说的译成文字；什么‘结构’，‘章法’，‘抑，扬，顿，挫’，‘起，承，转，合’等话头，我都置之不问。”（《半农杂文·自序》）

刘半农杂文的语言风格也是独具特色。刘半农驾驭语言的本事不是一般人能够企及的。他既是战士，又是诗人、小说家、民歌研究学者、语言学家，他语言运用灵活多变，根据文章内容的需要不断变幻风格，时而平实，时而中肯，时而幽默，时而滑稽，时而疾风暴雨，时而温婉细腻，信笔由缰，挥洒自如。

四、首倡新式标点和“她”与“它”

长期以来，中国人写文章没有“句读”。就是现如今，为引导学生了解古文学习古文，仍然将断句作为高考乃至研究生考试的试题。在相隔着遥远的历史，在一篇没有句读的文章里，揣摩作者的意思，实在是个艰难复杂的事情。正如刘半农说“古人之不加句逗而费解者已令吾人耗却无数心力于无用之地”。这个感受不是现代人才有，后时代的古人其实与我们有着相同的感受。到宋朝，开始在文字旁边加圈点。结果，发展到后来，人们将圈点变成欣赏符号，一圈到底。这样，文法符号和欣赏符号，混为一谈。使得古文越加佶屈聱牙扑朔迷离。

刘半农在《我之文学改良观》一文中明确提出了文章分段、完善“句读”、禁止圈点。第一个问题是分段，他说：

分段，中国旧书，往往全卷不分段落。致阅看之时，则眉目不清。阅看之后，欲检查某事，亦茫无头绪。今宜力矫其弊，无论长篇短章，一于必要之处划分段落。惟西文二人谈话，每有一句，另起一行。华文似可不必。

他在第二个问题中就涉及了句读。他说：

不知古书之不加句逗而费解者，已令吾人耗却无数心力于无用之地。吾人方力求文字之简明适用，固不宜沿有此种懒惰性质也。然西文，；：？四种句逗法，倘不将文字改为横行，亦未能借用。今本篇所用？、。三种，

唯、之一种，尚觉不敷应用，日后研究有得，当更增一种以补助之。至于符号，则？一种，似可不用，以吾国文言中有“欤哉乎耶”等，白话中有“么呢”等问语助词，无须借助于记号也。然在必要之处，亦可用之。！一种，文言中可从省，白话中决不可少。“”与‘’之代表引证或谈话，——之代表语气未完，……之代表简略，()之代表注解或标目，亦不可少。★及字旁所注123等小字可以不用，以汉文可用双行小注，无须foot一note也。又人名地名，既无大写之字以别之，亦宜标以一定之记号。

第三个问题就是禁止圈点。他说：

圈点，此本为科场恶习，无采用之必要。然用之适当，可醒眉目，今暂定为三种，精彩用○，提要用？，两事相合则用⊙。惟滥圈滥点，为愚为厉禁。

刘半农等这些新文学家提倡的这些主张，立刻遭到了封建复古主义者的竭力诋毁和反对。钱玄同在化名王敬轩致《新青年》的文章中进行了模拟。为此，刘半农在《奉答王敬轩先生》中再次集中笔墨谈到这个问题。

浓圈密点，本科场恶习，以曾国藩之顽固，尚且知之；而先生竟认为“形式美观”，且在来信之上，大圈特圈，大点特点。想先生意中，以为“我这篇经天纬地的妙文，定能使《新青年》诸记者，拜服得五体投地”。又想先生提笔大圈大点之时，必定摇头摆脑，自以为这一句是“一唱三叹”，那一句是“弦外之音”，这一句“平平仄仄平平”，对那一句“仄仄平平仄仄”，对得极工。初不知记者等虽然主张新文学，旧派的好文章，却也读过不少，像先生这篇文章，恐怕即使起有清三百年来之主考文宗于地下，也未必能给你这么许多圈点罢！闲话少说，句读之学，中国向来就有的，本志采用西式句读符号，是因为中国原有的符号不敷用，乐得把人家已造成的借来用用。先生不知“钩挑”有辨别句读的功用，却说他是代替圈点的。又说引号（“”）是表示“句中重要之处”，不尽号（……）是把“密点”移在“一句之后”。知识如此鄙陋，记者惟有敬请先生去读了三年外国书，再来同记者说话。如先生以为读外国书是“工于媚外，惟强是从”，不愿下这功夫，那么，先生！便到了你“墓木

拱矣”的时候，还是个不明白！

1919年4月21日，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在北京召开成立大会。刘半农、胡适、周作人、钱玄同、马裕藻、朱希祖等六人联名提出“国语统一进行方案”。“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得以通过。议案中对标点的作用、意义、标点的格式、使用规范，作了进一步细化。1920年2月教育部正式下文《通令采用新式标点符号文》。新式标点符号，从此开始生长在我们的文字里，流淌在我们文化的血液里，镌刻在我们思维的沟壑里。

历来，汉语书写中，没有“她”字。第三人称代词多用“伊”或“他”字，没有性别区分。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一段时间，有一些文学作品，也有用“伊”字来专指女性第三人称。

“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时，一切旧的观念正在被突破，文化领域中新的事物也是层出不穷。新诗、杂文、句读等等的出现，给人们耳目一新，神清气爽的感觉。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作出开创性伟大贡献，在新诗、杂文、句读等文化领域披荆斩棘勇于实践长于思考的江阴籍北大教授刘半农，注意到了这个文化现象。

一个“他”字表示所有的第三人称，终嫌笼统。然而，怎么来区分性别呢？对语言问题极有研究，造诣极高的刘半农，在一番思索后，他主张造一个新字“她”，用“她”字来承担表示女性第三人称的任务。不过，当时他这个想法，他并不急于公布，因为对这个字应怎样定位，怎样发音等问题，还没有想好，因而只是在朋友交谈中说了一下。但不久，周作人在《新青年》第五卷第二号译文《改革》一文中，就透露刘半农的这个想法。一透露，刘半农的这个想法立刻引起了人们争议。然而，却也因为有了这个争议，促使刘半农加快速度更深入地去思考和探讨了这一问题，并使“她”字真正诞生，并获得社会的认可。

1920年初，上海《新人》杂志上，刊登了一篇署名寒冰的文章《这是刘半农的错》。这篇文章，针对刘半农创造的“她”字说话，认为大可不必。他认为，第一、第二人称的“我”“汝”等字，都没有男女性别区分；另外，“她”和“他”字，只能在阅读时分别，而读音时并不能区别，所以没必要新造一个“她”字。

寒冰的文章出来没多久，上海《时事新报》的“学灯”栏中，发表一篇署名孙祖基的《她字的研究》，孙祖基文章大力支持刘半农的创造。接着还发表了一篇针对性文章《驳她字的研究》。因为“她”字，文坛开始口水战。这样一来，“她”字问题更引人注目了。

此时，刘半农已到英国留学。他在伦敦读到了登在《时事新报》上的两篇文章，这使他不由对此事进一步研究，并写出《“她”字问题》一文来。

对这个“她”字，刘半农从两个方面进行了讨论。一、中国文字中，要不要有一个第三人称阴性代词；二、假如需要，能不能用这个“她”字。

首先，从翻译和阅读外国文章的角度，提出了创造“她”字的必要。他举出阅读中的一个例子：

“他说，‘他来了，诚然很好；不过我们总得要等他。’”

这种语言方式，在外国文章，和国人的日常表达中，是常常遇见的。但倘若按照“他”字表示一切第三人称的话，就会出现丈二和尚摸不清头脑的问题。但是，用一个女性的“她”字来区别，一切便会明了：

“她说，‘他来了，诚然很好；不过我们总要等她。’”

使用了“她”字，说这句话所牵涉的三个人物的角色，就清清楚楚了。这是一个显明的例子。

接下来，刘半农对“她”字的可行性作了分析，指出了此字可用的必要。他概括说：

“我们因为事实上的需要，又因为这一个符号，形式和‘他’字极像，容易辨认，而又有显然的分别，不至于误认，所以尽可以用得。”说到这里，刘半农似乎坚定了自己的想法：“要是这个符号是从前没有的，就算我们造的；要是以前有的，现在却不甚习用，变做废字了，就算我们借的。”

最后，为解决该字只能区别字形而难以区分字音这一点，刘半农也做了一些探讨。他说：“‘他’字在普通语区域中，本有两读：一为Ta用于口语；一为Tuo，用于读书。我们不妨定‘他’为T’ a，定‘她’为T’uo；……”当然，这一点刘半农也正在思考，故他希望周作人及孙祖基以及寒冰等关心这一问题的人来共同研究。

说起周作人，还有一段故事。周作人认为“他、她”两字难以区别读音，故在自己的文章中，不用“她”而用“伊”。而刘半农却以为口语中用‘伊’字当第三位代词的地域很小，难求普通不利于推广；“伊”字的形式，表示女性，没有“她”字来得明白；“伊”字偏文言，用于白

话中，不甚协调。

通过对“她”的全面探讨后，刘半农还趁便提出一点新的想法：“我现在还觉得第三位代词，除‘她’之外，应当再取一个‘它’字，以代无生物。”

刘半农在英国伦敦将《“她”字问题》写好之后，寄给当时发表过多篇论辩文章的上海《时事新报·学灯》栏，于1920年8月9日发表。发表后，获得社会的广泛认同。慢慢地，“她”字便作为女性第三人称代词出现在人们的文章和书籍中，并最终为人们广泛使用；就连刘半农只在文章中提及而未来得及深入解说的“它”字，现在也成为人称之外的其它物名的确定代词而广泛运用。

“她”与“它”，是刘半农创造的。刘半农不仅是创造者，还是一位大胆的实践者。譬如这无生物的名称吧，不仅创造了一个“它”字，还对一些格外珍惜的东西，表达出一种近乎对异性的珍重。譬如他在给周作人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说起文学，我真万分的对她不起，她原是我的心肝宝贝！……她竟如被我离弃的很渺远的一个情人一样。”

将自己热爱的文学、挚爱的祖国，用一个女性的“她”来表示，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突破吧。现在我们在行文造句时得心应手地运用着“她”字来表达自己珍爱的事物，开先河者，也是刘半农。

如今，我们都已经十分熟稔地运用“她”、“它”来表情达意，喝水不忘挖井人，这是刘半农的功劳。刘半农逝世后，鲁迅先生在《忆刘半农君》的纪念文章中，专门提及此事：

“他（刘半农）活泼，勇敢，很打了几次大仗。譬如罢……‘她’和‘它’字的创造，就都是的。现在看起来，自然是琐屑得很，但那是十多年前，单是提倡新式标点，就令有一大群人‘若丧考妣’，恨不得‘食肉寝皮’的时候，所以的确是‘大仗’。”

二十世纪初，刘半农们对封建僵化陈腐的文化作突破和改变，不是容易的事。在如今，所有唇枪舌剑都已尘埃落定，我们的文化已经由那些睿智的先贤们引领，进入了姹紫嫣红满园芬芳的时代，我们享受着刘半农呕心沥血、披荆斩棘，甚至浴血奋战获得的成果，我们至少应该给他的伟大一个公道的评价吧。

第七章 出国留学

一、文学的守望者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发轫多年的国语运动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刘半农为国语发展也立下了汗马功劳。当时，刘半农一方面是个载誉文坛的白话诗人，另一方面是个国语先驱。刘半农也把倡导白话文和推动国语发展看做不可或缺的两翼。所以，刘半农出国之后研究语音学和他投身“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是不矛盾的，和他希望“五四”风暴之后在废墟上重建新文化的思想更是一脉相承的。

只不过，刘半农出国的另一个原因，也是众所周知的。

刘半农去北大任职时，只是常州府中学堂肄业的学历资格，这成为他始终抑郁寡欢的原因。几千年来，官本位社会的中国，崇尚的就是官大一级压死人的信条。而这种官本位的思想，还不仅仅反映在官场，在社会的方方面面都有蔓延。反映在学术院府，那就是学历高一级压死人。即便是高学历低能力者也无妨，照样可以眼高手低地去嘲笑他人。这是中国社会之怪现象，这样的怪现象世世代代阻止了多少青年才俊脱颖而出啊。但是，谁又能改变？靠一个“五四”，就可以荡涤一切陈腐吗？显然不可能。伟大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中，刘半农冲锋陷阵很打了几个大仗，可以说是功成名就的了，但是功成名就又怎么办呢？遇上一些具体问题，还是绕不开这个话题，那些不阴不阳，不三不四，酸不拉几的话语时不时刺激着刘半农。就是胡适，这个同是新文化营垒的洋博士，也是西装革履，器宇轩昂，对刘半农不屑一顾，说刘半农的文章“不登大雅之堂”。而那些本来就抱残守缺的老学究更是讥讽说：“你懂什么？你有什么资格来倡导呢？”这些刺激一次次伤害着刘半农。这样，他无论如何也要去国外深造。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说：“半农受了这

个刺激，所以发奋去挣个博士头衔来，以出心头的一股闷气……”正好这时，北大一些学生也纷纷出国，这也在客观上坚定了刘半农出国留学学习的决心。

1919年底，刘半农赴欧行程已定。在北京大学法科大礼堂召开校庆二十二周年纪念会上，他做了临别赠言：

我此番出去留学，不过是为希望能尽职任起见，为希望我的工作做得圆满起见，所取得一种相当的手续，并不把留学当作充满个人欲望的一种工具……

我是中国人，自然要希望中国发达；要希望我回来时，中国已不是今天这样的中国。但是我对于中国的希望，不是一般的出国者，对“祖国”的希望，以为应当如何练兵，如何造舰，我是——

希望中国的民族，不要落到人类的水平线下去；

希望世界文化史上，不要把中国除名。

怎么样才可以做到这一步——还要归结到我们的职任。

慷慨的演说，如劲风吹拂着在场的青年学子们的激情，暴风雨般的掌声久久不能平息，学生们激动了，刘半农也激动了。

1920年，刘半农、朱惠和长女刘小蕙短暂回到江阴，做出国准备。1月20日，一家抵达上海继续办理出国事宜。

在这期间，他应邀出席了一些朋友的送别宴会。原来在中华书局工作的一些老同事，也在汉口路的“小天地”酒店为他设宴送行。这天，正在席间，忽然传来声声笑语，刘半农觉得好生耳熟。几个男声其中夹杂着一个女人声音。刘半农过去一看，原来是上海《礼拜六》、《紫罗兰》、《游戏杂志》的编辑和主要撰稿人——姚蛩雒、朱鸳雒、闻野鸡、许瘦蝶、杨了公等，女人则是上海滩妖艳的四大名妓之一“林黛玉”。熟人相见，自是一番寒暄，之后，他们硬要拉刘半农入席，碍于情面，刘半农不得不小坐，席间，那帮人提议飞觞行令，这样，就是满桌满嘴的“鸳鸯蝴蝶”了，刘半农听得已是十分的不耐烦不自在，直到后来扯到骈体文《玉梨魂》时，刘半农再也不能控制，当众斥责它空泛、肉麻、淫秽，并讥讽道：“这真的是鸳鸯蝴蝶派小说。”一番争论闹得双方都脸上挂不住，最后，不欢而散。

1920年2月7日，一切事宜安排妥当，刘半农一家乘日轮“贺茂

号”启程。一声笛鸣，刘半农暂时抛却了国内许多年来的磕磕绊绊，琐琐碎碎。十里洋场的上海，繁华也好污浊也好，都随着哗哗的海水声渐行渐远，他站在甲板上，任凭那清爽的海风吹拂，遥远而陌生的国度，此时正充满着未知的魅力，精深博大的语音学充满着迷人的魔力，他在心中轻声低吟：祖国，我苦难的祖国啊，希望我回来时你能身强体壮啊。

在海上漂泊几天之后，他们于10日到达香港。暂时的小憩之后还有更长的行程等待着他。他们在太平山走了一圈，心神不定的大人们了无欣赏景色的喜悦，唯有孩子，无忧无虑。

登山四望，丛岚绕足，白云漫漫；
下不能见地，上不能见天。
山水溅溅，山树摩肩。
偶从云淡树疏处，窥见远海远山；
海大不如镜，山大不如拳。
稚儿欢笑奔我前，
山风吹短发，
飘荡白云间。
“尔胡为乎来哉？”
跳舞拍手，心中茫然。
为折山花佩胸前，
下山入海白阿母：“今日阿爹，携我上天。”

航船再次起航的时候，刘半农心中似乎充满了惆怅，一种远离故土的茫然，随着离家的距离越长越长。这茫茫大海上，他看见了许多国家的旗帜，却看不到自己国家的旗。刘半农心中的孤独感越压越重。低头看看船内，同船的中国人也是寥寥无几，长得相像，骨子里却另类的日本人倒不少。他们在船上川流不息地走来走去，相互打着招呼。夹七夹八讲着半三不四的英语、日语，他们中有商人、政客、奸细、龟奴、妓女。他们自恃高傲，对中国人很不愿搭理。

船上的活动余地很小，除了甲板，没处可去。这天他们在甲板结识了日本著名的画家小仓右一郎。小仓倒是一个和善的人，一边画着海景，一边和半农攀谈。他们相互了解，小仓知道了刘半农从北京大学教授出来，刘半农知道了小仓是一位著名画家、雕刻家。小仓兴致所起，还给

小蕙画张肖像。大大的眼睛，小巧的鼻子，乌黑的双眸，一个漂亮可爱的女孩，一挥而就画成了。小蕙既兴奋又羞赧。这枯燥的日子里，刘半农总算有了小仓右一郎这样可以说话的旅伴。

在三十多天的旅途中，虽然寂寞枯燥，但是，第一次到达的新的地方总会有许多的新鲜和深刻的印象：锡兰的印度古文明；安南生活与苛政之下的亡国奴；新加坡从事着商业活动的华侨，以及他们没有本国政府保护，处处受人欺侮的惊人情景；埃及的古文明、古文明的衰落……都在刘半农心头留下深刻的印象，寂寞中，幸好还有文字，还有诗歌，它们陪伴着刘半农，刘半农记录着沿途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

1920年3月15日，船终于抵达法国马赛，随后改乘火车经巴黎去英国。17日抵达英国伦敦。几次三番的选择，终于将家眷安顿好，随后刘半农就入伦敦大学学院学习，开始他刻苦探索语言学的征程。

二、教我如何不想她

异域的风情，总会让人有点新鲜感。宽阔古老的马路，整齐闪亮的路灯，高大虬曲的梧桐，远近矗立的楼房，一切沉浸在湿漉漉的雾里，雾都伦敦仿佛一个蒸汽的浴室。穿城而过的泰晤士河闪着耀眼的波光……

泰晤士河，英国最长的河流，也是最重要的水路，是英国的母亲河。它发源于英格兰西南部的科茨沃尔德山，沿途汇集了英格兰境内的诸多细流，河水从西部流入伦敦市区，从源头到伦敦桥长259公里，泰晤士河不算长，但它流经之处，都是英国文化精华所在，或许可以反过来说，泰晤士河哺育了灿烂的英格兰文明。伦敦的主要建筑物大多分布在泰晤士河的两旁，尤其是那些有着上百年、甚至三四百年历史



泰晤士河

的建筑，如有象征胜利意义的纳尔逊海军统帅雕像、葬有众多伟人的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具有文艺复兴风格的圣保罗大教堂、曾经见证过英国历史上黑暗时期的伦敦塔、桥面可以起降的伦敦塔桥等，每一幢建筑都称得上是艺术的杰作。

伦敦的上游，泰晤士河沿岸有许多名胜之地，诸如伊顿、牛津、亨利和温莎等。泰晤士河的入海口充满了英国的繁忙商船，然而其上游的河道则以其静态之美而著称于世。不过，令刘半农惊讶的是，繁华的伦敦街头，时不时总会看得见缺胳膊少腿的残疾人。这是一战留给英国伤痛的标记。刘半农慢慢熟悉伦敦，慢慢了解英国。这个由瓦特点燃工业革命的国家，有着先人一步的繁荣和发达，自然，这个繁荣和发展中不无血腥的掠夺。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给这个号称“日不落”的帝国还是蒙上了阴影。在战后虽然领土有所增加，但其对领土的控制力却因战争的巨大伤亡与物资损失而大大削减，之后英国的殖民地有很多开始独立，对英国的政治经济带来很大影响；同时战前的债权国变为战后的债务国，国际金融中心由英国伦敦转移到了美国纽约，“日不落帝国”世界政治、军事霸主的地位都已名存实亡；一战中，商船损失，使得其航运业遭遇重创，导致英国贸易量严重下降……

你抢我，我抢你，你杀我，我杀你，这样的社会，何时是个头？从混沌的中国走出，走进一个糊涂的英国，刘半农感到纠结！

好在，自然永远是美丽的。晶亮的阳光，啁啾的小鸟，曼妙的夜景，温柔清风……敏感的诗人总在这时，思念起祖国、故乡、故友……

他将明信片寄给鲁迅，也寄去一份浓浓的思念；他用方言写山歌，仿佛就找到了灵魂的慰藉；他用白话写诗歌，《牧羊儿的悲歌》、《静》、《饿》、《奶娘》、《一个农家的暮》、《稻棚》、《回声》……每写一首，就是一次心灵的归乡。

1920年9月4日抱着对祖国的深切思念，刘半农写下了经典的歌词《教我如何不想她》——

天上飘着些微云，
地上吹着些微风。
啊！微风吹动了我的头发，
教我如何不想她？

月光恋爱着海洋，
海洋恋爱着月光。
啊！这般蜜也似的银夜，
教我如何不想她？

水面落花慢慢流，
水底鱼儿慢慢游。
啊！燕子你说些什么话？
教我如何不想她？

枯树在冷风里摇，
野火在暮色中烧。
啊！西天还有些儿残霞，
教我如何不想她？

这首诗，从表面上看，好像是一首“情诗”，表现了诗人对心上人的思念、摹想之情怀。但是，联系诗人的生活和实际情况，就不难看出，这是一首思念祖国的诗歌。诗人当时远离祖国，身居异乡，生活艰苦，学习紧张，每当夜深人静，思乡怀国的情绪油然而生。也正是这个原因，激起了当时同样留学在外，同样有着思乡之情的赵元任的内心共鸣，赵元任为之谱写了舒缓优美的旋律。一时间，《教我如何不想她》，成为当时中青年知识分子中广泛流传的一首经典歌曲。这首歌，从上世纪30年代始一直传唱到如今。



赵元任

关于刘半农的《教我如何不想她》这首诗还有一则有趣的传说。赵元任夫人杨步伟在她的回忆录《杂记赵家》中有一段叙述。1930年前后，杨步伟在北京女子文理学院任教，她的那些女学生们非常爱唱《教我如何不想她》，后来歌词作者刘半农奉命接掌该学院，刘半农穿了一件中式的蓝布棉袍子来到学校，女学生们偷偷议论：“原先听说刘半农是一个很风雅的文人，怎么会是一个土老头。”杨步伟听到了，就告诉这些女学生：“你们一天到晚都在唱他写的《教我如何不想她》，这就是那个他

呀。”女学生哄了起来说：“这个人不像么。”还有的说：“这首歌不是你家赵先生写的吗？”杨步伟说：“曲是赵先生所谱，但歌词是他写的呀。”

后来刘半农知道了这件事，为此而作“打油”诗四句：

教我如何不想他，
请来共饮一杯茶。
原来如此一老叟，
教我如何再想他。

在欧洲的几年，无论在英国还是在法国、德国，刘半农的这种思乡之情是有增无减。从伦敦到巴黎，恰是秋季，巴黎的秋夜干爽而冷寂，凉飕飕的风不仅吹干了皮肤，也侵入内心，诗人低吟：

秋风一何凉！
秋风吹我衣，秋风吹我裳。
秋风吹游子，秋风吹故乡。

——《扬鞭集·秋风》

这首诗，颇有王维之“遍插茱萸少一人”的风韵。

在《扬鞭集》的《江南春暮怨词》、《忆江南》，以及《秧歌》、《山歌》、《依家》、《阵雨》、《拟歌》等作品里都有反映作者客居他乡思念祖国的思想和情怀。

刘半农身在他乡，心在祖国。他时时刻刻关注着祖国的发展。1923年7月6日，巴黎酷热难耐，这是三十年来最热的一天。“恰巧这天，北大同学为着国际共管中国铁路的不祥消息，开第一次讨论会，我就把这首记我个人情感的诗，纪念这一次的会。”祖国蒙受的耻辱让他心情翻滚，天热，心更热，心中燃着一腔怒火。

别再说多厉害的太阳了，只看那行人稀少的大街上，偶然来了一辆马车，车轮的边上，马蹄的角上，都爆裂出无数的火花！啊，咖啡馆外的凉棚，一个个的多么整齐啊！可是我想到了红海边头，沙漠游民的篷帐，我想到了印度人的小屋，我想到了我灵魂的坟墓：我亲爱的祖国！别再说自然界多么严峻了，只看那净蓝的天，始终是默默的，始终不给我们一丝的风，始终不给我们一片的云！独行踽踽的我，要透气是透不

转，只能挺着忍着，忍着那不尽的悲哀，化做了腹中一阵阵的热痛，化做了一身身的黄汗。啊！不良的天时，不良的消息，你逼我想到了“红笑”中的血花！我微弱的灵魂，怎担当得起这人间的耻辱啊！

诗人炽热的爱国感情，在字里行间喷涌而出。对侵略者惯用的“爱国”招牌欺骗国人，实则进行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作者已经洞察，因此他认为：

我要附带说一句话：爱国虽不是个好名词，但若是只用之于防御方面，就断然不是一桩罪恶。我还要说：我不能相信不抵抗主义。

蜗牛是最弱的东西了，上帝还给它一个壳，两个触角，这为什么？鼠疫杀人，我们防御了；疯狗杀人，我们将它打死了；为什么人要杀人，我们要说不抵抗！为着爱国二字被侵略者闹坏了，就连防御也不说；为着不抵抗主义可以做成一篇很好的神话，就说世界中也应如此。这若不是大智，可便是大愚！我只要做个不智不愚的人，我不能盲从。我就是这么说！

——《扬鞭集·别再说……》

1924年5月《扬鞭集·三唉歌》更是把诗人思念祖国，忧国忧民的思绪表露得淋漓尽致。爱着祖国，痛着祖国，看着贫弱的祖国，自己身处实验室，无力拯救祖国，欲哭无泪，唯有仰天长叹……

得不到她的消息是怔忡
得不到她的消息是烦苦，唉！

沉沉的一片黑，是漆吗？
模糊的一片白，是雾吗？哎！

这大的一个无底的火焰窟，
浇下一些儿眼泪有得什么用处，唉！

一种忧愁，一种无奈，一种割不断的思念，跃然纸上，而一种激发人奋进，惊醒人觉悟的情感也是历历可见啊！

留学没有改变刘半农忧国忧民的形象，反而因为对祖国的无比热爱，

促使他更加披肝沥胆地学习，他渴望早日学成归去，报效祖国……

三、荣获博士桂冠

刘半农在欧洲六年的留学期间，生活极度艰苦。按刘半农自己的说法叫“穷得淋漓尽致”。妻子朱惠，是带着身孕跟随丈夫前往欧洲的。到了伦敦不久就分娩，因为是龙凤双胞胎，医院做了剖腹产，一对宝宝，男孩叫育伦，女孩叫育敦。本来维持三张嘴已经很费力，一下多了两个孩子怎么了得？在医院生产时，又耗费一笔可观的医药费，刘半农一家的日子一下子陷入非常拮据困境。就连买个婴儿的摇篮都买不起，刘半农夫妇把国内带去的柳条箱一拆两半变成摇篮。为了节省，他们总是吃面包，这面包吃得，看见就想吐，但是还得吃。有面包吃算好了，有时还只能吃两餐。除了家庭的温馨可以暂时掩盖一点生活的苍白，其余的就是剩下坚韧的忍耐了。

刘半农官费留学，教育部每月发生活费 60 元，北大发津贴 120 元，可以折合 60 英镑。但是，战后的欧洲物价和金价大起大落，汇率也是大起大落，欧洲人的算盘珠子一拨拉，120 元所剩无几。而生活的费用，倒是有涨无跌。再有，半农寄回国去的稿件，发表了，有的却不寄稿费，这让他穷上再添一个急。刘半农既愤懑又抑郁。

你这样说也很好！

再会罢！再会罢！

我这稿子竟老老实实的不卖了！

我还是收回我几张的破纸！

再会罢！

你便笑咪咪的抽你的雪茄；

我也要笑咪咪的安享我自由的饿死！

再会罢！

你还是尽力的“辅助文明”，“嘉惠士林”罢！

好！

什么都好！

我却要告罪，

我不能把我的脑血，
做你汽车里的燃料！

应付贫穷，刘半农似乎总结出了一套办法，上街没钱坐电车，他就在寒风里走上十里八里，省了钱，锻炼了身体；早晨进图书馆，中午没钱买中餐，就自己带个面包啃啃，喝口自己带去的水。在贫苦的生活中刘半农没有消沉，他自嘲道：“学人的生活，本应该如此。”

“穷苦正是我们的本分：我们既没有做贼做强盗的勇气，更没有做军阀做政客的福分与聪明，那末，当你投生时，阎王爷就在你额头上用朱笔批上一个‘穷’字，也正是不胜应当之至！”

但是即便再洒脱，看见生病的妻子和孩子忍饥挨饿，刘半农的心中便是说不出的酸楚。

岑寂的黄昏，
岑寂的长街上，
下着好大的雨啊！
冷水从我帽檐上，
往下直浇！
泥浆钻入了破皮鞋，
吱吱吱吱的叫！
衣服也都湿透了，
冷酷的电光，
还不住地闪着；
轰轰的雷声，
还不住的闹着。

好！
听你们罢，
我全不问了！
我很欢喜，
我胸膈中吐出来的东西，
还逼近着我胸膛，
好好的藏着。

近了！
近了我亲爱的家庭了，
我的妻是病着，
我出门时向她说，
明天一定可以请医生的了！
我的孩子，
一定在窗口望着。
是
我已看清了他的小脸，
白白的映在玻璃后；
他的小鼻，
紧紧的压在玻璃上！
可怜啊！
他想吃一个煮鸡蛋，
我答应了他，
已经一礼拜了！

一盏雨点打花的路灯，
淡淡的照着我的门。
门里面是暗着，
最后一寸的蜡烛，
昨天晚上点完了！

1921年9月15日，刘半农在写给胡适的信中这样说：“我近来的情形，真是不了！北大的钱已三月没寄来，电报去催，也不寄；留学费也欠了三个月不发，……我身间有几个钞，便买支面包吃吃，没了便算。但是除闭眼忍受外，也就没有别法……”

在英国呆不下去了，这年夏天，刘半农只好举家转往法国，入巴黎大学学习，兼在法兰西学院听课。因为当时，法国的费用要比英国便宜多了。

再艰苦，刘半农不忘留学初衷，不忘中国人的志气。英国大不列颠图书馆和法国国家图书馆的宝藏，成为他最好的精神食粮；大学里的教授、专家成为他的良师益友。而自由开放的氛围也让这个来自殖民地半

殖民地的中国知识分子感到一种松绑的畅快。他只要忍住饥饿，就可以在知识的海洋畅游。

家，是和美的。妻子朱惠不仅承担了家中一切的杂务，还在心灵上深深慰藉着丈夫。不管是风是雨，他们总是肩并肩一起撑着这个温暖的家。不管是穷还是苦，妻子从无怨言。她以一颗炽热的心给了丈夫，给了这个家一个温暖的港湾。



刘半农夫妇与女儿小惠

我的心窝和你的，
天与海般密切着；
我的心弦和你的，
风与水般和谐着。

啊！……

血般的花，花般的火，
听它罢！

把我的灵魂和你的，
给它烧做了飞灰飞化罢！

——《无题·梦中作》

孩子是天真的，天真的孩子，让刘半农的内心的童真，内心精灵一样灵敏的诗歌，随着鲜花和阳光跳跃。

雨

这全是小惠的话，我不过替她做个速记，替她连串一下便了。

妈！我今天要睡了——要靠着我的妈早些睡了。听！后面草地上，更没有半点声音；是我的小朋友们，都靠着他们的妈早些去睡了。

听！后面草地上，更没有半点声音；只是墨也似的黑！只是墨也似的黑！怕啊！野狗野猫在远远地叫，可不要来啊！只是那叮叮咚咚的雨，为什么还在那里叮叮咚咚的响？

妈！我要睡了！那不怕野狗野猫的雨，还在黑黑的草地上，叮叮咚咚的响。它为什么不回去呢？它为什么不靠着它的妈，早些睡呢？

妈！你为什么笑？你说它没有家么？——昨天不下雨的时候，草地上全是月光，它到哪里去了呢？你说它没有妈么？——不是你前天说，天上的黑云，便是它的妈么？

妈！我要睡了！你就关上了窗，不要让雨来打湿了我们的床。你就把我的小雨衣借给雨，不要让雨打湿了雨的衣裳。

刘半农就在这艰苦而又充满温馨的日子里，一边研究着他的语言学，一边放不下他的“心肝宝贝儿似的文学。”《扬鞭集》中的许多诗歌都是在这个时期完成。但是，这样心顾两头，终究不是件事情，他发现现在从事研究的语言学，其实是一门十分深奥和庞杂的科学，而文学占据他的时间和精力太多，只好忍痛割爱暂时搁置一下，所以，后来一段时间，他的文学作品就大大减少了。

他一步步探索语言学，却一步步后退。因为语言这个东西实在太复杂，开始专修混通的语言学，发现预备困难，要完成任务，必须花十年八年时间；退一步侧重研究语音学，但又发现自己的耳朵和嘴巴不灵敏；再退一步，在普通语音学中研究实验语音学。想借助科学上的新方法，研究不容易凭空断定的音韵和乐律。他从一步步后退的经历中悟出一个道理，一切必须从实际出发，野心不能太大。宁可挑一块小石头打穿它，别在一块巨石上耗费无用功。这样，他把所有的东西撇下，步步为营，穷究到底，研究他的语音学。

1920年进入伦敦语音实验室工作，这时候，他就开始研究音韵奥秘，他曾准备对古诗词、曲、散文、歌谣、说话等进行试验比较，求出构成音节的共同原则。但数月后终因诗歌体裁太多，方言各地差异太大，吟诵起来千变万化而搁浅。

接着，他着手起草《语音学纲要》一书，后又因故暂停。他又拟作《南方语种的清浊音》，后又搁置。最后他着重汉语四声的研究，运用近代实验语音学的仪器和方法，记录了北京、南京、武昌、长沙、成都、福州、广州、潮州、江阴、旌德、腾越等十二个地方方言的声调研究结果，弄清了汉语调类和调值的关系。写成了书稿《四声实验录》，于1924年3月由上海益群书社出版。《四声实验录》由蔡元培封面题签，吴

敬恒序一，傅斯年序二，内容除“引言”外，分7个部分。

第1部分“声音的断定”，从物理学的角度说明“声浪”、“音的长短”、“音的强弱”、“音的本质”。第2部分“语音和乐音”，从语音与乐音的不同说明四声是高低的差别，指出了四声的基本条件。第4部分“计算及作图”和第5部分“声音与对数”，说明用精密的方法计算浪纹计上所画出的浪纹，并按数据画出图。第6部分，“已实验的四声”，是12处方言声调的记录，某处方言有几种声调，就画出几张分图，然后把分图汇合成一张总图，总图后有一个五线谱图，接着是一组“标音符号”，画在所举的例字旁边。第7部分“余论（今日以前的四声论）”，搜集了历代和当时比较重要的关于四声的论述。本书在理论方面，特别是对乐理讲得很透彻；在实践方面存在一些问题：从调值来看，有许多声调曲线都不能反映真实情况；从调类来看也有一些错误。尽管有缺点，但在中国以实验语音学的方法研究声调，并写成专著的，《四声实验录》是首创。在它的影响下，罗常培的《临川音系》（1941）、王力的《博白方音实验录》（1931）等都是用刘半农实验声调的方法确定声调的读音。

1922年冬，经过两年的刻苦研究学习，巴黎大学对刘半农的各部门功课进行了严格的测试，认为他成绩优异，可以进入博士生阶段学习。并允许应法国国家文学博士试。这样，刘半农的学习研究任务一下子更紧张了。一方面，他继续深入进行汉语四声研究工作，在北京大学的《国学季刊》和《国语月刊》上发表多篇论文；另一方面，他则必须为博士论文——《汉语字声实验录》、《国语运动史》积极准备资料。

赵元任曾有一次去刘半农家拜访，后来他在《刘半农先生》一文中回忆道：“房子已经够小了，可是桌椅板凳碗盏之间，发现东一个音鼓，西一个留声机，留声机可不是专为唱留声唱片用的，乃是为转动音浪计用的。那时他的更大规模《汉语字声实验录》论文的实验工作已经快做完了，所用的方法，还是量浪算对数的旧法子。可是他又拿着‘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精神，先后发明了直接量对数的音高推断尺（Liugraph）跟乙二声调推断尺……”

紧张的学习研究工作需要大量的资料，他就免不了常常往国家图书馆跑。这一天，与往常一样，刘半农在浩如烟海的书堆里翻阅着他所要的资料。突然，一本本似曾相识的，又泛着古黄的书籍映入眼帘，他的视线一下子就给它们逮住了，仿佛一群被劫的中国孤儿，看见一个家乡

的叔叔，在向他呼救。刘半农凝眸一看：这不是珍贵的敦煌的写本吗？怎么……对啊，他的眼前浮现出戈壁敦煌的一幕幕肮脏耻辱的勾当，他颤抖着双手捧起它们，仿佛捧着中国民族艺术的灵魂，一行泪水潸然而下，这些都是孤本啊，刘半农知道，他现在要把书带回国是绝对不可能的，唯有将他们的灵魂带走。从此，图书馆每天都有一个中国的书生，啃着自带的面包，伏案疾书，他硬是用他的毅力将失落在海外的敦煌写本中关于文学、语言、历史等方面的珍贵史料，一页页地手抄成本。并于1925年编成《敦煌掇琐》上、中、下三卷，由国立中央研究院出版。成为研究我国文学史、社会史、语言史的重要文献。另外还抄录了《太平天国有趣文件十六种》由北京北新书局出版。成为太平天国历史研究的重要文本。

1924年，由于刘半农在实验语音学研究领域里辛勤耕耘，成果卓著，巴黎大学语音学院院长贝尔诺在一次常委会上提名，吸收刘半农为该会会员。

1925年初，他的用法文撰写的博士论文《国语运动史》和《汉语字声实验录》完成。并获得法国学院的伏尔内语言学专项奖。

三月的一天下午，巴黎大学校园内弥漫着温馨而兴奋的气氛，圆形大厅坐满了旁听的学生和老师。一排主试的教授，神情威严而肃穆，他们安静地端坐在皮靠椅上。阳光从窗外射进来，为今天的这场面试增添了许多庄严和隆重。一侧，是今天将要进行博士论文答辩的刘半农。

刘半农今天仔细打理了一番，笔挺的西装，雪白的衬衣外同样是笔挺的领带。他略显不安，这是考试前人人都要显露的些许局促。为了这场答辩，他卧薪尝胆，夙兴夜寐。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完成了那么多的学习研究项目。他真的有些憔悴，只有那精气神，正在说明他是一个来自中国，一身傲骨，只有34岁的年轻人。

答辩开始，刘半农宣读论文。试场里鸦雀无声，大家都被他深奥又新鲜的内容所吸引，被他一口漂亮法语所吸引。接着是答辩，主试者围绕论文课题，提出一个又一个问题，这些问题，有的是推广广度，有的是开掘深度，刘半农从容淡定，思路清晰一一解答，并拿出随身携带来的“音高推断尺”和“刘氏音鼓”，一边答题，一边演绎，有条不紊，简明清晰。中场稍事休息。之后继续答辩。大厅里静得连呼吸声都可以听得见，这简直就是一场审判啊。四个多小时过去了，主试者宣布：中国

留学生刘半农，经过五年的学习，各门功课成绩优秀，并完全通过博士论文的答辩。经答辩委员会决议，一致同意授予他法国国家文学博士学位。顷刻，宁静的答辩现场欢声雷动，掌声雷动，刘半农恍惚间看见许多的灯光和许多的鲜花。梦寐以求的平台，他今天终于到达了目的，然而，此时站在这里的他却没有激动，没有欢呼，他的眼前浮现的是祖国，一缕悲怆掠过心头，刘半农差一点落下眼泪……

第八章 回国治学

一、组建“数人会”

作为法国以国家名义授予的文学博士，那是中国第一个最高头衔。获得这样的荣誉，不仅刘半农长舒一口气，中国也应该长舒一口气，并为之骄傲！

完成学业后，刘半农便一心只想着尽快把自己所学的本事报效祖国。他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这些时候自己越来越想念祖国了。那时，也有朋友劝他，国内如此乱哄哄，你在国外能住多久住多久，回国后只是惹得满身的乌烟瘴气而已。刘半农知道朋友是好意，自己也明知道祖国母亲正在苦难之中，但是，不知为什么，回国的念头丝毫不会动摇。一个游子，回家还要寻找理由吗？1924年下半年，他几乎天天梦见祖国、梦见家乡、梦见朋友。热情的树人、慷慨的玄同、温雅的启明、幽默的尹默……还有，老家的兴国塔、东横街、西横街、四眼井、北门头、忠义街……当然还有，北大河、琉璃厂、青云阁……一想到这些他就拉不住思维的缰绳，一个人发呆。朱惠说：“有得想，不如早点回？‘出门一里不如家里。’‘金窝银窝，不如家里狗窝。’”半农呵呵笑出声来，这些都是江阴家喻户晓的俗语。朱惠这时说来，让刘半农郁结的心顿时感到许多松散。

1925年6月中旬，刘半农和朱惠，带着三个欢蹦乱跳的孩子，带着大批的研究实验语音学的最新仪器，与赵元任夫妇一起启程回国。那是多么兴奋的一次行程啊。刘半农的心中充满了对祖国怀抱的渴望，充满了对亲人重逢的希冀。诗人的激情点燃了。

过地中海，他写道：

涛声寂寂中天静，三五疏星兢月明。
一片清平万里海，更欣船向故乡行。

过苏伊士运河，他写道：

重来夜泛苏伊士，月照平沙雪样明。
最是岸头鸣蟋蟀，预传万里故乡情。

过“Minikoi”岛，他写道：

小岛低低烟雨浓，椰林滴翠野花红。
从今不看炎荒景，渐入家山魂梦中。

过哥伦布海港，一只翩翩蝴蝶令作者想起故土，他写道：

椰林漾晴晖，海水澄娇碧。
咿哑桨声中，一个黄蝴蝶。

遥望西贡市，他写道：

澜沧江，江上女儿愁，
江树伤心碧，江水自悠悠！

后来，诗人将此五首小诗放在《扬鞭集》中时，编辑为《归程中得小诗五首》。品读之中，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作者那归心似箭的情感。

1925年8月7日。祖国仿佛一个泪流满面的母亲，迎接着许久不见的儿子。那天，刘半农从上海港登陆，大雨滂沱中，他看着熟稔的街道，听着温暖的母语，踩着那熟悉的雨中马路，他的泪水和着大雨一道流下……

稍事安顿，刘半农就投入到工作中去，他多么希望快点把学到的方法应用到实际工作中去，把研究的成果公布出来，把自己的研究项目继续深入下去。

他受上海亚东图书馆之邀，为花也怜依《海上花列传》校阅清样，称此书“是吴语文学中第一部好书。”这时，思乡心切的朱惠，已经带着孩子们回江阴老家去了，校完书稿，半农则急不可耐地匆忙北上进京。

离开上海时，他给已在北京大学附设的音乐传习所执教的天华发去电报，告诉了他具体的行程。当半农从检票处出来，就听见弟弟天华的江阴口音：“阿哥！阿哥！你总算家来咧！”兄弟久别相见，那感觉别提多复杂了，激动、温暖、怜惜，哎，天华看看哥哥斑白的双鬓，微驼的脊背，心里一股酸酸的味道。还是半农拍拍天华的肩膀说：“走吧，人都走了，就剩咱俩啦。”

兄弟俩来到天华的住处银闸胡同，这里是天华的音乐天地，到处挂满了乐谱、乐器。还有一张“抱朴含真，陶然自乐”的座右铭。刘半农从身边拿出一只精美的盒子，天华迟疑地打开盒子，一把炫目的小提琴赫然出现在眼前。天华一阵激动，轻轻拨动琴弦，一缕水一样清澈的声音，在幽暗的室内悠悠荡漾开去。“好琴，好琴啊！”天华说，“哥，你这么艰苦，哪来钱买这个啊？”刘半农笑着说：“不是《汉语字声实验录》一书，有一笔奖金吗？”天华的眼里，一下子涨满了春水。出国这五年，刘半农有多累有多苦经济有多紧张，天华心知肚明，这样辛苦的日子里哥哥依然想着念着天华的音乐，这种情感用什么话来表达都是多余的，天华只有深情地喊一声：“哥……”

第二天，刘半农就去拜访了蔡元培。急切地催促着关于成立语音实验室的事宜。蔡元培哈哈笑着“批评”他：“你真是个性子，我向来重视科学，岂能让你学非所用呢？你好好干吧，创出一个新天地来！”

10月18日，他在北京大学举行的第三次恳亲会上，发表了《我的求学经过及将来工作》的演说。在演说中，他谈了今后的具体设想：第一、继续深入研究四声问题。第二、调查各地的方言，著成《方音字典》第三、用录音机，将各种方言逐渐收录下来，做研究的素材。同时将社会流传的俗曲和将要失传的旧乐竭尽全力进行收集。第四、期望借助语音研究设备研究乐律，做一些系统的实验工作。他的这些设想，得到与会者的一致好评。

9月16日，赵元任做东，在家中宴请刘半农、钱玄同、黎锦熙、汪怡等人。席间谈论国外学术界现状，探讨国内研究领域情况。对音韵界没有一个像样的研究组织深感遗憾。此时，刘半农举杯提议：在座的音韵学家应该自行组织成一个研究团体。在座的专家们一致赞成。并决定命名为“数人会”。

“数人会”的意思，是采用了隋朝语言学家陆法言的《切韵·序》之

“我辈数人，定则定矣”的涵义。反映了成立之初这些专家们的雄心和抱负。然而，这一想法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认为他们过于狂妄了。为此，钱玄同撰文《关于数人会》对“数人”和“定则定矣”进行解释。说明只是取了“数人”之意，对“定”，一定会十分审慎，即使“定”了，发现错误，还是应该立即纠正的。“学术专制，乃是咱们中国两千年来一件最混蛋的事，魏渊是六世纪的人，说了那句话，我们还很讨厌他；我们是二十世纪的人，虽无似，然固极端反对学术专制，若也与魏渊取同一态度，那真的叫做‘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了。”这样，一场风波才渐次平息。

此后，数人会在一年多时间中开了 22 次会议，轮流做东，刘半农任主席。1926 年 9 月 14 日，“数人会”成员经过数次讨论研究，一致拟定并通过“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后上报北洋政府教育部，直到 11 月 9 日，才用教育部国语统一会筹备会的名义正式公布这一成果。

“数人会”虽然时间不长，但影响却非常深远。“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一直沿用至今。

二、坎坷“词典”路

刘半农后半生以极大的精力倾注在语言学上，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能亲手编纂一部汉语言词典。

早在 1919 年 4 月 21 日，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成立之时，刘半农就在大会上提出，由他亲手拟定，并由胡适、周作人、马裕藻、钱玄同、朱希祖等六人联名的《国语统一进行方法》案。通过此案时，他就提出了要编纂词典的建议。这算是民国以来国家文化机构建议修订辞书的先声。1920 年 1 月，国语词典委员会成立，刘半农成为委员会委员。之后，刘半农赴欧洲留学，但是，他身在海外，却时时牵挂着此事，却终因鞭长莫及，力不从心。而此时的国内，关于辞书一事屡屡提出却又不得实施，工作毫无进展。

1925 年，刘半农学成归来，归国第二天，他就拜访上海群益书社主人陈芝寿，商讨编辑词典之事，反复磋商，总算达成口头协议：刘半农组编，出版社垫款。刘半农在 9 月回北京之后立即就投入积极的准备工作中。谁知，一头在辛辛苦苦准备着，而另一头的出版社，却言而无信，

把那笔专用款，挪去开矿了。词典又成了纸上谈兵的事。

1927年，刘半农又向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提出了一个相当精细周到的《中国大字典》编纂计划概要。《概要》共分十个部分，从编写体裁、编制、取舍、形体、声音、意义、形音意合参、文法、词名等方面进行详细论述。但是，一谈到钱的事，又是碰壁，一个国立学校，哪里担当得起，一腔热情又是付诸东流。然而，《概要》对后世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后，1979年4月，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辞书研究》丛刊，在创刊号上，全文发表了这一《概要》，编者按认为：文中论点，可资借鉴。

1928年，刘半农再次向南京中华民国大学院（教育部）提出编纂大字典的计划，并提出60万的预算。这个数字，让许多政府大员大惊失色。有人甚至说：“60万啊，拿去给商务印书馆，一万就可以了。”碰到这样不学无术的当权者，刘半农只能是哭笑不得啊。

与此同时，黎锦熙等人也在作着种种努力，但结果都是相同，一提到资金，免谈。四面碰壁的刘半农对黎锦熙说：算了吧，有款当然好，没钱也要干啊，看来只好依靠咱们自己了。于是他们一面再去筹款，一面开始动手把中国大辞典编纂处成立起来。

他们化整为零，准备每年筹集3万元，然后花20年时间完成编纂任务，这样其实还是60万，但不至于压力太重。但是，实际操作下来，筹款还不到一半。看着不能落实的钱款，刘半农只有苦笑。他对黎锦熙说：“筹款不及一半，看来20年要变成40年了，这怎么等得及呢？我们能活到八十九十吗？”黎锦熙也只有苦笑，自嘲说：“《牛津大学字典》编了72年，换了四代总编纂，40年就不算什么了。”

1931年春，一天，刘半农举着信封，异常兴奋地找到黎锦熙等人，说：“成了，成了，这回成了，上海大东书局来信，对大辞典很感兴趣。可以先垫资5万。只是辞典规模上比预先的小一点，赶紧修改《中国辞典编写办法二十七条》。”谁知，等到黎锦熙他们将“二十七条”修改完毕，该书局的董事会，竟将辞典的项目又给否决掉了。什么原因？还是那个字：“钱”，书局董事会不看好这样的劳民伤财工程啊。

刘半农面对一连串的打击，没有灰心丧气。长期以来，中国社会这样对待文化和文化人，已经让文化和文化人都习以为常了。不过，只有文化人知道他手中的事情对于民族，对于后代子孙有多么的重要。刘半

农埋头苦干起来，不停地搜索和编写大辞典所需的稿本，也有零星发表在《世界日报·副刊》等刊物。同时，他还编写了一部《标准国音中小字典》。可惜他自己都没能看到它的出版，等到成书面世，他已经谢世一年多了。

为了一部词典，在那样的生存环境和文化生态环境下，刘半农百折不回、呕心沥血、竭尽全力去拼搏去奋斗，真正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铮铮骨气，值得我们永世铭记。

三、实验语音学的奠基人

在国外，刘半农进行实验语音学研究时，虽然自制了一些工具，但大多还是借助了人家的设备和仪器。回国再看看，自己国家的研究设备，那是根本无法和他人相比。多少年来，国内在一般语音学的研究上，都习惯于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实验语音学根本无人涉足，就是一片空白的处女地。

1921年，他曾写《创设中国语音学实验室计划书》，从巴黎寄给蔡元培。后又请胡适敦促蔡元培尽快建立语音学实验室。所以，回国时刘半农把大量实验语音学所需仪器带回来。回到北京，他立即着手筹建北大语音乐律实验室。1925年9月，经沈兼士介绍，魏建功成为他的助手。之后又将白涤洲、敖士英等人调进实验室工作。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终于在1929年，北京大学筹建了我国第一个语音乐律实验室。刘半农任实验室主任。

在实验室里，刘半农记录了全国七十多方言。

1927年发表了《“图式音标”草创》。

1930年发表《标音符号表》。

1932年编制《北平方音析数表》，《黟县方言同音字读音记录》。

刘半农一面在努力研究，一面还在培养年轻人。他通过让学生参观实验室、大会演讲、专门讲座等方式，让年轻人接触、了解、热爱这门冷僻的学科。同时，他还翻译介绍国外的语音学专著。在他逝世前还规划、领导了《十韵汇编》的汇著工作。后经魏建功、罗常培等的努力于1935年成书。这部对现存切韵系统韵书的总集，对研究隋唐时代的音韵系统和汉语音韵学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研究实验语音学的同时，他还借助研究语音的仪器测试古代乐律。

1930年，他在盛夏对北京故宫皇家历代珍藏的几百件古老乐器的乐律进行测试。

1933年他带领郑颖荪等人去河南上海等地考察，重点测试乐律。

1933年6月10日出发，去郑州、开封、巩县、洛阳、南京、上海，历时一个多月测试古代乐器乐律。对古老艺术造像进行登记、照相、度量。

1933年7月抵达南京，后转上海、北京，进行乐律测试。

在一路大量采集测试之后，他连续大量撰写论文：《琵琶及他种乐器之“等律”定品法》、《音律尺算法》、《从五音六律说道三百六十律》、《天坛所藏编钟编磬音律之鉴定》、《吕氏春秋·古乐篇·昔黄节解》、《十二等律的发明者朱载堉》等，都是这个时期的重要作品。

《十二等律的发明者朱载堉》，是应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之约，为纪念蔡元培先生65岁寿辰而作。分上中下三篇。

朱载堉（1536~1611），字伯勤，号句曲山人，青年时自号“狂生”、“山阳酒狂仙客”。朱载堉祖籍安徽省凤阳县，系明太祖朱元璋八世孙，郑藩王族嫡世。明代著名的律学家（有“律圣”之称）、历学家、数学家、艺术家、科学家。其父郑恭王朱厚烷能书善文，精通音律乐谱，载堉自幼深受影响，喜欢音乐、数学，聪明过人。

朱载堉虽然贵为郑藩王子，但他的生活道路并不平坦，这与他父亲朱厚烷的经历有关。朱厚烷是明仁宗朱高炽的第五世孙，袭父封爵，为郑恭王。他生活朴素，为人刚直，朱厚烷被囚禁时，朱载堉刚十五岁，他痛父非罪见系，筑土室宫门外，席藁独处者十九年，厚烷还邸，始入宫。在这期间，朱载堉布衣蔬食，发奋攻读，致力于乐律、历算之学的研究，撰写了大量学术著作。隆庆元年，朱厚烷冤案平反，次年，朱载堉结束了“席藁独处”的生活，重回宫中。万历十九年（1591），朱厚烷病逝，载堉为世子，本可承继王位，但他上书皇帝，甘愿放弃。有司认为，“载堉虽深执让节，然嗣郑王已三世，无中更理，宜以载堉子翊锡嗣。”《明史·诸王列传》即使如此，载堉也不答应，他“累疏恳辞”，执意让爵，从他父亲卒年起，直到万历三十四年（1606），经十五年七疏之后，神宗皇帝才予以允准，“以祐樞之孙载玺嗣，而令载堉及翊锡以世子世孙禄终其身，子孙仍封东垣王。”让爵之后，他自称道人，迁居怀庆

府，潜心著书，过着纯粹学者生活。

他著有《瑟谱》、《律历融通》、《律学新说》、《圣寿万年历》二卷、《万年历备考》三卷、《音义》一卷、《律吕精义》、《算学新书》、《操缦古乐谱》等著作。此外，尚有不明确撰述年月的《乐学新说》、《灵星小舞谱》、《旋宫合乐谱》、《六代小舞谱》、《小舞乡乐谱》、《二佾缀兆图》、《嘉量算经》、《圆方句股图解》、《律吕质疑辨惑》等。上述著作，大部分都收入他的《乐律全书》中。

朱载堉对古代文化的最大贡献是他创建了十二平均律。此理论被广泛应用在世界各国的键盘乐器上，包括钢琴，故朱载堉被誉为“钢琴理论的鼻祖”。

朱载堉用横跨 81 档的特大算盘，进行开平方、开立方的计算，提出了“异径管说”，并以此为据，设计并制造出弦准和律管。朱载堉的“十二平均律”使这十二个键的每相邻两键音律的增幅或减幅相等。对这个音乐领域遗留了一千多年的学术难题，朱载堉经过几十年的潜心研究，终于以他的十二平均律之说解决了。十二平均律一经出现，世界上有十分之八九的乐器发音和理论标准都是参照十二平均律的。我国著名的律学专家黄翔鹏先生说：“十二平均律不是一个单项的科研成果，而是涉及古代计量科学、数学、物理学中的音乐声学，纵贯中国乐律学史，旁及天文历算并密切相关于音乐艺术实践的、博大精深的成果。”十二平均律是音乐学和音乐物理学的一大革命，也是世界科学史上的一大发明。在中国古代音律学发展过程中，如何能够实现乐曲演奏中的旋宫转调，历代都有学者孜孜不倦进行探索，但是到朱载堉时无人登上成功的峰顶，只有朱载堉彻底解决了这一问题。为创建十二平均律，需要解决围绕这一难题的一系列学术课题，首先要找到计算十二平均律的数学方法。朱载堉应用自制的八十一档双排大算盘，开平方、开立方求出十二平均律的参数，详尽程度超过我国古代的数学专著，计算结果精确程度达二十五位有效数字。台湾学者陈万鼎先生说：“开方的方法既非朱载堉所发明，精于打算盘也无所谓学术价值，但他开方开到有效数字达二十五位数，恐怕自古以来的数学家，也只有他是唯一最精确而有耐心的人。”

刘半农在朱载堉诞辰 396 年之际撰写这篇论文，还朱载堉一个巨星的本来面目，这在国内外还是第一次。刘半农通过对朱载堉登峰造极的发明创造的记述、评价，激励自己和后辈的崇尚科学，严谨治学的信心，

其苦心明月可鉴。

实验语音学，是一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结合的产物。刘半农在留学欧洲的时候就已经创造了“声调推断尺”等仪器，回国后，他继续不断对已有的仪器进行改革。之后又推出“最简音高推断尺”、“乙二声调推断尺”、“刘氏音鼓甲种”、“刘氏音鼓乙种”“轻便浪纹计”、“四声模拟器”等等。刘半农在语音和乐律方面的研究和成果，无愧为我国实验语音奠基人的称号。

四、博学多才的智者

前不久听有人说起，刘半农的书法也可了得。这是我第一次听说，立马让人找出他的书法影印件。哟呵，那字写得正楷、行书、隶书各见风采。据说，1931年后，刘半农常常练习书法，与钱玄同同好敦煌写经。不同的是，钱玄同写经上追汉简，劲利爽健。刘半农则参以清代金农行楷笔意，含蓄凝重。人们评价刘半农的手札：丰肉微骨，他的写经体，像他读书做学问一样，深知出入法。其始也当求所以入，其终也当通所以出。见得亲切，此是入书法。用得透脱，此是出书法。盖不通临古人墨迹，则不能领会书中妙趣。不知古人用心处，不能从书中出来，则会死在古人笔下，成为书奴。惟知入知出，方得书学之法也。

刘半农不是书法家，他的书法人人称颂，他不是摄影家，拿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喜欢随便玩玩，但是他的摄影理论和实践，却为我国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摄影艺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甚至影响到当今。



刘半农的摄影作品

他学习摄影始于常州府中学堂，十七八岁的他，当时确实只是凭着爱好随便玩玩。1923年到法国留学时，才开始业余把摄影作为一门艺术进行研究。巴黎有什么摄影展览他都看，有什么摄影书报刊物他也看。1925年学成回国在北京大学执教以后，对摄影的兴趣更浓了。当时文艺界不少人贬

低摄影艺术，但刘半农不以为然，并于第二年加入热心倡导和推广摄影艺术的“北京光社”。他和光社同人经常在一起切磋影艺、先后展出和发表了《舞》、《夕照》、《垂条》、《泪珠中的光明》、《在野》、《人与天》、《着墨无多》、《静》、《莫干山之云》、《齐向光明去》、《客去之后》、《山雨欲来风满楼》等题材不同风格新颖的摄影作品。由于他做事认真且艺术修养极高，不久，他就成为颇负盛名的北京摄影界的活跃分子、光社的代言人和摄影艺术理论家。刘半农加入光社后做了两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一件是他担任编辑刊印了两本《光社年鉴》，这是我国最早发行的摄影年鉴，主要刊印光社同人的代表作，同时也记载了光社的活动情况。1929年编印的年鉴第2集比1928年的第1集在内容上又有所改进，除刊登社员的摄影作品外还刊登社员的论文、译文等，图文并茂。为研究中国摄影发展史留下珍贵的资料。第二件是他在从事摄影创作的同时还研究摄影理论。1927年写成《半农谈影》一书，同年10月交北京摄影出版社。翌年上海开明书店再版发行，影响很大。当时的摄影书刊大都是介绍摄影技术的，而像刘半农这本比较系统全面，同时非常通俗地阐述摄影艺术创作理论，这样的理论书籍在当时还是第一次出现。所以，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摄影美学专著。书中刘半农以他特有的诙谐的笔调，以他的生花妙笔对轻视摄影的偏见，进行了辛辣的嘲讽和鞭挞。



半农谈影

刘半农实在太聪明，太智慧了，不说他中小学时代如何出类拔萃，就说他出道之后，便是做一行出色一行：初到上海，他是个诗人、小说家；五四时期，他是个教育家、社会活动家、诗人、小说家、杂文家；赴欧洲留学期间，他是个严谨的学者；回国之后他又在实验语音学、语法研究、汉语工具书编纂、敦煌研究、太平天国史研究、考古等许多方面非常有建树。另外，在汉字改革、民俗研究、书法、摄影等领域也有突出的造诣。一个常州府中学堂肄业的学历，破格担任北京大学教授，受人排挤、鄙夷，那我就花点功夫拿个法国国家级博士头衔给你们看看。

这就是刘半农，刘半农的博学多才，在当时甚至以后，几乎无人能够与之匹敌。

蔡元培在《哀刘半农先生》一文中如此惋惜地说：

自从科学家习惯于机械的实验，数字的统计，虽有时亦为大胆的假设，而精神终是收敛。文学家习惯于高尚的理想，揶揄的寓言，虽有时亦为严格写实，而精神终是放任的。两种长技不能并存。培根以科学者，而能为莎士比亚编剧本；歌德以文学者，而于植物学有所发现；张弛自由，至为难得。我们的刘半农先生就是这一类的典型人物……先生在《新青年》上提倡白话诗文，叙述地摊上所搜集的唱本，我们完全认为是文学家。后来……专做语音学工作，完全是科学家了。

蔡元培的话真的说到点子上，刘半农不仅通晓中西文化，而且兼容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用现在的话来说，刘半农是个不可多得的复合型人才啊。

他曾为西北科学考察团整理、考证了两万多个木简文字；根据所得到的汉日晷仪形制拓片，制造新的日晷仪，并撰写论文《西汉时代的日晷》加以说明；他致力于中国民间文艺的研究工作，他与李家瑞合作的《宋元以来俗字谱》，为民俗研究提供了丰富翔实的第一手资料。对汉字演变提供重要的参考价值。1932年，他与李家瑞合作的《中国俗曲总目稿》两册共1276页，搜集了北京孔德学校收藏的大批曲本、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北京图书馆、故宫博物院以及个人藏书共六千多种汇编而成。这样浩大的工程，恐怕是空前绝后的；他在古籍整理、校勘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校点重印《何典》、题记《浑如篇》、校点《香奁集》、题跋《糸番清说》等。

刘半农在学术和艺术两方面的成就都是卓越的。但是，不幸的是他生活在当时如此糟糕的年代，那样腐败昏庸的政治背景，严重制约了这位天才的能量发挥。往往，坐下来投入工作了，城外又是炮声隆隆，城内百姓人心惶惶，他在《欧洲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听吧！城外的炮声，又轰轰的响个不止。昨天已经响了一夜，今天已经响了一朝，现在太阳落山了，又动手了。甲说：“王师”快要打灭“贼兵”了；乙说：看罢，“不上几天就见分晓了。”管它羊咬杀狗也罢，

狗咬杀羊也罢，我们在“这个年头”，正好比是一条癞皮饿狗，被人一脚踢到了泥潭里，要爬是爬不起，甚至于，要叫一两声也被淤泥塞住了嘴，这总是事实罢，这总是事实罢！

.....

我在上船之前，自己曾定了一个计划，某年作什么，某年作什么，以为这样办去，亦许十年八年之后，能有得一些成就。初不料，我竟打错“如意算盘”，竟健忘得连中国是什么一个国家都忘去了，竟没想到在我们中国国境之内是什么希望什么计划都是无从说起的。他们自有他们的“精神文明”，他们用不着你这些劳什子。别说你在这种事上做不好，即使做好了，大人先生也要把你一脚踢开，小人先生也要同你尖头把戏，对你扮鬼脸。你说你要关上门读书吗？你该有的面包份儿早已挪去喂了野兽，结果你只能“不务正业”，做你的流氓。你说要定一定心思索一下么？炮声早已变成家常便饭，有时还要来几声炸弹点缀点缀，有时还要青天白日摆出大圣大贤的脸孔来杀死三五十人，把热血溅到你身上……

然而在那样的生存环境中，刘半农还能有这样的成就，除了他过人的智慧之外，就是他过人的勤奋。语音学是枯燥的，但是刘半农自从踏进它的门槛，就用全部的生命能量点燃这座宫殿，他用“扎硬寨、打死仗”的办法去研究，去计算。工作数年之后，连他自己也知道，“虽然没有闹成病，但弯腰曲背，已彰彰在人耳目！”但是，即使如此，刘半农工作起来依然忘我。他说：“我必须把学问看做是我的坟墓，那么，即使不成功，也就是最大的成功了。”这就是刘半农之所以会成为一代巨擘的奥秘。他用常人达不到的毅力，常人舍不得的血汗，甚至是常人不肯放弃的生命，为自己筑起了一座巍然屹立的丰碑！

第九章 在教育的田野上

一、逆境办学

刘半农回到北京大学后，一面在文学系上课，一面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研究实验语音学。这几年间，他还先后担任过北京大学聘任委员会委员、仪器委员会委员、财务委员会委员、图书委员会委员长、出版委员会委员长、北大评议会书记、校务会议主席、语音乐律实验室主任、女子文理学院院长、研究文史部主任、《国学季刊》编委会委员、《国立北京大学志》主编、北大雄辩会导师、国语演说会导师、摄影研究会导师等职务。



国学季刊

对北大的深厚感情，这是众所周知的。北大是他生命的转折，是他命运的转折，是他成为一颗大树的深深根基。

正是因为对北大感情太深，所以 1927 年 8 月，奉系军阀政府将北京九所高校合二为一，成为国立京师大学校，并由教育部长刘哲兼任校长时，刘半农拍案而起，愤然辞去所有国立学校的教席。直到奉系退出北京，刘哲不再兼任校长，在反反复复的学潮风潮之后，恢复蔡元培校长名义，刘半农才回到北大。1930 年，蔡元培辞去校长名义，刘半农以北

京大学教授会的身份，赴宁挽留蔡元培，但终因蔡元培去意已决而未果。

由于国内政治形势的瞬息万变，致使经济形势也十分吃紧。在这样的情况下，教育的日子就必须勒紧裤腰带。北大的日子自然好不到哪里去。教育部拖欠经费成了常事。那么教职工工等米下锅也就成了家常便饭。这样北京各个高校屡屡出现风潮也不是什么稀奇事了，这里摁下去，那里又冒出来。这时，担任北京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院长的刘半农，正好轮任北京大学校务会议主席。这个主席当得，简直一头雾水，经费就成了最头疼的事。他多次主持校务会议商讨向教育部追索积欠经费。同时，也自行想办法解决必要的教学费用。

在这种困难的境遇中，他还曾于1933年11月，与李四光等23人联名发起北大教授为学生建筑新宿舍的捐款活动，自己捐了一个月的薪水。刘半农说：“严重的国难依然严重，国内分裂的现象又已重演于目前……我们处于这样的局面之中，只须稍稍一想，马上就可以收回了兴高采烈，立刻变做愁眉苦脸。”但是，这样的困难并没有销蚀他的意志，他继续说，“我们唯有在愁眉苦脸中生活着，唯有在愁眉苦脸中咬紧了牙苦干着，在愁眉苦脸中用沉着坚毅的精神挣扎着，然后才可以找到一条光明的出路……”自然，在那样的社会，靠一己之力要找到光明的出路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不能否认，正是刘半农这样的知识分子们的苦苦挣扎、苦干，才让我们民族的文明不至于在炮火中灰飞烟灭，不至于在血肉与屠刀下变成烂泥。

正是在这样的愁眉苦脸中，1926年，他兼任了北京师范大学本科教席。第二年，又兼任北京中法大学服尔德学院中文系主任，受聘为中法大学图书馆顾问、中法大学丛书委员会常务委员等。老革命家陈毅，著名明清史学专家商鸿逵，著名语言学家陈定民，法国文学专家、巴黎大学名誉教授罗大冈等都是他的学生。1929年，他应邀担任北京辅仁大学教务长。两年时间，给辅大师生留下极好的印象。在时局动荡的岁月，辅大失去了“大学”的名分。刘半农担任教务长后，根据相关规定，该补的补，该增的增，然后奔波在北京与南京之间，以最快的速度，迅速恢复了辅仁大学大学的名分；同时，因为刘半农为人敦厚，心胸豁达。用现代话说，他具有较强的人格魅力，他延请的教授无党同伐异之嫌，而著名的教授们也乐意与之打交道，一时间，刘半农为辅大罗致了许多优质师资力量。如：周作人教授近代小品文、马衡教授金石学、宋希祖

教授历史和文学史、刘钧教授教育学、白雄远担任军事训练教席等等。再则，是在校内提倡新文艺。亲自为学生修改文章，主持编辑了《辅仁学志》，创办《辅仁大学生》。对学生自办刊物，他也是悉心指教。而对毕业生，更是为他们热诚谋求出路。只要是学生的事，刘半农一定会放下手中的事情，全力以赴帮助解决。所以后来当刘半农逝世的消息传来，辅大学生是悲痛欲绝。

刘半农从事教育，在繁忙的课堂教学、千头万绪的行政事务之后，还进行深入的教育学术研究，他撰写的学术著作，对于教学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早年在《新青年》上发表的《应用文之教授》是一篇非常有分量的学术著作。之后的《应用文及其作法》，虽短，但是一篇短小精悍观点独到的好文章。他总结的，做应用文应注意的“明、达、切、当”四件事，就是对现代人仍有很好的指导意义。

明，是说条理要明白，不明白就彼此纠缠；是说层次要明白，不明白就前后上下混乱了；是说话句要明白，不明白就没人能懂……

达，就是传达，是要把自己要说的话，无论如何曲折隐微，都能一丝不苟的传达出来……

切，就是切合，就是所说的话，处处要紧切着所要说的东西，不要离开了它放野箭……

当，就是应当：应当说的话要尽量说，不应当说的话要尽量的删……

1931年，北京大学和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联合建立“研究教授”职称，并实行教授专任制度。对所治学术有所贡献，见于著述为标准的人选，设立名额15人，五年为一期。这样，刘半农、周作人、徐志摩、陈受颐、汤用彤等五人应聘，至此，刘半农辞去校外一切职务，专任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和研究文史部主任。

二、创办进步“副刊”

《世界日报》1925年2月于北京创刊，成舍我主编。1926年6月，成舍我找到刘半农请其出山主办《副刊》。刘半农没有马上答应。没有立刻答应的原因有几个。一是办报的条件。刘半农提出，《世界日报》对

《副刊》应不加任何干涉，不加任何条件。二是稿源问题。三是编辑方针问题。报纸不是教科书。报纸是提供给读者的一种随便浏览的平面媒体，只要在消磨中获得一点裨益就可以了。

在接受这项工作之前，他向一些朋友打过招呼，也探探他们的口气，看看能否源源供稿。然后，《世界日报》在22日那天登出广告说，《副刊》请北京大学教授刘半农主编，还说：“刘先生的许多朋友，老的



成舍我

如《新青年》的同人，新的如《语丝》同人，都答应源源寄稿。”这是报纸拿来吸引读者眼球的广告。却没想到，为此刘半农与老朋友钱玄同发生了矛盾。一天，刘半农突然收到钱玄同来信，信中抓住“都答应源源寄稿”一词兴师问罪。钱玄同说：我当然是你刘先生的朋友之一，但是我没有答应。即使叫我来做，我也不一定答应，不是没时间，也不是没材料，是我不愿意拿我的东西与“明珠”什么《春明外史》等等为伍。钱玄同接着阐述自己要小题大做的理由，还是一个对文化及文人的见解问题。“我有一个牢不可破的见解：我以为老顽固党要卫道，我们在主义上虽然认他们为敌人，但有时可与原谅他们……最可恶的，便是有一种二三十岁的少年，他们不向前跑，不去寻求光明：有的听人家说‘线装书该扔下马桶三十年’或‘中国的旧文化在今日全不适用’的话就要气炸了肺，对于捧坤角逛窑子这类混账事体认为大可做得，而对于青年男女极为正当的恋爱反要大肆讥讽；有的效法张丹斧做《太阳晒屁股赋》那种鸟勾当，专做不负责任的没有目的的恶趣味的文字。我对于这种少年，是无论何时无论何地绝对不愿与之合作的……”钱玄同还要求刘半农一定在《语丝》发表。

刘半农与钱玄同是朋友加战友，其感情之深厚是没法说说的。也正因为是特别好的朋友，所以观点有分歧，便是毫不客气，哇呀哇呀实话实说了。不过，此时刘半农正是忙着开张之时，给老朋友兜头一瓢冷水，也真的有点猝不及防。刘半农考虑一番之后，给钱玄同写了一封回信，并以通信的形式加以编辑，然后一起发表，题目为《疑古玄同与刘半农抬杠——“两个宝贝”》。刘半农在信中以表面绵软，骨子里硬气的口吻对

钱玄同的来信进行了有解释、有谅解、有道歉式的反驳。看了叫人忍俊不禁拍案叫绝，最后，这对老朋友的交情还是不能伤的。刘半农在结尾时用十分轻松幽默的笔触写了首打油诗：

我们两个宝贝是一见面就要抬杠，真是有生之年，即抬杠之日。如今从口上抬到了笔上，不得不有打油诗以做纪念：

闻说抬甚杠，无人不抬杠。

有杠必须抬，不抬何用杠。

抬自犹他抬，杠还是我杠。

请看抬杠人，人亦抬我杠。

新文学运动中的两位热闹的名将就在这样的嬉闹中为《副刊》开张了。

1926年7月1日《世界日报·副刊》出刊第一卷第一号。刘半农撰文《也算发刊词》。他先谈创办缘起，再谈自己的爱好：

我知道我自己是个读书人，然而读的书是不多的，而且很杂乱的。我虽然偏向着要研究些较为实在一点的学问，如语言学，语音学，乐律学之类，但对于一般的文艺，如诗歌，小说，民谣，杂记之类，也非常喜欢。至于纯粹的科学，只是算学物理两项，有时还要乱翻一下，其余的都觉脾胃不对，或者是从前没有下过预备功夫，现在也就没有勇气去学习。而平生之所绝对不能者，却有三事：即是担粪着围棋之外，再加上一个谈政。因其不能担粪，所以至今没有能到民间去；因其连着棋也不会，所以非但不能当兵打仗，甚而至于不能和人打架；因其不能谈政，所以至今是看见了有关于政治的书报就头痛……

接着他说：因此，我们在这副刊里不妨意到笔随的乱谈天……我与几位同事教书育人当然是正事，而没事时也常在一起乱谈天。有时谈得不投机，就抬杠，闹起来煞有介事的样子。其实也只不过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一类的问题。因此有人称我们那休息室是“群言堂”。这大概还是不错的，但我感觉到即使这样，也比“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来得好一些。现在有了这《副刊》，也许这“群言”要播流一些过来了……在结束语里他申明：这《副刊》办得下办，办不下就滚蛋！在一阵热闹中《副刊》开张了。

《副刊》虽然在鲁迅、周作人等新老朋友的支持下开始出刊，但是因为《副刊》还基本上是纯文学性质，加上政治气氛紧张，致使《副刊》闹稿荒。其中再插进因发表抄袭家逍遥生的文章而造成的种种麻烦更使刘半农疲于处理事端。然而就在这时，《世界日报》主编成舍我被军阀政府逮捕了。一时间进步刊物，进步文人人人自危。刘半农也不得到外头躲避风头。

刘半农以《副刊》为阵地，向封建军阀倒行逆施的残暴统治宣战。11月28日他发表杂文《与张耀翔先生小开顽笑》，用辛辣、幽默、外柔内刚的笔触，对张耀翔《中国人才产生地》一文中“大捧浙江人”进行讽刺鞭挞，其矛头直指徐树铮、曹汝霖、章宗祥之流。

12月7日，他在《副刊》发表杂文《论胡适之的“好好先生”》。当年年初，北洋军阀政府教育总长章士钊因镇压女师大风潮而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去职。之后易培基接任，不久让位给任可澄。任可澄何等人也，好多人不知底细。一次刘半农问胡适之。

“你看这人怎样？不会上台也来胡闹吧？”

胡适之说：“不会不会，他是个好好先生。”

谁知没多久，任可澄的面目清晰了，这个“好好先生”不仅是个饭桶，却不比老虎总长章士钊仁慈。“第一个下马威，便是用武力接受女师大。第二件事，便是他上台后没有筹到一个铜子，却要分润别人筹到的钱。再次一件大事，便是活活地烧死了两个女生。再一件事便是不能为中小学筹钱，反从中捣乱，闹出京、保两派的大风潮……”作者一箭双雕，给了胡适与任可澄各一记闷棍。

由于政治形势越发严峻，刘半农的《副刊》不能再办



《语丝》

下去了，他以失眠为理由，辞去了副刊的职务。前后总共兼职七个月。

1927年4月12日血雨腥风笼罩全国，蒋介石在上海、广州、南京等地发动反革命政变，全国各地反动势力迫害、暗杀、逮捕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气焰尘嚣甚上。4月2日李大钊被捕，29日即被杀害；10月22日，《语丝》周刊被查封；北新书局被封闭，逮捕了相关人员。这样作为《语丝》主要撰稿人之一，同时又是《世界日报·副刊》主编的刘半农再留在家中，便是坐以待毙了。他与周作人商量，去了周作人的日本朋友家暂避风头。

在日本友人家里，活动很受限制，一则，外头风声鹤唳，再则，友人希望不要常有客人前来打扰，这样，两人除了吃饭睡觉，还能干什么？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两人郁闷得常常相对无言，唯有磨墨作文。

一天，天阴沉沉的，仿佛要下雨。周作人垂着头，阴着脸，干坐在榻榻米上，刘半农瞥一眼，叹口气，他的心中何尝不也是心事重重呢？但是，生性幽默的刘半农，却不忍这样的苦寂和郁闷，他磨着墨，突然对周作人喊道，“砚兄！”周作人一听，以为哪位客人来了。一抬头，扶正眼镜，说：“谁？谁来了？”刘半农吃吃傻笑，周作人一看半农手下一方砚台，这才对刘半农的苦中作乐恍然大悟，也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三、严格治校



《老实说了》封面

学术上刘半农严谨治学，对学生的管理上，他是严格要求、热心关怀。他在各个大学兼职期间，总是嘱咐学生要勤奋读书，成为国家民族的有用之材。在担任《世界日报·副刊》时期，总是提携无名晚辈和青年作者。刘半农性子耿直，心胸坦荡，眼睛里揉不得沙子。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上一些人的所作所为看不入眼，批判起来淋漓尽致，毫不手软，但是，也面对现实，认为只要他们不加害于别人，就让他们自生自灭去。

但是，如果有些青年也混入其中，特别是一些跻身文坛的无聊青年与之沆瀣一气，刘半农就忍不住。出于对青年的期望、惋惜、出于一种沉重的社会责任感，他在1927年底，在《世界日报·副刊》连续发表文章：《老实说了吧》、《为免除误会起见》、《“老实说了”的结束》等文章，严肃地指出问题青年和青年问题。

老实说了吧，我回国一年半以来，看来看去，真有许多事看不入眼。当然，有许多事是我在外国时早就料到的，例如康有为要复辟，他当然一辈子还在闹复辟；隔壁王老五要随地吐痰，他当然一辈子还在哈而嗽；对门李大嫂爱包小脚，当然她令爱小姐的鸭子（脚丫）日见其金莲化。但如此等辈早已不打在我们的账里算，所以不妨说句干脆话，听他们去自生自灭，用不着我们理会。若然他们要加害到我们——譬如康有为的复辟成功了，要叫我们留辫子，“食毛践土”——那自然是老实不客气，对不起！如此等辈既可以一笔勾销，余下的自然是一般与我们年纪相若的，或比我们年纪更轻的青年了。我不敢冤枉一般的青年，我的确知道有许多青年是可敬，可爱，而且可以说，他们的前途是异常光明的，他们将来对于社会所建立的功绩，一定是值得记录的。但我并不敢说凡是中国的青年都是如此，至少至少，也总可以找出一两个例子来。我所以说看不入眼的，就是这种的例外货。瞧，这就是他们的事业：功是不肯用的，换句话说，无论何种严重的工作，都是做不来的。旧一些的学问么，那是国渣，应当扔进毛厕；那么新一些的吧，先说外国文，德法文当然没学过，英文呢，似乎识得几句，但要整本的书看下去，可就要他的小命。至于专门的学问，那就不用提，连做敲门砖的外国文都弄不来，还要说到学问的本身么？事实是如此，而“事业”却不可以不做，于是乎轰轰烈烈的事业，就做了出来了。文句不妨不通，别字不妨连篇，而发表则不可须臾缓。有什么了不得的东西可以发表呢？有！——悲哀，苦闷，无聊，沉寂，心弦，密吻，A姊，B妹，我的爱，死般的，火热地，热烈地，温温地，……颠而倒之，倒而颠之，写了一篇又一篇，写了一本又一本。再写一些，好了，悲哀，苦闷，无聊……又是一大本。然而终于自己也觉得有些单调了，于是乎骂人。A是要不得的；B从前还好，现在堕落得不可救药了；再看C吧，我说到了他就讨厌，他是什么东西！……这样那样，一凑，一凑又是一大本。叫悲哀最可以博到人家的

怜悯，所以身上穿的是狐皮袍，口里咬的是最讲究的外国烟，而笔下悲鸣，却不妨说穷得三天三夜没吃着饭。……你们口口声声说努力于这样，努力于那样，实际你们所努力的只是个“无有”。你们真要做个有用的青年么？请听我说：第一，你们应当在诚实上努力，无论道德的观念如何变化，却从没有把说谎当作道德的信条的。请你们想想，你们文章中，自假哭以至瞎跳瞎骂，能有几句不是谎？第二，你们要做人，须得好好做工，懒惰是你们的致命伤。你要到民间去么，掙上你的锄头；你要革命么，掙上你的枪；你要学问么，关你的门，读你的书；你要做小说家做诗人么，仔细地到社会中去研究研究，用心看看这社会，是不是你们那一派百写不厌的悲哀，苦闷，无聊……等滥调所能描写得好，发挥得好的。再请你看一看各大小小说家大诗人的作品，是不是你们的那一路货……

后来，他又把这些内容归纳成五点：一要读书，读好书。二要整本整本地读书。东抓西摸没有好结果。三要做文艺创作家，就要下切实的功夫，绝不是堆砌辞藻就完事。四要记载或描写事物，态度要诚实。五，评论或骂人应当根据事实。他告诫年轻人要拥有一颗健康的心，应当认真读书好自为之。如果总认为“春天不是读书天，夏日炎炎正好眠，秋有蚊虫冬有雪，收拾书包好过年”，那你一辈子都不会成为有用之材。

刘半农的文章，一时讨论声四起。有人赞成，有人反对，有人讥讽他说：还说人家呢，看你回国后也没干啥大事，就翻译了那几首破民歌。甚是有人还进行人身攻击。面对这些人的做法，刘半农一面反击，一面也感到心寒。青年强则中国强，青年智则中国智啊，这个世道正在腐蚀着青少年啊。

为此1930年5月5日，他任国立北京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院长，当日上午就向全体学生发表讲话。他告诫学生要勤奋读书，保持学生本分。翌年，他针对女子学院学生经常出入公共舞厅等情况，亲自拟定《禁止女生入公共跳舞场布告》：

现在本市各饭店所设公共跳舞场，大都品流不齐，空气污浊，决非青年学子所应参加。兹特严重告诫：诸生务须自惜羽毛，绝不涉足；如有故违，一经查出，立即除名。此布。

布告一出，绝大部分学生拍手叫好，但也有一部分人表示不满。接着众多媒体关注此事。《世界日报》刊登消息，说刘半农禁止女学生跳舞，还禁止互称“密斯”，改称“姑娘”。就连西报也转载，上海等地的报纸也转载。一些人载文有意纠缠关于“密斯”与“姑娘”的称谓问题。抛开禁止入跳舞场的问题。为此，刘半农在《世界日报》上发表答记者问，并以《跳舞与密斯——刘复对其主张之解释》为题刊出，以正视听。

刘半农认为：“跳舞为娱乐消遣之一种，余虽不主张积极提倡，亦无一概禁止之意。唯近来本市各舞场，空气太坏，往往容易引诱青年入于浪费，虚荣，旷时，耽欲之迷途，或竟至造成悲惨之结果。此等舞场，欧美都会中亦有之，然自爱者决不涉足。余为爱护青年及徇各生家长之请求……禁止学生到舞场跳舞，盖雅不欲今日中国之大学生，仅成其为一对对跳舞之所谓摩登青年也。至于家庭集会，偶一跳舞，余固并不反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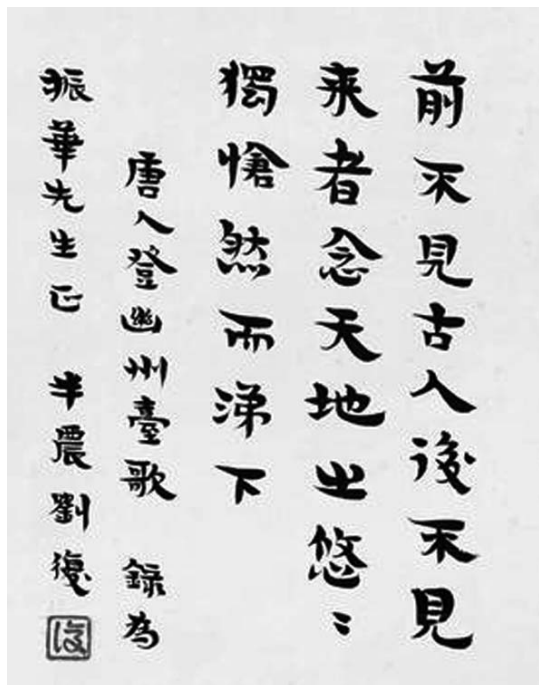
在对待称呼“密斯”的问题上，刘半农认为：“第一，女子称谓之名词，国语中并不缺乏，为保证中国语言之纯洁计，无须乎用此外来译音之称呼。第二，“密斯”在英语里并非有何可贵之处，英人对使女及饭店下女之类，亦称“密斯”，未必一受此称，便有何等光荣。第三，吾人口口声声呼打倒帝国主义之口号，而日常生活中尚将此不需要之帝国主义国家语言中译来之名词引用，诚不知是何种逻辑。”在如此阐述之后，刘半农再次表示要废除这个带有奴性的称呼，以“姑娘”、“小姐”、“女士”等国语称呼代之。

刘半农的解释未能平息风波，好事之徒们发出嘲笑，笑刘半农忒老土，忒不领行情，忒不懂时尚，并利用各个媒体的副刊发表所谓的“讨论”。甚至还组织什么“密斯和姑娘征文”、“密斯和姑娘总投票”、“密斯和姑娘大发奖”等等，用现在的话来说，完全是不负任何社会责任的恶搞。刘半农对莘莘学子的一片苦心，就这样被那些搅屎棍搅得臭气冲天，这仿佛是一个大学校长要求学生潜心读书是错的，而学生们成天出入舞场，交际、消费、不务正业才是正确。由此可见当时是个怎样混乱恶俗的社会。

尽管如此，刘半农在1931年12月25日《致北平市长周大文》一文中，仍然坚持自己严肃端正的治校态度，强调学生最好不要涉足营业舞场。他说：“青年正当力学救国之时，一旦堕入奢靡淫污之窟，不啻饮以

蜜鸪，而致其死命也。”

虽然，刘半农的声音，在那个病入膏肓的病态社会显得是那么的微弱，但是，他一身正气，关爱青年，严肃治学的态度，随着一次次革命对历史尘埃的荡涤，越来越清晰地凸显在我们眼前。当一切淫秽、污浊、功利的喧嚣渐次退去，唯剩一个教育家伟大的背影……



第十章 爱憎分明的斗士

一、亦“恨”亦爱徐志摩

刘半农在法国巴黎攻读博士的时候，虽然没有时间常给国内写稿，但，国内寄来的刊物，他是必定仔细阅读的。这次，他收到了周作人寄来的七期《语丝》周刊。鲁迅等《语丝》的许多“长期撰稿人”大都是刘半农的朋友和战友。再者，刘半农对《语丝》“简短感想和批评”式的文体，“发表自己所要说的话”的办刊风格，反抗一切专制和卑鄙，提倡思想自由，独立判断的个性非常欣赏。他一有空就往下看，一天，当他看到徐志摩发表在第三期上的《死尸》一文时，不禁高兴得拍案而起：“好！题目有了，就叫《徐志摩先生的耳朵》。”一惊一乍把个朱惠吓得一脸惶恐：“喔哟哟，吓煞人，你在发毛病啊？”原来，《语丝》周刊第三号上，徐志摩发表了译诗《死尸》，诗有12段，每段只有四句，但徐志摩却在诗前发表了一大段矫情的感想，其中说：“这首《死尸》是菩特莱尔（按：今通译波德莱尔）的《恶之花》诗集里最恶亦最奇艳的一朵不朽的花。翻译当然只是糟蹋……”在对波德莱尔的诗进行了一大通赞美之后，徐志摩说：



徐志摩

我自己更是一个乡下人！他的原诗我只能诵而不能懂；但真音乐原只要你听：水边的虫叫，梁间的燕语，山壑里的水响，松林里的涛——那只要你有耳朵听，你真能听时，这‘听’便是‘懂’。”“所以诗的真

妙处不在他的字义里，却在他的不可捉摸的音节里；”“我不仅会听有音的乐，我也会听无音的乐（其实也有音就是你听不见）。我直认我是一个干脆的 Mystu（拉丁语：神秘主义者）。为什么不？我深信宇宙的底质，人生的底质，一切有形的事物与无形的思想的底质——只是音乐，绝妙的音乐。天上的星，水里洵的乳白鸽，树林里冒的烟，朋友的信，战场上的炮。坟堆里的鬼磷，巷口那只石狮子，我昨夜梦……无一不是音乐做成的，无一不是音乐……你听不着就该怨你自己的耳轮太笨，或是皮粗，别怨我。

徐志摩的这些妙论，显然太装腔作势，太唯心，太神秘了。刘半农看着觉着浑身不舒服，以他诗人的敏感，实验语音学家的智慧，杂文家的犀利与凌厉，一下就抓住了徐志摩文章的逻辑矛盾和矫情的伪装。虽然好久不写文章，虽然实验语音学让他忙得头发丝开花，但是，看见徐文，他作文的冲动上来了，而且手痒无比。忍不住，拿住徐志摩开刀了，刘半农要解剖徐的耳朵。《徐志摩先生的耳朵》发表于同年3月2日《语丝》周刊第十六期。刘半农提笔先说：

先模仿徐先生的文笔说一句话：我虽不是音乐家，我可爱研究理论的音乐。

就我一知半解的程度去推测，或者是根据了我读过的三本半破书去推测，我总是模糊到一万〇一分。我的耳朵，当然只配听听救世军的大鼓……

但是，因为徐先生竟是那么说而且是很正式，很郑重的宣布了。所以，我就来考察考察，看看这现象是否真实。

接着刘半农挖苦说，看徐志摩的文章，令人想起乡下的看鬼婆婆：

“乡下”的看鬼婆婆（或称作看香头的），自说能看见鬼，而且说得有声有色：东是一个大的，西是一个小的，床顶上一个青面獠牙的，马桶角里落一个小白脸！但我若是个光学家，我就决不睬她，因为她只是看鬼婆婆罢了！

现在却不然。徐先生是哲学家，是诗人，他学问上与文艺创作上的威权，已可使我们相信到万分，而况他是很正式，很郑重的宣布的。

因此现象真实与否的一个问题，可以不成问题。若然有人对于徐先生的话，尤其是对于徐先生这样正式，这样郑重的话，还要怀疑，那么，此人真该“送进疯人院去”，此人一定不能“数一二三四”，因为他不知道徐先生与乡下看鬼婆婆之间，有多大的区别。

接着刘半农进一步揭露徐志摩一知半解的推测：

第一推测：徐先生所能听的音，或者是极微弱的音，是常人听不见的，这个假定如果对，徐先生耳朵上，一定有具自然的 microphone（传声筒）。

第二推测：亦许徐先生听到的是极远的音，是常人听不到的。那么，徐先生耳朵上一定有一具自然的无线电受音器。

第三推测：亦许徐先生能听一秒钟一颤动的低音，以至于一秒钟一百万颤动的高音。那么，徐先生的耳鼓膜，一定比常人特别 sensible（敏感）。我们可以说，这是双料道地的耳鼓膜。

第四推测：亦许徐先生的耳朵不但能听音而且能发音，发了之后还是自己听。这样，徐先生耳朵上，一定有一具——有一具什么呢？啊，惭愧，这个名词还没有发明呢！

这几个推测当然是不完备的。“天地大着”，幼禾犀的科学，何能仰测高深于万一呢？幸而我不久就回国。到北京后，我要用性命担保我的诚意，请徐先生给我试验试验。屈徐先生为 Sujet（受实验者）当然万分对他不起；但为探求真理起见，徐先生即不像上海新世界卖野人头的一样胡诌，我想他当然一定可以俯允我的要求。

徐先生！我们试验时，在未入本题之前，可先作两个附带试验（便这附带试验，也就重要得可以了）：

第一，我知道听音是耳鼓膜，而你却说是耳轮。

第二，你说皮厚皮粗不能听音，我就不知道那一部分的皮是有听觉的。还是人体皮肤的全部呢？这只是某一局部（例如脸皮）？

至于归到问题本身，那自然尤其重要了。惟其重要，所以更难。最难的是徐先生的耳朵，不能割下观察与试验。但我总想尽我能力，打破难关。

万一竟是无法，我要与徐先生协商，定一个极辽远的预约：

到徐先生同泰戈尔一样高名高寿之后，万万一一且不讳，而彼时我

刘复幸而尚在，我要请他预先在遗嘱上附添一笔，将两耳送给我解剖研究，至少也须是两个耳轮，能连同他的细皮，自然更好。

我研究完了，决不将他丢到荒野中去喂鸟（因为这不是一件鸟事），一定像德国人处置康德的头颅一样，将他金镶银嵌起来，供在博物院里。

若然不幸，我死在徐先生之前，我当然就没这样的好福分去研究。但我想“天地大着”，此间总有许多同我一样的好事者；我们总有一天能将这“甘脆的 mystic”研究出个究竟来，只拜望徐先生能多多赐助罢了。

（十四年一月二十三日，巴黎）

徐志摩是个非常有才能的诗人，也向来心高气傲，叫刘半农一顿“闷棍”之后，竟然哑口无言。刘半农办事，向来求真务实，最看不惯虚头滑险，就是再熟悉的人，出来弄虚作假，鬼婆婆似的妖言惑众他都不会买账。刘半农回国后，与徐志摩同被北大聘为教授，一起共事多年。1931年11月10日，因飞机失事而徐志摩不幸夭折的前一夜，他们还一起在郑颖荪家里共进晚餐，为徐饯行。

几天后，刘半农得知徐志摩的噩耗，悲痛欲绝，遂写挽联：“一夕清谈成永诀，万山云雾葬诗魂。”之后，又写《飞行诗》再次悼念这位才情横溢的年轻诗人。由此我们也再次看到了爱恨分明的刘半农。看到刘半农待人的坦诚，刘半农的朋友情谊的如此干净。

二、“欺侮”不可一世的陈西滢

刘半农从欧洲回来的这一年，正是国内政局动荡不安的年代。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的同时，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又发生了“女师大”事件。

1924年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即女高师）学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反对推行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奴化教育的杨荫榆任校长。杨荫榆倚仗北京段祺瑞政府的支持，无理迫令3名学生退学，激起了学生们的强烈愤慨。1925年1月，学生代表赴教育部要求撤换杨荫榆，并发表宣言，坚决反对杨荫榆任校长。同年4月，章士钊以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身分，声言“整顿学风”，为杨荫榆打气。5月7日，女师大学生会召开会议纪念国耻日，杨荫榆强行登台演讲，学生们大发嘘声，坚持要她退席。杨恼羞成怒，公然引军警入校进行干预。9日，她假借校评议会的

名义，将学生自治会干部许广平、刘和珍等6人开除。11日，女师大学生召开全校紧急大会，决定驱逐杨荫榆出校，并出版了《驱杨运动特刊》；同时请鲁迅、马裕藻等人出面伸张正义，维持校务。5月27日，鲁迅、马裕藻、沈尹默、钱玄同等7人联名在《京报》上发表宣言，坚决支持女师大学生。7月，杨荫榆在反动政府的支持下强行解散大学预科甲、乙两部4个班，学生奋起自卫。北京党组织发动各校学生声援女师大学生的斗争。8月10日，段祺瑞政府下令停办女师大，另成立国立女子大学。12日，教育总长章士钊亲自出面，下令免去鲁迅的教育部佥事的职务。在党的领导下学生们坚持斗争，加之社会进步舆论的广泛支持，斗争终于取得胜利。1925年冬，恢复女师大。1926年3月，北京临时执政府发布了“撤销对周树人免职处分”的训令。

在这场斗争中，“现代评论派”的陈西滢装出一副公允的姿态，在《现代评论》上连发名为“闲话”的文章，打着公正的幌子，给杨荫榆帮腔，污蔑学生把“教育界的面目”都给丢光。甚至还诬陷鲁迅等人是在暗中指使挑唆。为此，鲁迅等人著文予以坚决反驳。

一时间，口水满天飞，陈西滢明确站在杨荫榆以及她维护的北洋军阀政府的一边。刘半农在整个斗争中冷静观察审视之后，在1926年1月25日《语丝》第三十六期上突然发表杂文，题为《骂瞎了眼的文学家》，文后还附有“爱管闲事”者的《刘博士订正中国现代文学史冤案图表》和林语堂《写在刘博士文章及“爱管闲事”图表的后面》的文章三箭齐发，矛头直指“现代评论派”干将陈西滢。

陈西滢，原名陈源，字通伯，无锡人。陈与刘本是家乡人，并相识甚早。早在欧洲留学时就已认识。只是陈西滢一向自视高傲，并且在欧洲又是“先进了庙门”，对刘半农傅斯年等晚来一步者很是瞧不起。其交往过程中少不了市侩式的磕磕绊绊。不过，刘半农并没把陈西滢的庸俗细节当做一回事，回国后，还与傅斯年一同致信蔡元培推荐陈西滢去北大任教。这样陈西滢才在北大当上了教授。但谁知，陈的没有由来的高傲愈发不可收，简直就是狂妄自大，不可一世了。在是非面前，刘半农是黑白



陈西滢

分明的人，这可不管熟人和老乡了。刘半农的文章，把自比英国狄更斯、法国伏尔泰、左拉、弗朗士的陈西滢，斥为“名盗名贼名妓名优”，并运用他无可匹敌的讽刺挖苦之手段，讥讽道：

我所替陈先生愤愤不平者，便是我翻遍了一切英国文学史，没有看见陈先生的名字。这些编文学史的，真实瞎了眼！而且，陈先生不但应在英国文学史中有地位而已也，他既是 Dickens—Voltaire—Zola—France（狄更斯、伏尔泰、左拉、弗朗士）四个人的合体，那便无论哪一种世界通史中都用该大书特书的。然而，我竟孤陋寡闻，没有找到一些影子。更退一百步说，法国 Institut（学院）面前，至少也应该把他们贵法国的 Voltaire—Zola—France 的合体大大造起一座铜像来，然而我离开法国时，好像没有看见。许是还没有完工吧！然而那班 Institut 的老头儿们，可真是糊涂到万分上了。再退一万步，H.G. Wells（威尔斯 1866—1946，英国作家）的那部《世界史大纲》中好像也没有陈先生的名字，这真有些古怪了。

接着，就威尔斯的话题，再进一层进行讽刺，最后提醒北大史学系主任朱谔先说：“谔先，你该知道我们现在只有这一个人替我们中国捆绑场面，你还不赶紧添设‘陈源教授之研究’一科么？”

在刘半农文字炮火的猛烈攻击下，陈西滢开始暴跳如雷，在《晨报·副刊》等刊物发表文章还击，而后，刘半农根据论敌露出的狐狸尾巴再次组织反击，刘半农的文章一篇比一篇精彩，一篇比一篇具有杀伤力。甚至，“一笏帚打十七八只蟑螂”（江阴方言，一箭多雕之意）顺便连论敌的帮凶一起，毫不留情地进行反击。《语丝》斗士们也来助阵，经过几个回合的战役，陈西滢终于败下阵去，不敢吱声了。刘半农这一批战斗的檄文，有力地配合了鲁迅等人对“现代评论派”的斗争，为女师大学生的复校运动提供了极为有力的舆论支持。

3月18日，北京为抗议日本帝国主义干涉我国内政及炮击大沽，赴段祺瑞执政府请愿，段部开枪镇压，死47人，其中包括女师大学生刘和珍。伤200余人。李大钊，陈乔年均在战斗中负伤。这就是震惊世人的三·一八惨案。鲁迅称：这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听闻消息，刘半农义愤填膺，当晚就作“敬献于死于是日者之灵”的诗歌《呜呼三月一十八》，表示了他对牺牲者的激情敬悼，和对反动当局的愤慨，对卖国贼

的声讨。诗歌3月22日发表在《语丝》第71期，化名“范奴冬女士”。后由赵元任谱曲，此哀歌唱遍京城。

呜呼！三月一十八，
北京杀人如乱麻！
半天黄尘翻血花！
晚来城郭啼寒鸦，
悲风带雪吹！
地流赤血成血洼！
死者血中躺，
伤者血中爬！
呜呼！三月一十八，
北京杀人乱如麻！
养官本是为卫国！
谁知化作豺与蛇！
民贼大试毒辣手，
高标廉价卖中华！
甘拜异种作爹妈！
愿枭其首籍其家！
死者今已矣，
生者肯放他？
呜呼！三月一十八！
北京杀人如乱麻！

三、悼“快绝一世的徐树铮”

徐树铮（1880~1925），字又铮，号铁栅，自号则林。萧县官桥镇醴泉村人，自幼聪颖过人，才气横溢。3岁识字，7岁能诗，13岁中秀才，17岁补廪生，有神童之称。

光绪二十七年（1901），他弃文就武到济南上书山东巡抚袁世凯，陈述经武之道，未得赏识。后被荐为段祺瑞记室。光绪三十一年由段保送



徐树铮

至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就学。学成回国，先后任段祺瑞军事参谋、总参谋等职。

民国初年，徐树铮位居要津，叱咤风云。先后任军学司司长、军马司司长、将军府事务厅长，民国3年（1914）5月，徐树铮任陆军部次长，年仅34岁，为次长中最年轻者。袁世凯帝制失败，黎元洪继任总统，段祺瑞为国务院总理，徐树铮复任陆军次长兼国务院秘书长。在府院之争中，他同总统府秘书长被先后革职。张勋复辟后，徐随段讨张，后冯国璋任总统，段祺瑞复任总理兼陆军总长，徐树铮任陆军次长、兼西北筹边使，升为上将。在冯段之争中，徐为段穿梭奔波，他一方面假参加欧战之名，向日借巨款，编“参战军”，为段扩兵争雄；一方面组织“安福俱乐部”，包办选举，成立安福国会，以巩固段之政权。

民国8年，徐树铮任西北筹边使。历经5个月的周旋，外蒙取消自治。民国9年直皖两系军阀斗争激烈，他被免职，任远威将军，留北京代职。直皖战后，段祺瑞下台。他被指控为“十大祸首”之最通缉拿办，借日本使馆之助逃到天津，后潜入上海英租界内匿居。民国10年，孙中山以非常大总统名义在桂林组织大本营，计划北伐讨直。此时直奉两系矛盾日趋尖锐，孙中山联合段祺瑞、张作霖组成三角同盟。徐树铮代表段祺瑞于次年初赴桂林与孙中山晤谈，主张孙、段、张三方联合成立全国政权，反对直系军阀政府。民国13年9月，盘踞在江苏的直系军阀齐燮元为夺取被浙江的皖系军阀卢永祥控制的上海，爆发了江浙战争。徐树铮任浙沪联军总司令。皖系失败，他在租界的寓所里被支持直系军阀的英国人拘捕。并强迫他乘英轮去欧洲。在途经香港时，直奉战争结束，段祺瑞被推为临时执政，徐获得自由，被任命为考察欧美日本各国政治专使。遂率考察团15人，先后考察法国、英国、瑞士、意大利、德国、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比利时、荷兰、美国、日本等12个国家。在考察法国期间，孙中山在北京逝世。

徐树铮于民国14年12月11日考察结束回到上海。段祺瑞以京津局面混乱电嘱其暂缓赴京，但他认为考察回国，理应复命，即赴京。复命后，于12月19日晚乘专车离开北京南下，途经京津间廊坊车站，被冯

玉祥部杀害，时年四十有五。翌年，归葬故里，有《建国铨真》、《视昔轩文稿》、《兜香阁诗集》、《碧梦庵词》等著作传世。

徐树铮的军旅生涯，有褒有贬，孙中山曾对徐树铮收复外蒙一事有较高的评价；但说徐树铮是段祺瑞的灵魂，有极强才干，但锋芒毕露，过于骄狂，胆大敢干，树敌太多的人也不在少数。袁世凯曾这样评论徐树铮：“又铮其人，亦有小才，如循正轨，可期远到。但傲岸自是，开罪于人特多”。

不过，吃军饷的，照理似乎和文化不太相干，但他偏就关注着文化，与中国新文化运动颇有关系。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刚刚开始之时，他对新文学家们滥施淫威。因为他同样喜好诗文，又是安徽人，自居是“桐城派”的人，他办了个立达中学，自称林纾曾在此学校教过书。之后，他与林纾因为这个关系，便是越走越近。所以，常以保卫圣道自居，想用武力打击迫害新文学运动中的先进分子。

林纾对新文学家们恨得咬牙切齿的时候，他在上海《新申报》上著文，以小说的形式，含沙射影辱骂攻击陈独秀、蔡元培、钱玄同、胡适等人是诋毁先贤的魔鬼，但文中也塑造的能狠打人一顿的“伟丈夫”和可以把魔鬼抓去吃了的“罗睺维阿修罗王”这就是暗指徐树铮。林纾的文章，不仅含着谩骂和侮辱，同时还有恫吓。这样，他就不能不招致新文化阵营的反击。李大钊、蔡元培、刘半农都对林纾等人想借武力镇压新文化的阴谋予以揭露。

对这样一个手握生杀之权，又虎视眈眈着新文学家们的军阀、政客，他的死，对新文学营垒自是一个大快人心的事。刘半农遂撰文《悼“快绝一世的徐树铮将军”》，发表在《语丝》周刊第六十一期上。

文章从“暗杀”开始写起。作者认为，暗杀总不是人间应有的事情。虽然当初，徐将军杀陆将军手段也与暗杀相差无几，但如果必须在任何事情上讲究礼尚往来，那就不免冤冤相报，将人间的事弄成一大堆冤仇的集合。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哪里还有生存的余地？但是，接下来，作者举出的是当年徐树铮暗杀陆建章的故事。刘半农以这则“故事”暗示，徐树铮之被杀，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咎由自取。

接着，刘半农声明“悼”徐树铮的几点原因：

徐树铮也是“一世英雄”，可惜“天不假年”，使他既不能“流芳百

世”，并连“什么万年”也“功亏一篑”，刹那间就变做了“而今安在”。我们知道不世出之怪杰，乃是天地间的灵气或厉气的结晶，但无论他是什么气，总是上天特地加工制造的——犹之乎狐狸精之为物，也要五百年的道行——那么，我们上体天心，岂得不一洒伤心之泪呢？

这位在林纾那里一会儿是伟丈夫，一会儿是吃人的降魔妖怪的人物，在刘半农这里不过是老天特地加工的狐狸精等之类的怪物而已。接着，刘半农以“敬谨致唁”的口气辛辣地讽刺徐树铮的主子、奴才以及靠山：

其一，当然是白宫里的那位“内外感”的圣人。他现在失去了一个右手，而那位“赦婢链妾”的贵左手，一时又有些麻木不仁，他老先生的悲痛自不待言。我们对他，不得不敬谨致唁。

其二，乃是国内国外的一班欢迎欢送，忙得屁滚尿流的阔佬。他们欢迎欢送的目的，本是路人皆知的，现在可竟落得一场空。呜呼呜呼，夫复何言！我们对他们也应该相当的致唁。

其三，是他的一百多个随员，顾问，翻译，参议，下至无量数的二爷三小子之类。他们现在“树倒猢猻散”，“两只眼睛地牌式”，故未真正间架哉，阿要触霉头！我们对他们自然也该一律致唁。

最后，便是东方的那一个贵国了！……

这一串的致唁名单中“内外感”人是指段祺瑞，作者借他的《二感篇》（其中分《内感》和《外感》）特指他本人。而“东方的贵国”是指日本。刘半农通过致唁，充分表达了自己对封建军阀暴力统治的蔑视和嘲笑，反映了作者不屈不挠、不畏强暴的斗争精神。不管后世如何评价徐树铮，但当徐树铮与新文学阵营对垒叫板时，当徐树铮以及他所荫庇的“叭儿狗”、“干将”之流尘嚣甚上时，刘半农的行为是勇敢者的战斗行为，正是这样的无私无畏，才在事实上捍卫了五四新文化运动。

四、不惧强盗的勇士

刘半农在法国巴黎留学时就说，如果我回国，我就不说外国话，在人家的土地上，说人家的话，在自己的国家内，说自己的母语这是应该的。之后，在回国数年后，一次在周作人家做客，朋友们偶然谈起中国

人说外国话的事。许多人非常同意刘半农的观点。后来，大家在谈到在中国的外国人说中国话的问题，说该给他们一个期限，让他们必须学会说中国话，有的外国人竟是一辈子不会说中文。认为中国人土，所以中国话也土，不愿意学。席间有人说：不见得，有的中国人，在国内看见外国人说外国话，其实人家可是中国通啊，那你一说外文，叫人家只能接着说外文了，所以，外国人在中国，到处都是“宾至如归”的感觉。这些人，不说外语，怕人家不知道他会说外语啊。

随着一阵爽朗的笑声，刘半农聪明的脑瓜子一转，说：“是不是这样呢，比如抽烟，先拿一支烟放在嘴上，再拿个火柴儿来取个火，本来是容易到万分的事，若不是风瘫麻木，决不至于要借人之手取火。但是，如果有善于奉承拍马的仆人在，你一叼烟，他立马就‘嗤——’地给你点好火，送到你的嘴边来！”

这个比喻太确切了。引得众人大笑不止。

有人说：“这还算好的呢，有的，中国人见了中国人都大说外国话，或者在中国话里夹七夹八夹些外国话，真替他们肉麻。”

刘半农微微一笑说，这也有了一比的：“就如制台衙门前倒马子（马桶）的，眼看着制台太太混元金斗金光灿烂便拿来戴在头上跳舞，以为自己也可以金光灿烂，殊不知其臭不可言！”

刘半农的幽默让众人捧腹。席间的谈话气氛越来越热烈，从说外国话说开去，众人一直讨论到外国文字，历数了钱币、报纸、书刊、一些人的名片上莫名其妙的外国文字。很是有看法。不过，这些的谈话，只是毫无结果的闲聊而已。不同的是，刘半农并没有说过就如清风吹过，这件事他一直在心头。几天后，他撰文《关于外国话及外国字》，郑重其事将诸位先生的思想普告天下：“我们并不反对研习外国语言文字，而且极主张今后的青年要多多研习外国语言文字，但要紧记牢：研习外国的语言文字为自己，不是为别人；要是借此吸取外国的文明，因为：‘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达到打帝国主义的目的，不是借此卖身投靠，把自己送给帝国主义作奴隶，替帝国主义作宣传，替帝国主义者装点门面。”此文中，刘半农爱国反帝的思想可见一斑。

刘半农不仅著文宣传自己的思想，在一些维护祖国历史文化的关键时刻也是挺身而出。

1925年时的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由于其自1892年迄1909年在中

国新疆、西藏的探险经历，以及二十多部旅行记和科学报告，已是世界上赫赫有名的人物。这使他萌生了组建科学考察团，在中国西北考察的念头，并寻找支持。德国航空公司早就意欲开辟德国与中国间的中亚航线，该公司同意提供经费和由赫定组织指导航空技术和探险活动。

1926年11月，赫定来到北京，同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商谈，达成了协议，草拟了探险大纲。并取得了北京政府外交、军事等部门的同意。

正当考察团紧锣密鼓准备成行时，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历史博物馆、图书馆等爱国进步学者，联合提出抗议，抗议以外国人为主对中国西北进行考察，提出中国的古生物、考古、地质资料应由中国人自己考察研究。抗议活动很快在北京及全国掀起声浪，并致电绥、甘、新地方军政长官阻止赫定一行入境。

赫定在中国学术界抗议下，节节退步，由最初的单独组建科学考察团，到最终确定“中瑞联合西北科学考察团”；中国学者由二人增到十人；考察团设中、瑞团长各一人；所有收罗及采掘所得之物，全部运回北京，归中国保管，赫定可获地质学副本，等等。1927年4月，中瑞西北联合科学考察团正式成立，中方团长徐炳昶（古人类学家）、瑞方团长斯文赫定。瑞方专家有那林（地质学家）、赫德（气象学家）、贝格曼（考古学家）、赫默尔（医学专家），还有十余名外国专家。中国专家有袁复礼（地质学家）、黄文弼（历史及考古学家）、丁道衡（地质学家）、詹蕃勋（地质学家）、马叶谦（古人类学家）、李宪之、刘衍准、龚元忠等十人。考察的重点，是地质学、地磁学、气象学、天文学、人类学、考古学和民俗学，学科种类较多，同时又是有中国专家参加的第一次大型科学考察。此次中、瑞联合“西北科学考察团”的成立、成行，经过了多次的交涉、谈判。据《徐旭生西游日记》所载，在谈判中，“折冲最多者为刘复博士”。刘半农当然不会忘记1921年他在欧洲留学时，和傅斯年一起陪蔡元培先生参观大英博物馆所藏敦煌古写本的情形。也不会忘记他啃着面包一本本抄写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藏的104件敦煌文献，以《敦煌掇琐》的名字带回国公开出版。而将这些中国宝贵文化遗产弄到法国去的，就是他的老师——法国语言学家、汉学家、被称为敦煌学大师的伯希和。

“西北科学考察团”的成立，体现了刘半农等爱国学者维护祖国主

权、尊严，敢于斗争的精神。

在斗争中联合，在联合中坚守祖国利益。中外团员们工作还算和谐和睦。团里的外国人似乎也守规矩，未发现有无违反协定盗掘文物之类的情形。当斯文赫定 1929 年回到北平的时候，在刘半农等理事会成员那里他感受到气氛已与两年前大不相同。

不过，擅长制造和利用环境的赫定，决定要让这种气氛再浓厚一些，1927 年 11 月，他请刘半农推荐诺贝尔文学奖中国候选人，这个建议就这样应运而生。赫定实际上是在我国大西北做侦察工作为帝国主义服务的“学者”，他为了笼络中国学者支持他组织“西北科学考察团”以继续他的间谍活动，便“拿瑞典诺贝尔奖金的华冕来取悦中国学者”。

刘半农力荐鲁迅先生，但被鲁迅婉拒。鲁迅在信中说：

“请你转致半农先生，我感谢他的好意，为我，为中国。但我很抱歉，我不愿意如此。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们拿不到。你看我译的那本《小约翰》，我那里做得出来，然而这作者就没有得到。或者我所便宜的，是我是中国人，靠着这‘中国’两个字罢，那么，与陈焕章在美国做《孔门理财学》而得博士无异了，自己也觉得好笑。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赏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我眼前所见的依然黑暗，有些疲倦，有些颓唐，此后能否创作，尚在不可知之数。倘这事成功而从此不再动笔，对不起人；倘再写，也许变了翰林文字，一无可观了。还是照旧的没有名誉而穷之为好罢”。

——《鲁迅书信集》

1928 年，美国的一个“中亚考古团”，又以打猎为名，到我国内蒙等地挖掘盗窃文物。被中国方面拦截后这些美国人怀恨在心，怂恿北京的一些报纸，大骂文物、古物两会，说这是“妨碍文化”，“是中国人不懂科学的表示”。当时，刘半农在古物保管委员会十九名委员之列、是北京文物临时维护会负责人。他针对一些人的叫嚣，针锋相对予以回击：“这种鬼子报，先天里带着要骂中国人的使命，犹如狗的天性里，就带着

要吃屎的使命”一样。

“中亚考古团”的团长叫安得思，安得思本是流氓，曾因挖出了恐龙蛋，大吹特吹，捞取名气，后来就以翻尸倒骨为职业，其实根本不是什么学者身份。安得思在中国政府不闻不问，老百姓毫无知觉的混乱年代，曾7次，带着大队人马去内蒙等地挖掘，成车成箱将古物运走，还大模大样在北京设立办事处。1929年，安得思按照要求去古物保护委员会接洽。刘半农将与瑞典斯文赫定所定的西北科学考察团的运作办法给安得思看。安得思哪里肯接受，说，瑞典是个小国，美国是个大国，大国焉能照着小国的办法去做？来来回回，胡搅蛮缠。经过十多个回合，说是要签订草约了，突然又反悔了，将前后所商量的方案全都否定，同时，那些配合他强盗行动的报刊又开始骂人。

安得思有意与古物保护委员会决裂，同时回电美国，请人去搬保护伞，国务卿史汀生出面与中国交涉。这一切，真的太令人气愤，这样的作法，其实就是一个意思：古物保护委员会，你是答应不答应？刘半农维护中国利益的态度十分强硬。国民政府的王外长三番五次来电，刘半农等人就三番五次回电，怎么着也是拖着、顶着。直到王外长都失去耐心，自己亲自跑到古物委，去做刘半农他们的工作。王外长说：“我很希望美国国务卿将来帮助我们撤销领事裁判权，所以在这件小事上最好让着点。”

一席话，将刘半农说得目瞪口呆：喔哟哟，原以为在维护中国自身利益，殊不知倒是在妨碍撤销领事裁判权，竟使我中华民国外交上占不到大便宜，这还了得啊？愚忠，愚忠啊。于是便说：“要真是在这件事上吃点小亏，让国家占上大便宜，我们何乐而不为呢？”

这样，王外长才心满意足地离开了。

又过去几天，安得思约刘半农他们面谈，刘半农以为是中国外交上占便宜的时候来了，谁知，安得思严厉告诉他们：奉美国天产博物院院长欧思本（安得思所属单位）之命，不得与古物委员会签订任何协定。刘半农等人简直昏厥，呵呵，难道，这就是外交大便宜吗？而此时，那些骂人的刊物，又开始喷粪了。

隔了一段时间，刘半农收到一本美国寄来的《科学杂志》其中还夹了一封信，杂志中有一篇文章专门讲述了安得思交涉的经过，作者就是欧思本。这篇文章把“不懂科学”、“妨碍文化”的罪名统统加到刘半农身

上。而文中所讲述的经过则有意颠三倒四，胡搅蛮缠，偷梁换柱，无中生有。仿佛倒是他们盗窃了中国的古物，还要让刘半农这个中国古物保护委员会委员去美国磕头谢罪才对。刘半农轻蔑地把信和杂志随手往边上一丢，后来撰文《北旧》，发表于1930年《北新》半月刊第四卷。文中披露了事件的真实经过。还针对欧思本的强盗嘴脸进行了回击：“据说，欧思本是个有学问的老者，不比安得思是个纯粹的流氓，然而糊涂至此，亦殊可怜。大概太老了，快要到地里去了，所以对于地下的事，转比地面上的事更清楚了！……欧思本老先生，这还是你太滑稽了呢？还是我刘半农的骨头太贱了呢？”

1931年，又有法国黄种巡查团假借一九学术考察团的面目不怀好意地来到中国。他们的目的只有两个，一个是盗窃文物，一个是为进一步的侵略做情报刺探。这个团，名义上是中法联合组建，实质上中国人做不了主。在考察过程中，法方居然殴打中国团员。一时间，全国上下，义愤填膺。而当形成冲突时，中方储民谊这个政客兼汉奸的团长曲意奉迎，一副委曲求全的奴才相。而法方团长卜安则歪曲事实，掩盖真相。刘半农气愤地致函质问法使馆参赞韩德威。抓住韩德威向报界发表的为法方推脱责任的谈话中的谎言，一一加以击穿。后来，刘半农又在《世界日报》发表《介绍黄种巡查团》。

文章说：“法国黄种巡查团蒙着一九学术考察团的假面具来到中国，不幸碰着黄种人郝景盛挨打，闹得满城风雨。”并揭露：国民政府虽有下令禁止的决议，但又根据王外长的报告，将决议撤销，而许该队西来的一部分通过中国。接着他又着重介绍了《中法友谊报》上的《关于黄种巡查团》一文。该文不打自招地承认团中的主要成员皆不是什么学者，而是一群挂着羊头卖狗肉的帝国主义分子。这个团队的真正目的是：记载经过的地域，探寻路线并测定高度，研究地面和空中的大联络；对叙利亚、伊拉克、中国的古迹做综合研究，尤其注意新疆的庙宇和教堂；研究各民族的文化与社会；研究短波之进行和长距离之通电；研究波斯美术和中国美术，采集美术品，以备陈列于博览会及博物馆，普遍的用图书和影片记载一切，作为依据；研究商业之大中心所在，及其主要贸易，研究兑汇及其信托的性质，开辟新商场。”这里的“研究”、“采集”纯粹是掩耳盗铃的把戏，说穿了就是盗窃和掠夺。

刘半农的“介绍”，其实是一次无情的揭露，让强盗和骗子，赤裸裸

曝光在光天化日之下。在那个军政要员们萎头缩脑的年代，倒是刘半农这样的文人，捧着一腔沸腾的铁血丹心，为国家为民族利益冲锋陷阵啊！呜呼，哀哉！

五、高举“反日救国”大旗

抗日战争爆发，刘半农更是坐不住了。他说：“现在的刘半农本来不愿意多管闲事，但到国难临头国家民族生死存亡之际，心火在内中燃燎着，要叫我不说话，自己压抑不住。”于是他写了一批反日救国的文章，当然，在文章中作者也有一个认识逐步提升，思想逐步深化，观点逐步完善的过程。

《反日救国的一条正路》作于1931年9月29日。文章一开头，作者从苏州人入笔描摹中国人的国民性。虽然生动，但有损苏州人形象，也贬低了中国的热血人士，有以偏概全的缺陷。但从另一个方面也说明了他面对外敌入侵的满心“燃燎”的心情。而对利用开大会、贴标语、游行示威、缠黑纱、叫口号等形式的反日，作者不以为然，认为，看上去轰轰烈烈，慷慨激昂，只需一个日本兵拿了枪过来，保管大家一哄而散，日本兵枪一响，大家都魂不附体。所以，结队游行等事，非但对救国没有一丝一毫的好处，说不定还有相当的害处，可以给日本人提供口舌……这些观点也是有失偏颇的。

接着，作者对国内外形势做了分析，他认为，日本的这次出兵，是经过几十年处心积虑的谋划而来，既然出兵，绝不会轻易撤兵，日本占领满洲，不仅是帝国主义野心，也是他们国小民多，必须向外扩张，而向外，满洲是他们最好的路径，所以，对于满蒙的竞争，他们绝对不是随便的尝试，绝对不是跟中国人玩游戏，得到满蒙就是他们最好的活路，得不到就是一条死路。因此，要是认为中国有的是土地，那么赶紧把满蒙送人拉倒，省得许多麻烦，省得伤了和气。要是认为满蒙应该争的，那就必须彻底了解这种争不是尝试，不是玩笑，不是儿戏。而是判定你死我活，或我死你活的大决斗。必须有了这样的见解，然后才可以斗一斗，争一争。刘半农对日本侵略战争的性质把握十分准确。他的论述也是给国人擦亮了眼睛，明确了此次战争的残酷性和艰巨性，坚定人们用血肉筑起新的长城的殊死搏斗的信心。

文章抨击了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主义”，揭露了国际联盟所谓的公允，其实只是假面具而已。即使真的公允，他们手上连一支部队都没有，那么公允只是嘴上擦石灰——白说白话。这样的分析，再次坚定中国同胞的信心，自己的命运只有靠自己去把握，靠谁都不靠谱。

在这种形势下，中国人必须清醒认识到，日本人是我们的仇人，不是一般的仇人，真正是不共戴天的仇人。对死仇我们不能打哈哈，开玩笑。而要卧薪尝胆，刻苦自励，做好全力还击的准备。“我们有枪就用枪，没有枪就用刀，没有刀就用木棍树枝，用砖石，再没有我们有头颅可以撞，有拳可以挥，有脚可以踢，有牙可以咬！……我们拼，我们组成军队就用军队拼，不能组成军队联合十个八个人三五个人也可以拼，单独一个人也可以拼，你叫我们军队也好，土匪也好，暴徒也好，什么名义都可以，我们所要的是拼。一个拼死一个不赔本，一个拼死两个还赚一个！只须世界上还剩一个中国人，你们日本人休想好好过，只须世界上还剩一滴中国人的血，必须拼到你们日本人相等的血才甘心。”

刘半农的这一番话，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的吼声。是一个中国觉醒的血肉之躯对全体同胞的呐喊，在民族危亡的时刻，便是赤裸裸的血肉之躯对峙血肉之躯，决心对峙决心，这是战争的本质。

刘半农从“抗日”说到“救国”，当时的中国真的是积重难返，每一个细胞都在流脓、腐烂。所以，作者认为，要救国，先要救自己，先救我们的事业。学生要读好书，教员要教好书，国民要锻炼身体，要抵制日货，要从颓废主义，享乐主义，以及“摩登”“跳舞”等淫逸丧志的东西中解脱出来。做一个行为纯洁，人格完整的人，进入刚强果敢，振作有为的人。只有这样，中国才有希望，才有复国的一天，重放光明的一天。

不久，刘半农又写了《好聪明的北平商人》，对一些表面高喊抵制日货，暗地里堆满日货，有的甚至还想发国难财的行径进行挞伐。再次表达他的爱国热情。

刘半农一面撰文呼吁呐喊，一面积极投身到抗日救国的实际工作中去。1933年1月3日，山海关失守，日寇步步进逼，蒋介石依然不抵抗，听到这一消息，他气愤极了，对内侄朱穆之说，“榆关失守了，国民党不抵抗，再这样下去，我要去投共产党！”而对老朋友周作人家里悬挂膏药旗，刘半农火冒三丈，他说，他再挂那个旗子，我就要和他划地绝交了。

第十一章 多维的空间

一、天华之死



刘天华

二弟天华，住处离半农不远，就在附近。半农和天华自小兄弟感情深厚，一个热爱文学，一个热爱音乐，两人刚出道时在上海相依为命，一个卖文为生，一个靠音乐糊口。在北京，兄弟间经常走动，就是孩子们也一有空就在一起嬉戏玩耍。

这时的刘天华在音乐上已经造诣很深，声誉也很高，特别是1930年的冬天，在北京饭店与世界著名的小提琴家欧尔门等一起演出时，他用一把二胡，演奏了深沉忧郁的《病中吟》、欢快灵动的《空山鸟语》、用琵琶演奏了经典作品《十面埋伏》，简直就把听众镇住了。外国人几乎是第一次听到中国的民乐能够如此细致深刻地演绎这样复杂的音乐作品。演奏会，哥哥刘半农和嫂子朱惠都参加了，半农对天华的音乐作品，自是有着更深刻的理解，他们一起拼搏，相互勉励，走过了多少人生的坎坎坷坷。半农是听见了天华的音乐，听见了天华的心声，听见了天华精神的律动。哥哥为天华的成就感到由衷的欣喜和祝福。

1932年6月初的一天，弟媳殷尚真突然急匆匆前来找半农：“大哥，天华病了！”

“怎么会呢？累了？”半农一边询问，一边立刻动身和朱惠殷尚真一起过去看天华。天华的身体一直很棒，怎么会生病呢？刘半农想。

说话间，他们到了天华的床前，天华的样子，叫当哥哥的心里一凉。

脸色蜡黄，眼圈发黑，许多疹子，并伴着不断的喉咙痛。天华说：“我去天桥给一个鼓姬记录锣鼓经，回来就不舒服，估计可能是受凉了，感冒了，不要紧的，哥。”

来势汹汹的感冒叫半农不敢麻痹大意，他立刻叫朱惠去请医生。医生一会儿就来了，一查，说是猩红热。

猩红热，为A组 β 型溶血性链球菌（也称为化脓链球菌）感染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其临床特征为发热、咽喉发炎、全身弥漫性鲜红色皮疹和疹退后明显脱屑。少数患者患病后可出现变态反应性心、肾、关节的损害。猩红热坊间也叫“烂喉痧”。

三弟刘北茂一家也赶过来了，所有人都惊呆了。刘半农的脊背是一阵阵冒冷汗，朱惠摇着发呆的丈夫的肩膀悄声说：“快送二弟去医院，这是最好的办法啊！”

医院？刘半农一听医院，心里又是一惊，他的亲人、熟人，给医院的庸医害死了多少个？什么同仁医院、协和医院，侄女阿燕侄儿阿明不都是死在这样的医院吗？刘半农说：“不，快去请中医。”

病来如山倒啊，中医面对如此迅猛的疾病，能做的只是无力的抵抗。天华的病情越来越严重，北京大学、女子学院、艺术学院、国乐改进社的学生们一批批前来探望。因为猩红热是传染病，学生们让殷尚真都堵在客厅里，然后再将学生来探望的情况转告丈夫。

天华的病情愈发不妙！

刘半农请来了当时北平最著名的五个中医前来会诊，同时注射血清之类的药物消减病菌的威力。所有人的智慧都在跟看不见的威力无穷的病魔搏斗，一天两天……但是，一切的努力，挽回不了一代音乐天才的离去。天华的灵魂乘着音乐的翅膀慢慢起飞了，弥留之际，他最后努力地睁着眼说：“哥，我不行了，要走了……”内心的悲痛再也控制不住，刘半农失声痛哭起来……

年仅37岁的天华的离世，使刘半农一蹶不振。他经常喃喃自语：“为什么坏人不死，好人死啊。”

一个英才的陨落怎么不叫人心痛，更何况，他是自己手足情深的二弟啊。刘半农一面组织人将天华创作的曲谱整理成纪念册，一面还在经常独自发呆。朱惠说：“别发呆啦，给二弟写点什么吧。”半农说：“我何尝不想啊？只是，这话不知从何说起，一想起二弟来，这泪还就忍不住。”

天华过世 10 天后，刘半农终于写出了声泪俱下的《书亡弟天华遗影》，读来真的让人唏嘘不已：

呜呼，此吾二弟天华之遗影！民国十有八年三月一日下午，天华偶过余家，余适影匣在手，即为摄取此帧；洗晒既成，丰神不恶，天华欣然持去，悬之斋头。余生平好以摄影自娱，而为天华摄者仅此。不谓天华死后，举殡之日，即以供于影亭之中，今设灵于家，即以悬于木主之上。余每一瞻瞩，丰神如昨，而幽明之路已殊，悲痛伤心，不知涕泗之何从也。

天华少余四岁，幼与余同学于先君子宝珊先生及先师杨绳武先生所创之翰墨林小学，即今之江阴县立三校；稍长，又同学与常州府中学，即今之江苏省立五校。时余颇有“小时了了”之誉，而锋芒流露，恒为同学们所倾。天华课业不异于人，而朴讷寡言语，孳孳兀兀，纯乎得学子之正。是以先宝珊先生及诸师长，每愿天华能兼余之颖悟，余能兼天华之沉潜，方为两全也。

余家素清贫，武昌义起，学校停闭，余与天华均废学。天华入本邑青年团抗贼；余北走清江，以书牋翻译之事佐戎幕。居数月，小子溥仪去位，余还归江阴，挈天华同往上海，时民元春二三月之交也。余居上海，以卖文为活，天华则致力于音乐。天华性情初不与音乐甚近，而其“恒”与“毅”则非常人所能及。择业既定，便悉全力赴之；往往练习一器，自黎明至深夜不肯歇，甚或连十数日不肯歇。其艺事之成功实由于此，所谓“人定胜天”者非耶？

民三，天华就教本邑华墅某小学。明年，先宝珊先生弃养，天华即于是年就教母校省立第五中学。民六，余就教北大，天华来书，每羨都中专家荟萃，思欲周旋揖让于其间。民九，余有欧洲之行。民十一，天华果北来，缔交于杨仲子、赵丽莲、郑颖荪、嘉祉诸君。余得书狂喜，知其艺必将大进也。

天华以国乐西乐，方域虽殊，理趣无异，而当时士子，每重新声，鄙夷旧物，贯通之责，难望他人；于是择西乐中最难之小提琴而兼习之，纳贽于欧西某名师称弟子。今人每怀小技，辄沾沾自喜，以为当世莫我若；其能于既为大学教授之后，而犹虚心师事他人，以求其艺事之完成者，天华而外吾不知当世尚有几人也。

民十四，余东归，见天华，聆所奏乐，知其于琵琶二胡，已卓然成家，小提琴亦登堂入室，即举在法所构一名厂小提琴赠之。七年以来，天华日与此琴俱，出则携以相随，人则操奏不去手。天华艺日益进，琴声亦日益美好。果天假之年，天华必兼为此道名师，此琴亦必为世间珍品。今人既云亡，琴亦绝响矣！

天华于琵琶二胡，造诣最深。琵琶之《十面埋伏》一曲，沉雄奇伟，变化万千，非天华之大魄力不能举。其于二胡，尤能自抒妙意，创为新声，每引弓一弄，能令听众低徊玩味，歌哭无端；感人之深，世罕伦比。二胡地本庸微，自有天华，乃登上品。欧西土人有聆天华之乐者，欢言“微此君，将不知中国之有乐”！此虽过誉乎？亦十得八九矣。

天华于所专习之外，凡与音乐有关者，如钢琴、铜角、古琴、队乐，以及昆腔、京戏、佛曲、俗曲之类，亦无不悉心钻研，得其理趣；于和声作曲之学及古来律吕之说，亦多所窥览。说者谓中西兼擅，理艺并长，而又能会通其间者，当世盖无第二人。顾恒小心谨慎，不轻述作，故一生所写，仅二胡琵琶谱十数种，及《梅兰芳歌曲谱》一书，均已行世；其未及付印者，有《安次县吵子会乐谱》及《佛曲谱》两书，又二胡新谱已成未成者各数种，将由其门弟子整理而刊行之。

天华北来之后，所就教之学校凡三，曰北京大学，曰女子学院，曰艺术学院。十年以来，政局不定，教育组织，朝三暮四，推转靡安，此三校名目屡更，少者三次，多者七次，而天华连续任教其中，直至得病之日，犹往上课，其于职务，可谓全始全终者矣。

天华体质素强，身材高伟，内气充实，平时从不病，乃以本年五月三十一日晚七时病，时授课归来，琴篋书囊犹在手也。病之初，仅心烦作冷耳。越一夕而体大热，喉大痛，肤现红斑，医者断为猩红热，注血清，不见效，六月三日、四日，更注血清两次，仍不见效。五日，病大剧，发狂如虎吼，健仆四人扶持之，势亟亟不可终日；遍延北平名医五人会诊，注少许吗啡，更于血管注血清，狂势稍止。六日，略有转机。七日，神志苏醒，热减，脉平，能进饮食，可安睡，医者欣然相谓曰：“希望与日俱增矣。”此下午六时事也。八时后益平稳；十二时，静睡如常人，举家欢喜；乃至一时半，病忽剧变，体骤热，脉骤乱，眼上翻，右腹飞跳，自此急转直下，医者来，束手无策，亦莫知其所以然，但言势将易簪，当有以为备。至太阳初出，百鸟方鸣，天华竟于晨光熹微中

徐阖目，与世长辞，而一家恸哭之声作矣，时为中华民国二十一年六月八日上午五点四十五分，距其初病，仅七昼夜又十点钟耳。天华近数年中，每谓余曰“我俩三十多年老弟兄”，此本友爱之辞，不意竟成恶讫！天华得年三十有八，吾二人为兄弟之期，至此斩矣，悲哉悲哉！

天华娶同邑殷可久先生女尚真，生三子二女，一子一女早殇；存者子育毅，育京，女育和，均尚幼，未成立。

天华一生，行事至简，初不如大人先生之勋名赫赫，而其艺事之成功，与夫为学之勇，诲人之勤，固已可使一代士夫唏嘘感想于无穷矣。余生平不肯作谀墓之文，余爱余弟，尤不愿以违衷夸饰之言被余弟。是以上方所写，字字悉真。世有作民国初年乐人传者乎，当有采于斯文。

.....



刘天华墓

处理完天华的后事，刘半农努力使自己走出阴影，投入到工作中去，在大学教授英语的三弟北茂跟大哥说起想做二哥没有做完的国乐，半农甚是称赞。他知道，三弟喜欢国乐，天华生前没少指导过他，半农说：“国乐在天华手上已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你一定要让它发扬光大啊。”北茂说：“那是，让我努力吧，算是

尽我的微薄之力与二哥去接力！”

天华的匆匆离去，对刘半农的打击太大，刘北茂看着憔悴的大哥，心疼地说：“大哥，你该出去放松放松自己了。”

“是的，准备去河南洛阳等地，研究古代乐律去。”

二、《桐花芝豆堂》与《双凤凰砖斋》

从洛阳到南京又转道无锡返回江阴，直到七月底，刘半农才回到北京，他希望户外的的工作，能够改善自己的心情，但是走出亡弟的阴影，

真的很难。

夏日的一天，一位身材高挑，风流潇洒的中年人突然来访刘半农。刘半农抬头一看，呵，原来是北大同事林语堂。林语堂比刘半农小四岁，在新文化运动中他也发表文章表示对白话文学的赞同。在1926年3月18日段祺瑞政府屠杀爱国学生时，他撰文表示强烈愤慨……1932年他创办了主张幽默、提倡抒发灵性的《论语》杂志。杂志十分受读者欢迎。此时，林



林语堂

语堂一脸笑意盯着刘半农说：“老兄聪明人啊，我来拜访，你一定知道我的目的喽？去年我创办了《论语》杂志，我来向你约稿……”

林语堂带着圆圆的大眼镜，天生一张笑脸，这在刘半农阴沉已久的天空里，无疑照来了一缕阳光，再者，《论语》又是提倡幽默、灵性的一本杂志，他们的谈话便始终充满了童心、谐趣、幽默和欢快的气氛，这是天华去世以后刘半农难得感到开心的一天，二弟的去世仿佛堵塞了他的思维，窒息了他的灵魂，这下可好，林语堂的邀约，倒是为他打开了创作的另外一扇窗。林语堂说：“老兄为人谑而不虐，亦庄亦谐，文章也充满灵动之气，你的赐稿将使我的刊物增光添彩啊，希望你成为长期撰稿人。怎样？”

刘半农转着大脑袋，眯着眼睛说：“有了，有了，我要拟一个题目，叫《桐花芝豆堂》，我自注自批。好不好？”

“什么意思呢？”林语堂一时未能领悟，歪着头问。

“你听着啊，‘桐’梧桐子；‘花’是指落花生；‘芝’指芝麻；‘豆’指大豆。这几样东西，都可以打油啊！本堂主人不是喜欢打油诗，诗又杂而不一。凡所见所闻皆可以入诗。故以此四物为堂名，可以吗？”

“哈哈，好！好！”林语堂已经笑得前仰后合了。“《论语》就要半雅半俗，深入浅出，亦庄亦谐，人情入理的风格。老兄能这样出场，自有很好的效果。谢谢老兄！”

1934年，林语堂又创办《人世间》半月刊，刊物的宗旨也要求幽默、闲适。刘半农在《人世间》上发表了连载《双凤凰砖斋小品文》。他

为自己的斋名解释说：“昔苦雨老人（周作人）得一凤凰砖，甚自喜，即以名其斋。今余所得砖乃有双凤凰。半农他事或不如岂明。此则倍之矣。”

这段时间，人们常常可以在《论语》和《人世间》看到刘半农幽默的小品文和打油诗。看惯了他或博大精深或壮怀激烈或鞭辟入里的文章的人们一时转不过弯来，甚至有人认为这是刘半农的“蜕变”，对他的“蜕变”很是看不惯，有人扼腕叹息，有人著文抨击。就是周作人和胡适的和诗都遭到了非议。载几则小品文和诗歌，供赏：

传吴道子画观音像拓本跋

世所传吴道子画观音像不知有几处刻石。余所知者西安碑林中有其一，南京岩山一佛洞中亦有其一，均大同小异。此刻远在腾越，以粗石凿成，尤古拙可玩。近唐人画佛渐从西域出，取以相比，风格颇多似处。可知原画虽未必即出道子手，要亦自有渊源。拓本纸墨甚旧，当是乾嘉时物。上有永北文武二官印，乃偏僻之处，偶有古迹，吏人遂据以为利耳。廿三年二月十九日得于厂甸画棚中，三月十四日记此，即付重装。

柬天行

顷与兄及白何二公同游拈花寺，观僧人作剃度道场，欢喜赞叹。归语细君：倘吾得与彼三人同到拈花寺落发，念佛之余，可以讲音韵，谈幽默，亦是人生一乐。内子因问：究以何日去，当治饌为君等别。念此事非第一人所能定，故以奉询。且欲知尊夫人及白何二夫人亦能治饌为别否。最好是吃遍四家，抹去嘴上油，仍不作和。

赠拜古先生

古人亦是人而已
古人放屁未必香
凭把古人干屎橛
持来细嚼当香肠

阅卷杂诗之五

追要追在屁股头
迎头哪哼好追求
有朝一日两头碰
啊呀一声鲜血流

(注：对考生“迎头追上”语，加以讽刺。)

刘半农这些发表在《人世间》和《论语》上的小品文和打油诗，同样遭到了鲁迅的反对。鲁迅说：对于刘半农，我爱十年前的他，当时，他跟陈独秀等从封建营垒里杀出一条血路来，这是非有大勇气，大气魄不能做到的。但对他的近几年却憎恶了。……打油诗弄烂古文，挖苦学生考卷中的错别字、病句，那些学生要钻地洞了……而刘半农在逝世前，对自己这段时间的作品，也有反思，他在1931年8月31日写的《五年以来》一文中就感叹过自己的“没落”。然而，笔者认为，用人性的眼光体察刘半农的这段“没落”，其实也是有缘由的。

三、初纂《赛金花本事》

赛金花闺名赵灵飞，乳名赵彩云（一说姓郑），小名三宝，清朝同治十一年十月初九生于安徽黟县，后随父亲移居到苏州。赛金花是一个生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叶中国的具有传奇色彩的女子。

在晚清众多的名妓当中，赛金花应该是最具传奇色彩的一个，除了名列“清末四大谴责小说”的《孽海花》，还有多部笔记和小说涉及她的故事。

赛金花幼年被卖到苏州为妓，1887年恰逢前科状元洪钧回乡守孝，对彩云一见倾心遂纳为妾，15岁的彩云就这样嫁给了48岁的洪钧。不久，洪钧奉旨为驻俄罗斯帝国、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荷兰四国公使，其原配夫人



赛金花

畏惧华洋异俗，遂借诰命服饰给彩云，命她陪同洪钧出洋。90年代初，同洪钧归国，不久洪病死。1894年彩云在送洪氏棺柩南返苏州途中，潜逃到上海重操妓女旧业，改名“曹梦兰”。后至天津，改名“赛金花”。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时，居北京石头胡同为妓，曾与部分德国军官有过接触。1903年在北京因涉嫌虐待幼妓致死而入狱，解返苏州后出狱再至上海。晚年生活穷困潦倒，1936年病死于北京。

从现在存有的一些老照片来看，其实赛金花并非倾国之色，只因不同寻常的经历，成为一连串传奇故事的主人公。

洪钧，原籍安徽徽州，清朝状元，官至礼部侍郎。当他一见赛金花，立刻惊为天人，遂纳为妾。而洪钧已有一妻一妾在堂，赛金花排第三房。洪钧赛金花年龄悬殊。这于是又引出了另外一个流行的传说。

传说，洪钧未中状元之前，曾经受到过一个妓女的资助，这个妓女有的作品里称之为小青。和所有“公子落难美人相救”故事的男女主人公一样，洪钧和小青订下了白头之约，但是也同样没有跑出这类故事的套路：中了状元的洪钧觉得娶妓为妻有损自己的体面，于是抛弃了前盟。而不知内情的小青最初沉浸在“状元夫人”的憧憬中，得知真相后愤然上吊自杀。因此，在《孽海花》中，出场时的傅彩云脖子上有一圈与生俱来的红丝，足以让男主人公金雯青（洪钧字文卿，此处影射很明显）明白她是小青的转世，遂有隔世重逢之感。

1887年，洪钧奉命出使欧洲，夫人王氏不愿去异域洋邦，赛金花便代她去。在海上走了一个月，到达意大利港口热那亚后改乘火车，直达德国柏林。由于赛金花年轻美貌，长于辞令，很快闻名于欧洲上流社会，这是她一生最为亮丽的三年，也使她人生的传奇进入了高潮。德国皇帝和皇后召见了她。赛金花身姿绰约，娇嫩雪白的肌肤和水灵灵的一双妙目传达无限情意，细瓷般的气韵震住了德国皇帝和皇后，让他们真正见识到东方美女的风采。在欧洲三年，赛金花凭她的聪明伶俐，居然学得了一口流利的德语。这是她传奇经历到达巅峰的筹码。

如果说，在洪钧死后，赵彩云心甘情愿地为他守节，而不是去重操旧业，那么，“状元夫人”的名声就不可能作为一种成名的资本。而在赛金花的时代，像明末名妓董小宛那样从良后心甘情愿作一名贤妇的妓女实在太少。许多妓女因为尽量挥霍，债务缠身，经常靠嫁人来摆脱债务。赛金花虽未能免俗，但她到底是在洪钧死后才重操旧业，也不失为

光明磊落。

赛金花在上海挂牌接客，果然效果颇佳，名声大噪。清末著名小说家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作者）因为她传奇的经历，将她列入上海名妓中的“后二怪物”之一。在北京她则因为喜欢穿男装，被称为“赛二爷”。

促成赛金花再次成名的却是庚子事变。1900年，庚子年。在慈禧的暗示下，义和团杀死了很多在华洋人，这其中包括德国公使克林德。列强以此为借口，进攻北京，慈禧和皇帝逃往陕西。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后，奸、杀、掠、抢无恶不作。赛金花因为通德语，她用德语告诉德国士兵：我是你们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和皇后维多利亚的好朋友，并拿出了她当年同德国皇帝和皇后的合影。德国士兵认出了他们的皇帝和皇后，立即举手行礼。第二天，德国士兵便开来一辆轿车接赛金花去见她在西洋时就认识的八国联军总司令瓦德西，这次旧情复燃，亲密异常；也凭借这一层特殊关系，赛金花借机为慈禧求情，又劝瓦德西整肃军纪，少侵扰百姓，下令安民。瓦德西第二天便下令禁止士兵违纪妄为。但瓦德西对战争赔款一事开价却很高，谈判一开始，他便提出要慈禧太后赔克林德公使的命，皇帝要道歉。当时，李鸿章卧病在床，他便对庆亲王说：只有试用赛金花了。赛金花奉命又再一次展开外交手段，对瓦德西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并说服了克林德夫人。在她的游说下，八国联军同意议和。辛丑和议成功，赛金花功劳自然不小。因此京城人对她多有感激，称之为“议和大臣赛二爷”。民间还称她为“护国娘娘”。这类传说也正是赛金花故事中最引起争论的地方。

和议既成，联军退兵，两宫回銮，乱哄哄论功行赏之时，自然没有赛金花的份。相反，虽然“议和大臣赛二爷”的名声增加了不少“生意”，也不过依旧做着倚门卖笑的生涯。以至于后来的虐妓致死一事，赛金花并非没有责任，但似乎也别有隐情。

此后的赛金花虽然又在上海重张艳帜，只是秋娘已老，传奇的故事也离她而去。不过一个身份低贱的风尘中人，一生中两次与历史风云际会，虽为流星一闪，却也足以引起世人的揣测与惊讶，因此，当时就有人预言：“照他这样侠骨奇情，将来自必为一代传奇人物。”

赛金花一生充满了传奇的色彩，她出入豪门，沦落风尘，命中克夫（三次嫁夫，三次孀居），无有子女，于1936年去世，终年67岁。葬于

陶然亭公园。著名画家张大千为她作肖像画，齐白石为她题写墓碑。她亲笔题写的“国家是人人的国家，救国是人人的本分”至今犹存博物馆中。赛金花她那爱国之心，比起当时卖国贼、汉奸犹胜千万倍。“自古风尘出侠女”这是对赛金花一生真实的写照。

1933年，晚年穷困潦倒的赛金花被北京《实报》记者发现并进行报道。60多岁的一代名妓再度成为新闻人物。各家报纸争相采访，朝野各界名流欢聚时必邀赛金花陪同。一次，因记者管翼贤之邀，刘半农、胡适之、傅斯年、赵效沂与赛金花相见。席间，赛金花海吹漫说，宾主欣然有色。刘半农产生了写《赛金花本事》的初衷。这样，刘半农邀约学生商鸿逵，一起完成《赛金花本事》，学生商鸿逵欣然答应。之后，他们做了外围采访，了解了赛金花在老家的一些情况。又找到戏剧家齐如山。齐忠告刘半农，赛金花的自述，水分很多，取材一定要谨慎。并说，像你这样的大博士，大文学家，而且著作为《本事》，不能如小说一样胡编乱造，不然于你的名誉和身份都有相当的损害。

刘半农考虑写《赛金花本事》，是在侵华日军长驱直入的1934年，塘沽协定的签署，意味着，北方已经给卖国政府给出卖了，完全在日寇魔爪的控制之下了。赛金花的复出，以及刘半农考虑写《赛金花本事》，其实都有有识之士们借古讽今的意味在其中。

为写《赛金花本事》，刘半农请郑颖荪出面联系了赛金花，带上商鸿逵和速记生连续多天听取赛金花本人叙述身世。刘半农做了大量的案头工作，但是，采访结束后，一直将素材搁置一边，未能动手写作。看见商鸿逵的时候，也讨论过，分章分节的事情，但，由于事务繁忙，直至他自己离世，依然未能动手写作。

刘半农逝世后，学生商鸿逵陷入巨大的悲痛中，他自己都不愿意去想这件事，但别人却总是不时间



赛金花本事封面

起此事。商鸿逵想，不如完成了老师的遗愿吧，于是就将采访材料整理成三万多字的《赛金花本事》。于1934年11月，由北京星云堂书店出版。署名刘半农初纂、商鸿逵纂就。封面为赛金花手迹题词。

此书基本属于回忆录，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至于，由于赛金花一生起落于风尘之中，到晚年又失意潦倒，自述中是否有随口胡诌，自相矛盾之处，则当别论了。后人在评论此书时，谓不符事实处较多。不过《赛金花本事》的出版，使得赛金花咸鱼翻身，一时什么“外传”“传略”“自述”“编年”纷纷出炉，连商业广告，戏院开张都得沾沾赛金花的光。从此，似乎赛金花就没再冷却过，直至今日，仍有人出于种种目的在翻炒这个传奇的女子。

第十二章 生命的夕照

一、为李大钊题碑立传

刘半农与李大钊是在北京大学认识的。1918年1月，刘半农在北京任教之后的大约半年，蔡元培聘请李大钊任图书馆主任；同年，两人加入蔡元培的“进德会”；2月，刘半农征集全国近世歌谣，李大钊予以大力支持，将家乡的几百首歌谣提供给刘半农，并发表在《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新青年》主编陈独秀被捕，刘半农、李大钊各自在《新青年》发表诗歌，揭露敌人，声援战友，表现出不畏强暴的斗争精神。

1927年4月6日，李大钊被捕，28日，李大钊与同时被捕的19位革命者被反动当局绞杀。噩耗传遍全国，革命志士无不心痛欲绝。刘半农也为失去挚爱的战友而夜不能寐。1933年4月，中共地下组织通过北大的进步师生和李大钊生前好友，发起为李大钊公葬的活动。刘半农是创意者之一，为公葬李大钊积极奔走筹备。之后，他又撰写了：“故国立北京大学教授李君墓碑”：

君讳大钊，字守常，河北乐亭县人。早年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习政治经济之学。既卒業，东游日本，入早稻田大学，所诣益精。归国后，作为文章，布之《甲寅》、《新青年》诸报，理致谨严，思度闳远，见者称道。以民国七年一月，主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事。九年九月，改任政治、史学两系教授。兼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教员。君温良长厚，处己以约，接物以诚，为学不疲，诲人不倦，是以从游日众，名满域中。会张作霖自称大元帅于北京，政出武夫，儒冠可溺，遂逮君及同游六十余众，而令何丰林按其狱。君与路友于、张伯华、邓文辉等二十人遂同罹于难。风凄雨横，催此英贤，呜呼伤哉！君生于清光绪

十五年十月六日，死于民国十六年四月二十八日，春秋三十有九。夫人赵氏
 纫兰；子三：震华、光华、欣华；女二：星华、炎华。越六年，其友王烈、何基鸿、
 沈尹默、沈兼士、周作人、胡适、马裕藻、马衡、傅斯年、蒋梦麟、樊际昌、刘
 复、钱玄同等创议募资，为营窀穸，遂于民国二十二年*月*日葬君于北平
 西山万安公墓。载临斯穴，挥涕凄怆，惟神魂之得所，迪吾民于恺康。□
 □敬撰并书 *** 镌字

碑文高度概括了李大钊的短暂一生，反映了作者对死者的了解、敬重和对统治者的憎恶。但是由于一些发起者有不同意见，最后未用。

1933年4月23日，北京各界人士臂缠黑纱，手持花圈，三五成群浩浩荡荡跟随在李大钊灵柩之后，前来参加公葬活动的群众高呼革命口号，高唱国际歌，表示对烈士无尽怀念和对当权者的抗议和示威。这次公葬活动，有上千青年被捕，许多人都被杀害在监狱里。但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吓不倒追求真理和光明的人们。李大钊公葬一年后，北大进步师生又决议为其立碑。刘半农就在这样的白色恐怖下为李大钊夫妇书写墓碣。两块墓碑一直在万安公墓的青松翠柏中矗立了近50年，直至1983年李大钊烈士陵园落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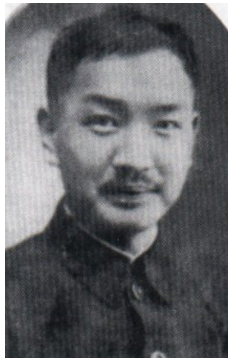


为李大钊送葬

二、痛斥戴传贤

戴传贤(1891~1949)，1891年1月6日（清光绪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六）生于四川广汉，原籍浙江湖州。中华民国时期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原名良弼、传贤，字季陶，笔名天仇。晚号孝园，浙江吴兴人。工书，能画，书宗北魏，画以兰竹为多，偶写山水，亦有韵致。颇得其师刘子泉薪传。

戴传贤 1905 年去日本留学，进法政大学。1909 年回国，任江苏地



戴季陶

方自治研究所教习。后因在上海《中外日报》、《天铎报》撰文抨击清王朝而受通缉，逃往南洋槟榔屿，主办《光华报》，并加入同盟会。1912年回国，在上海创办《民权报》，后任孙中山秘书，并受命进行二次革命的军事联络活动。二次革命失败后逃往日本。1916年随孙中山回国。次年由上海去广东任大元帅府秘书长。“五四”运动时期在上海主编《星期评论》。1920年夏曾参加筹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中途退出。其后同张静江、蒋介石等共同经营交易所的投机生意。1924年到广州，参加国民党“一大”，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

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任中央宣传部长，后任黄埔军校政治部长等职。但他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持反对态度。孙中山逝世后，他在广州支持成立右派组织孙文主义学会，撰写小册子歪曲孙中山的革命学说，散布反对共产党、反对工农运动的言论，并支持和参与西山会议派的反共活动。在北伐战争中，他奔走于南昌、日本、上海之间，为蒋介石寻找国外靠山，准备发动“四·一二”政变。

1928年之后，戴传贤任国民党政府委员、考试院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总司令部政训部长等职，曾多次主持制定和修订考试法规。抗日战争至解放战争期间，任国民政府委员、考试院长等职，长期充当蒋介石的谋士。1948年6月改任国史馆馆长。1949年2月，他看到蒋介石的统治即将崩溃，对前途感到绝望，在广州服安眠药自杀。

1934年5月13日，在《世界日报》上出现了一篇近四千字的杂文，题目叫《南无阿弥陀佛戴传贤》，此文嬉笑怒骂，讽刺挖苦，把这名列国民党五院院长之首的戴传贤骂得狗血喷头。谁这么大胆？刘半农是也！此时的戴传贤，可谓是权倾一方，炙手可热的一品大员，刘半农简直是老虎头上拍苍蝇了！果真，戴传贤一见报纸就大发雷霆，无奈刘半农，便把成舍我主办的《世界日报》停刊了三天。

戴传贤在辅佐蒋介石的同时，还是一个专门从事迷信复古活动的行家。考试院设在南京鸡鸣山下的关帝庙中，门旁设三个号房，如有来客，三号房将你踢来踢去，直踢得你头昏眼花才弄明白，该找哪一位。而走进考试院，那蓝墙蓝瓦蓝门蓝窗，以及处处可见的戴院长手题门匾楹联，

让人不得不捧着小心提着脚跟儿走在一路的肃杀里。

至于戴传贤笃信佛教故事更多了去了。他自称是释迦牟尼佛的虔诚弟子。在办公室旁设一精致佛堂，清闲时就在佛堂诵经。香烟阵阵缭绕于办公室，诵经声声萦绕在考试院。戴传贤还经常在院中接待中外和尚。主客相见，鞠躬的鞠躬合十的合十，很有风景。

“九一八”事变之后戴传贤竟搬来西藏喇嘛教格鲁派的两个活佛，在北京举行“时轮金刚法会”，说是要用佛力扭转华北的劫难。在法会上他高举黄绸大伞，自称“弟子戴传贤”，令看客都不敢相信这是国民政府的考试院院长。戴传贤已经腐朽没落到让人不敢相信的地步了。请看刘半农是如何以笔作刀撕开他的画皮的：

启请：赫赫院长，婆卢羯帝！胡说乱道，上天下地！疯头疯脑，不可一世！那顾旁人，皱眉叹气！南无古老世尊戴传贤菩萨！南无不惭世尊戴传贤菩萨！南无宝贝世尊戴传贤菩萨！

凡是在民国初年读过《民权报》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不对当时的戴天仇先生表示相当的敬意，因为他是武松般勇猛的革命记者，虽然他的文章，用现在的眼光看去，理论也有错误的地方，文笔也有冗长无当的地方，然就全体而论，总比当时流行的徐枕亚的《玉梨魂》小说差胜一筹。不料时间只过了短短的二十年，当时的戴天仇先生竟摇身一变而为今日的戴传贤戴院长，这真是出于我们“意料之外”了。大约因为戴先生是个革命元勋罢，所以国民政府把一个考试院院长位置给了他。我是没有受到过党义教育的人，所以不知道考试院重要到什么地步；然既列为五大院之一，并不比什么时生时灭、巧立名目的委员会，则其重要性也就可想而知。然而我们的戴院长，自从就任以至今日，究竟做了什么事业没有呢？南无阿弥陀佛，天晓得！

把鸡鸣山下的一座关帝庙，改做了一座“考试庙”。

庙门口站岗的武装同志，身上穿的是二十世纪的军服，佩的却是同孔夫子一样古老的宝剑，这就值得叫你捧着肚子暗笑。

.....

当日本人挥刀南下的时候，国民政府在干什么，戴传贤在干什么呢？作者毫不留情地揭露道：

不说戴先生自命为“日本”通的么，不是他做过一部《日本论》的么？当五年前此书出版之时，也曾引起了国内读者的相当的注意；虽然也有许多专门研究日本事务的人把这部书批评得一钱不值，我却还替他愤愤不平：我以为季陶何至于如此，亦许是同行相妒罢。然而，到了九一八以后，以戴先生所处的地位，以戴先生自命为日本通的一块招牌，总该有一篇两篇惊天动地的文字发表才是：若应降，便畅畅快快的主降，若应战，便畅畅快快的主战。这种主张若不为政府所容纳，戴先生便该桂冠而去，以国民资格与政府作文字上及事理上之抗争，甚至为党部开除党籍，为政府下令通辑，亦在所不惜，这才无负于他那一块日本通的招牌，这才无负于他当年武松般的勇气。然而可惜，我们的戴院长竟不肯这样做：他只是浮萍般的，在“长期抵抗”亦即永不抵抗的波浪上飘；岂特飘而已矣，他还进一层，追随着一般愚夫愚妇而自为领袖，希望借着佛力挽回华北的劫运……

嗟夫！吾辈老百姓之渴望于大人先生者，欲其救苦救难也。而戴院长救苦救难之方术不过如此，是直吾家老妈子之流亚耳！

对于国内紧张的形势不闻不问，这些党国的要员坐着飞机飞来飞去在做什么“贵干”呢？

最近，戴院长又奉了中央的命令，坐了飞机到西北去视察了一回。我真有些不明白，为什么在六七年以前，我们几个书呆子声嘶力竭闹着西北的重要，政府诸公竟是充耳不闻；到东北四省丢失之后，西北二字竟变了和南京的板鸭一样时髦，谁都要想见识见识，谁都要想尝尝滋味。大约是因为狐皮袍子被小贼偷去了不得不找件破棉袍御寒罢。呜呼，此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谁谓政府诸公无远见耶？于是乎我们的戴院长坐了飞机挤热闹去矣。他到了西安，就于四月十一日发出一条反对发掘古墓的电报（见四月十三日本报）。这电报自始至终全是对着考古家的发掘古墓说话，对于人民私掘古墓，不过引来做个陪衬。电街中首列“上海中央研究院蔡院长”，其次才是汪院长，王教长，蒋委员长；这是他对于蔡先生的挑战，说得质直些，就是上海人所说的“骂山门”。他以为已往的考古发掘工作，是蔡先生所领导的中央研究院做的，所以他就一把拉住了蔡先生说话，其意若曰：你这蔡老头儿岂有此理！我这戴小头儿可不答应！你是元老，我也是元老；你是院长，我也是院长。来！

咱们俩演个交手罢。蔡老先生虽老，却于此等处不肯示弱；他看你气势汹汹的来，只是拿出他的老工架，不慌不忙的把你教训一顿。结果呢，生公说法，虽未必能令顽石点头，而行政院的议决案，还是依了蔡先生，没有依戴先生（见四月二十五日本报）。

可怜啊！我们的戴先生其将“痛心疾首，呼吁无声，哭泣无泪”而终古乎？且夫考古发掘工作，不自今日始，报章所载，专书所刊，亦即连篇而累牍。戴先生并非昏聩，岂有全不知晓之理，而其电报不发于前，不发于后，不发于平时燕居之余，而发于此番长途劳顿之次，此中原由，亦大可研究。有人说：这一定是戴先生和徐先生抬杠的结果。徐先生者我们的老朋友徐旭生先生是也，现方在西安作考古工作。亦许戴先生驾到，杨虎城设席洗尘，而请徐先生作陪。酒过三巡，徐先生大谈考古，戴先生触动佛心，不免查照平时惯例，正襟危坐的把他那一肚皮妙论大演而特说，徐先生听得不耐烦，也说出他那一股子傻劲，摇头扭颈的和他大抗而特辩，结果是戴先生恼了。好！上海人说得好：“拨点颜色依看看！”于是乎“呼吁无声哭泣无泪”的电报就发出了。这种的揣想，我以为决然合于事实，因为，假使真有这样的一件事，戴先生发电的起因既不明，所取的手段亦未免卑劣，戴先生之“贤”，其尚足“传”乎？戴先生反对考古家的发掘，蔡先生及国内各报纸已加纠正，现在可以不必再谈。

我所要请教戴先生的，只有两点：第一点是戴先生原电中所说的掘墓，只举了“人民之私掘小小无名坟墓”和学术界的“公然掘墓”两种，而对于军阀们的公然发掘大大有名坟墓竟假装不知。冯玉祥在河南，曾设了税局提倡古玩商人刨坟取物；孙殿英曾发掘东陵；最近三五年中北平附近一带的名坟，已为托庇于某人的奸商们发掘将尽，（此某人者，言人人殊，尚未考定，姑不举名。）这都是彰彰在人耳目的事，戴先生不但在当时没有敢说什么话，便在这回的电报中，也竟没有敢附带一笔，戴先生敢向拿笔杆儿的人作难，斯诚勇矣；其不敢得罪有枪同志，殆亦古君子明哲保身之道欤！

第二点：戴先生原电中说：“古代于发掘禁墓者，处以凌迟。现今各省亦有以此刑处之者。”古代有无以凌迟处盗墓的事实，兹且不考，至于“现今各省”，却要请戴先生说个明白：究竟是那几省，那几年，那几件案子？因为这一点关系很重要，以堂堂考试院院长的地位，决不应信

口胡说。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国因为要撤消领事裁判权，近十数年中正努力于司法的改良，普通执行死刑，都是枪决：绞斩且不常见，何况凌迟？而戴先生居然于公电之中传布这种骇人听闻的消息！要是被外国人翻译过去了，从而拈住了这一点，说我们中国的司法，还同欧洲中古时代一样黑暗，这责任戴先生担负得了么？戴先生以一品大员的身分，而如此不顾事实，胡说乱道，要是外国，早引起了议院中的严重的责问了；而在我们贵国，竟不闻中央党部或其他机关因戴先生之“出言失慎”而加以纠正或提出弹劾，这也是咄咄怪事。

现在我们的戴先生已从西北回来了。看中央社四月三十日下午四时所发出的电报，知道那天早晨，国府举行纪念周，戴先生出席报告视察西北的感想，其结语为“本人此次旅行为生平第一次之满足，感到无限欢快，且具无穷希望……”

好极了！戴先生自己也满足了，一向大家以为没有办法的西北，也可以有了无穷的 hopes 了。我们老百姓除感谢戴先生之外，还有什么话说呢？可是，凡是到陕西去旅行的，没一人不知道陕西人之所“痛心疾首，呼吁无声，哭泣无泪”者，是全省没一处不种而且是不得不种，不得不吸的邪片烟，而戴先生报告之中，竟完全没有提到。说是他没有知道这种情形罢，那是糊涂。说是他知道了而不肯说罢，那是蒙蔽。糊涂与蒙蔽，二者必居其一，其为渎视察之职则均，愿戴先生有以自解。

.....

将令全国百姓心不愿为人愿为鬼，戴先生“培国本，厚国力”之功，伟矣盛矣，至矣尽矣，蔑以加矣！戴先生征鞍甫卸，又匆匆的到杭州去主持时轮金刚法会了。孙中山先生致力革命四十年，目的只是要教一大堆俯伏在皇帝脚下的奴隶，站直起来做人。戴先生到了已可站直的时候，却因站得腿酸，仍要跪到班禅脚下去做矮子，这原是戴先生个人的癖好，说得好听些是信仰自由，我们尽可以不理睬。但如戴先生要利用他的地位，使他个人的癖好发扬滋长而遍及于全体民众，那是我们有脑筋的人决不能容忍的。

.....

刘半农的橄文，是给戴传贤“兜头一瓢冷水”，但是这冷水并没有浇醒戴传贤，更浇不醒他服务的那个蒋家王朝，不是吗？一个覆灭了，一

个自杀了，这就是，南无阿弥陀佛戴传贤！

三、不落的星光

刘半农的身体一直很健壮。只是由于常年伏案观测，字斟句酌进行实验语音实验，脊背有些微驼，人到中年心脏也有些弱化。除了1928年去东京出席东方考古会议，他也不大出远门了。1934年6月，他为了撰写《四声新谱》、《方音字典》和《中国方音地图》搜集资料，他决定在暑期携学生白涤洲、沈仲章、周殿福等去绥远、内蒙古一带考察方音民俗。

出发前，刘半农跟大家说：此行大家要做好思想准备，绥远、内蒙地缘辽阔，我们要拿出“扎硬寨，打硬仗”的精神，探索语音学未涉足的领域，新设计的课题必须经科学论证才算完成任务。6月20日，他们去包头、绥西、安北、五原、临河、固阳、萨县、托县等地调查记录方音及声调。并收录民歌七筒。

6月24日对呼和浩特、武川、丰镇、集静、陶林、兴和、清水、凉城等地的方音做了调查，收集歌谣五筒，路过黄河渡口，滔滔浑黄的激流中，突然出现一队队逆流而上的纤夫，他们赤裸着身体，身背着纤绳，浑身汗流浹背，吼着低沉的号子，踩着应律的节奏匍匐前行，刘半农的心灵被这坚强、忍耐、悲怆、苦涩的场景深深震撼。他手持相机不停地拍着，直至胶片用完，他灵机一动，对沈仲章说：“你追上他们，将他们唱的调子记录下来。然后到绥远找我们。”

沈仲章一溜烟追过去了。

正在等船逗留的时候，一只羊皮筏子载着过河的客人驶过来，被湍急的水流冲得晃晃悠悠，众多的破衣烂衫中矗立着一位挎着玲珑小包的时髦女郎，很是显眼，刘半农的幽默劲又来了。他对蒙古学生白涤洲说：有句好诗，“黄河古渡一摩登”。

白涤洲捂着嘴笑：“刘教授你的脑子真是转得太快了！”

等渡的人还有很多，刘半农有点内急了，他对众人说，等就索性再等会儿吧，于是他和白涤洲爬到山坡上去解手。望着脚下青青绿草，浩荡的黄河，头上悠悠蓝天白云，他大声对学生说：“哈哈，痛快：‘高山拉屎去，天地一茅房！’”

白涤洲笑得眼泪都出来了：“先生您别说啦，我要滚到山脚下去啦！”

先生您是名教授您还真的不失童心哦。”

“呵呵，”刘半农笑着说，“人都希望保持一颗童心，其实保持童心何其难。只有用纯洁的眼光看待人生，才会保得住真正的质朴和童真啊。”

7月7日，离大同，抵张家口，他们睡下时已是早晨三点了。只睡了一会儿，一早起来就为考察事宜奔波。到晚上六点，疲惫的刘半农已感不适，但并没在意，只以为是劳累所致。9日，体温升高。第一师范学校知道刘半农来了，坚持请他为学生演讲，无奈抱疾登台，一堂讲座结束。回旅馆体温陡然升高到三十八度五。大家反复劝他休息，不听。与学生继续工作，直到支持不住。请医生诊断，疑为“感冒”。当天晚上，体温升至三十九度五。这才感到情况不妙，赶紧于当晚乘火车返会北京。

一声汽笛的鸣叫，火车终于进了北京站。

三个孩子早已等候在车站，看见父亲，孩子们自然是高兴得欢呼雀跃。刘半农不让他们接近：“别，别，我可能是传染病，孩子们，不要碰我。”开心的孩子们很是扫兴。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把父亲接回家。朱惠看见久违的丈夫，烧红的脸颊，萎顿的神情，便惶恐不安，二弟天华的事情立刻浮现在她眼前。一丝不祥，掠过心头。她安顿好丈夫，说：“这旁边不远有个名医叫施今墨，我去请他！”说完，朱惠风也似的出了门。

施今墨（1881~1969），中医临床家，教育家。毕生致力于中医事业的发展。提倡中西医结合，培养了许多中医人才。长期从事中医临床，治愈了许多疑难重症，创制了许多新成药，献出700个验方。在国内外享有很高声望。

施今墨来了，一番望闻问切之后，刘半农告诉施先生，内蒙是牧区，虱子很多，怀疑是不是给虫子咬了感染了伤寒。施先生肯定地对刘半农说，肯定不是伤寒。但是是什么病，施先生疑惑再三，还是诊断为感冒，给病人开了方药。喝了药，刘半农似乎放心了许多，一身汗一出，体温真的就降了好多。

7月11日，三弟刘北茂为大哥备了好酒好菜为哥哥接风洗尘。刘半农不敢出门，叫朱惠和两个孩子前去，留下小蕙作伴护理。刘氏三兄弟，一直感情亲密，父母去世早，刘半农对两个兄弟关爱有加，而两个兄弟一直视长兄为父。没有大哥参加的接风宴，自然少了情趣，草草吃完饭，

朱惠和孩子们也赶紧回家。

朱惠回到家，看见丈夫又翻出了“新花样”，体温不仅又升高了，而且还不断打呃。小惠害怕地拽着母亲的手，孩子大了，看得出父亲的病有些尴尬，她在为父亲的健康担心，她的心里已经无数遍为父亲做了祷告：父亲快点好起来吧，我跟弟弟妹妹都爱你，妈妈更爱你！你快点好起来吧！

新请的梁医生来了。半农坚持问，是不是伤寒。梁医生也非常明确地否定了伤寒，诊断结果，居然还是感冒。吃过梁医生的药，刘半农的呃逆打得更加厉害。整个人都在不停地震动。

夜深了，孩子们从睡梦中醒来，看见依然陪在父亲榻前的母亲焦急而无助的眼神。听见父亲不断地打呃声和给高烧折磨出的“哼哼”声。懂事的孩子们也翻来覆去不敢入睡。

梁医生被三弟刘北茂等亲朋好友再次请来出诊。梁医生坚持说不是伤寒，是重感冒。体格健壮的刘半农几天下来已经给病魔折磨得脱了形了，脸色蜡黄，双眼充满血丝。憔悴的形象让他仿佛一下子老了许多。

傍晚，刘半农的病情似乎又有些好转，热度稍退，人也舒服点了。他点燃一支烟，但很快就掐灭了。他的潜意识里有种不安的感觉，心里不自觉地拿在欧洲的那次大病比较，似乎这次总有一种难以拿捏的感觉。

夜幕再次降临，病魔仿佛借助黑夜的屏蔽正在消解着病人。第二天，刘半农的病情再度恶化。首善医院的方石珊院长来了，诊断为黄疸病。劝刘半农赶紧入协和医院。而刘半农依然反感那个医院，不肯前去。家人又请来一位德国医生。医生检查完毕就说：“他的心脏太弱了，再工作就要送命了。”一个个医生，一次次没有结论的诊断（或误诊），一个个白昼黑夜，人们看不见，其实刘半农正在一步步离我们远去……

夜，好静啊，静得瘆人。刘半农进入了溟濛，眼睛发花，耳朵也听不清楚，吃过德国医生的药全吐了，而呃逆不止依然如故。他虚幻的意向里一会儿是西横街，一会儿是乡下舅家，一会儿是北大校园，一会儿是欧洲街头。他的身边有孩子们，有朱惠，还有，还有，父亲母亲，二弟天华……

阿彭快来，你又去看井了！

这是母亲的声音。

分明是眼前的事，
可已经过去了……

这是母亲的声音，他的额头不断冒出淋漓大汗，而眼角，流着不知是汗还是泪……他抓住朱惠的手，用微弱的声音说：“惠，天亮去叫我的好朋友，我要写遗嘱，我的力量用完了……”朱惠咬着牙，不敢哭出声来。

7月14日上午十时，刘半农进入北京协和医院抢救，诊断为在内蒙古感染了“回归热”病。回归热是由回归热螺旋体引起的急性虫媒传染病，引起人类发病者有虱传和蜱传回归热螺旋体，我国以南疆及山西等地为主要发病地。易被误诊。本病的典型临床症状为阵发性高热、全身疼痛，肝脾肿大，以及发热期与无热期交替出现。

下午二时十五分，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叱咤风云的刘半农慢慢合上眼睛，一代诗人，一代学者的嘴角轻轻颤动，他，是在吟诵？

用我的血
用我的泪
写在什么上面？
写在嫣红的花上面，
早已春残花落，
写在银光的月上面，
早已乌啼月落。
写在云上面，
……
写在水上面，
……
写在我的泪珠上
用我的血，写在我的血球上。
……

他的脸，突然凝固了一刹那智慧而幽默的微笑……

泪水和悲恸，从刘家所有亲朋好友的喉咙里，山崩地裂般地涌出。

我的心窝和你的，
天与海般密切着；
我的心和你的，
风与水般协和着。
啊……
血般的花，花般的火，
听它罢！
把我的灵魂和你的
给他烧做了飞灰飞化罢！

朱惠眼前一黑，向后倒了下去……



刘半农墓

刘半农年谱

(1891~1934)

1891 年（清光绪十七年 辛卯）1 岁

5 月 27 日（农历四月二十日）出生于江苏江阴西横街（今 49 号）一户清贫的知识分子家庭里。祖籍江苏江阴。祖父刘汉。“国学生，字步阶，号梅卿，生于道光十二年十一月十四日”。“同治三年三月初三日，死于洪杨起义。时年 59 岁。祖母夏氏，年轻守寡，无子嗣。后从本家收养一个孩子，这就是半农的父亲。夏氏靠纺纱织布，供其读书。父刘宝珊。“宝珊，汉嗣子，名玉珂，邑庠生，生于同治九年庚年闰十月十二日”。母蒋氏。蒋氏系“邑乐大桥镇西塘坊圩坤赐公女”，出身贫苦。半农名复，初字半依，后改为半农，原名寿彭，晚号曲庵，世以字行。

1893 年（清光绪十九年 癸巳）3 岁 会唱儿歌

1894 年（清光绪二十年 甲午）4 岁 接受启蒙教育，其父教以识字

1895 年（清光绪二十一年 乙未）5 岁

二弟寿椿生。寿椿后改名天华。

1896 年（清光绪二十二年 丙申）6 岁

入塾就读。已能咏诗作对。

1897 年（清光绪二十三年 丁酉）7 岁

细心观察生活中充满了令他终生难忘的诗情画意：

我是个生长南方的人，所谓“网鱼漉鳖，在河之洲；咀嚼菱藕，拾拾鸡头；蛙羹蚌目，以为膳羞；布袍芒履，倒骑水牛”，正是我小时候最有趣的生活……（1935 年 7 月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半农杂文·二集》）

1898 年（清光绪二十四年 戊戌）8 岁

对绘画发生兴趣。

1901年（清光绪二十七年 辛丑）11岁

入翰墨林小学。江阴县翰墨林小学校，系由其父刘宝珊和杨绳武先生所创办。学习成绩恒列前茅，尤以国文、英语最为出色。

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 癸卯）13岁

7月11日，三弟寿慈生。寿慈后改名北茂。

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 丁未）17岁

入常州府中学堂就读。当时，常州府知府系翰林御史黄步瀛。黄知府“爱好旧文学，常到校出题考试，刘（半农）名列第一，黄捐廉赏给学费1年。又得校长屠元博和各老师的照顾，给予免费的待遇”。

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 戊申）18岁

3月中旬 常州府中学堂游艺间正式成立。游艺部分设图画、雅歌（昆曲）、军乐、柔术（由日本教师教授）、标本、园艺、地图绘制、摄影、手工、拳术、器械操、竞漕、击剑枪刺、篆刻、测量、演说、英语会话等小组。刘半农报名参加了摄影部。

1909年（清宣统元年 己酉）19岁

半农于11月15日参加常州府中学堂建校两周年纪念活动。

1910年（清宣统二年 庚戌）20岁

6月初与朱惠结婚。（朱惠，字蕙英，1888年阴历十一月初五生，比半农大3岁，她精明干练，贤淑有德。1947年1月9日在北京病逝。）

6月19日母卒。

1911年（清宣统三年 辛亥）21岁

3月，半农随全校师生赴无锡旅行，登惠山，朝出而晚归。

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

11月6日常州宣布光复。

常州局势动荡，学校迟迟不能复课，遂肄业于常州府中学堂。

从常州回江阴。受当时江阴县翰墨林小学校长王羽唐先生之聘，暂回母校教书。暇时，他便和吴研因等编辑《江阴》杂志。

1912年（民国元年 壬子）22岁

春，江阴光复前，半农毅然投身革命。因不满于当时革命军队内部的混乱现实，回归江阴。不久去上海开明剧社当编辑。

夏，经徐半梅介绍，兼任上海《中华新报》社馆外特约编辑。

1913年（民国二年 癸丑）23岁

春，上海开明剧社解散。经徐半梅介绍，入中华书局编辑部工作。

8月，在《上海月报》4卷4号发表短篇小说《假发》，署名半依。

10月13日，在上海《时事新报·阿俎》上，发表百字小说《秋声》。该小说内容揭露了张勋部下镇压二次革命、荼毒地方的罪行。获得该栏悬赏第三十三次一等奖。

10月，在《小说月报》4卷6号上发表警世小说《局骗》，署名半依。

11月10日，在上海《时事新报·杂俎》上，发表笑话《西笑译丛四则》，署名半依。

1914年（民国三年 甲寅）24岁

继续在中华书局工作。

3月1日，首次由沈瓶庵编辑的《中华小说界》1卷3期上发表侦探小说《匕首》。发表时，在目录上署名半依。

5月1日，在《中华小说界》1卷5期上发表滑稽小说《黑行囊》，署名半依。同日，在《中华小说界》1卷6期上发表滑稽小说《顽童日记》，署名半依。

7月1日，在《中华小说界》1卷7期上，发表根据丹麦安徒生《皇帝之新衣》改写的滑稽小说《洋迷小影》，署名半依。

8月1日，在《中华小说界》1卷8期上，发表滑稽小说《财奴小影》，署名半依。同期，发表社会小说《伦敦之质肆》，原著者英国狄更斯，译者署名半依。

9月1日，在《中华小说界》1卷9期上发表“谈瀛”《美洲风俗趣谈》，署名半依。

10月1日，在《中华小说界》1卷10期上发表哀情小说《默然》，署名半依。

11月1日，在《中华小说界》1卷11期上，发表醒世小说《咏而归》，署名半依。同期，发表“哀情小说”《此何故耶》。原著者俄国托尔斯泰，译者署名半依。后在《中华小说界》1卷12期连载。

12月5日，在由王钝根编辑的《礼拜六》27期上发表实业小说《橡皮傀儡》。原著者美国 Edward Eggleston，译者署名半依。

12月19日，在《礼拜六》29期上发表实业小说《奉赠一圆》。原著者美国 Fran K11n Conger，译者署名半依。

1915年（民国四年 乙卯）25岁

继续在中华书局工作。

1月1日，在《中华小说界》2卷1期上，发表言情小说《未完工》，署名半依、省吾。

1月2日，在《礼拜六》31期上，发表实事小说《疗妒》，署名半依。

1月27日，其父刘宝珊卒。

1月《中华学生界》月刊创刊。在创刊号上发表短篇小说《终身恨事》，署名半依。

2月1日，在《中华小说界》2卷2期上发表滑稽小说《福尔摩斯大失败》（1—3案），署名半依。同期，发表书信《剧话》。

2月6日，在《礼拜六》36期上发表滑稽小说《哲学家》。原著者美国夸德氏，译者署名半依。

2月27日，在《礼拜六》39期上发表实业小说《幸运之怪物》。原著者系美国 George Jean Nathan，译者署名半依。

3月1日，在《中华小说界》2卷3期上发表滑稽小说《影》，署名半依。

3月，在《中华小说界》第二卷3、4、5期上，连续发表了“家庭小说”《帐中说法》。原著者英国 Douglas Jerrold，译者署名半依。

4月1日在《小说海》1卷4号上发表翻译小说《八月二十》，署名半依。

5月1日在《小说海》1卷5号上发表翻译小说《卑田院客》。原著者法国 Marcel Prevost，译者署名半依。

在《中华小说界》2卷5期上，发表外交小说《烛影当窗》。原著者英国柯南达里，译者半依。

在《中华小说界》2卷5期上，发表哀情小说《悯彼孤子》，署名半农译。

5月，译著“外交小说”《欧陆纵横秘史》，作为小说汇刊第43种，由上海中华书局初版，署名江阴刘半依。

6月1日在《中华小说界》2卷6期上发表言情小说《情悟》，署名海澄、半依。

7月1日在《中华小说界》2卷7期上发表《杜瑾讷夫之名著》，署名半依译。杜瑾讷夫，今译屠格涅夫。

在《中华小说界》2卷7期上初次发表国事小说《黑肩巾》，署名五

天游原译，半依润辞。后又在2卷8~12期、3卷1~6期上连载。

7月31日在《礼拜六》61期上发表滑稽小说《吃河豚》，署名半依。

8月1日在《中华小说界》2卷8期上发表历史小说《英王查理一世喋血记》，署名半依。

9月1日在《中华小说界》2卷9期上发表哲理小说《诛心》，署名半依。

10月1日在《中华小说界》2卷10期上发表哲理小说《希腊拟曲·盗珥》。原著者希腊路珞披端，译者署名半依。

在《小说大观》2集上发表翻译的“政治小说”《玉赞花》。原著者法国W·H·G·C，译者署名半依。同期发表译作“喜剧”《戍癩》。原著者英国陆军副将F·J·Fraser，译者署名半依。

11月1日在《中华小说界》2卷11期上发表翻译的社会小说《如是我闻》。原著者俄国托尔斯泰，译者署名半依。同期，发表“侦探小说”《谈娥》，署名半依。后在2卷12期续载。

12月1日在《中华小说界》2卷12期上发表翻译的“哀情小说”《暮寺钟声》。原著者美国欧文，译者署名半依。

12月30日在《小说大观》4集上发表翻译的侦探小说《一身六表之疑案》。原著者英国柯南达里，译者署名半依。

12月31日在《中华小说界》3卷1期上发表社会小说《我矛我盾》，署名半依。同期，发表“悲剧”《战后》，署名半依。

1916年（民国五年 丙辰）26岁

继续在中华书局工作。

2月1日在《中华小说界》3卷2期上发表历史小说《拿破仑瘐死之翻案》，署名半依。

3月1日在《中华小说界》3卷3期上发表哀情小说《呱呱默默》，署名半依。同期，发表家庭名剧《小伯爵》，署名半依。后在3卷4、5期上连载。同期，发表译作《托尔斯泰之情书》，署名半依。

3月在《小说大观》5集上，发表了翻译的侦探小说《X与O》。原著者英国维廉勒苟，译者署名半依、小青。

春，中华书局同人合译《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负责全书的校阅工作。

4月1日，在《中华小说界》3卷4期上发表《福尔摩斯大失败》（第4案），署名半依。

4月《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由中华书局出版。全书实收44案。原著者英国柯南道尔，由刘半依、严独鹤、程小青、陈小蝶、天虚我生、周瘦鹃、陈霆锐、天侔、常觉、渔火等十人分译。《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后，并附刘半依撰《英国勋士柯南道尔先生小传》。

5月1日在《中华小说界》3卷5期上发表《福尔摩斯大失败》（第5案），署名半依。

在黄山民编辑的《小说海》2卷5号上发表小说《二十六人》，署名半依。作者自注：“是篇为俄国高尔基原著。”

5月在《中华学生界》月刊2卷5期上发表少年小说《立志难》，署名半依。同月，《乾隆英使觐记》一书由中华书局初版。原著者是英国马戛尔尼，译述者刘半依。

6月1日在《中华小说界》3卷6期上发表社会小说《愚民术》。内容包括《国师》和《叶仙》两篇，署名半依。

6月在《小说大观》6集上发表社会小说《塾师》。原著者英国霍桑，译述者半依。同期，发表“宫廷小说”《韩卢忆语》。根据英国《吾主安在》一书翻译，译述者半依。同期，发表“侦探小说”《铜塔》。原著者英国维廉勒荷，由半依、小青合译。

7月1日在《小说海》2卷7号上发表短篇小说《庸人自扰》，署名半依。

9月30日长女小蕙生。小蕙名育厚。

10月1日在《新青年》2卷2期上，首次发表《灵霞馆笔记·爱尔兰爱国诗人》，署名刘半依。

10月在《小说大观》第7集上发表社会小说《柳原学校》。原著者英国柯南达里，译者半依。同期，发表哀情小说《看护妇》。原著者法国MAX O Rell，译者半依。

秋，任上海实业学校和中华铁路学校教员。

11月1日在由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2卷3期上发表本年9月译作于上海的《灵霞馆笔记·欧洲花园》。原著者葡萄牙席尔洼，译者署名刘半依。

在《小说海》2卷11期上发表短篇小说《丹墀血》，署名恺然、半依。

12月1日在《新青年》2卷4期上发表《灵霞馆笔记·拜伦遗事》，署名刘半依。以后收入《半农杂文》第一册时，改名《拜伦家书》。

在《小说海》2卷12期上发表短篇小说《日光杀人案》，署名半依、舍我。同期发表短篇小说《兄弟侦探》。署名无为、半依。

12月在《小说大观》8集上发表侦探小说《髯侠复仇记》。原著者美国 Norman Mnnro，译者署名半依。

本年，由于中华书局发生财政危机，辞去编辑工作。曾在上海的一位朋友家里，会见近代文学家苏曼殊（1884—1918），谈文论诗，后来半农又与他通过三次信。（《悼曼殊》，1918年12月《新青年》5卷6号）

1917年（民国六年 丁巳）27岁

1月5日在《小说海》3卷1期上发表小说《女侦探》，署名半依。

1月由包天笑、钱病鹤编辑的《小说画报》月刊创刊。在该刊创刊号上发表小说《歇浦陆沉记》，署名半依。后在该刊2~5期上连载。

2月1日，在《新青年》2卷6期上。发表《灵霞馆笔记·阿尔萨斯之重光》，署名刘半依。文内尚收有法国李塞尔作词、刘半依译词的《马赛曲》。

2月5日在《小说海》3卷2期上发表短篇小说《失魂药》，署名半依。

2月12日在上海《时事新报·报余丛载》上发表《卧佛寺游记》，署名半依。后在20日续载。

2月25日在《小说月报》8卷2期上发表寓言《交谪》，译者署名半依。

2月《小说画报》2期上发表短篇小说《催租鬼》，署名半依。

在《小说时报》30期上发表刺世小说《文明》。本篇为“英国著名滑稽杂志《Punch》之记者所撰”，译者署名半依。

3月25日，在《小说月报》8卷3期上发表寓言《钱虏之言》。原著者日本式亭三马，译者署名半依。同期，发表寓言《万国去各簋会》。原著为英国维廉勒荷，译者署名半依。

3月在《小说画报》3期上发表短篇小说《可怜之少年》，署名半依起稿、天笑修词。

4月1日在《新青年》3卷2期上发表《灵霞馆笔记·咏花诗》，署名刘半依。文内收有他翻译的英国瓦雷氏作《寄赠玫瑰四章》、英国摩亚作《最后之玫瑰三章》、英国拜伦作《哀尔伯紫罗兰三章》、陶德作《同情一首》、无名氏作《不忘我三首》、史密司作《颂花诗十五首》。

4月5日在《小说海》3卷4期上发表短篇小说《最后之跳舞》，署名半依。

4月25日在《小说月报》8卷4期上发表寓言《新闻电稿》，署名半依。同期，发表寓言《村长女》，署名半依。

4月，在国华书局出版侦探小说《猫探》。原著者美国梅丽维勤，刘半依译述。同期，在《小说画报》4期上发表短篇小说《奴才》，署名半依。

5月1日在《新青年》3卷3期上发表《我之文学改良观》，署名刘半依。

6月1日在《新青年》3卷4期上，发表短剧《琴魂》。原著者英国梅理尔，刘半依译述。同期，发表《灵霞笔记·缝衣曲》。原著者英国虎特，署名半依译。

6月30日在《小说大观》10集上发表社会小说《卖花女侠》。原著者法国耶米曹拉，署名江阴刘复半依译。

7月1日在《新青年》3卷5期上发表《诗与精神上之革新》，署名刘半依。

8月1日在《新青年》3卷6期上发表《灵霞馆笔记·倍那儿》，署名刘半依。

8月25日在《小说月报》8卷8期上发表小说《稗史罪言》，署名半依。夏，受蔡元培之邀，出任国立北京大学预科国文教员。

9月5日在《小说海》3卷9期上发表短篇小说《地图与珠》，署名舍我、半依。

10月16日致书钱玄同。表示了对文学革命的极大热情。

11月18日致书钱玄同，讨论新文学和今韵问题。

11月在《小说时报》33号上发表短篇小说《恶作剧》，署名半依、无为。

12月11日出席北大国文门研究所国语部与国语研究会联合召开的国语讨论会。北大方面出席的还有蔡元培、沈尹默、钱玄同、朱逖先、胡适之；国语研究会方面出席的有黎锦熙、陈颂平等。

12月25日，出席北京大学国文门研究所第一次小说科研究会并讲演。到会的教员还有周作人。到会的研究员为袁振英、崔龙文。在讲演中，他强调要用历史的、系统的、比较的方法研究小说。

12月25日在《小说月报》8卷12期上发表小说《猫之圣诞》。原著者英国 Ella Higginson，半依译。

12月28日出席北京大学国文门研究所第二次小说科研究会并发言。

12月，作新诗《其实……》于北京，后收在《扬鞭集》上卷。作新诗《案头》于北京，后收在《扬鞭集》上卷。初与蔡元培、钱玄同、周作人、胡适之等人相识。担任北京大学预科一年级（丙班）国文教员，兼理预科一年级（丁班）国文教员和三年级（乙班）小说科教员。

1918年（民国七年 戊午）28岁

1月15日《新青年》编辑部由上海迁至北京，编辑部改组。刘半农参与编辑工作。4卷1期出版，从该期起“完全用白话做文章”。在《新青年》4卷1期上发表新诗《相隔一层纸》和《题女儿小惠周岁日造像》。同期，发表论文《应用文之教授》时，他首次在署名上改“半依”为“半农”。同期，发表与钱玄同的通信《新文学与今韵问题》。

1月18日出席北京大学国文门研究所第三次小说科研究会，并在会上做了题为《通俗小说之积极教训与消极教训》的演讲。该文于同年7月15日发表在《太平洋》杂志1卷10期，署名刘复。

2月1日在《北京大学日刊》上登载《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后在《新青年》4卷3期上转载。同日，出席北京大学国文门研究所第四次小说科研究会。

2月10日旧历除夕。赴鲁迅寓所拜访。后在同年3月15日《新青年》4卷3期上发表《除夕》一诗，回忆了这次欢聚。

2月15日在《新青年》4卷2期上发表新诗《车毯》。署名刘半依。同期，发表《游香山纪事诗》。1917年8月作于江阴。初收在《扬鞭集》上卷。署名刘半依。同期，发表悲剧《天明》。原著者英国P·L·Wilde，1918年1月刘半依译于北京。同日，作诗《拟古二》于北京。初收《扬鞭集》上卷。

3月15日在《新青年》4卷3号上发表《复王敬轩书》，署名刘半依。初收在1934年4月上海光明书局版张若英编《中国新文学运动史资料》。后收入《半农杂文》第一册，改题《奉答王敬轩先生》。该文是在《文学革命之反响》的总标题下，由钱玄同托名“王敬轩”，发表了一封反对文学革命、为封建旧文学辩护的《给新青年编者的一封信》，而后由刘半农以记者名义复信的。在《复王敬轩书》中，刘半农嬉笑怒骂、条分缕析，先对他“大放厥词”深表“感谢”。接着，以来信的八个部分为靶子。逐一进行批驳。最后，还针对王敬轩来信中的错字、别句和语句不通之处，一一指出并极尽嘲讽。钱玄同、刘半农演的这一出“双簧

戏”，是新旧文学论争中的著名事件，它有力地推动了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开展，也表现了新文学家们的坚定态度和战斗精神。同日下午，在北京大学国文门研究所演讲小说。

3月29日下午四时至五时半，出席北京大学文科国文门研究所小说科第五次研究会，并在会上做了题为《中国之下等小说》的演讲。该演讲文章后载同年5月21~31日，6月1、3、4日《北京大学日刊》，署名刘复。文中他依据多年搜集的二百多种小说进行了综合研究。

4月5日晚上，与钱玄同共往鲁迅寓所造访。

4月15日在《新青年》4卷4期上发表新诗《灵魂》，署名刘半农。同期，发表新诗《学徒苦》，署名刘半农。初收在《扬鞭集》上卷。同期，《新青年》首设“随感录”专栏。他发表了用白话撰写的《随感录·七》。

4月19日下午四时至六时，出席北京大学文科国文门研究所小说科第六次研究会。从该日起至5月3日止，和周启明、胡适之一起在北京大学国文研究所教授小说。

5月15日在《新青年》第4卷5期上，发表译诗《我行雪中》。为“印度 Ratan Devi 所唱歌，刘半农译”。同期，发表新诗《读萝卜人》、《三月二十四夜听雨》，署名刘半农。同期还发表杂文《斥灵学丛志》，署名刘半农。

5月17日下午，在北京大学国文研究所讲演小说。出席者还有周启明、胡适之等人。

5月20日完成了选编近世歌谣的工作。即日起，直至1919年5月22日，连续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了他编订、注释的歌谣148首，开创了中国现代民歌搜集、研究的新局面。

5月，北京大学上报教育部，请派刘复去欧洲学习语言学。后因工作关系，决定暂缓派一年。

6月15日在《新青年》4卷6期上发表书信《新文学及中国旧剧》，署名刘半农。同期有署名“崇拜王敬轩者”，发表《讨论学理之自由权》。

7月15日在《新青年》5卷1期上发表新诗《窗纸》，署名刘半农。同期，发表新诗《无聊》，署名刘半农。同期还发表杂文《随感录·十五》，署名半农。

7月16日教育部下达第286号训令，准其留校一年后再赴欧留学。

7月30日加入蔡元培等人在北京大学发起的“进德会”。具名恪守

“进德会”的三条基本戒律：“不嫖、不赌、不纳妾。”同日，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越谚序录》，署名刘复。

8月6日下午，与钱玄同共访鲁迅。

8月15日在《新青年》5卷2期上发表新诗《晓》，署名刘半农。同期，发表译诗《TAGORE 诗二章》，同期还发表杂文《南归寻话》及通信《今之所谓“评剧家”》，署名均为刘半农。同期，周作人发表译文《改革》。周氏在“按语”中透露：半农想造一个“她”字，和“他”字并用。

9月15日在《新青年》5卷3期发表译诗《海滨五首》（原作者印度泰戈尔）、《同情二首》（原作者印度泰戈尔）、《村歌二首》（原作者印度奈都夫人）、《海德辣跋市五首》（原作者为印度奈都夫人）、《倚楼三首》（原作者印度奈都夫人）、《狗》（原作者俄国屠格涅夫）、《访员》（原作者俄国屠格涅夫）、通信《对于（新青年）之意见种种的回信》，以上均署名刘半农。

9月开学后任北大文科二年级和三年级的文法课。

11月15日在《新青年》5卷5期发表杂文《作操主义》，署名刘半农。

11月19日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刘复启事》，征求胡以鲁先生《言语学》改订完善本。

11月22日在《北京大学日刊》256号上发表《答常惠君论歌谣选》，署名刘复。

11月25日在《北京大学日刊》258号上发表《答罗家伦书》，署名刘复。

12月7日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刘复启事》，征订江阴南菁书院刊行之《皇清经解读编》和《南菁丛书》。

12月15日为沈尹默代编的《新青年》第5卷第6号出刊。在该期上发表新诗《悼曼殊》，署名刘半农。同期，发表杂文《答Y、Z君》，署名刘半农。

12月22日设宴于东安市场中兴茶楼邀请鲁迅、周作人、徐悲鸿、钱秣陵、沈士完、君默、钱玄同等人同饮。晚十时方散。后徐悲鸿曾赠画。

本年，作新诗《大风》、《沸热》，初收在《扬鞭集》上卷。

1919年（民国八年 己未）29岁

1月7日夜，与钱玄同共访鲁迅。

1月12日下午，访鲁迅。

1月15日在《新青年》6卷1期发表《什么话》，署名刘半农。

1月24日晚，访鲁迅。

2月4日晚，访鲁迅。

2月25日北京大学推刘复、朱希祖、马裕藻、胡适之、钱玄同、周作人为“国语统一筹备会”会员。

2月27日在《北京大学日刊》第319号上，发表《刘教授复沈教授之函》，署名刘复。

2月在《北京大学月刊》1卷2号上发表论文《居庸关刻石辨文》，署名刘复。

3月9日在北京大学学术讲演会上，做《歌谣之科学的研究》报告。

4月15日在《太平洋》第1卷第11号上，发表译文《哲学家》。Rollo Peters原著，刘复重译。

4月21日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在北京召开成立大会。教育部指定张一麟为会长，吴稚晖、袁希涛为副会长。会员有刘复等35人。

4月23日在“国语统一筹备会”上，刘复与胡适、周作人、马裕藻、钱玄同、朱希祖等6人联名提出由刘复拟定的《国语统一进行方法的议案》并《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经大会议决通过。

4月在《北京大学月刊》1卷4号上发表《国语统一进行方法议案》。

5月4日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在“五四”运动中，“他坐守北大指挥部”。本日，往访鲁迅先生，转交丸善寄来的书籍两册。

5月18日上午，访鲁迅。

6月3日在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的领导下，爆发了更大规模的爱国斗争。军阀政府逮捕了学生千余人。北大法科的8名学生，因到中央公园散发爱国传单，也被拘。下午，刘半农与周作人、陈百年、王星拱等人赶到北大三院，慰问被捕学生，他们自称是北大代表，但在入口处，却遭到反动军警拒绝。

6月4日为声援被捕学生，身为北京大学教授会干事负责人的刘半农，执笔起草了《致本校全体教职员诸君函》，由他和钱玄同、沈尹默等20人署名，发表在本日《北京大学日刊》上。下午，参加北大教职员全体紧急大会，商讨救援被捕的学生。

6月5日出席北大教授临时会议，为该会干事负责人。讨论挽留蔡

元培继续担任北大校长职务和应付“六三”紧急事件诸事宜。

6月12日陈独秀在东安市场散发传单时被捕。

7月10日鲁迅托刘半农带去孔德学校捐款。

7月13日在《每周评论》30号上发表仿儿歌体诗《云》，署名寒星。

7月20日在《每周评论》31号上发表拟儿歌《羊肉店》。

8月2日教育部发出训令（293号）：刘复“留校现已一年期满”，该员本年是否定期出发，仰即迅速据实呈复，以凭核办。

8月，回江阴。途中，在锡澄运河上从船夫口中采录了《江阴船歌》20首。月底返北京。

9月21日在《新生活》5期上发表印度寓言《虎与牲鹿与鳄鱼》、《狗与狼与月》，署名刘复。同期，发表新诗《落叶》，署名寒星。

秋，作新诗《中秋》，初收在《扬鞭集》上卷。

10月6日出席北京大学国文教授会。会上议决了组织教员会事宜。

10月15日出席北京大学国文研究所研究会，讨论语典总编辑沈兼士提出的《语典编撰大旨》。出席会议的还有钱玄同、周作人、沈尹默等11人。

10月30日在《新潮》2卷1期上发表新诗《E弦》、《老牛》、《铁匠》，署名寒星。同期，发表书信《写给MR·G·G·Willaws的一封信》，署名寒星。

10月作新诗《民国八年的国庆》、《卖菜》。初收在《扬鞭集》上卷。

11月刘复与钱玄同、马裕藻、周作人、朱希祖、胡适之等人修正《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案》（修正案）。

本月，北洋政府教育部正式公布注音字母。

11月10日在《新青年》6卷6期上发表新诗《D——!》，就陈独秀被捕一事怒斥凶残的敌人。同期，还发表了新诗《他们的天平》、《烟》，署名刘半农。

11月23日下午，刘半农与沈尹默、陈百年、朱逖先、钱稻荪、马幼渔同访鲁迅。

12月1日因准备赴欧留学，即日起停授文法课。

12月17日上午，北京大学在法科大礼堂召开校庆22周年纪念会。会上，行将赴欧留学的刘半农登台演讲。

12月20日在北京《晨报·副刊》上发表《留别北大学子的演说》。

本年，兼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本科教席。专著《中国文法通论》由北大出版组印行。翌年8月改由群益书社出版。

1920年（民国九年 庚申）30岁

1月1日在《新青年》7卷2期上发表新诗《小湖》、《桂》，署名刘半农。

1月初国语统一筹备举行第二次大会，成立国语辞典委员会。被推举为国语辞典委员会委员之一。偕夫人朱惠和长女惠从北京启程赴欧。1月20日赴欧途中抵上海。在上海曾做《言语之成立与存在》的演讲。在上海《时事新报·学灯》上发表《言语之成立与存在》一文，署名刘半农。

1月27日在上海致书周作人，设想编《近代文艺丛书》，拟请鲁迅为编辑和主要撰稿者的宴会，席间议论了“鸳鸯派”诸问题。

2月7日自上海乘日轮“贺茂丸”号二等舱，携眷赴欧。

3月16日从法国马赛登岸，旅赴巴黎。

3月17日到达英国伦敦。

3月27日作新诗《拟装木脚者语》。初收在《扬鞭集》上卷。

4月1日在《新青年》7卷5期上发表新诗《敲冰》，署名刘半农。这是一首洋溢“五四”时期革新者勇猛进击精神的好诗。

4月9日致书蔡元培，表述了自己的求学宗旨。

4月30日在《学艺》2卷1号上，发表翻译小说《人的生活》。Maxim Gorky原著，刘复重译。

4月作诗《猫狗》、《血》。初收在《扬鞭集》上卷。

5月3日寄给鲁迅一张明信片，表示了对老友的怀念。

5月18日作诗《一个失路归来的小孩》。

5月24日在《北京大学日刊》615号上发表《刘复教授自伦敦致蔡校长书》。阐述了自己留学欧洲的行程、学习的计划，并表示了对老友的怀念。

5月26日《对于改良北京大学图书馆的意见》写讫。

6月6日作诗《三十初度》。初收在《扬鞭集》上卷。

6月23日作诗《稿子》。初收在《扬鞭集》上卷。

7月28日在《北京大学日刊》671号上发表《对于改良北京图书馆的意见》，后续载于29、30日的672、673号，署名刘复。

7月作新诗《夜》于伦敦。初收在《扬鞭集》上卷。

8月1日男刘育伦、次女刘育敦孪生于伦敦。

8月6日作散文诗《雨》于伦敦。初收在《扬鞭集》上卷。

8月9日在上海《时事新报·学灯》副刊发表《“她”字问题》，首创“她”、“它”二字，作为第三人称女性和无生物代词。在发表这篇文章前后，因“她”字问题曾引起激烈的争论。

8月11日作新诗《爱它·害它·成功！》初收在《扬鞭集》上卷。

8月16日作散文诗《静》于伦敦。初收在《扬鞭集》上卷。

9月4日作歌词《教我如何不想她》于伦敦。诗人还首次将“她”字运用到该词中。后来，该词由赵元任谱曲，经年传唱，至今不衰。

10月1日作新诗《牧羊儿的悲哀》、《登香港太平山》、《地中海》，署名刘复。

本年入英国伦敦大学语音实验室工作。冬，北京大学成立“歌谣研究会”，由沈兼士、周作人等主持。刘半农表示赞赏。

1921年（民国十年 辛酉）31岁

1月1日，作新诗《一九二一年元旦》，初收在《扬鞭集》中卷。

3月10日作新诗《在一家印度饭店里》于伦敦。该诗初收在《扬鞭集》中卷。

3月20日译讫长诗《十二个》，寄周启明，托他在国内发表，并写长信一封，谈及对于译诗的一些见解。

3月23日作《歌》（“没有不爱美丽的花”）于伦敦。

5月1日在《新青年》9卷1号上发表新诗《伦敦》，署名刘半农。自注：“一首昏乱的诗！”

5月20日编成民歌专集《瓦釜集》。作《寄〈瓦釜集〉稿与周启明》，后改题《〈瓦釜集〉代自叙》，收在《瓦釜集》。

6月从英国伦敦“转赴法兰西，入巴黎大学，兼在法兰西学院（College de France）听讲”。

7月16日作新诗《耻辱的门》于巴黎。初收在《扬鞭集》中卷。

8月1日在《新青年》9卷34号上发表新诗《奶娘》、《一个小农家的暮》、《稻棚》、《回声》，署名刘复。同期，发表译诗《夏天的黎明》。署名刘复译，Wilfred Wilson Gibson原作。

8月9日鲁迅将刘半农的一篇译稿转寄沈雁冰。

8月30日鲁迅将刘半农的两篇文章转寄陈独秀。

9月5日作新诗《卖乐谱》于巴黎。初收在《扬鞭集》中卷。

9月15日作《创设中国语音学实验室的计划书》，寄蔡元培。寄信胡适。请胡适促成创设中国语音学实验室的计划，并谈及他当时在法的生活情景。作新诗《战败了归来》于巴黎。初收在《扬鞭集》中卷。

9月20日作新诗《秋天》于巴黎，初收在《扬鞭集》中卷。

9月23日作新诗《两个失败的化学家》于巴黎，初收在《扬鞭集》中卷。

10月1日作新诗《老木匠》于巴黎。初收在《扬鞭集》中卷。

10月5日作新诗《织布》于巴黎，初收在《扬鞭集》中卷。

10月15日作新诗《荒郊》于巴黎，初收在《扬鞭集》中卷。

11月10日在《小说月报》112卷11号上发表译诗《王尔德散文诗五首》，署名刘复译。

11月16日在《北京大学日刊》第893号上发表《提议创设中国语音学实验室计划书》，署名刘复。对该室创建后的归属、组成、经费、调查、收蓄、分析、解释、发表、应用、置购等方面，都做了极为详尽的规划和说明。

本年加入文学研究会。

1922年（民国十一年 壬戌）32岁

继续在法国巴黎学习。

1月1日在《诗》1卷1期上发表新诗《梦中作》、《我们俩》、《巴黎的秋夜》、《小诗》三首，即《许多的琴弦》、《酷虐的冻与饿》、《眼泪啊》。同期还发表新诗《母的心》，均署名刘复，收在《扬鞭集》中卷。

3月22日在《北京大学日刊》第988号上发表论文《国语问题中一个大争点》。又载于同年3月27日的《晨报·副镌》，署名刘复。

3月致信钱玄同，讨论语言教育中的四声问题。

春，为进行学术考察，曾去德国柏林搜集资料和学习3个多月。

4月20日在《北京大学日刊》第1005号上发表《刘复教授致校长函》，署名刘复。他恳请蔡元培代呈教育部，“请准延期半年……至十二年年底止”，以便在欧全面地研究实验语音学。

4月27日~30日在《晨报·副镌》上连载《四声实验录提要》，署名刘复。

夏，撰《四声实验录·序赘》。初收在《四声实验录》，又收入《半农杂文》第一册。

8月作新诗《诗神》，初收在《扬鞭集》中卷。

9月9日在《北京大学日刊》第1072号上发表《刘复教授致校长函》，署名刘复。他在信中就北大建立语音学实验室一事，恳请蔡元培再在校务会议上讨论一次，以切实创立。

冬，经巴黎大学之特种试验，许应法国国家文学博士试。本年，曾着手起草《语音学纲要》一书，拟上编为应用语音学，下编为实验语音学，后未成，亦未再提及此书。作《南方语中的清浊音》一文。后来，因想把南方清浊和北京阴阳合论，重新进行增改，遂搁置。

1923年（民国十年 癸亥）33岁

继续在法国巴黎学习。

4月，作新诗《三十三岁了》于巴黎。初收在《扬鞭集》中卷。

6月11日，作新诗《江南春暮怨词》于巴黎。初收在《扬鞭集》中卷。

6月23日，作散文诗《巴黎的菜市上》于巴黎，初收在《扬鞭集》中卷。

6月24日，在北京大学《歌谣》周刊24号上发表《江阴船歌》20首，署名刘半农。此系诗人1918年8月采集。初收在《瓦釜集》。

7月6日作新诗《别再说……》于巴黎。后载1924年4月《文学周报》第118号，署名刘复。初收在《扬鞭集》中卷。发表时题名为《七月六日》。

7月8日，作新诗《忆江南》于巴黎，初收在《扬鞭集》中卷。

7月9日在《晨报·副镌》上发表新诗《柏林》、《写所见》，署名刘复。

7月23日，作新诗《秧歌》于巴黎，初收在《扬鞭集》中卷。

7月29日，作新诗《记画》于巴黎，初收在《扬鞭集》中卷。

7月在国立北京大学《国学季刊》1卷3号上发表两篇论文：《实验四声变化之一例》、《守温三十六字母排列法之研究》，均署名刘复。

8月5日，作新诗《母亲》于巴黎，初收在《扬鞭集》中卷。

9月16日在《晨报·副镌》上发表了新诗《情歌》，署名刘复，初收在《扬鞭集》上卷。收集时，改题为《教我如何不想她》。

9月23日，在北京大学《歌谣》周刊第25号上发表《海外的中国民歌》，署名刘复，该文初收在《半农杂文》第一册。

10月22日，撰《中国文法通论·四版附言》于巴黎。初收在1923年上海群益书社四版《中国文法通论》。

10月，作散文诗《熊》于巴黎，初收在《扬鞭集》中卷。

12月22日，通过沈雁冰，致书吴立模，将自己抄录的有关《五更调》的资料送给他，供吴研究之用。

本年，在《国语月刊》1卷12期上发表论文《实验部四字母之结果》，署名刘复。为撰写《汉语字声实验录》准备材料，进行实验。在巴黎国家图书馆抄录该馆所藏我国敦煌写本中有关文学、语言、历史等方面的珍贵资料，时约半年。

1924年（民国十三年 甲子）34岁

继续在法国巴黎学习。

1月8日，写《致沈兼士、周作人、常维钧三先生的信》于巴黎。后载同年3月23日北京大学《歌谣》周刊第48号，署名刘复。

3月，专著《四声实验录》由上海群益书社出版，署名刘复。内收《四声实验录·序幕》，该书由蔡元培封面题签。这是作者运用近代实验语音学的仪器和方法研究汉语四声的一部学术著作。此书一出，破除了自齐梁间沈约创四声说以来，一千五百年间在四声解释上的层层疑云，给了四声以科学的说明，在我国音韵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4月14日在《文学周报》第117号上发表新诗《等着》、《我意思不起来了》、《赤裸裸的话》、《劫》、《病中与病后》，均署名刘复，初收在《扬鞭集》中卷。

4月21日，在《文学周报》第118号上发表新诗《梦》、《在墨蓝的海洋深处》、《夜》、《七月六日》，均署名刘复，初收在《扬鞭集》中卷。

5月8日，作新诗《面包与盐》，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

5月作《三唉歌》于巴黎。初收在《扬鞭集》中卷。

12月6日法国巴黎语言学会召开常委会，经巴黎学院院长贝尔诺提名，刘半农被吸收为该会会员。

1925年（民国十四年 乙丑）35岁

继续在法国巴黎学习。

1月2日将自己敦煌写本中搜集的《孟姜女小唱》，抄寄颀刚，供其研究。

2月20日，在《北京大学日刊》第1627号上发表《刘半农研究所国学门主任函》，署名刘复。

3月1日，在北京大学《歌谣》周刊第80号上发表通信《太平天国

时代的民歌》，署名刘复。

3月2日，在《语丝》第16期上发表杂文《徐志摩先生的耳朵》，署名刘复。

3月9日，在《语丝》第17期上发表新诗《看井》，署名刘半农。

3月17日，进行博士学位答辩。下午1时，他以《汉语字声实验录》和《国语运动史》两篇论文，以及自行设计、制作的测音仪器“音高推断尺”和“刘氏音鼓甲种”，参加法国国家文学博士学位答辩。答辩结果，被授予法国国家文学博士学位，并获光荣之考语。其论文《汉语字声实验录》，被列为巴黎大学语音学院丛书之一。

4月15日，据《法国最高文艺学院公报》宣布：《汉语字声 Volney》。

5月23日，在《时事新报·学灯》副刊上发表论文《国语运动略史提要》，后又载于同年6月1日《晨报·副刊》第120期，署名刘复。

5月25日，在《时事新报·学灯》副刊上发表《汉语字声实验录提要》，后又载于同年5月28、29日《晨报·副刊》第118、119期，署名刘复。

6月，离巴黎，携带大批研究语音学院的最新仪器，暨夫人和子女，共赵元任夫妇一起，搭乘法轮“Porthos”号由马赛启程回国。

同月19日，在马赛作《敦煌掇琐序目》。

7月3日~8月7日，归程中航行海上。做《归程中得小诗五首》。初收在《扬鞭集》中卷。

8月7日抵上海。

8月8日，拜望上海群益书社主任陈芝寿先生，并向陈谈起有编辑一部中等字典的意思。应上海亚东图书馆之邀，为花也怜依所撰《海上花列传》一书校阅清样。

9月上旬，从上海回到北京。复任北京大学国文系教授，并兼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导师。还兼任中法大学讲师。积极筹建北京大学音乐律实验室。积极筹备编写一部《中小字典》。

9月16日，和北京几位研究音韵的学者一起在赵元任家聚餐。席间，刘半农提议发起“数人会”。“数人”者，源出一千三百七十年前隋朝语言学者陆法言之《切韵序》。

10月1日，在《京报·副刊》第286号上发表《小诗两首：记老友申无量先生语》，署名刘复。该诗同年9月28日作于北京。

10月17日，“数人会”召开第二次会议。刘半农任主席。

10月18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举行第三次恳亲会。假北海公园濠洽濮间举行。沈兼士先生主持。与会者共39人。会上刘半农发表了《我的求学经过及将来》的演说。

10月19日，在《语丝》第49期上发表《小诗五首》，署名半农。该诗1929年10月9日作于北京。初收在《扬鞭集》中卷。

10月26日，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3期上发表论文《敦煌掇琐序目》，署名刘复。该文1925年6月19日写于马赛。

10月，作《小诗三首》于北京，初收在《扬鞭集》中卷。

11月4日，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4期发表《我的求学经过及将来工作》，署名刘复。

11月21日，在《孔德学校旬刊》第17期上发表读后感《齐伦君的〈雨中幻想〉》，署名刘复。

11月25日，上午10时，国语运动大会总筹备处召开成立大会。筹备处设在上海西藏路平乐里98号“书业商会”。由蔡元培、张一麟、吴敬恒分任正、副会长。刘复等12人任会董。

冬，回江阴。在江阴采集了短歌三四十首，长歌两首。

本年，在北京大学继续讲授语音学。编著《敦煌掇琐》一书，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作为专刊之二，出版署名刘复。专著《汉语声实验录》（法文）作为法国巴黎大学语音学院丛书之一种在法国初版，署名刘复。专著《国语运动略史》（法文）在巴黎初版，署名刘复。

1926年（民国十年 丙寅）36岁

1月10日，晚，到女师大访鲁迅。

1月11日，在《语丝》第61期上，发表杂文《悼“快绝一世的徐树铮将军”》，署名刘复，该文1925年除夕写于北京。初收在《半农杂文》第1册。

1月25日，在《语丝》第63期上发表杂文《骂瞎了眼的文学史家》，署名刘复。初收在《半农杂文》第1册。同期，署名“爱管闲事”者，发表《刘复博士订正中国现代文学史冤狱图表》；林语堂发表《写在刘复博士文章及“爱管闲事”图表的后面》。这篇杂文，声势逼人，把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了北洋军阀的“巴儿狗”、“现代评论派”干将陈源（西滢）。

1月30日，陈源（西滢）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两封《致半农》。质问刘半农，尤其对“阿哥的妹妹拟”一句，表示不满，认为这是刘半

农“无缘无故的欺负一个弱女子”。同期，刘半农发表《致通伯》，驳斥陈通伯（即陈源、西滢）的谬论。

2月1日，在《语丝》第64期上发表杂文《奉答陈通伯先生——兼答SSS君及其前辈》，署名刘复。

2月2日，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2卷17期上发表论文《琵琶及他种弦乐器之“等律”定“品”法》，署名刘复。该文1926年1月15日写于北京。

2月15日，在《语丝》第66期上发表散文诗《饿》，署名刘复。初收在《扬鞭集》上卷。

2月22日，在《语丝》第97期上发表“闲谈之一”《几首道光年间的小曲的开场》，署名刘复。

3月1日，在《语丝》第68期上发表《旧体诗二首》署名刘复。

3月5日，在《京报·副刊》第429号上发表《疯人的诗》，署名刘复。

3月7日晚，在家中宴请鲁迅、张凤举、李玄伯、陈百年、林语堂等人。

3月8日，在《语丝》第69期上发表“闲谈之二”《马健忠上李鸿章书》，署名刘复。

3月15日，在《语丝》第70期上发表《扬鞭集·自序》，署名刘复。初收在《扬鞭集》上卷。该序1926年3月3日写于北京。这本诗集是他将“十年以来所做所译的诗歌小品，删存若干首，按时期先后编为一集，即用第一首诗第一二两字定名为“‘扬鞭’”。

3月18日，北京群众数千人，为抗议日本帝国主义干涉我国内政及炮击大沽，赴段祺瑞“执政府”请愿，段部开枪镇压，死47人（其中有刘和珍等），伤200余人。是为“三·一八”惨案。当晚，刘半农义愤填膺，作“敬献于死于是日者之灵”的战斗诗歌《呜呼三月一十八》，表示了他对牺牲者的敬悼之意和对当权者的愤慨之情。

3月22日，在《语丝》第71期上他化名“范奴冬女士”，公开发表《呜呼三月一十八》，诗歌以悲愤的激情祭奠牺牲者，声讨卖国贼。

4月5日，在《语丝》第73期上发表《重印〈何典〉序》，署名刘半农。初收在1926年6月刘复标点重印《何典》。4月12日，在《语丝》第75期上发表《瓦釜集·代自序》署名刘复。

4月26日，在《语丝》第76期上，发表《手攀杨柳望情哥词·小

序》，署名刘复。初收在《瓦釜集》。同期，发表译诗《莪默诗八首》，署名刘复。

4月，民歌体诗歌专集《瓦釜集》，由北京北新书局出版，署名刘半农。该诗集封面题字钱玄同，选器马叔平，制篆陈万里，序歌周作人。

5月3日，在《语丝》第77期上发表译诗《国外民歌二首》，署名刘复。一为“高丽民歌”，一为“鞑靼民歌”。

5月10日，在《语丝》第78期上发表论文《一个极笨极笨的索引法》，署名刘复。

5月17日，在《语丝》第79期上发表译诗《为的是我要上巴黎去》。署名为法国郎特省民歌，刘复译。初收在《国外民歌译》第1集。

5月25日，鲁迅为其校点的《何典》一书作《何典·题记》。

6月1日，在《语丝》第81期上发表译诗《今希腊的民歌二首》，署名刘复译。初收在《国外民歌译》第1集。

6月7日，在《语丝》第82期上发表译诗《大真实》。署名法国古歌，刘复译。初收在《国外民歌译》第1集。

6月14日，在《语丝》第83期上发表译歌《饮酒歌》。该歌选自歌剧《茶花女》第1幕第8场，署名刘复译。

6月18日，晚，往访鲁迅，约请鲁迅为《世界日报·副刊》撰稿。

6月中旬，在北京《世界日报》社答应不加任何干涉的条件下，应成舍我之邀，愿意担任《世界日报·副刊》主编。

6月21日，致书鲁迅。鲁迅24日复信，并从25日起撰写《马上日记》。

6月27日，在《语丝》第85期上发表《关于（何典）里方方及其他》，署名半农。同期，发表杂文《与疑古玄同抬杠》，署名刘复。

6月，诗歌专集《扬鞭集》，由北京北新书局出版，署名刘半农。此系上卷。周作人撰序，刘复自序。收1917年至1925年所作诗歌120首。同月，刘复标点重印《何典》，由北京北新书局初版。《何典》系清张南庄原著，最早由上海申报馆出版于1878年。

7月1日，北京《世界日报·副刊》创刊，刘半农兼任主编。同日，在《世界日报·副刊》1卷1号上，发表《也算发刊词》，署名刘复。初收在《半农杂文》第1册。同日鲁迅将《马上日记》部分稿寄交刘半农。

同日，在《世界日报·副刊》1卷1号上发作《印度寓言》，署名北茂译、半农校。从该日起，后至翌年2月1日止，在该《副刊》上连续

刊载了《印度寓言》105则。

7月3日，在《世界日报·副刊》1卷3号上发表《致农萍书》，署名刘复。同期，发表译诗《Verdaronnette》。原为法国民歌，署名刘复译。

7月6日，在《世界日报·副刊》1卷6号上发表译诗《今希腊民歌一首》，署名刘复译。

7月9日，在《世界日报·副刊》1卷9号上，发表了杂文《“呼冤”之余波》，署名记者。初收在《半农杂文》第1册。

7月12日，在《语丝》第87期上，发表了序跋《浑如篇·题记》，署名刘复。后收在《半农杂文》第1册。

7月13日，在《世界日报·副刊》1卷13号上发表译诗《我的女儿你要买只帽子吗？》法国民歌，署名刘复译。初收在《国外民歌译》第1集。

7月14日，在《世界日报·副刊》1卷14号上发表杂文《谨防扒手》，署名记者。初收在《半农杂文》第1册。

7月19日，在《语丝》第88期发表《译〈茶花女〉剧本序》，署名刘复。

7月24日，在《世界日报·副刊》1卷20号上发表译诗《爱情的欢乐只是一时的》。法国民歌，署名刘复。初收在《国外民歌译》第1集。

7月26日，在《语丝》第89期上发表译诗《阿尔萨斯的〈鸣儿歌〉》、杂文《两个圈儿》，署名均为刘复。

7月27日，将《扬鞭集》、《茶花女》各一本寄赠鲁迅，墨笔题字，“迅兄教正，复”。

7月30日，在《民国日报·副刊》1卷30号发表《致蔡仪书》，署名记者。

7月，剧本《茶花女》，由北京北新书局出版。署名法国小仲马著，刘半农译。内尚收入了1926年7月15日写于北京的《茶花女·序外语》一文。

8月1日，在《世界日报·副刊》1卷2号上发表杂文《闯仔穷祸哉》，署名记者。同日，晚访鲁迅。

8月7日，北京《世界日报》负责人成舍我，被军阀政府逮捕。刘半农离家到外面躲避风险。本日，在《世界日报·副刊》2卷7号上发表译诗《在山中往往来来的走》，署名刘复。初收在《国外民歌译》第1集。

8月9日，在《语丝》第91期上发表《校点“香奁集”后记》，署

名刘复。同期发表《关于刘校〈何典〉的几个靠得住的正误》，署名宁庄、刘复。

8月18日，在《世界日报·副刊》2卷17号上发表译诗《茶花郎的歌》，署名刘复。

8月19日，在《世界日报·副刊》2卷18号上发表译诗《中央亚细亚Kafiristan的民歌》，署名刘复。初收在《国外民歌译》第1集。

8月23日，在《语丝》第93期上发表译诗《小亚细亚的情歌》，署名刘复。同期，发表杂文《不与刘大白先生拌嘴》，署名刘复。

8月26日，在《世界日报·副刊》2卷25期上发表《附言》，署名复。

8月28日，在《世界日报·副刊》2卷27号上，发表译诗《英国古歌两首》，署名刘复。同日，在《语丝》第94期上发表译诗《埔寨的民歌》，署名刘复。

8月31日，在世界《世界日报·副刊》2卷30号上，发表了杂文《关于“情书一束”》，署名记者。

8月，刘半农校点诗集《香奁集》，由北京北新书局发行。唐韩致尧著，沈尹默序，刘复后记。

9月11日，在《语丝》第96期上，发表译诗《俾路芝斯坦的民歌》，署名刘复。初收在《国外民歌译》第1集，收集时改题为《在一个半开半掩的门里头》。

9月14日，出席“数人会”会议。会上议决“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但北洋政府教育部不肯用部令公布，他们另筹对策。同日，在《世界日报·副刊》3卷14号上发表译诗《尼泊尔的民歌》，署名刘复。

9月18日，在《语丝》第97期上发表“东抄西袭之四”《白话诗的先驱者》、“东抄西袭之五”《神州国光录之一》、“东抄西袭之六”《神州国光录之二》、“东抄西袭之七”《湘湖杂诗》，均署名刘复。

9月26日，在《世界日报·副刊》3卷25号上发表译诗《满洲里的民歌》（三首），署名刘复。初收在《国外民歌译》第1集。

9月28日，在《世界日报·副刊》3卷27号上发表杂文《开学问题》，署名刘复。初收在《半农杂文》第1册。

10月2日，在《语丝》第99期上发表“东抄西袭之八”《西游补》，署名刘复。同期，发表《关于〈茶花女〉译本的校勘》，署名刘复。

10月9日，上午，出席中法大学成立七周年纪念会。应孝章之邀，

做《法国流俗语举例》的报告。本日，在《语丝》第100期上发表“东抄西袭之九”《当兵苦》，署名刘复。

10月13日，在《世界日报·副刊》4卷12号上发表《发起学术演讲启事·附记》，署名记者。

10月25日，在《世界日报·副刊》4卷24号上发表译诗《罗马尼亚民歌》（三首），署名刘复。初收在《国外民歌译》第1集。

10月，在北京《孔德月刊》第1期上发表《我眼睛里所见的孔德》，署名刘复。

11月1日，在《世界日报·副刊》5卷1号上发表小说《前程》，署名半农。

11月9日，刘复、钱玄同、赵元任、黎锦熙等制定的“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以教育部国语统一会筹备会名义正式公布。

11月13日，在《语丝》第105期上发表译诗《西班牙的短民歌二十二首》，署名刘复。初收在《国外民歌译》第1集。

11月15日，董若雨原著、刘半农校点的小说集《西游补》由北京北新书局初版。1920年上海北新书局再版。附录刘半农作《西游补作者董若雨传》。

11月20日，在《语丝》第106期上发表译诗《西班牙的短民歌六首》，署名刘复。初收在《国外民歌译》第1集。

11月23日，在《世界日报·副刊》5卷23号上发表论文《打雅》，署名刘复。初收在《半农杂文》第1册。

11月27日，在《语丝》第107期上发表译诗《西班牙的民歌八首》，署名刘复。初收在《国外民歌译》第1集。

11月28日，在《世界日报·副刊》5卷28号上发表杂文《与张耀翔先生小开顽笑》，署名刘复。同期，发表《关于“打雅”》，后在12月1日续载，署名刘复。自作者发表论文《打雅》后，续“打雅”的文章不断在《世界日报·副刊》上发表，到1932年8月22日止。作者搜集到的关于“打”字的词头，共有八千多条。同日，上午10时，他在北京学术讲演会，北大学术研究会第九次公共讲演会上，做《语言的进化》的讲演。讲演地点在北京大学三院大讲堂。

12月6日，由北京大学评议会议决，任北京大学聘任委员会委员。

12月7日，在《世界日报·副刊》6卷7号发表杂文《论胡适之的

“好好先生”，署名刘复。初收在《半农杂文》第1册。

12月10日，在《世界日报·副刊》6卷10号上发表讲演稿《语言的进化》。同月13日又在《晨报·副刊》转载，署名刘复讲，叶含章、李竞何记。

12月11日，在《莽原》半月刊第23期上，发表译文《猫的天堂》，署名左拉著、刘复译。初收在《法国短篇小说集》第1册。1927年3月北京北新书局出版单行本。该文副题为《献给打猫打狗的鲁迅翁》。同日，在《语丝》第109期上发表译诗《西班牙的民歌九首》，署名刘复。

12月17日，在《世界日报·副刊》6卷17号发表《本刊启事》，署名记者。

12月20日，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月刊》1卷3号上发表论文《帝与天》，署名刘复。

本年，编集《太平天国有趣文件十六种》，由北京北新书局初版，署名刘复录。本年被聘为北京大学雄辩会和国语演说会导师。兼任北京师范大学本科教席。

1927年（民国十六年 丁卯）37岁

1月1日，在《世界日报·副刊》7月1号上以个人名义登载一则“恭贺新禧”的广告。同期，发表翻译小说《戈姆与尸体》。署名法国底得罗著，刘复译。初收在《法国短篇小说选》第1册。同日，在《中法教育界》第4期上发表论文《法国流俗语举例》，署名刘复。初收在《半农杂文》第1册。该文系作者1926年10月9日在中法大学服尔德学院的讲演稿。

1月8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召开第八次委员会，议决每月5日举行一次学术讲演会。被推为月讲干事。同日，在《语丝》第113期上发表译文《游地狱记》。署名法国弗洛倍尔著，刘复译。

1月11日，在《世界日报·副刊》7卷8号上发表杂文《老实说了吧》，署名刘复。初收在《半农杂文》第1册。

1月18日，在《世界日报·副刊》7卷15号上发表《“老实说了”以后》，署名刘复。

1月22日，在《语丝》第115期上，发表了译诗《西印度 Pueblo 族的民歌》。后来又在116期上续载，署名刘复。初收在《国外民歌译》第1集。译诗计6首。

1月25日，在《莽原》半月刊2卷2期上，发表译文《黑珠》，署名

刘复。初收在《法国短篇小说集》第1集。

1月30日，在《世界日报·副刊》7卷27号上发表《刘复启事》。以失眠症复发为理由，声明辞去《世界日报·副刊》主编。

1月31日，在《世界日报·副刊》7卷28号上发表《“老实说了”的结束》，署名刘复，初收在《半农杂文》第1册。

2月12日，在《语丝》第118期上发表新诗《一年来所作诗》，署名刘复。

2月26日，在《语丝》120期上发表译文《爱情的小兰外套的故事》。署名左拉著、刘复译。同期，发表书信《皇娘》，署名刘复。

3月5日，在《语丝》121期上发表译诗《木马歌》，署名小蕙译、半农校改。同期，发表“东抄西袭之十”《遇仙别纪八则》，署名刘复。

3月10日，在《莽原》半月刊2卷5期上发译文《失业》。署名左拉原著、刘复译。初收在《法国短篇小说集》第1册。同年5月，作为北京孔德学校小丛书之一，由北京北新书局初版发行。

3月19日，在《语丝》第123期上，发表“东抄西袭之十一”《阴势及其它》，署名刘复。初收在《半农杂文》第2集。

3月25日，在《语丝》第124期上发表序跋《孔德小丛书卷头语》，署名刘复。

4月1日，在《语丝》第125期上发表译文《八巴贝克与法奇尔》。署名服尔德著、刘复译。初收在《法国短篇小说集》第1册。

4月5日，从晚8时5分开始，在北京大学三院国学门演讲室做《从五音六律说到三百六十集》的学术报告。

4月16日，在《语丝》第127期上发表序跋《海外民歌序》，署名刘复。初收在《半农杂文》第2集，收集时改题为《国外民歌译·自序》。

4月26日，瑞典人斯文赫定曾组织“中亚细亚远征队”来中国西北部考察。北京大学考古学会、历史博物馆、古物陈列所、故宫博物院、清华大学研究院、中华图书馆协会、中央观象台、京师图书馆等学术团体，联合组成北京学术团体联席会，发表公开宣言，认为瑞典人此举纯系学术侵略。屡经交涉，终于与斯文赫定平等组成“西北科学考察团”。谈判时，“折冲最多者”为刘半农。遂被推举为“西北科学考察团”理事会的常委理事长。

4月30日，在《语丝》第129期上发表《猓猓民歌四首》，署名刘

复。名为《新嫁娘的怨歌》和《伤旧域歌三首》。

4月，译诗专集《国外民歌译》第1集，由北京北新书局初版，署名刘复。此诗集收国外民歌36首。

5月14日，在《语丝》第131期上发表译诗《钉匠歌》。署名法国柏里欧著，小蕙译、半农校改。

5月21日，在《语丝》第132期上发表《猥猥人的创世纪》，署名刘复。

6月4日，在《语丝》第134期上首次发表《苏莱曼东游记》，署名刘复。

6月10日，在《莽原》半月刊2卷11期上发表《克洛特格欧》的后序，署名刘复。

6月11日，在《语丝》第135期上发表译诗《祖父的歌》。署名俄国作、小蕙译、半农校改。

6月18日，在《语丝》第136期发表《悼王静安先生》诗，署名刘复。

6月，译作《法国短篇小说集》（第1册），作为北京中法大学丛书之一，由北京北新书局初版。署名刘半农译。

7月9日，在《语丝》第139期上发表《关于译诗的一点意见》，署名刘复，初收在《半农杂文》第2集。

7月23日，在《语丝》第141期发表译诗《土耳其民歌五首》，署名刘复。

7月30日，在《语丝》第142期发表译诗《土耳其民歌》，署名刘复。

8月27日，在《语丝》第146期上发表译诗《秋歌》署名小蕙译、半农校改。

9月10日，在《莽原》半月刊2卷17期上发表《比打哥儿》。署名服尔德作、刘复译。

10月1日，兼任北京中法大学服尔德学院中国文学系主任。担任中国文法、语音学、法文戏曲、中国著名选读等课程。

10月10日，专著《半农谈影》，由北京真光摄影社初版，署名刘半农。内收《半农谈影·序》。后收入《半农杂文》2集。

10月24日，北京北新书局为奉系军阀所查封，为避文祸，与周作人一起逃离避难。

秋，因不满奉系军阀统治和教育部长刘哲的作为，辞去所任国立各

校教职。曾与瑞典学人斯文赫定商议，拟提名鲁迅为诺贝尔文学奖金候选人，并为此托台静农致书鲁迅，征询鲁迅的意见，后为鲁迅所婉拒。

11月，以蔡元培为院长的国民政府“大学院”下属之“古物保管委员会”成立。被推选为该会19名委员之一。

12月1日，在《北新》半月刊2卷3号上发表译文《服尔德文抄》，署名刘复译。

12月29日，写长文《西游补》作者董若雨传于北京。初收在1929年上海北新书局版权《西游补》。

12月31日，在《语丝》4卷3期上发表“东抄西袭之十二”《北语诗》、“东抄西袭之十三”《二十年前的北京》，署名刘复。同日，在北京《晨报》上发表《请看刘复叙述光社之性质》。初收在1928年1月1北京光社初版的《光社年鉴》第1集，又收入《半农杂文》2集。

12月，在《清华学校》4卷2期上发表论文《“图式音标”草创》，署名刘复。

12月，“国语统一会”改为“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吴稚晖为主席，委员共31人，刘复等“数人会”6人皆在内。所属“国语辞典编纂处”改名“中国大辞典编纂处”，黎锦熙任总主任。

本年，参加业余摄影团体北京“光社”。被推选为国乐改进社名誉会员。搬迁至北京王府井大街附近的敦厚里7号寓所居住。

1928年（民国十七年 戊辰）38岁

1月10日，国乐改进社编辑的《音乐杂志》创刊。对该刊的出版，曾进行资助。同日，在《音乐杂志》创刊号上发表《音律尺算法》，署名刘复。后在1卷2、3期上连载。该论文1927年2月4日作于“三家胡同”之底。

1月14日，在《语丝》4卷5期上，发表“杂览之十四”《董份遗事之一》，署名刘复。

2月27日，在《语丝》4卷9期上，发表“杂览之十六”《林则徐照会英吉利国王公文》，署名刘复。

4月初，赴日本出席东亚考古学会召开的学术会议。赴日途中经汉城。曾在汉城听朝鲜旧时王府中所奏的古乐，时称“李王府雅乐”。

4月29日，在日本京都东亚考古学会的学术会议上演讲论文《新嘉量之校量及推算》

6月5日，在奉系军阀退出北京后，发起成立北京文物临时维护会。

7月5日，下午，北京文物临时维护会召开茶话会，招待大学院（教育部）特派员。在会上做一月来维护北京市文物情况的工作报告。

7月，赴南京。向中华民国大学院的大学委员会提出了编纂《中国大字典》计划，预算60万元。被否决。又联合建议将北京的文物机构按性质重新分类，定出系统的科学的管理办法来。

8月4日，晚，在上海“万云楼”，与鲁迅、许广平、周建人、沈尹默、郁达夫、张友松、林语堂暨夫人、李小峰暨夫人欢宴。

8月13日，中央研究院第三次院务会议决议：聘请刘复、吴稚晖、胡适、陈寅恪、赵元任、顾颉刚、林语堂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

8月，兼任中法大学的丛书委员会常务委员。

9月2日，美国流氓安得思，被美国纽约天产博物院委任为中亚考古团团长，带领大队人马，到我国内蒙一带挖掘古物，前后7次，每次都要挖掘几十、几百大箱的东西运回国，并在北京弓弦胡同设立了永久性的办事处。中国政府既不过问，人民更是全不知道。1927年夏季，他们又从内蒙挖了八九十箱东西运回北京，准备从北京运往天津出口，却被文物维护会和古物保管委员会查获。经查护照，中国政府只是批准他们打猎而已。刘半农代表中国学术团体和他们进行斗争。他们一面写了“伏辨”，一面却怀恨在心，怂恿北京的各洋人报，“文物”、“古物”两会是“妨害文化”，“是中国人不懂科学的表示”。本日，《顺天时报》还发表社论，恶毒地攻击文物维护会刘半农等爱国人士。

10月7日，作《关于外国话及外国字》于北京。该文初收在《半农杂文》二集。作者针对当时一些人崇洋媚外的现象，大声疾呼。

10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正式开始工作。下分史科学、汉语、文籍考订（筹办中）、民间文艺四个组。被聘任为民间文艺组主任，并提出了研究计划。后因经费支绌，此组被裁并，遂改任特约研究员。

12月，在《辅仁学志》1卷1期上发表论文《新嘉量之校量及推算》，署名刘复。

冬，和李家瑞合作，着手中国俗曲的研究整理工作，一面编目，一面采访搜集，费时三年余。本年，北京改名北平。刘半农被聘为古物保管委员会委员。搬迁到北京南池子扁担胡同1号寓所居住。

1929年（民国十八年 己巳）39岁

1月17日，被推选为北大学院（即北京大学）评议会候补评议员。由北大学院评议会议决，被推为北大学院图书委员会委员长，北大学院仪器委员会委员。

1月21日，晚上，在北大法学第一院，西北科学考察团举行公开讲演会。会上，刘半农做《西北科学考察团之性质及其成立之经过》的报告；听讲演者约3000人。

1月22日，在《世界日报·教育界》上发表《在欢迎西北科学考察团大会上讲演》。翌日连载，署名刘复。

1月，与钱玄同、刘大白等7人，被南京政府教育部聘为名誉编审。离开北京大学一年半以后，又重返北大任教。

2月25日，上午，在北大学生欢迎院长暨教职员大会上演说。

3月4日，下午，出席北大学院教授会议，讨论开课问题及促请北大原教授回校任教诸问题。

5月，被聘为北大学生演说辩论会导师。北京大学摄影研究会成立，被聘为该会导师。

6月15日，被聘为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编辑委员会的委员。

6月23日，在北京大学国文学会发表演讲，题为《明沈宠绥在语音学上的贡献》。

6月26日，被聘为北京大学学院研究所国学门委员会的委员。

7月，应沈兼士之邀，兼任北京辅仁大学教务长。赴南京，办理辅仁大学董事会立案及恢复辅仁大学名称诸事宜。在南京会见蒋梦麟。南京政府教育部和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会合组为国立北平图书馆。设国立北平图书馆委员会。被教育部聘为该委员会的委员。

8月6日，北大复校运动取得胜利。教育部改国立北平大学北大学院为国立北京大学。

8月22日，北京大学教职员工公推刘复、陈大齐、王烈三人为代表，欢迎蔡元培回北大任校长。遂赴南京、上海等地。

9月20日，在《语丝》5卷29期上发表《沪宁车中作代画诗——录寄小蕙与弟妹共玩之》3首，署名刘复。

9月，主编辅仁大学《辅仁学志》第1卷第2期。两次出度国立北平图书馆委员会会议。被推选为国立北平图书馆建设委员会委员。

10月10日,上午10时,在辅仁大学教务处主持召开国文教程会议。

11月4日,经北京大学评议会议决,任命其为评议会书记,兼任北大仪器委员会委员。

12月3日,《中国大辞典》编纂处召开会议,议决字典组分为七股。书报组分为八股。书报组中的俗曲股由刘复负责。

12月15日,下午3时,在辅仁大学会议厅召开第二次教务会议。会上,刘半农报告了《辅大学志》目录。

12月17日,国立北京大学31周年校庆纪念日,上午,在庆祝会上发表演说。同日,在《北京大学一周年纪念刊》上发表《北大河》,署名刘复。经多年筹建的我国第一个语音音乐律实验室,在北京大学正式建成并开放。刘半农担任该实验室主任。

12月18日,作《光社年鉴·二集·序》于北京。初收在同年北京光社《光社年鉴·二集》;后收《半农杂文》2集。

12月30日,在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赴美游历演出前,其弟刘天华编辑《梅兰芳歌曲谱》,时日,刘半农作《梅兰芳歌曲谱·序》于北京。初收在1930年《梅兰芳歌曲谱》,后收入《半农杂文》2集。

12月,担任北大《国学季刊》编辑委员会委员。

本年,作《没有光棚的人像摄影——《半农谈影》之余》,署名刘半农。初收在1929年北京光社版《光社年鉴》第2集。小说集《西游补》,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署名清董若雨著、刘半农校点。附录《西游补作者董若雨传》,署名刘半农作。初收在《半农杂文》2集。搬迁到北京王府井大街附近的阮府胡同30号寓所居住。

1930年(民国十九年 庚子)40岁

1月12日,上午出席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了拟设国语运动文献馆、开办国语传习机构等提案。

1月16日,在《北新》半月刊4卷1、2期上发表杂文《北旧》,署名刘复。

1月,主编《辅仁学志》的第2卷第1期。

2月,译作《比较语音学概要》作为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编委会主编大学丛书之一,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初版。署名法国保尔巴著、刘复译。赵元任作序。编著《宋元以来俗字谱》,作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单刊之三初版,署名刘复、李家瑞全编。

3月17日纪念“三·一八”惨案四周年纪念日，以辅仁大学教务处名义发布第71、76号布告。

4月17日，《北大学生》月刊编委会召开第6次会议，决定聘请刘复为顾问。

4月28日，南京政府教育部任命其为国立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院长。

4月，作《辅仁大学的现在和将来》于北京。初收在《半农杂文》2集。

5月4日，答北京《世界日报》记者问，就整顿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诸事宜，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5月5日，上午，就任国立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院长职。办理接收手续，并分别向教职员和学生发表讲话。同日，作《与女院学生谈话》。初收在《半农杂文》2集。

5月20日，出席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委员会，讨论研究所组织法及规章制度等问题。

5月23日，担任中法大学《中法教育界》编辑委员会常务委员。

5月25日，出席北大校务会议。由于第四届校务会议主席和常委任期已满，依次由女子文理学院院长刘复继任第五届校务会议主席。

5月31日，主持北大第39次校务会议，讨论向教育部催索积欠经费等问题。

6月1日，下午，出席北大女子文理学院欢迎新院长和欢送毕业生的全体大会，并在会上致答辞。

6月3日，与白涤洲、魏建功、敖士英等人，在北大语音乐律实验室记录了70余种方言，历时年余。根据研究所得，本日编成《调查中国方音用标音符号表》。

6月6日，率女子文理学院应届毕业生，参观北大语音乐律实验室。

6月14日，上午，在北大办公处，接待索取欠薪的北大教职员工会委员。同日，12时半，主持北大第41次校务会议，讨论向教育部催索积欠经费问题。会后，与北大教工代表去银行商借教育经费。

6月17日中午，主持北大临时紧急会议，讨论筹措经费问题。下午，再次赴银行商借教育经费。

6月在《北大学生》1卷1期上，发表论文《“四声模拟器”之创制》，署名刘复。该文1929年12月15日“书于北京寓庐”。

8月1日辅仁大学举行新生入学考试，考场分设15处。与辅大校长陈垣赴各试场巡视。

夏，测试故宫所藏乐器的音律，单钟磬两项，就鉴定了500多件。应北新书局之约，利用余暇，为高中学生编写《中国文法讲话》。

9月在国立北京大学《国学季刊》2卷3号上，发表论文《明沈宠绥在语音学上的贡献》，署名刘复。该文系1929年6月23日在北大国文学会上的演讲稿。

10月1日上午，在辅仁大学开学典礼上致词。

10月15日，出席北大第51次校务会议，再次讨论向教育部催索积欠经费问题。同日，出席北大评议会。被推选为北大评议会书记，兼北大聘任委员会委员。同日，因蔡元培在9月份辞去北大校长职务，代理校长陈大齐也请求辞职，故被北大教授会推举为代表之一，拟赴南京挽留蔡元培先生留任。

10月19日作为北大教授会代表，赴宁前就北大校长问题答记者问。

10月27日离京赴津，转车南下。

11月9日“北平光社”在中山公园举办第七届摄影作品展览，展出刘半农摄影佳作25幅。

11月14日自宁返京。当日晚，出席北大评议会为其举行的公宴，报告南下接洽经过。

11月17日上午，向北大师生报告南下接洽经过。

12月10日在辅仁大学《辅大校刊》上发表《刘教务长致各教授函》，署名刘复。该函同年12月5日作。函请各教授查核新课程表。

12月17日，在北大32周年校庆纪念会上讲演。本日晚，出席胡适为庆祝40岁生日而举行的家庭宴会。

12月23日，在北大欢迎新校长蒋梦麟的大会上讲话。

12月，兼任辅仁大学附中高中部主任。

本年，将1925年创制的“音高推断尺”改进为“最简音高推算尺”；将“刘氏音鼓甲种”改进为“刘氏音鼓乙种”。在《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本第2分册上发表论文《声调之推断及“声调推断尺”之制造与用法》，署名刘复。

1931年（民国二十年 辛未）41岁

1月6日，作《中国文法讲话序》于北京。初收1932年11月上海

北新书局出版的《中国文法讲话》上册；以后收入《半农杂文》2集。

1月，在辅仁大学《辅仁学志》2卷1期上发表论文《从五音六律说到三百六十律》，署名刘复。该文系1927年4月5日在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演讲稿。

2月9日，为北大女子文理学院发布《禁止女生入公共跳舞场布告》。初收在《半农杂文》2集。

4月1日，在《世界日报》上发表谈话《跳舞与密斯——刘对其主张之解释》，署名刘复。初收在《半农杂文》2集。

4月18日，为办理辅仁大学立案事宜，离京南下。是日抵杭州。

4月21日，抵上海。

4月22日，从上海寄书《致辅仁大学全体同学函》。

春，将1925年所拟的《中国辞典编写办法》的27条原稿交给黎锦熙。经黎锦熙修改以后，定名为《编辑大学辞典办法》。

中国大辞典编纂著部，下设“大学辞典股”（原第2组，为第5股；拟编内容、体裁略相当于法国的拉罗斯小辞典和英国的韦勃司脱大学辞典）。刘复任该股主任。

5月20日，上午，向辅仁大学全体学生报告办理校立案的经过。

5月27日，在辅仁大学《辅大校刊》2卷16期上，发表《刘教务长致全体同学函》，署名刘复。

6月13日，被北平市教育局聘请为甄别考试委员会的委员。

6月17日，上午，出席北平市教育局甄别考试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6月20日，在北京《晨报·教育界》上，发表书信《致尹默》，署名刘复。该信1931年6月19日写于北京。函致教育部及北大校长沈尹默，他主动要求辞去女子文理学院院长职务。

7月6日，出席北平市教育局甄别考试委员会会议，评定与试人员的分数。

7月下旬，为北平教育局举办的“注音符号讲习班”讲演了数次。8月8日，在《世界日报·教育界》上发表《介绍黄种巡察团》，署名刘复。

8月30日，上午，在北大欢迎前任校长蔡元培的大会上，代表全体职员致欢迎辞。

8月31日，写杂文《五年以来》于北京。初收在《半农杂文》2集。

8月，北大实行教授专任制度，并建立“研究教授”职称。当时，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和北大本身，每年各提出20万元。以5年为期，设立“研究教授”15名。其人选“以对于所治学术有所贡献，见于著述，为标准”，“研究教授每周至少授课6小时，并担任研究及指导学生之研究工作，不得兼任校外教务或事务。遂与汤用彤、陈受颐、周作人、徐志摩等共5人，被聘为北大文学院研究教授。遵照北京大学“研究教授”之有关规定，刘半农辞去校外一切教务、事务之兼职。专任北大中国文学系教授及研究文史部主任。

9月16日，北大公布文学院1930年度课程大纲。刘半农担任了语音学（单位二）及语音学实验（单位三）的教学工作。

9月18日，“九·一八”事变爆发。

“九·一八”事变后不久，他对内侄朱穆之说：“榆关失守了，国民党不抵抗，再这样下去，我就去投共产党。”

9月20日，下午，出席北京教职员对日委员会执委会第二次会议。

9月23日，北大评议会改名为北大校务会议。被推选为出席校务会议的文学院教授代表。

9月24日，出席北大教职员工大会，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诸问题。

9月26日，出席北大第一次校务会议，会议决议：为制定《北大组织大纲》，设立起草委员会。被推选为《北大组织大纲》起草委员会委员；兼任北大图书委员会委员、北大财务委员会委员。

9月29日，作《反日救国的一条正路》于北京。该文初收在《半农杂文》2集。

10月21日在《世界日报·经济界》上发表杂文《好聪明的北平商人》，对一些商人不顾国难当头出售的货进行抨击，署名刘复。

10月24日，撰《朝鲜民间故事校后语》于北京。初收在1932年6月上海女子书店初版《朝鲜民间故事》，后收在《半农杂文》2集。这是作者为女儿小蕙所译《朝鲜民间故事》一书所撰写的跋语。

10月，搬迁到北京王府井大街附近的大阮府胡同16号寓所居住。

12月5日，在《世界日报·国语周刊》第14期上发表《征求“打”字的别用》，署名刘复。同日，在《人世间》半月刊第17期发表《半农家信》，署名刘半农。该信写于同年5月1日，系作者南下时记述游杭州、上海、苏州、无锡、江阴等地情景的家信。

12月19日，在《世界日报·国语周刊》第16期上发表论文《释“吃”》，系“习俗笔记外篇之一”，署名刘复。初收在《半农杂文》2集。

12月25日，在《世界日报·世界琐闻》上发表杂文《致北平市长周大文》，署名刘复。

本年，审阅李家瑞编《北平俗曲略》。

被聘为《国立北京大学志》编纂处主纂。

1932年（民国二十一年 壬申）42岁

1月29日，在《世界日报·副刊》第5卷第29号上发表论文《诗体展览》，翌日续载，署名刘复。该文写于同年1月25日。

3月2日，在《世界日报·国语周刊》24期上发表论文《释“来去”》，系“习俗笔记外篇之二”，署名刘复。初收在《半农杂文》2集。

3月11日，在《世界日报·教育界》上，发表《刘昨致函张继——关于西安建陪都事有所指摘》，翌日续载。初收在《半农杂文》2集。

3月12日，在《世界日报·国语周刊》25期上发表《刘复启事》。

3月，在国立北京大学《国学季刊》3卷1号上，发表论文《释“一”》，署名刘得。

4月8日，晚赴马幼渔家，拜望章太炎。在座的还有朱逖先、钱玄同、沈兼士、俞平伯、胡适之、周作人等。

5月，编著《中国俗曲总目稿》，由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印行。署名刘复、李家瑞合编。

6月7日，北京光社在北京中山公园内举行摄影作品展览。展出刘半农的摄影佳作26幅。

6月8日，上午5点45分，其弟、民族音乐家刘天华因患猩红热病逝，享年37岁。

6月18日，在刘天华家，与其生前友好暨及门弟子一起讨论如何纪念天华先生问题。并作《书亡弟天华遗影后》，初收在1933年《刘天华先生纪念册》；后收入《半农杂文》2集。

6月30日，《磐石杂志》创刊，为之题写刊名。

6月，在国立北京大学《国学季刊》3卷2号上，发表论文《天坛所藏编钟编磬音律之鉴定》，署名刘复。

7月2日，晚，与陈垣、徐炳昶等46人，共同欢宴蔡元培到京。

7月28日，为报载沈尹默至函教育部推荐其继任北大校长一事，向

记者发表谈话，表明自己事先并不知晓，而且志在学术，无意担任学校任何行政工作。

8月4日，在《世界日报·妇女界》上发表论《“女性”代“女人”根本不通》，副题是《给〈世界日报〉“妇女界”记者的一封信》，署名刘复。

8月6日，在《世界日报·妇女界》上发表《再论“女性”根本不通——致秉英》。署名刘复。

8月18日，在《世界日报·妇女界》上，发表《刘复致秉英信》。

夏，赴上海。曾会见北新书局主人李小峰，应约代编一部中小学生所用的字典。

9月7日，北大校务会议议决：北大成立研究院，下设自然科学、文史、社会科学三部。后被任命为文史部主任。

9月16日，林语堂主编的《论语》杂志创刊。刘复被聘为“长期撰稿员”。

9月21日，由于日寇入侵日深，华北危机严重，北京文教界江瀚、徐炳昶、马衡、刘复等30余人，集会商讨，决定向南京政府上呈定北京为不设防的文化城的意见书。江瀚领衔，刘复拟稿。10月上旬，送交南京政府。

9月，专著《中国文法讲话》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署名刘复。

同月，在国立北京大学《国学季刊》3卷3号上发《北平方音析数表》，署名刘复。

秋，开始编纂《中小字典》

应北京星云堂主人刘敏斋约请，着手编辑《半农杂文》。翻检查抄半年有余，后因日寇侵略加剧而中辍。

10月31日，北大校务会议教授代表改选，再次被推选为文学院教授代表。

11月6日，翻译剧本《茶花女》，由北京小剧院排演。

同日作《因〈茶花女〉之公演而说几句话》。初收在《半农杂文》2集。

11月8日，会见美国学者来维思，后共进餐。后为其所撰《词律研究》一书作序。

11月23日，在天津《益世报·戏剧与电影》第3期上，发表《甘苦之方——看〈茶花女〉公演后写》，署名为刘复。初收在《半农杂文》2集。

11月28日，撰《北京俗曲略序》于北京，初收在《北平俗曲略》

(李家瑞编)；后收入《半农杂文》2集。

11月29日，在北京教育界《对于国联调查团报告意见宣言》上签名。

11月30日，下午，出席北大本学年度首次校务会议。讨论并通过各系课程、各委员会委员名单。被聘任为北大出版委员会委员长、北大仪器委员会委员、北大图书委员会委员。

12月1日，在《北洋画报》上发表《再写几句》，署名刘复。

12月8日，撰《辅仁大学的现在和将来·后语》于北京。初收在《半农杂文》2集。作者在文中叙述了他曾担任辅仁大学教务长一职的原因和后来辞职的经过。

12月14日，下午，出席北大本学年度第2次校务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北京大学学则》。

12月16日，下午，在北大做《音标与音谱》的演讲。

12月27日，下午，出席北大第3次校务会议。讨论了研究生奖学金规划草案等事宜。

12月28日，撰《初期白话诗搞序目》于北京。初收在1933年北京星云堂初版之《初期白话诗稿》；后收入《半农杂文》2集。

12月31日，在《世界日报·国语周刊》第67期上发表《词律研究序》，署名刘复。初收在《半农杂文》2集。

12月，在国立北京大学《国学季刊》3卷4号上发表论文《两汉时代的日晷》，署名刘复。

本年，曾致力于研究两汉日晷。

张恨水创办北平美术专科学校。刘复被聘为该校董事。曾出席该校董事会，讨论教育、行政诸事宜。

同年，在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外编《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庆祝论文集》上发表论文《十二等律的发明者朱载堉》，署名刘复。

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 癸酉）43岁

1月7日，北大公布文史部研究生研究科目及导师名单。负责指导研究生学习中国文学史。

1月11日，下午，出席辅仁大学为欢迎法国汉学家柏希和而举行的公宴。

1月20日，撰《〈糸番〉清说跋》于北京。初收在《半农杂文》2集。《〈糸番〉清说》，系清雍乾之世魏象乾所著，专谈“翻译之术”，乃

“译界之重要史料也”。

1月25日，下午，出席北大临时校务会议，讨论抗日捐款问题。

2月9日，本学期担任北大国文系的语音学、语音实验学课程，并担任文学院一年级共同必修课——语言学的方法论。

2月10日，出席北京大学校务会议，再次讨论了抗日捐款等问题。

2月16日，下午，出席北大教务会议，讨论由教授捐款赶制抗日伤兵的被褥问题。

2月23日，北大创办的国民伤兵医院成立。被推举为北大国民伤兵医院理事会理事。

2月24日，下午，出席北大校务会议，讨论有关北大国民伤兵医院及教职工捐款等问题。

3月15日，在《世界日报·读者论坛》上发表杂文《为汪局长脱靴》，署名刘复。初收在《半农杂文》2集。

3月22日，作《应用文及其作法》于北京。初收在中华书局初版的中国文教科书；后收入《半农杂文》2集。

3月25日，撰《刘天华先生纪念册》，后收《半农杂文》2集。

4月1日，在《论语》第14期上，发表《群言堂解》，署名半农。

4月8日上午，在成舍我创办的北京新闻专科学校开学典礼上致词。

同日，在《世界日报·国语周刊》第80期上发表《奉答扬君遇夫》，后在81、82期上发表续载，署名刘复。初收在《半农杂文》2集。

4月10日，中国共产党北京地下党组织，通过李大钊烈士生前好友，发起为李大钊举行公葬的活动。本日，与钱玄同等12人联名发出为李大钊举行公葬的募款书。

4月14日，在《世界日报·教育界》上发表《在北平新闻专科学校开学典礼上的演讲词》，署名刘半农。该演讲词写于同年4月8日。

4月15日，撰写《故国立北京大学教授李君墓碑》。

该碑文后未用。（碑文草稿原件现存中国革命博物馆保管部）

5月1日在《论语》第16期上发表《题跋一则》，署名半农。

5月13日夜里，寄书黎锦熙先生，即《论比较文法名称书》。

5月21日在《世界日报·国语周刊》第87期上，发表《论比较文法名称书》，署名刘复。

6月3日上午，出席北大校务和教务联席会议，讨论本学期结束工

作和招考新生诸问题。

6月19日，假暑期赴河南等地，研究中国古代乐律。

6月22日，去河南博物馆及至公会主教怀履光处，为测试河南博物馆收斂断郑出土的古代的钟、怀履光所藏古代编磬和金大和无射钟的音伸，接洽研究事宜。

6月26日，与沈仲章等去巩县，游石窟寺，发现北魏时期的乐舞造像，连夜照相、度量、记录。

6月27日，去洛阳，登伊阙龙门，在宾阳洞及万五千佛洞顶上，发现唐代乐舞造像，遂作照相、记录等工作。

6月30日，回巩县，继续其发掘工作。

7月3日，抵南京，测试烈士祠所藏旧时文庙编钟编磬的音律。约5日，经无锡回江阴，曾在家乡采录民歌。后去上海，测试卢江刘善斋所藏之编钟的音律。

9月16日，在《论语》第25期上，首次发表《桐花芝豆堂而皇之诗集》。

9月30日，致函北京《世界日报》，否认将再任北大女子文理学院院长。

秋，重编《半农杂文》第1册。

10月3日，北大成立《北大一览》编辑委员会。被聘为编委会委员。

10月5日下午，出席北大国民伤兵医院理事会会议，讨论该院在5月23日结束后的余款和用具处置问题。

10月7日，出席北大《北大一览》编委会首次会议。同日，北大改选参加校务会议的教授代表，再次被推选为文学院教授代表。

10月13日出席本学年北大第1次校务会议，议决各委员会名单。被推选为北大图书委员会委员、北大仪器委员会委员、北大出版委员会委员。

10月，调语言学家白涤洲为北大语音乐律实验室助手、指导白涤洲写《北平声调之研究》。同月，拟定《十韵汇编》一书的编辑计划，并具体领导了这一计划的实施和完成。

11月10日下午，去北京天坛测试所藏编钟、编磬的音律。

11月17日，北京大学演说辩论会召开全体会议。被聘为该会导师。

11月19日，与李四光等23人联名，发起北大教授为学生建筑新宿舍的捐薪活动。为此捐薪1月。

12月17日，为纪念北大35周年校庆，撰杂文《三十五年过去了》，载《北京大学三十五周年纪念刊》，署名刘复。同日，《国立北京大学校史略》由“国立北京大学志编纂处”编印，署名刘复主纂。

12月23日，在《世界日报·教育界》上发表杂文《走入魔道的学校游艺会》，署名刘复。该文系有感于北大35周年校庆游艺会而做。

12月24日上午，出席北京昆弋维护会全体大会。在会上报告开会宗旨。被推选为该会主席。同日，下午出席北大校务会议。

12月30日下午，出席北大校务会议。

冬，因嫌1930年制造的“声调推断尺”体积大、费用高，经重新设计改进，遂制成“乙二声调推断尺”。

本年，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进逼，使刘半农忧心如焚。他看到周作人家里挂起了太阳旗，走到门口遂拂袖而去，归家后气愤地对其内侄朱穆之说：“周作人再挂日本旗，我就和他划地绝交！”

本年，撰论文《英语的起源》。初收在《半农杂文》2集。

本年，《刘天华先生纪念册》，由国立北平图书馆等集资刊印初版，署名刘复编纂。

《初期白话诗稿》由北京星云堂书店线装影印初版，署名刘半农编。书名题签马衡。

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 甲戌）44岁

1月1日，由郑振铎、朱自清、冰心、吴晗等人编辑的《文学季刊》创刊。刘复被聘为“特约撰稿人”。同日，在《论语》第32期上发表杂文《武七先生的人格》，署名半农。武七，即武训。

1月5日下午，出席北大研究所文史部部务会议。

1月6日中午，赴“撷英饭馆”《文学季刊》社之宴。出席者50余人。晚，赴“东兴楼”北大国文系之宴。席间，初会谢冰心。

1月8日晚，为北大演说辩论会做练习指导。

1月17日，出席北大出版委员会会议。

1月26日夜，赴胡适家小谈，见赠《四十自述》一册。

1月27日，请郑颖荪与赛金花商定，自“下一星期起，每星期一、三、五下午4时后，请她到颖荪处述说一生故事，备编写成书，并托汪怡庵代找速记生”。

1月29日下午，“约商鸿逵、速记生于、葛二人同往颖荪家，听赛金

花述说一生故事。速记稿当另行清理成书……”

1月31日下午,“四时后,仍到颖荪家处听赛金花述说故事,并请金自书‘赛金花本事’五字,为异口书检之用”。后于2月2、5、7、9日,又赴郑颖荪家听赛金花述说故事。并请陈执中、唐亮等人为赛画像。

2月6日,上海商务印书馆为恢复毁于“一·二八”炮火的东方图书馆,特成立东方图书馆北平赞助委员会。被聘为该会委员。

2月8日下午,出席北平图书馆工程参考室开幕式。

2月18日下午,出席北平图书馆戏曲音乐展览会开幕式。

2月22日下午,到车站去送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守和赴欧考察。

3月7日夜,“为李守常(大钊)夫妇写墓碑”。

3月15下午,出席蒋梦麟夫妇“请国文、心理、生理三系师生茶叙”会,并即席朗诵近作“打油诗”6首。

3月21日下午,出席北大出版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3月22日中午,出席辅仁大学董事会。

3月24日下午,出席北大《北大一览》委员会会议。

4月5日,林语堂主编的《人间世》半月刊创刊。被聘为“特约撰稿人”。

4月6日,出席北平图书馆常务委员会。

4月14日,出席北大《北大一览》编纂委员会会议。

4月16日,出席北平美术专门学校董事会。

4月25日,出席北京大学出版委员会的会议。

4月28日,张恨水创办的北平美术专门学校改校名为北华美术专门学校。为之书写校牌。

5月4日下午,与顾颉刚、卜晨光及吴文藻、冰心夫妇陪同一美国新闻记者,同往北京天桥居仁里16号,访问赛金花

5月6日,中午,出席北平图书馆、图书馆协会、中基会、故宫博物院四机关联合欢迎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主任恒慕义博士的宴会。

5月10日,出席了北平图书馆委员会会议。

5月23日,出席了北京大学出版委员会常务会。

5月26日下午,去北海公园团城参观西北文物展览会。

6月1日,下午,因教育部规定各大学毕业考试需请校外专家参加,故应邀出席中法大学毕业考试委员会会议。同日,在《文学》2卷6号上发表论文《吕氏春秋古乐篇昔黄节解》,署名刘复。

6月5日，在《人间世》半月刊第5期上发表《半农杂文自序》，署名刘半农。初收在《半农杂文》第1册。

6月12日上午，出席北华美术专门学校毕业典礼。

6月18日，出席了北京大学仪器委员会会议。

6月19日，下午4时40分，从北京西直门车站出发，去绥远一带考察方音民俗。其目的是为了完成他的《四声新谱》和《中国方言地图》工作中的一环；更直接的目的，则是为撰写一篇学校论文，代表中国学术界参加国际地理学会为纪念瑞典考古学家斯文赫定博士70寿辰而编印的一部世界性的论文集。

6月20日，抵包头。停留5日。调查了包头、绥西、安北、五原、临河、固阳、萨县、托县等地方音及声调。并用录音机收录民歌7筒。

6月24日，抵呼和浩特。停留7日。调查了呼和浩特、武川、三镇、集静、陶林、兴和、清水、凉城等县方音及声调。

6月29日工作之余，欲了解内蒙古自治真相，赴百灵庙一游。

6月30日晨，乘汽车由蜈蚣坝进入阴山，途次武川。

6月，散文专集《半农杂文》第1册，由北京星云堂书店初版，署名刘复。

7月1日上午11时，会见内蒙古自治委员长云王，询问自治实施情况并略事周旋，即辞出。又亲往蒙古包考察蒙民生活。

7月2日晨，离百灵庙，返呼和浩特。停留3日。受到北大旅绥毕业学生及当地党政长官的招待。应教育厅之邀，作公开演讲，听众逾千人。

7月5日，赴大同。停留2日。调查了山西、雁北等13县的方音及声调，并收录了当地民歌8筒。

7月7日晚，离大同。夜抵张家口。就寝已至8日凌晨3时。

7月8日，晨8时，去第一师范接洽调查事宜，适逢星期天，无法进行工作。略事午休，遂在烈日下乘坐10里路的人力车，往游赐儿山；晚6时归，即感不适。

7月9日，在张家口。晨往第一师范工作。体温增至37.5度，白涤洲等婉劝其休息，不听。又应第一师范学校校长之清，抱病登台，为学生演讲1小时。体温增至38.5度。同人再劝其休息，仍不听。又勉强记录方音，但身体再也无法支持，始告辞先回住所。晚，体温已增至39.5度。当夜，扶病登离张家口返京。

7月10日，晨8时抵京。归家后旋请中医施今墨诊治，疑为重感冒。

7月11日，体温仍高，但精神尚好。是夜，请大夫诊治，仍疑为重感冒。

7月12日，热度稍退，汗流不止，时有打嗝。

7月13日，清晨，请首善医院的方石珊院长诊治，断为黄疸病劝入协和医院治疗。复请一德国医生诊治。傍晚，又请另一位中医诊治。是夜，再请一按摩医生诊治。病情加剧，体温骤增，但神志清晰，无异平时。

7月14日，天明，因数日失眠，益形憔悴，四肢厥冷。上午10时，入北京协和医院诊治，确诊为回归热病。下午2时15分溘然长逝！

7月16日，晨8时，移厝北京西城北海后门外之嘉兴寺。灵车复盖北京大学三色校旗。蔡元培手持“国立北京大学教授刘复博士之铭旌”作为前导。灵车路过北京大学一院时曾稍停，由蒋梦麟率北大教职员生路祭。

7月20日，法国驻华使馆代表公使贺柏诺致函北京大学，深切悼念刘复逝世，并向其家属表示慰问。

8月5日，在《人间世》半月刊第9期上发表《王芷章腔调考原序》，署名刘半农。

10月14日，上午10时，北京大学假景山东街二院大礼堂为其举行追悼会。参加追悼会的有：北京政委会秘书长何其巩，北京大学蒋梦麟、李四光、胡适之、李书华、刘树桐、樊际昌、钱玄同、周作人暨全体学生，辅仁大学沈兼士、张怀，北京各大学教授任叔永、何昌泗、赵万里，北京文教界知名人士徐炳咏、周肇祥、江瀚、江庸，《磐石》杂志社同人，公教青年会同人，春笋社同人，中华公教进行会总监督处袁承斌等，计五百余人。全国各地报刊为其逝世纷纷发表消息和纪念文章，《世界日报》、《青年界》、《人世间》等报刊特出了纪念专辑。蔡元培、鲁迅、白涤洲、张恨水、陈子展、钱玄同、黎锦熙、魏建功、郝瑞恒、陶亢德、李长之、吴稚晖、赵景琛、汪怡、姜亮夫、徐霞村、汪馥泉、陆旭抄、杨令德、商鸿逵、陈万里、许钦文、苏雪林、周作人、容媛、赵元任、徐芳、胡风、陈康白、西泠、沙鸥等人发表了纪念文章。

翌年（1935年）

5月29日，被安葬在北京西郊的香山玉皇顶之侧大木沓。墓地为中法大学捐赠。其二弟刘天华同时在该地下葬，两墓相距仅数十步。

刘半农作品选

“作揖主义”

沈二先生与我们谈天，常说生平服膺《红》、《老》之学。《红》，就是《红楼梦》；《老》，就是《老子》。这《红》《老》之学的主旨，简便些说，就是无论什么事，都听其自然。听其自然又是怎么样呢？沈先生说：“譬如有人骂我，我们不必还骂：他一面在那里大声疾呼的骂人，一面就是他打他自己。我们在旁边看着，也很好，何必费着力气去还骂？又如有一只狗，要咬我们，我们不必打它，只是避开了就算；将来有两只狗碰了头，自然会互咬起来。所以我们做事，只须抬起了头，向前直进，不必在这抬头直进四个字以外，再管什么闲事；这就叫做听其自然，也就是《红》《老》之学的精神。”我想这一番话，很有些同托尔司太的不抵抗主义相像，不过沈先生换了个《红》、《老》之学的游戏名词罢了。

不抵抗主义我向来很赞成，不过因为有些偏于消极，不敢实行。现在一想，这个见解实在是大谬。为什么？因为不抵抗主义面子上是消极，骨底里是最经济的积极。我们要办事有成效，假使不实行这主义，就不免消费精神于无用之地。我们要保存精神，在正当的地方用，就不得不在可以不必的地方节省些。这就是以消极为积极：不有消极，就没有积极。既如此，我也要有些游戏笔墨，造出一个“作揖主义”的新名词来。

“作揖主义”是什么呢？请听我说：——

譬如早晨起来，来的第一客，是位前清遗老。他拖了辫子，弯腰曲背走进来，见了我，把眼镜一摘，拱拱手说：“你看！现在是世界不像世界了：乱臣贼子，遍于国中，欲求天下太平，非请宣统爷正位不可。”我急忙向他作了个揖，说：“老先生说的话，很对很对。领教了，再会罢。”

第二客，是个孔教会会长。他穿了白洋布做的“深衣”，古颜道貌的走进来，向我说：“孔子之道，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现在我们中国，正是四维不张，国将灭亡的时候；倘不提倡孔教，昌明孔道，就不免为印度、波兰之续。”我急忙向他作了个揖，说：“老先生说的话，很对很对，领教了，再会罢。”

第三客，是位京官老爷。他衣裳楚楚，一摆一踱的走进来，向我说：“人的根，就是丹田。要讲卫生，就要讲丹田的医生。要讲丹田的医生，就要讲静坐。你要晓得，这种内功，常做了可以成仙的呢！”我急忙向他作了个揖，说：“老先生说的话，很对很对。领教了，再会罢。”

第四五客，是一位北京的评剧家，和一位上海的评剧家，手携着手同来的。没有见面，便听见一阵“梅郎”“老谭”的声音。见了面，北京的评剧家说：“打把子有古代战术的遗意，脸谱是画在脸孔上的图案；所以旧戏是中国文学美术的结晶。”上海的评剧家说：“这话说得不错呀！我们中国人，何必要看外国戏；中国戏自有好处，何必去学什么外国戏？你看这篇文章，就是这一位方家所赏识的；外国戏里，也有这样的好处么？”他说到“方家”二字，翘了一个大拇指，指着北京的评剧家，随手拿出一张《公言报》递给我看。我一看那篇文章，题目是“佳哉剧也”四个字，我急忙向两人各作了一个揖，说：“两位老先生说的话，很对很对。领教了，再会罢。”

第六客是个玄之又玄的鬼学家。他未进门，便觉阴风惨惨，阴气逼人，见了面，他说：“鬼之存在，至今日已无丝毫疑义。为什么呢？因为人所居者为‘显界’，鬼所居者，尚别有一界，名‘幽界’。我们从理论上证明它，是鬼之存在，已无疑义。从实质上去证明它，是搜集种种事实，助以精密之器械，继以正确之试验，可知除显界外，尚有一幽界。”我急忙向他作了个揖，说：“老先生说的话，很对很对，领教了，再会罢。”

末了一位客，是王敬轩先生。他的说话最多，洋洋洒洒，一连谈了一点多种。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八个字，发挥得详尽无遗，异常透彻。我屏息静气听完了，也是照例向他作了个揖，说：“老先生的话，很对很对。领教了，再会罢。”

如此东也一个揖，西也一个揖，把这一班老伯，大叔，仁兄大人之类送完了，我仍旧做我的我：要办事，还是办我的事；要有主张，还仍旧是我的主张。这不过忙了两只手，比用尽之心思脑力唇焦舌敝的同他们辩驳，不省事得许多么？

何以我要如此呢？

因为我想到前清末年的官与革命党两方面，官要尊王，革命党要排满；官说革命党是“匪”，革命党说官是“奴”。这样牛头不对马嘴，若是双方辩论起来，辩到地老天荒，恐怕大家还都是个“缠夹二先生”，断

断不能有什么谁是谁非的分晓。所以为官计，不如少说闲话，切切实实想些方法去捉革命党。为革命党计，也不如少说闲话，切切实实想些方法去革命。这不是一刀两断，最经济最爽快的办法么？

我们对于我们的主张，在实行一方面，尚未能有相当的成效，自己想想，颇觉惭愧。不料一般社会的神经过敏，竟把我们看得像洪水猛兽一般。既是如此，我们感激之余，何妨自贬声价，处于“匪”的地位；却把一般社会的声价抬高——这是一般社会心目中之所谓高——请他处于“官”的地位？自此以后，你做你的官，我做我的匪。要是做官的做了文章，说什么“有一班乱骂派读书人，其狂妄乃出人意表。所垂训于后学者，曰不虚心，曰乱说，曰轻薄，曰破坏。凡此恶德，有一于此，即足为研究学问之障，而况兼备之耶？”我们看了，非但不还骂，不与他辩，而且还要像我们江阴人所说的“乡下人看告示”，奉送他“一篇大道理”五个字。为什么？因为他们本来是官，这些话说，本来是“出示晓谕”以下，“右仰通知”以上应有的文章。到将来，不幸而竟有一天，做官的诸位老爷们额手相庆曰：“谢天谢地，现在是好了，洪水猛兽，已一律肃清，再没有什么后生小子，要用夷变夏，蔑污我神州四千年古国的文明了。”那时候，我们自然无话可说，只得像北京括（刮）大风时坐在胶皮车上一样，一壁叹气，一壁把无限的痛苦尽量咽到肚子里去；或者竟带了这种痛苦，埋入黄土，做蝼蚁们的食料。

万一的万一竟有二天变作了我们的“一千九百十一年十月十日”了，那么，我一定是个最灵验的预言家，我说：那时的官老爷，断断不再说今天的官话，却要说：“我是几十年前就提倡新文明的，从前陈独秀、胡适之、陶孟和、周启明、唐元期、钱玄同、刘半农诸先生办《新青年》时，自以为得风气之先，其时我的新思想，还远比他们发生得早咧。”到了那个时候，我又怎么样呢？我想，一千九百十一年以后，自称老同盟的很多，真正的老同盟也没有方法拒绝这班新牌老同盟。所以我到那时，还是实行“作揖主义”，他们来一个，我就作一个揖，说：“欢迎！欢迎！欢迎新文明的先知先觉！”

（七年九月，北京）

半农发明这个“作揖主义”，玄同绝对的赞成；以后见了他们诸公，也要实行这个主义。因为照此办法，在我们一方面，可以把宝贵的气力

和时间不浪费于无益的争辩，专门来提倡除旧布新的主义；在他们诸公一方面，少听几句逆耳之言，庶几宁神静虑，克享遐龄，可以受《褒扬条例》第九款的优待；这实在是两利的办法。至于“到了万一的万一”那一天，他们诸公自称为新文明的先觉，是一定的；我们一定会欢迎新文明的先觉，是对于老前辈应尽的敬礼，那更是应该的。

(玄同附记)

她字问题

有一位朋友，看见上海新出的《新人》杂志里登了一篇寒冰君的《这是刘半农的错》，就买了一本寄给我，问我的意见怎么样。不幸我等了好多天，不见寄来，同时《新青年》也有两期不曾收到，大约是为了“新”字的缘故，被什么人检查去了。

幸亏我定了一份《时事新报》，不多时，我就在《学灯》里看见一篇孙祖基君的《她字的研究》，和寒冰君的一篇《驳〈她字的研究〉》。于是我虽然没有能看见寒冰君的第一篇文章，他立论的大意，却已十得八九了。

原来我主张造一个“她”字，我自己并没有发表过意见，只是周作人先生在他的文章里提过一提；又因为我自己对于这个字的读音上，还有些怀疑，所以用的时候也很少(好像是至今还没有用过，可记不清楚了)。可是寒冰君不要说，“好！给我一骂，他就想抵赖了！”我决不如此怯弱，我至今还是这样的主张；或者因为寒冰君的一驳，反使我主张更坚。不过经过的事实是如此，我应当在此处声明。

这是个很小的问题，我们不必连篇累牍的大做，只须认定了两个要点立论：一，中国文字中，要不要有一个第三位阴性代词？二，如其要的，我们能不能就用“她”字。

先讨论第一点。

在已往的中国文字中，我可以说，这“她”字无存在之必要：因为前人做文章，因为没有这个字，都在前后文用关照的功夫，使这一个字的意义不至于误会，我们自然不必把古人已做的文章，代为一一改过。在今后的文字中，我就不敢说这“她”字绝对无用，至少至少，总能在翻译的文字中占到一个地位。姑举一个例：

她说，“他来了，诚然很好；不过我们总得要等她。”这种语句，在西文中几乎随处皆是，在中国口语中若是留心去听，也不是绝对听不到。若依寒冰君的办法，只用一个“他”字：

他说，“他来了，诚然很好，不过我们总得要等他。”

这究竟可以不可以，我应当尊重寒冰君的判断力。若依胡适之先生的办法，用“那个女人”代替“她”（见《每周评论》，号数已记不清楚了），则为：

那个女人说，“他来了，诚然很好；不过我们总得要等那个女人。”

意思是对的，不过语气的轻重，文句的巧拙，就有些区别了。

寒冰君说，“我”“汝”等字，为什么也不分起阴阳来。这是很好的反诘，我愿读者不要误认为取笑。不过代词和前词距离的远近，也应当研究。第一二两位的代词，是代表语者与对话者，其距离一定十分逼近；第三位代表被语句，却可离得很近。还有一层，语者与对话者，是不变动，不加多的；被语者却可从此人易为彼人，从一人增至二人以上。寒冰君若肯在这很简易的事实上平心静气想一想，就可以知道“她”字的需要不需要。

需要与盲从的差异，正和骆驼与针孔一样。法文中把无生物也分了阴阳，英文中把国名，船名，和许多的抽象名，都当作阴性，阿拉伯文中把第二位代词，也分作阴阳两性；这都是从语言的历史上遗传下来的，我们若要盲从，为什么主张采用呢？（我现在还觉得第三位代词，除“她”字外，应当再取一个“它”字以代无生物；但这是题外的话，现在姑且不说。）

此上所说，都是把“她”字假定为第三位的阴性代词；现在要讨论第二点，就是说，这“她”字本身有无可以采用的价值。关于这一点，可以分作三层说明：

一，若是说，这个字，是从前没有的，我们不能凭空造得。我说，假使后来的人不能造前人未造的字，为什么无论那一国的字书，都是随着年代增加分量，并不要永远不动呢？

二，若是说，这个字，从前就有的，意思可不是这样讲，我们不能妄改古义。我说，我们所做的文章里，凡是虚字（连代词也是如此），几乎十个里有九个不是古义。

三，若是说，这个字自有本音，我们不能改读作“他”音。我说，“她”字应否竟读为“他”，下文另有讨论；若说古音不能改，我们为什么不读“疋”字为“胥”，而读为“雅”，为“匹”？

综合这三层，我们可以说，我们因为事实上的需要，又因为这一个符号，形式和“他”字极像，容易辨认，而又有显然的分别，不至于误

认，所以尽可以用得。要是这个符号是从前没有的，就算我们造的；要是从前有的，现在却不甚习用，变作废字了，就算我们借的。

最困难的，就是这个符号应当读作什么音？周作人先生不用“她”而用“伊”，也是因为“她”与“他”，只能在眼中显出分别，不能在耳中显出分别，正和寒冰君的见解一样。我想，“伊”与“他”声音是分别得清楚了，却还有几处不如“她”：一，口语中用“伊”字当第三位代词的，地域很小，难求普通；二，“伊”字的形式，表显女性，没有“她”字明白；三，“伊”字偏近文盲，用于白话中，不甚调匀。我想，最好是就用“她”字，却在声音上略略改变一点。

“他”字在普通语区域中，本有两读：一为t' a用于口语；一为t' uo，用于读书。我们不妨定“他”为t' a，定“她”为t' uo；改变语音，诚然是件难事，但我觉得就语言中原有之音调而略加规定，还并不很难。我希望周先生和孙君，同来在这一点上研究研究，若是寒冰君也赞成“她”字可以存在，我也希望他来共同研究。

孙君的文章末了一段说，“她”字本身，将来要不要摇动，还是个问题，目下不妨看作X。这话很对，学术中的事物，不要说坏的；便是好的，有了更好，也就要自归失败，那么，何苦霸占！

寒冰君和孙君，和我都不相识。他们一个赞成我，一个反对我，纯粹是为了学术，我很感谢；不过为了讨论一个字，两下动了些感情，叫我心上很不安，我要借此表示我的歉意。

寒冰君说，“这是刘半农的错”！又说，“刘半农不错是谁错？”我要向寒冰君说：我很肯认错；我见了正确的理解，感觉到我自己的见解错了，我立刻全部认错；若是用威权来逼我认错，我也可以对于用威权者单独认错。

（九年六月六日，伦敦）

汉语字声实验录提要

这部论文的趣旨是双重的：一方面是我用了科学方法来研究我们中国语言中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另一方面是我将我国前人在这问题上所下过的功夫，连同他们的缺点，用最清楚的语言表写出来，希望能使研究这问题的人(外国人和中国人自己)，可以免却许多纠纷。

为了这后一层，我在书中开端处，自三至二八节，写了一篇小小的四声研究史；又自五四至七四节，把“阴”，“阳”，“清”，“浊”，“上”，“下”，等名词的各种歧义，以及“字书声”，“方言声”，“常声”，“变声”等的定义，都说个清楚。

关于今日以前各作者在四声问题上所下的判断或揣测，我引用了不少。古一些的已几乎全备；新近的却只能举了几个例，因为，一层是篇幅有限，二层是有价值的并不多。

我所用的实验方法，可以分作四步说：第一是记声，第二是量线，第三是计算，第四是作图。

记声并不是一件难事，只须有得一个好音鼓，和一个速率够大而且极匀的好浪线计。但最要紧的是发音正确的受试人和选择得很适当的材料。关于这两层，我在九二至九五节中说明。

量线是只量到十分之一公厘(mm)为止；所用的器具，只是一个十倍的放大镜和一支玻璃小尺。若然用显微镜，那就是要量到百分之一公厘以上也极容易。但所得结果，却未必能更好，因为烟薰纸上的线纹，并不适宜于显微镜的观察，假使放大得过度了，浪线都变成了“肥线”，其中点极难断定；要是任意断定，结果反要增加许多错误。

计算音高的方法，目下至少有五六种。我所用的一种，就正确上说，是处于第二位。处第一位的一种方法，是将语言的音，和电流音义的音，同时平行画出；然后依据音义线纹中某一颤动的长短以推算语音线纹中处于同一时间中的一个或多个颤动的速度。若然浪线计的速率不很均匀，就非用这方法不可。我所用的一个浪线计，却用不着这样。

作图的兰番工夫可以省得，若然所试验的只是三五个字或三五个音，因为在这样时，我们只是看了数目字，也就可以比较得出各音的高低起落来。所以在法国的《语音学杂志》中，在德国的Vox杂志中，又在Rousselot及Poirot两先生的著作中，都可以找到这一类的例。但若做了大批的实验工夫，就万不能把数目字做比较的工具。而且把数目字印入书中，也很不便当。假使我论文中不用图而用数目字，这部书的分量，至少要增加六倍。

作图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直接的，一种是用对数的。直接法从前Poirot先生用过，现在Scripture先生也还用着。这是个比较简易的方法，有时也颇可以用得，但根本上与音理相背，并不能将各音的高度正确表出。所以我所用的是对数法。

应用对数法在工作上很烦苦。自从我将一六页的第一第二两表制成了，就简易了不少。但便是这样，还比直接法烦苦到一倍以上。

就以上所说，可见做这种实验的工夫，所需要的时间很多，而且只能慢慢的做，不能做得快。平均是每一个字或一个音，延长只在半秒钟左右的，就要用两点以至两点半钟的工夫。我全书所用的实验工夫，是整整三十个月，编写成书的时间还不算在内。单指胡适先生一段《清道夫》的文章，共二百五十五字，延长七十二秒钟，就用了十二个半礼拜的工夫。

作这种工作所需要的时间如此之多，实在是一件不能轻轻放过的事。因为这能给学人以许多痛苦，从而阻碍学术的进步。

数年来身受的痛苦，使我创制了一种新仪器，将量线，计算，作图三种工夫，交给机械去代做(看后方)。

我书中将实验方法说明之后，接着便有一段关于字声上的普通观察。在这段书里，我举了十种方言中的字声来做例，一方面用以证明决没有两种方言中的字声制能于完全符合，另一方面是借此说明字声的比较研究法。我对于“字声”一个问题上也下了几个揣测，虽然我们现在还不能从事于这种的工作。又自八七至八九节，我说明我自己的“标声法”；这方法简易明确，不但语音学者可以用得，便是普通的言语学者也可以用得。

在一一四节里，我把我将来研究这字声问题的计划说明；因为本书并不完全，如全书开首时并结尾时所说。

关于字声与构成声音的四种分子间所有的关系，也有相当的讨论。

这种讨论的用意，是在于通知从事研究字声的人，不要将问题看得太简，可也不要去做吃力不讨好的工。这句话解释是如此：一方面，我们大家都知道字声之构成，在于音高，但音长与音质，也不能不问；另一方面，关于音强一个问题，目下不妨暂且搁着，不要随随便便将物理学中 $I=A^2n$ 一个公式错用了。我也知道研究字声，不能将强弱一件事置之不问，但因物理学中这一个公式既不能适用，我们又还没有能发明一个正确的新公式，又何苦要多做些无谓的工作呢？

一般的实验语音学家在这件事上都很疏忽，便连Rousselot, Scripture, Chruski诸先生也是如此。因此常有人向我说：你研究字声，你研究的是音高，很对；但你把音强忘记了！为答复这一类的问题起见，我既在书中详论了研究音强之不可能，更在此地重提一下。

我从开场说到现在，说的几乎完全是方法。说得多了！但是并不太多。因为一切实验科学中最重要的总是方法。方法安排定了，其余只是机械般的做法；所得结果，几乎是无可辩论的。因此我们也可以说，实验语音学一种科学的全体，只是一大堆的方法的总称罢了。

现在说书的本身。

此书分为两编。第一编论常声，第二编论变声。

常声是单发的音，而且是咬嚼得很清楚的。严格地说，语言中简直就没有常声这样东西，因为我们说话时，决然用不着这样的声。但是我们假定因为研究某一方言中的某一字声，而请一个说这方言的人来说一个例字给我们听，他所说出来的，一定是个常声。因此我们可以说：常声乃是我们理想中的声，我们将它说出时，我们以为它可以代表某一声的现象的全体，而在实际的语言中，这某一声的现象，却未必和常声一样表露得完全：有时只表露出一部分，有时因为种种关系，竟可以全不表露。这种只表露一部分或竟是全不表露的声，我们就称他为变声。

我研究了三种方言中的常声，就是北京语中的，广州语中的，江阴语中的。北京语与广州语之可以代表北部及南部语，自然没有问题。江阴语是我自己的方言。我本想找个苏州人来发音，做江浙语系的代表，但竟没有能找到，不得已乃用江阴语。

实验工夫若然只做一次，那是万万不够的。所以我在要断定某一声的价值时，必比较许多次实验所得的结果，而求其最普通之一现象。

凡与字声有关系的事，也大都研究。因此，在广州语中，我非但研

究旧说的八声，还研究了新近发现的第九声；在江阴语中，我研究了至今聚讼的一个清浊问题，和“浊上”的消失问题；在北京语中，我研究了“自然声”，“人声转变”，“哑音气子”等问题。

第二编所研究的变声，又分作重音与音节两件事。在重音一件事上，我得到了十几个见解。这种见解在目下还不能当作结论。把这小小的收获与所用的工夫相比较，似乎很不上算；但在不怕做苦工的人看来，可以增加一分勇气了。我们知道无论研究何种科学，实验的或非实验的，假使一个人用了一世工夫而所得结果只是十个八个字，但求十个八个字真有价值，那就决不是一个耻辱。

关于音节，我只是十分粗略的观察了一下，因为这个问题，需要特种的材料和受试人，本以分开研究为是。

现在说附录中所记我所创造的两件仪器。

第一种仪器叫做音高推算尺，可以做量线，计算，作图等工作；有大小两式，小式尤比大式合用，因为价值便宜，便于取携，而且不易损坏；用以量线，可以量到十分之一公厘，其准确与用玻璃小尺绝对一样，而时间可以省到三四倍；又不伤目力，因为放大镜的倍数很低。说到作图，可有两种方法：一种是用计算的，一种是不用计算，就将量线，计算，作图三事，同时兼做的：这后一种方法，比前一种更好，因为非但简便省事，而且所得结果，其正确程度，竟超出普通方法之上。其理由有二：

第一，普通方法所得的结果，并不是直接来的，是经过了许多次的间接来的；每经过一次的间接，就有增加一分的错误的可能。无论你怎么精细用心，这总是件逃不了的事、我们仪器上所得的结果，却完全是直接的；完全直接也当然并不就是绝对没有错误，但错误的分量总少得多了。

第二，在物理计算中，除有特别需要外，通常只用数目字三位；在图算法中，用两位就够。我们这仪器上的对数尺，却用了四位：以四位与三位或两位相比，自然是正确得多了。

因有这种原因，所以用无计算法直接画出来的曲线，形式非常整齐，不比用普通方法所画的，常带着许多不规则的折齿。这种折齿从何而来，向来没有人能明白解释过；现在我们可以说，这是错误成分太多的结果。

第二种仪器是一个音鼓，感觉特别灵敏，所以记起声来(尤其是在记

女声的时候)，比普通的Rousselot式鼓好得多。若是把鼓膜的宽紧和鼓管中的气量校得恰好，所画出的浪线，几乎可以和Lioretgraphe上画出来的一样；而且于记语声之外，更能记“音哨”和许多种口吹乐器的声。因有此种作用，我们有时可以把它替代电流音叉，有时也可以借它研究乐器的音高。我们还能用它记留声机片的音，因此可以利用市上所卖的留声机片，来研究名歌人或名乐师的奏品。为了这样一件事，从前Scripture先生曾特造过一种仪器。这仪器的价值至少要比我们的音鼓高上一百倍，实验时所用时间和材料，要多到一千倍；所画出的浪线，自然比我们的鼓上所画出的详细得多，但在普通研究中，我们永世也用不着那样的详细。

(十四年三月十七日，巴黎)

国语运动略史提要

这一部小论文的主旨，在于记述事实，并不在于评论。若然中间有些地方带着些评论的意味，那不过是为着要把所说到事实，说得分外明了些。

此外还有一件事要声明：我虽然是国语统一筹备会的会员，我在论文中，却并不作此会的宣传者，这就是说，我的态度是客观的，不是主观的。即如注音字母，在普通教育及社会教育上，我承认它有相当的价值，但我并不就因此承认它在科学的研究上有何等的价值。

关于国语一个问题上的事实，可以按着时间，略叙如下：

最初是为着要普及教育，便利妇孺，而苦于文言太难，因此就有人提倡做白话书报。这一期的白话文，依着作者的意旨，是专为便利妇孺的，并不是给读书识字的人看的。

但是，这种文体的改变，并没有能收到多大的效果。因为把文言改成了白话，只是能“易懂”，并不能“易识”，而易识的重要，乃更在易懂之前。因此，接着就有了一个字母时期。这一期中的作者，想要造成一种字母制的字，替代原来的汉字，使识字一件事，可以容易些。

在这一期的作者中，我们不当忘记了王照劳乃宣两先生。

但是，假使我们要利用字母，我们马上就可以发现一个极重要的问题：那就是读音问题。假使没有方法统一读音，字母就全无用处。

在起初一步，大家以为这问题很容易解决，只需把京语当作标准语就完了。

后来大家渐渐看出，采用京语有许多的不相宜；为中国全民族着想，与其用京语，不如用一种人造语。这人造语中的各分子，连最重要的读音一件事也包括在内，应当先期分别研究，务求所造成的语言，使全中国人民，能于接受。

到此地才是真正的国语运动的开场；也是到了此地，一般提倡国语的人，才把中国全民族混通看作一块，不再用开通知识便利妇孺等话头，

把一国的人民，勉强分成两家。

自此以后直到今天，我们常在这一条轨道中走，虽然中间也经过了不少的变更与周折。

目下的国语的情形是这样：

自从民国七年注音字母公布了，次年《国音字典》出版了，关于统一读音的一个问题，已算有了个解决，虽然这个解决并未能完全应合到我们的理想与希望。

自从民国八年国语统一筹备会成立了，我们已有了一个正式的永久机关，去研究关于国语的一切问题，并安排关于国语的一切事务。

自从有了民国五年以后的文学革命；国语一件事就渐渐的建造于一个稳固的基础上。我们应当注意：我们是直到了此一刻，才能明了白话文的真价值。

在这种种的情状之下，我们可以说，亦许在十年八年之后，我们可以有得一种很合实用的辅助语。

但是在此地，我们应当补说一件事：

目下从事于国语的人，几乎把全力用在统一读音上，希望理想中的辅助语，可以早早造成。除去少数的罗马字提倡者以外，我们再听不见有什么人主张要用什么字母来代替汉字；注音字母只是一件标音的工具，使读音可以统一，并不是一种文字，看它的名称可以知道。

这种态度上的转变，看去自然是很奇怪的。因为我们方才说过，统一读音并不是一个目的，乃是一种方术，或者说，是一种预备的工夫，使字母制的文字，可以实现。按着理说，我们当然不能在半路上就停止了。

但是要使字母制的文字实现，无论是用罗马字或另一种字，我总觉得非常困难，虽然这问题是重要到极顶。我以为我们应当有些耐心。我们应当将这问题用最精细的方术去研究；凡是与这问题有关系的事项，都该一一分别讨论，不能放松一点。若不先下这种工夫，贸贸然就尝试，恐怕结果一定不好。因此就目前说，我们应当把野心收小一点，暂认我们今日所做的统一国语的工作，也是一种差可满意的工作，因为这种工作的本身，也有相当价值在：

因此缘故，我在论文中对于汉字罗马化这一个问题，只是在结束处很简略地说了一说，并没有能将诸位提倡人的办法，节要写入。我在这

件事上很抱歉，但我希望他们将来提出的办法，能比今日以前的更好，更进步，更完满。在根本上说，我决然不是他们的反对者。

以上将我论文中的大要说完；以下请允许我指出几个特别点：

第三章说注音字母。用英文写的说注音字母文章，已有了几篇，用法文写的，这亦许还是第一篇。

因求便利于非语音学者的读者起见，我的标音法和论音法，并没有采用Rousselot制或“国际制”。

第四章中说到文学革命。这当真是中国现代史的一件大事：在记述此事之前，有一段文言的构成史。这是我个人的研究，虽然说得很简略，或者还不是全无根据。

最后是在第五章中，第一七八节，我说明官话究竟是什么；一八二至一八七节，我把京语与国语两相比较。这两段，我自信剖析得很清楚。

（十四年三月十七日，巴黎）

《扬鞭集》自序

我今将我十年以来所作所译诗歌删存若干首，按时期先后编为一集，即用第一首诗第一二两字定名为“扬鞭”。

我不是个诗人。诗人两字，原不过是做诗的人的意思。但既然成了一个名词，就不免带着些“职业的”臭味。有了这臭味，当然就要有“为做诗而做诗”的机会，即是“榨油”“绞汁”的机会，而我却并不如此。

我可以一年半不做诗，也可以十天八天之内无日不做诗。所以不做，因为是没有感想；所以要做，因为是有感想肚子里关煞不住。

有时我肚子里有了个关煞不住的感想，便把什么要事都搁开，觉也睡不着，饭也不想吃——老婆说我发了痴，孩子说我着了鬼——直到通体推敲妥帖，写成全诗，才得如梦初醒，好好的透了一口气。我的经验，必须这样做成的诗，然后在当时看看可以过得去，回头看看也还可以对付。至于别人看了如何，却又另是一件事。

请别人评诗，是不甚可靠的。往往同是一首诗，给两位先生看了，得到了两个绝对相反的评语，而这两位先生的学问技术，却不妨一样的高明，一样的可敬。例如集中《铁匠》一诗，尹默、启明都说很好，适之便说很坏；《牧羊儿的悲哀》启明也说很好，孟真便说“完全不知说些什么！”

原来做诗只是发抒我们个人的心情。发抒之后，旁人当然有评论的权利。但彻底的说，他的评论与我的心情，究竟能有什么关系呢？

我将集中作品按照时间先后编排，一层是要借此将我十年以来环境的变迁与情感的变迁，留下一些影子；又一层是要借此将我在诗的体裁上与诗的音节上的努力，留下一些影子。

我在诗的体裁上是最会翻新鲜花样的。当初的无韵诗，散文诗，后来的用方言拟民歌，拟“拟曲”，都是我首先尝试。至于白话诗的音节问题，乃是我自从民九年以来无日不在心头的事，虽然直到现在，我还不能在这上面具体的说些什么，但譬如是一个瞎子，已在黑夜荒山中摸索了多年了。

(十五年三月三日，北京)

“好好先生”论

当任可澄将要上台做教育总长的时候，一天，我同适之在某处吃饭。我因任可澄这三个字好像有些不见经传——其实是我读的经传太少——就问适之：你看这人怎样？不要上了台也同老虎一样胡闹吗？适之说：“不会不会！他决不会！他是个好好先生。”

后来，好像又在什么报上看见记任可澄的事，说你做省长多年，调动的知事只有两三个。

其实调动知事的多少，我是绝对不要注意的。不过，拿这件事来做参考，似乎适之所说的好好先生一句话，总还有点可靠。

好好先生也并不是什么一个大不了的考语；换句话说，只是个“全无建白的庸人”；译作白话，乃是“糊里糊涂的大饭桶。”

但是，在这个年头儿，白米饭吃不饱，窝窝头也就可以将就；鸦片烟吃不着，吞上皮也就可以过瘾。所以，苟其任可澄真是好好先生，可就算啦！

于是我就睁着眼睛来看这位好好先生：

他第一个下马威，便是用武力接收女师大。

第二件事，便是他上台之后没有筹到一个镋子，却要分润别人所筹到的钱。

再次一件大事，便是活活的烧死了两个女生。

再次一件事便是不能为中小学筹钱，反从中捣乱，闹出京保两派的大风潮。

抹去零的不说，单说这四件事，也就够了罢。

或曰：任可澄屡次说过“以人格为担保”这一句话，他的人格既已做了担保品不放在自己家里，也就难于怪他。

如此说，他可真是公而忘私的好好先生呢！

(十五年十二月五日，北京)

答《对于〈新青年〉之意见种种》

Y·Z·君：

敝志是绝对主张白话文学的；现在虽然未能全用白话文，却是为事实所限，一时难于办到；并不是胆小，更不是不专诚。

先有王敬轩后有崇拜王敬轩者及戴主一一流人，正是中国的“脸谱”上注定的常事，何尝有什么奇怪？我们把他驳，把他骂，正是一般人心目中视为最奇怪的“捣乱分子”！至于钱玄同先生，诚然是文学革命军里一个冲锋健将。但是本志各记者，对于文学革新的事业，都抱定了“各就所能，各尽厥职”的宗旨；所以从这一面看去，是《新青年》中少不了一个钱玄同；从那一面看去，却不必要《新青年》的记者，人人都变了钱玄同。

Tagore的著作，从前已由独秀先生译过一首《赞歌》登在第一卷里；本号和前一号，半农也从《The Crescent Moon》里专译了几首。但求《新青年》能够长寿，将来第六七八九……卷的第六号，总有一本是“Tagore号”。因为外国文豪很多，不比我们中国只有一位林大文豪，又因为要介绍外国文豪，总得把他的著作，和别人对于他评论，仔细研究过了，方可动手，决不是随便拿过一本书来，请阿猫阿狗信口说了一遍，便可用起韩、柳的——或者是《聊斋》的——笔法，一天挥上“四千字”的。所以本志拟定的办法，是每卷介绍一人。

本志的通信栏，本来是“商榷”性质，并不专是“雄辩”。来信所说新闻一栏，似乎可以不必：因为通信栏，固然可以交换意见；便是具体的论文，也可以“读者论坛”中发表。

女子问题，本志非常注意；只因外间来稿甚少，记者等把自己的主张发表了，也没有人来讨论，所以不知不觉，竟像把这个问题冷搁起来了。我们中国人，大概可分作两种：一种是顽固，无论世间有什么新事新理，他们决不肯平心研究，只是一笔抹杀，斥之为“叛逆”，为“数典忘祖”；一种是糊涂，无论世界上的潮流激荡到怎么样，他们只是醉生梦

死，什么事都不闻不问。第一种人，可称之为“准狗”；因为狗是喜欢吃矢的，你要叫他不吃矢，他定要咬你。第二种人，可称之为“准猪”；因为猪是一辈子昏天黑地，预备给人家杀的。唯其如此，所以可爱可敬的中国人，快要进化到原人时代去了！

来诗六首，做的译的，都是很好，《小河呀》一首，尤觉有趣可爱。其文字上有应行斟酌之处，已与同人商量，代为修改一二，不知有当尊意否？

记者（半农）

一九一八年八月三十日

北大河

惟中华民国十有八年十有二月，北京大学31周年纪念刊将出版，同学们要我做篇文章凑凑趣，可巧这几天我的文章正是闹着“挤兑”（平时答应人家的文章，现在不约而同地来催交卷），实在有些对付不过来。但事关北大，而又值31周年大庆，即使做不出文章，榨油也该榨出一些来才是，因此不假思索，随口答应了。

我想：这纪念刊上的文章，大概有两种做法。第一种是说好话，犹如人家办喜事，总得找个口齿伶俐的伴娘来，大吉大利说上一大套，从“红绿双双”起，直说到“将来养个状元郎”为止。这一工我有点做不来，而且地位也不配：必须是校长，教务长，总务长等来说，才能说得冠冕堂皇，雍容大雅，而区区则非其人也。第二种说老话，犹如白发宫人，说开天遗事，从当初管学大臣戴着红顶花翎一摆一摇走进四公主府说起，说到今天二十九号汽车在景山东街嗷嗷嗷；从当初同学中的宽袍大袖，摇头抖腿，抽长烟管的冬烘先生说起，说到今天同学中的油头粉脸，穿西装，拖长裤的“春烘先生”（注曰：春烘者，春情内烘也）。这一工，我又有点不敢做，因为我在学校里，虽然也可以窃附于老饭桶之列，但究竟不甚老：老于我者大有人在。不老而卖老，决不能说得“像煞有介事”；要是说错了给人家挑眼，岂非大糟而特糟。

好话既不能说，老话又不敢说，故末真有点尴尬哉！

叫！有啦！说说三院面前的那条河罢！

我不知道这条河叫什么名字。就河沿说，三院面前叫做北河沿，对岸却叫做东河沿。东与北相对，不知是何种逻辑。到一过东安门桥，就不分此岸彼岸，都叫做南河沿，剩下的一个西河沿，却丢在远远远的前门外。这又不知是何种逻辑。

真要考定这条河的名字，亦许拿几本旧书翻翻，可以翻得出。但考据这玩意儿，最好让给胡适之顾颉刚两先生“卖独份”，我们“玩票”，总不免吃力不讨好。

亦许这条河从来就没有过名字，其惟一的名字就是秃头的“河”，犹如古代黄河就叫作河。

我是个生长南方的人，所谓“网鱼漉鳖，在河之洲；咀嚼菱藕，拊拾鸡头；蛙羹蚌臠，以为膳羞；布袍芒屨，倒骑水牛”，正是我小时候最有趣的生活，虽然在杨元慎看来，这是吴中“寒门之鬼”的生活。

在八九岁时，我父亲因为我喜欢瞎涂，买了两部小画谱，给我学习。我学了不久，居然就知道一小点加一大点，是个鸭，倒写“人”字是个雁；一重画之上交一轻撇是个船，把“且”字写歪了不写中心二笔是个帆船。我父亲看了很喜欢，时时找几个懂画的朋友到家里来赏鉴我的杰作。记得有一天，一位老伯向我说：“画山水，最重要的是要有水。有水无山，也可以凑成一幅。有山无水，无论怎样画，总是死板板的，令人透气不得。因为水是表显聪明和秀媚的。画中一有水，就可以使人神意悠远了。”他这话，就现在看来，也未必是画学中的金科玉律；但在当时，却飞也似的向我幼小的心窝眼儿里一钻，钻进去了再也不肯跑出来：因而养成了我的爱水的观念，直到“此刻现在”，还是根深蒂固。

民国六年，我初到北京，因为未带家眷，一个人打光棍，就借住在三院教员休息室后面的一间屋子里。初到时，真不把门口的那条小河放在眼里，因为在南方，这种的河算得了什么，不是遍地皆是么？到过了几个月，观念渐渐的改变了。因为走遍了北京城，竟找不出同样的一条河来。那时北海尚未开放，只能在走过金鳌玉蜆桥时，老远的望望，桥南隔绝中海的那道墙，是直到去年夏季才拆去的。围绕皇城的那条河，虽然也是河，却因附近的居民太多了，一边又有高高的皇城矗立着，看上去总不大入眼。归根结底说一句，你若要在北京城里，找到一点带有民间色彩的，带有江南风趣的水，就只有三院前面的那条河。什刹海虽然很好，可已在后门外面了。

自此以后，我对于这条河的感情一天好一天；不但对于河，便对于河岸上的一草一木，也都有特别的趣味。那时我同胡适之，正起劲做白话诗。在这一条河上，彼此都喻过了好几首。虽然后来因为喻得不好，全都将稿子揉去了，而当时摇头摆脑之酸态，固至今犹恍然在目也。

不料我正是宝贵着这条河，这条河却死不争气！十多年来，河面日见其窄，河身日见其高，水量日见其少，有水的部分日见其短。这并不是我空口撒谎：此间不乏十年以上的老人，一问便知端的。

在十年前，只隆冬河水结冰时，有点乌烟瘴气，其余春夏秋三季，河水永远满满的，亮晶晶的，反映着岸上的人物草木房屋，觉得分外玲珑，分外明净。靠东安门桥的石岸，也不像今日的东歪西歇，只偷剩了三块半的石头。两岸的杨柳，别说是春天的青青的嫩芽，夏天的浓条密缕，便是秋天的憔悴的枯枝，也总饱含着诗意，能使我们感到课余之暇，在河岸上走上半点钟是很值得的。

现在呢，春天还你个没有水，河底正对着老天；秋天又还你个没有水，老天正对着河底！夏天有了一些水了，可是臭气冲天，做了附近一带的蚊蚋的大本营。

只是十多年的工夫，我就亲眼看着这条河起了这样的一个大变化。所以人生虽然是朝露，在北平地方，却也大可以略阅沧桑！

再过十多年，这条河一定可以没有，一定可以化为平地。到那时，现在在蒙藏院前面一带河底里练习掷手榴弹的丘八太爷们，一定可以移到我们三院面前来练习了！

诸公不信么？试看西河沿。当初是漕运的最终停泊点；据清朝中叶人所做的笔记，在当时还是檣桅林立的。现在呢，可已是涓滴不遗了！

基于以上的“瞎闹”（据师范大学高材先生们的教育理论，做教员的不“瞎闹”是就‘瞎不闹’，其失维均，胡区区亦乐得而瞎闹），谨以一片至诚，将下列建议提出于诸位同事及诸位同学之前：——

第一，那条河的最大部分（几乎可以说是全体），都在我们北大区域之内，（我们北大虽然没有划定区域，但南至东安门，北达三道桥，西迄景山，谁也不能不承认这是我们北大的势力范围矩——谓之为“矩”而不言“圈”者，因其形似矩也——而那条河，就是矩的外直边），我们不管它有无旧名，应即赐以嘉名曰“北大河”。

第二，既称北大河，此河应即为北大所有。但所谓为北大所有，并不是我们要把它拿起来包在纸包里，藏在铁箱里，只是说：我们对于此河，应当尽力保护；它虽然在校舍外面，应当看得同校舍里面的东西一样宝贵。譬如目今最重要的问题，是将河中积土设法挑去，使它回复河的形状，别老是这么像害着第三期的肺病似的。这件事，一到明年开春解冻，就可以着手办理。至于钱，据何海秋先生说——今年上半年我同他谈过——也不过数百元就够；那么，老老实实由学校里掏腰包就是，不必向市政府去磕头，因为市政府连小一点的马路都认为支路不肯修，

哪有闲情逸致来挑河？(但若经费过多，自当设法请驻平的军队来帮帮忙)此外，学校里可以专雇一两个，或拨一两个听差，常在河岸上走走。要是谁家的小少爷，走到河边拉开屁股就拉屎，就向他说：“小弟弟，请你走远一步罢，这不是你府上的中厕啊！”或有谁家的老太太，要把秽土向河里倒，就向她说：“你老可怜我们的北大河罢！这大的北平城，那一处不可以倒秽土呢？劳驾啊，我给您请安！”诸如此类，神而明之，会而通之，是在哲者。

河岸上的树，现在虽然不少，但空缺处还很多。我的意思，最好此后每年每班毕业时，便在河旁种一株纪念树，树下竖石碑，勒全班姓名。这样，每年虽然只种十多株，时间积久了，可就是洋洋大观了。假如到了北大开一百周年纪念会时，有一个学生指着某一株树说：“瞧，这还是我曾祖父毕业那年种的树呢。”他的朋友说：“对啊！那一株，不是我曾祖母老太太密斯某毕业的一年种的么？”诸位试闭目想想，这还值不得说声“懿欤休哉”么？

总而言之言之总之，我虽然不相信风水，我总觉得水之为物，用腐旧的话来说，可以启发灵思；用时髦的话来说，可以滋润心田。要是我们真能把现在的一条臭水沟，造成一条绿水涟漪，垂杨飘拂的北大河，它一定能于无形中使北大的文学，美术，及全校同人的精神修养上，得到不少的帮助。

我的话已说完，诸位赞成的请高举贵手，不赞成就拉倒，算我白费，请大家安心在臭水沟旁过活！

(十八年十二月一日，北平)

致北平市长周大文

华章先生市长座右：教读多忙，罕承清海。维动定迪吉，德业日新，为祝为慰。敬启者：反对营业舞场，复实首创其议。半年前忝长女院，曾牌告学生，倘稍涉足，立除学籍。一时中外报纸，传为异闻，攻击讥嘲，数月未息。而复屹然未动，持之愈坚。良以青年正当力学救国之时，一旦堕入奢靡淫污之窟，不啻饮以蜜酖，而致其死命也。幸未几，政府即颁禁闭之令。平市赖公果断办理，不及二月，即告肃清。复今虽已不负学校行政责任，而能目睹陷害青年之恶瘴，得以排除一面，亦不禁额手称庆，深佩政府之贤明，及我公处事之敏捷也。乃犹有一二旅馆，假藉外人势力，公然设场，甚至登报招摇，洋洋自得。夫国际通商，虽有条约之保障。而所在国特有之禁令，则在所必遵。故美国禁酒，未闻酿造之国家据条约向纽约运酒。英国禁娼，未闻卖淫之国家，据条约在伦敦设窑。吾国禁烟，外奸私贩，在所难免，然亦未闻公开吃，登报招人。以彼例此，事正相类。该旅馆等，若设于使馆界中，犹可言吾国政令之所不及。今分明在界外，而乃悍然蔑视政府之命令，违抗我公之设施，我公若曲予优容，恐转为彼辈所窃笑，且何以对政府？何以对被封之中国舞场？我公处代表全市尊荣之地位，此而不图，恐市民未必能谅解我公之雍容大度，转或怀疑而生腹非。此则爱公之市民如复者，所以不得不以寸笺奉告也。敬请政安。

刘复敬上

(二十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北平)

关于新诗致胡适之的信

适之兄：

我们有九个月不见了。想到我在北京时，常常和你讨论(有时是争论)诗。所以我现在写这封信，虽然是向你问好，却不说“辰维……为慰”，仍旧是说诗。我希望我们通一次信，便和我们见面谈一回天一样。

我很不满意，为什么我自从离开本国之后，没有看见过一首好诗(虽然我在外国看见的报章杂志很少)? 更不满意的，便是为什么你，起孟，尹默近来都不做诗? 你的上山，起孟的小河，尹默的三弦，都可算白话诗开创时代的有成效的成绩；我的铁匠，虽然你不十分赞成，却也可以“附骥”。但是，看到我们当初的理想，这一些很零碎的小成绩，算得到什么?

你的《尝试集》已刻成了。但是，这只是“尝试”范围中的“成功”，并不就是“成功”。

旧体诗的衰落，是你知道的。但是，新体诗前途的暧昧，也要请你注意。

我不是说，我们提倡(或创造)了一件事，便该由我们一手经纪到底。换一句话，便是我并不以为“初期白话诗人”，应当由我们几个包办。能有比我们好的，他尽可以“取而代之”。我们也甘心退让。因为我们只希望我们的“目的”成功。我们的“目的”成功了，虽然我们个人不成功，也就同成功一样。但是，看看近来报章杂志上登出来的许多“诗”，终不免要教我悲观。错了！悲观是没用的。不如说：要教我们增加勇气，努力的挑担子。

诚然，我们在诗上面，功夫愈多，经验愈多，便觉得难处愈多，胆子愈小。所以我觉得我前三年做的诗，十首中至少有五首可以烧得。但是，虽然难，我们正该拼命从这“难”字中钻出去。有不妥的，我们预备将来十首中烧去九首，究竟还剩得一首。若是因为他难，便怕，便懒，便从此不动，那么，结果是一个字也没有！

上文说了许多话，其实只说得一句，便是请你“多做”。尹默是个懒鬼(鬼者，鬼谷子之省文)。除非他自己做，你便用鞭子打，他也不做。起孟本来不专心做诗；不过偶然兴到，做一两首，却很好，很别致。所以尹默是催也没用，起孟是无需催得。惟有你，既是“榨机”，又是白话诗的发难者，却不可听你懒。

我是向来喜欢胡诌的。到了伦敦，已诌了好多首，寄在仲甫处。其中有几首描写小孩子的，似乎别有趣味；如果你看见，请你评论评论。

有两首诗，附在这一封信里寄上。一首很平常；一首短歌，请你仔细评论。这短歌的体裁，虽然是开创，却有一半是摹仿一个人(不是中国人)。你眼光很高，请你猜一猜：什么人？

在《时事新报》上，看见你一封信，和胡怀琛的许多东西。从前在北京常听你说“不值得一驳”。我心中很不以为然；以为天地间难道竟有不值得一驳的东西？到看了这位南社诗人的雅论，我才晓得我从前的不是！

再看他的明月诗， he 说是“合修词，物理，佛理的精华，共组织成一诗，复杂极了！”又说“眼前的新体诗，能如此的也不多了”！唉！不要脸的人，天地间原是有的，我何必苦苦的责备他？

在不相识的人中，做诗最认真，而又得一部分人的同情的，要算郭沫若。你对于他，有什么评论？我不甚赞成他。我以为他只是抄袭些西洋文学中的艳丽，或神秘字样，来填充篇幅，骨底里却空无所有。这可以说，是外国式的“山节藻梲”。

康白清是聪明人。他的《送客黄浦》，真好。新近在《新潮》二/三号登的《疑问》，也可以“压卷”，不过第五节大可删得。然而登在《时事新报》里的《归来太和魂》就很平常。

《新潮》里的诗，比别种杂志里所登的，自然好得许多。但二/三号中，除《疑问》外，竟一无可取。俞平伯两首，都平常。傅斯年两首，第一首还过得去，第二首太坏。然而他自己向我说，第二首(自然)是他最得意的。我找来找去，找不出好处来。我的意见，以为做诗时，断断不可搭架子。要能把高尚的思想，从平常人的身份、口吻中表现出来，才显得真本领。傅孟真一开口便搭了一个学者的搭(架)了；以后也处处唯恐人家不知道他是个学者。不知“梅花忽地开言道：小的梅花接老爷”，固然很糟；便换作“小子梅花拜老师”，亦何尝便好？

罗志希诗才很薄弱。我向傅斯年说过：诗人之门，不许志希敲得。看他《送许楚僧诗》，几乎是一篇短祭文！

以上所说，只是随便谈天，当然不足据为定论。我写这封信的目的，便是希望你“诗炉从此生新火”。

你的《尝试集》，《国语讲义》，《英文近人诗选》，或他种著作(不论长篇短篇)，又杜威的讲演录(中文或英文)，均希寄我一份。

看报上，知道《新青年》已经收回自办了。以后的办法如何？请择要告我一二。

刘半农

敲 冰

零下八度的天气，
结着七十里路的坚冰，
阻碍着我愉快的归路。
水路不得通，
旱路也难走。

冰！
我真是奈何你不得！
我真是无可奈何！

无可奈何，
便与撑船的商量，
预备着气力，
预备着木槌，
来把这坚冰打破！
冰！
难道我与你，
有什么解不了的冤仇？
只是我要赶我的路，
便不得不打破了你，
待我打破了你，
便有我一条愉快的归路。

撑船的说“可以”！
我们便提起精神，
合力去做——
是合着我们五个人的力，

三人一班的轮流着，
对着那艰苦的，不易走的路上走！

有几处的冰，
多谢先走的人，
早已代替我们打破；
只剩着浮在水面上的冰块儿，
轧轧的在我们船底下剐过，
其余的大部份，
便须让我们做“先走的”：
我们打了十槌八槌，
只走上一尺八寸的路。
但是，
打了十槌八槌，
终走上了一尺八寸的路！
我们何妨把我们痛苦的喘息声，
欢欢喜喜的，
改唱我们的“敲冰胜利歌”。

敲冰！敲冰！
敲一尺，进一尺！
敲一程，进一程！
懈怠者说：
“朋友，歇歇罢！
何苦来？”
请了！
你歇你的，
我们走我们的路！
怯弱者说：
“朋友，歇歇罢！
不要敲病了人，
刮破了船。”

多谢！

这是我们想到，却不愿顾到的！

缓进者说：

“朋友，

一样的走，何不等一等？

明天就有太阳了。”

假使一世没有太阳呢？

“那么，傻孩子！

听你们去罢！”

这就很感谢你。

敲冰！敲冰！

敲一尺，进一尺！

敲一程，进一程！

这个兄弟倦了？——

便有那个休息着的兄弟来换他。

肚子饿了？——

有黄米饭，

有青菜汤。

口渴了？——

冰底下有无量的清水；

便是冰块，

也可以烹作我们的好茶。

木槌的柄敲断了？

那不打紧，

舱中拿出斧头来，

岸上的树枝多着。

敲冰！敲冰！

我们一切都完备，

一切不恐慌，

感谢我们的恩人自然界。

敲冰！敲冰！
敲一尺，进一尺！
敲一程，进一程！
从正午敲起，
直敲到漆黑的深夜。
漆黑的深夜，
还是点着灯笼敲冰。
刺刺的北风，
吹动两岸的大树，
化作一片怒涛似的声响。
那便是威权？
手掌麻木了，
皮也剝破了；
臂中的筋肉，
伸缩渐渐不自由了；
脚也站得酸痛了；
头上的汗，
涔涔的向冰冷的冰上滴，
背上的汗，
被冷风往袖管中钻进去，
吹得快要结成冰冷的冰；
那便是痛苦？
天上的黑云，
偶然有些破缝，
露出一颗两颗的星，
闪闪缩缩，
像对着我们霎眼，
那便是希望？
冬冬不绝的木槌声，
便是精神进行的鼓号？
豁刺豁刺的冰块剝船声，

便是反抗者的冲锋队？
是失败者最后的奋斗？
旷野中的回声，
便是响应？
这都无须管得；
而且正便是我们，
不许我们管得。

敲冰！敲冰！
敲一尺，进一尺！
敲一程，进一程！
冬冬的木槌，
在黑夜中不绝的敲着，
直敲到野犬的呼声渐渐稀了；
直敲到深树中的猫头鹰，
不唱他的“死的圣曲”了；
直敲到雄鸡醒了；
百鸟鸣了；
直敲到草原中，
已有了牧羊儿歌声；
直敲到屡经霜雪的枯草，
已能在熹微的晨光中，
表露他困苦的颜色！
好了！
黑暗已死，
光明复活了！
我们怎样？
歇手罢？
哦！
前面还有二十五里路！
光明啊！

自然的光明，
普遍的光明啊！
我们应当感谢你，
照着我们清清楚楚的做。
但是，
我们还有我们的目的；
我们不当见了你便住手，
应当借着你力，
分外奋勉，
清清楚楚的做。

敲冰！敲冰！
敲一尺，进一尺！
敲一程，进一程！
黑夜继续着白昼，
黎明又继续着黑夜，
又是白昼了，
正午了，
正午又过去了！
时间啊！
你是我们唯一的，真实的资产。
我们倚靠着你，
切切实实，
清清楚楚的做，
便不是你的戕贼者。
你把多少分量分给了我们，
你的消损率是怎样，
我们为着宝贵你，
尊重你，
更不忍分出你的肢体的一部分来想他，
只是切切实实，

清清楚楚的做。

正午又过去了，
暮色又渐渐的来了，
然而——

“好了！”

我们五个人，
一齐从胸臆中，
迸裂出来一声“好了！”
那冻云中半隐半现的太阳，
已被西方的山顶，
掩住了一半。

淡灰色的云影，
淡赭色的残阳，
混合起来，

恰恰是——

唉！

人都知道的——

是我们慈母的笑，
是她疼爱我们的苦笑！

她说：

“孩子！

你乏了！

可是你的目的已达了！

你且歇息歇息罢！”

于是我们举起我们的痛手，
挥去额上最后的一把冷汗；

且不知不觉的，

各各从胸臆中，

迸裂出来一声究竟的：

（是痛苦换来的）

“好了!”

“好了!”

我和四个撑船的，
同在灯光微薄的一张小桌上，
喝一杯黄酒，
是杯带着胡桃滋味的家乡酒，
人呢？——倦了。
船呢？——伤了。
大槌呢？——断了又修，修了又断。
但是七十里路的坚冰？
这且不说，
便是一杯带着胡桃滋味的家乡酒，
用沾着泥与汗与血的手，
擎到嘴边去喝，
请问人间：
是否人人都有喝到的福？
然而曾有几人喝到了？

“好了!”

无数的后来者，你听见我们这样的呼唤？
你若也走这一条路，
你若也走七十一里，
那一里的工作，
便是你们的。
你若说：
“等等罢！”
也许还有人来替我们敲。”
或说：
“等等罢！”
太阳的光力，
即刻就强了。”

那么，
你真是糊涂孩子！
你竟忘记了你！
你心中感谢我们的七十里？
这却不必，
因为这是我们的事。
但是那一里，
却是你们的事。
你应当捧你的木槌为十字架，
你应当在你的血汗中受洗礼，
……
你应当喝一杯胡桃滋味的家乡酒，
你应当从你胸臆中，
迸裂出来一声究竟的“好了！”

(载《新青年》第七卷第五号)

缅怀与研究

刘半农先生不死

蔡元培

刘先生死了！为青年模范的刘先生，是永远不会死的！

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说学者心理上进展的状况，是最好没有的了。从各种科学中或一种科学的各方面中，择自己性所近的专研起来，这是知的境界。研究开始了，渐感到这种工作的兴趣。废寝忘食，只有这唯一的嗜好，这是好的境界。学成了，在适当的机会应用起来，搜罗新材料，创造新工具，熟能生巧，乐此不疲，随遇到如何艰难，均不以为意，这是乐的境界。我个人所见到的刘先生，真是具此三种境界的。刘先生早年求学的状况，我知道的不多。我认识他是在民国六年，那时候刘先生已经二十余岁了，在大学预科任教员，在《新青年》杂志发表诗文，就在国内作“商量旧学，培养新知”的准备，亦喂食不可。但他一定要出去留学。到了法国了，以他平日沉浸于文史的习惯，也未尝不可以选点轻松的学科，在讲堂上听听讲，在书本上寻点论文的材料，赚一个博士的证书；然而他经再三考虑以后，终选定了语音学。这是刘先生的知。他选定了这学科以后，对于测验的纤琐、计算的繁重，毫不以为苦；我到巴黎见他时，一问到，他就“头头是道”、“津津有味”的讲起来。这是刘先生的好。他回国了，在北京大学的国学门研究所，布置语音学实验室，这就是他的主要工作。当然能者多劳，他除北大研究所以外还担任中央研究院史语研究所兼任研究员和各大学院院长、教务长等职务，并在各杂志或日报上也有相当的发表。但是他的兴趣，还是集中于语音学。他时时有新的发明，如改良测验的仪器，由笨重变为轻便；改良计算的方法，由繁难变为简易，都是他最得意的事。他对于考察方言，决不畏旅行的艰苦。此次由北平经绥远而达百灵庙，染病以后尚极有兴会，不得已而回平，以致疾笃，亦从无怨天尤人的感想。这是刘先生的乐。以我个人的观察，刘先生可谓实践孔子所说“知

之”、“好之”、“乐之”的三境界，可以为青年求学者的模范了。

刘先生不幸而死，但是无数青年能以刘先生为模范，而对于所学能由“知之”以至于“好之”而至于“乐之”，则刘先生就永远不死了。

(转载自《刘半农全集》电子版，北京大学未名出版社2004年版)

论刘半农的《扬鞭集》

沈从文

当五四运动左右时，第一期国语文学的发展上，刘复这个名字，是一个时髦的名字。在新文学新方向上，刘先生除曾经贡献给年轻人以若干诚实而切要的意见外，还在一种勇敢试验中，写了许多新诗。按照当时诸人为文学所下的定义，使第一期新诗受了那新要求的拘束，刘复，沈尹默，周作人，为时稍后的康白清，俞平伯、朱自清，徐玉诺，在南方的沈玄庐，刘大白，以及不甚能诗却也有所写作的罗家伦、傅斯年，等等，都同时为诗有所努力，且使诗的形式，极力从旧诗中解放，使旧诗中空泛的辞藻，不再在新诗中保留的。每一个作者，对于旧诗词皆有相当的认识，却在新作品中，不以幼稚自弃，用非常热心的态度，各在活用的语言中，找寻使诗美丽完全的形式。且保守那与时代相吻合的思想，使稚弱的散文诗，各注入一种人道观念，作为对时代的抗议，以及青年人灵魂自觉的呼喊。但这一期的新诗，是完全为在试验中而牺牲了。在稍后一时，即或在诗中那种单纯的朴素的描绘，以及人生文学的气息，尚影响到许多散文创作者，然而自从十三年后，这第一期新诗，便差不多完全遗落到历史后面，为人所渐忘了。他们在自己主张上写诗，这主张，为稍后的一时几人新试验破坏无余了。

在第一期诗人上，周作人是一个使诗成为纯散文最认真的人，译日本俳句同希腊古诗，也全用散文去处置。使诗朴素单一仅存一种诗的精神，抽去一切略涉夸张的词藻，排除一切烦冗的字句，使读者以纤细的心，去接近玩味，这成就处实则也就是失败处的。因这个结果，文字虽由手中而大众化，形式平凡而且自然，但那单纯，却使读者的情感奢侈，一个读者，若缺少人生的体念，无想象，无生活，对于这朴素的诗，反而失去认识的方便了。年轻人，对于周作人的译作诗歌的喜悦，较之对于郭沫若译作诗歌的喜悦为少，这道理，便是因为那朴素是使诗歌转入

奢侈，却并不“大众”的。较后的郭沫若，一反北方所有文字运动的拘束，用年轻人的感情，采用虽古典而实通俗的词藻与韵律，以略带夸张的兴奋调子，写他的诗，由于易于领会，在读者中便发生了无量的兴味。这一面的成就，却证明了北方几个诗人试验的失败。并且那试验，也就因此而止，虽俞平伯到较后日子里，还印行他的《忆》，刘复印行他的《扬鞭集》，周作人，则近年来还印行他的《过去的生命》，但这些诗皆以异常寂寞的样子产生，存在于无人注意情形中，因为读者还是太年青，一本诗，缺少诱人的词藻作为诗的外衣，缺少悦耳的音韵，缺少一个甜蜜热情的调子，读者是不会欢喜的，不能欢喜的。

似乎在《扬鞭集》或《忆》的序上，周作人先生有类似下面的意见：
……我所见到三个具诗的天分的人，一是俞平伯，二是沈尹默，三是刘复。……

沈尹默，十四年左右印行了《秋明集》两册，却是旧词旧诗。在新诗贡献上，除了从在《新青年》上他的几首诗，见出这一个对旧诗有最好修养的作者，当五四左右时，如何勇敢的放下一切文学的工具，来写他的幼稚的口语诗那种勇敢外，是没有什么可说的。俞平伯，在较先两个集子里，一切用散文写就的诗，才情都很好，描写官能所接触一切，低回反复，酣畅缠绵，然而那种感情却完全是旧式文人的感情，同朱自清非常相近，他在他那自己试验中感到爱悦的似乎还是稍后印出的《忆》，这名《忆》的一册小诗，用与冰心小诗风格相似的体裁写成，感情还是那种感情，节约了文字，使在最小篇章里，见自己一切过去的姿态，与欲望的阴影，这诗给作者自己的动摇或较之读者为大，因为用最少的笔描写自己的脸，与一个微笑，一滴泪，一声呻吟，除了自己能从那一条线一个曲折辨认出来发生兴味外，读者却因为那简单，不易领会了。周作人对刘半农的意见，似在能驾驭口语能驱遣新意这两件事上。

在《扬鞭集》里，有农村素描的肖像，如《一个小农家的暮》：

她在灶下煮饭，
新砍的山柴，
必剥剥的响。
灶门里嫣红的火光，
闪着嫣红的脸，
闪红了她青布的衣裳。

他衔着个十年的烟斗，
慢慢的从田里回来；
屋角里挂去了锄头，
便坐在稻床上，
调弄着只亲人的狗。
他还踱到栏里去，
看一看他的牛；
回头向她说。
“怎样了——
我们新酿的酒？”

门对面青山的顶上，
松树的尖头，
已露出半轮的月亮，
孩子们在场上看着月，
还数着天上的星：
“一，二，三，四，……”
“五，捌，六，两，……”
他们数，他们唱：
“地上人多心不平，
天上星多月不亮。”
(一九二一)

这种朴素的诗，是写得不坏。以一个散文的形式，浸在诗的气息里，平凡的看，平凡的叙述，表现一个平凡的境界，这手法是较之与他同时代作者的一切作品为纯熟的。

又如《稻棚》，《回声》，全在同一调子里，写得非常亲切动人。

但这类诗离去了时代那一点意义，若以一个艺术的作品，拿来同十年来所有中国的诗歌比较，便是极幼稚的诗歌。散文的进步，中国十四年来的诗，便必须穿上华美的外衣，才会为人注意。刘复这诗歌，却是一九二一年左右写成的，那时代，汪静之，刘延陵，徐玉诺，皆是诗人，在比较中，刘半农的诗是完全的。

刘复在诗歌上试验，有另外的成就，不是如《稻棚》的描写农村，

不是如《耻辱的门》写他的人道主义的悲悯与愤怒。写恋爱的得失，心情的一闪，他的诗只记下一个符号，却不能使那个感想同观念成为一首好诗。他有长处，为中国十年来新文学作了一个最好的试验，是他用江阴方言，写那种方言山歌。用并不普遍的文字，并不普遍的组织，唱那为一切成人所能领会的山歌，他的成就是空前的。一个中国长江下游农村培养而长大的灵魂，为官能的放肆而兴起的欲望，用微见忧郁却仍然极其健康的调子，唱出他的爱憎，混和原始民族的单纯与近代人的狡狴，按歌谣平静从容的节拍，歌热情郁悌的心绪，刘半农写的山歌，比他的其余诗歌美丽多了。

在《扬鞭集》一二四页上：

郎想姐来姐想郎，
同勒浪一片场浪乘风凉。
姐肚里勿晓得郎来郎肚里也勿晓得姐，
同看仔一个油火虫飘飘漾漾过池塘。

在一二五页上：

姐园里一朵蔷薇开出墙，
我看见仔蔷薇也和看见姐一样。
我说姐倪你勿送我蔷薇也送个刺把我，
戳破仔我手末你十指尖尖替我绷一绷。

在一二七页上：

劈风劈雨打熄仔我格灯笼火，
我走过你们头躲一躲。
我也勿想你放脱仔棉条来开我，
只要看看你们缝里格灯光听你唱唱歌。

在一二八页上：

你联竿拙拙乙是拙格我？
我看你杀毒毒格太阳里打麦打得好罪过。
到仔几时一日我能够来代替你打，
你就坐勒树阴底下扎扎鞋唱唱歌。

欲望是那么小，那么亲切，却写得那么缓和入耳。还有微带着挑拨；使欲望在另外一种比兴中显出，如在二二零页的一首。在二二二页上：

河边上阿姊你洗格伦衣裳？
你一泊一泊泊出情波万丈长！
我隔子绿沉沉格杨柳听你一记一记捣，
一记一记一齐捣勒笃我心上！

较之其他诗皆像完美一点。俚俗，猥褻，不庄重，在一首较好的诗中是可以净化的，它需要的是整个的内涵，在《凤凰人》歌谣中，有下面这样动人的句子：

天上起云云重云，
地下埋坟坟重坟：
姣妹洗碗碗重碗，
姣妹床上人重人。

又如描写一个欲望的恣肆，以微带矜持的又不无谐趣的神情唱着，又如下面的一歌：

大姐走路笑笑底，
一对奶子翘翘底：
我想用手摸一摸，
心中虽是跳跳底。

关于叠字与复韵巧妙的措置，关于炫目的观察与节制的描写，这类山歌，技术方面完成的高点，并不在其他古诗以下。对于新诗有所写作，欲从一切形式中去试验，发现，完成，使诗可以达到一个理想的标准，这类歌谣可取法处，或较之词曲为多的。

《扬鞭集》作者为治音韵的学者，若不缺少勇气，试来作江阴方言以外的俗歌，他的成就，是一定可以在中国新诗的发展上，有极多帮助的。不过，从自然平俗形式中，取相近体裁，如杨骚在他《受难者短曲》一集上，用中国弹词的格式与调子，写成的诗歌，却得到一个失败的证据，证明新诗在那方面也碰过壁来。

（载1931年《文艺月刊》第2卷第2期）

“五·四”时代的一面影

胡风

《半农杂文》第一册，刘复著。北平星云堂书店出版。

(一)

著者在序文里说，也许有人会根据他文章里的“某某数点”斥他为“落伍”为“没落”，(自序页一一)但我以为这担心是多余的。刘先生是“五·四”时代的一员战士，虽然不是站在司令的地位上面，但却切实地打了几次硬仗，那以来的经过了不数的人世沧桑，(这集子包含了由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的时间)，刘先生还是一个非常认真的言语学者，他的工作里面明明地包含了许多有用的成果——只凭“某某数点”斥他为“落伍”为“没落”，这当然是不会有而且不应该有的事情。但我们也不能照直地相信他的“我每有所写述，或由于一时意兴之所至，或由于出版人的逼索，或由于急着要卖几个钱，此外更没有什么目的”(自序页一)的说话，因为这前面还应该有一个前提：实践的要求。

所以，虽然是“在付印之前，当然已经挑选过二次；非但有整篇的挑选，而且在各篇之内，都有字句的修改，或整段的删削，……”(自序页)里面的文章也许或多或少地失去了原来的面目，但这本集子却不失为有用的文献：通过它我们可以望见“五·四”时代的一个侧面，或者说，通过它我们可以看到，在战士之一的刘先生的活动里面，“五·四”的时代精神呈现了怎样的姿态？他说，“把这么许多年来所写的文字从头再看一次，犹如回到了烟云似的已往的生命中从头再走一次”，(自序页一一)我现在的目的就是想看一看这个“已往的生命”的真容。

(二)

原来,“五·四”运动是从反帝国主义运动开始的。这个反帝运动虽然是由于一种新的要求,但当时的观念基础非常朦胧,种族的爱国心和“富国强兵”的思想一定是占主要的地位,这在著者的初期文章里面反映得很明显。我们且看一看下面的四篇译文罢。——

《欧洲花园》——侨住英国的葡萄牙文人当葡萄牙参加欧战时的感想。作者由祖国的宣战记起从前的英主撒拔司丁。他为了扩张“国威”,兴兵去征服摩尔,虽然“不蒙天佑,身死国辱”,但葡萄牙人民却相信他没有死,总有一天会回来恢复祖国的“昔日之盛”。作者尽情地赞美了这个“精神界之宝物”——“鼓铸国魂之神话”。

《拜轮家书》——拜轮从希腊寄给母亲的信。译者心中的拜轮当然是援助希腊独立的豪杰。

《阿尔萨斯之重光》——法国文学家绿蒂纪欧战中阿尔萨斯复归法国时的激动的状况。

《马丹撒喇倍儿那》——记世界驰名的法国女优撒喇倍儿那的事迹,译者所注重的当然是她的反抗德国的精神。

以下引用的是最后一文里的两段纪事:

去冬十月,马丹离美之前,演一新编之战剧,以为临别纪念,余辛亦列座。此剧情节,乃一法国少年掌旗军官亲语马丹,而马丹据实制为剧本者。余见舞台之上,残阳衰草之中,此七十一岁之老女杰,自饰少年军官,当其弹丸贯胸,血流遍体,犹手抱三色国旗而疾走,至力竭扑地,乃发其最后之呼声曰:“英吉利万岁!法兰西万岁!”而手中尚紧抱国旗勿舍。嗟乎!此景此情,吾知五十年后,凡曾于是日到院观剧之人,犹必洒其老泪,呼子若孙而语之曰:“吾于某年某月某日之夕,目睹此垂死之少年军官也。”

全剧科白,以演绎“耶稣在喀尔伐里(Calvary)之祈祷”(喀尔伐里乃耶路撒冷附近之一小山,即耶稣受刑处。)一节为最佳:其于“渠等明知而故犯,望勿赦其罪”(Ne ‘lesPardo-nnezPas, IlsSaventCeguilsfont一语,凡三易其辞),今直录之,愿读者瞋目一想:

“渠等背弃誓言,欲以人血染历史,毁我寺院,戮我子弟,乱我妇

女。天主！渠等明知而故犯，望勿赦其罪。”

“渠等违背条约，阻止人道之进行。如有小弱之国，宁死勿辱，出全力以咱卫者，渠等亦弥增其暴力以催灭之，即尽歼其人民，亦所勿顾。天主！渠等明知而故犯望勿赦其罪。”

“天主！长夜将过，愿汝于天明之后；勿更以忧患加诸渠等，而令其永受苦恼，倍于吾等所受；愿汝以不疲不息之手痛扑之；愿汝以永流不息，永拭不干之眼泪渥其身。天主！渠等明知而故犯，望勿赦其罪。”

(二六一二七页)

普法战争之后，各处盛传马丹拒绝德皇事，谓“德皇欲延马丹至柏林演剧。马丹谢曰：‘德皇，吾仇也，吾奈何以吾技娱吾仇？渠能举阿尔萨斯归吾法兰西者，仇立释；仇释，吾明日至柏林矣。’使者往还数次，马丹坚执其言，终不成议。”余问此说完全可信否，马丹曰：“此中尚有传闻失实处。初，吾欲至阿尔萨斯演剧，德人以邀吾先至柏林演剧为交换条件，商量至数年之久，余终不许。后余以甚念阿尔萨斯州人，必欲一至其地，即自甘退让，先至柏林。在柏林开演数日之后，忽德皇使人来言，欲亲至院中婉剧，余以坚决之辞谢使者曰：‘为我代白恺撒，渠倘能以阿尔萨斯一州为吾演剧之代价，剩如命。否则渠自前门入院；吾即自后门而逃；幸毋责我以大杀风荣也。勺：德皇知余终不可强；果未至。又有一次，时在普法战争十年之后，余在哥本哈结(Copenhagen)演剧，一风度翩翩之德国大使，每日遣人以鲜花赠余，余一一却之。至演剧完毕之日；渠又开一极盛之夜宴会，为吾钱行。余觉情不可却，应约往，则在座陪席者，均一时巨官贵妇。宴将毕，此不知趣之大使，举杯起立，高声言曰：‘吾为此多才多艺之法国大女伶祝福，兼祝产此美人之法兰西！’余以其语意轻薄，立即报以冷语曰：‘愿君为吾法兰西全体祝福，普鲁士大使先生！’于是宾主不欢而散。次晨五时许，余尚未起，忽为喧扰声惊醒，披衣出视，乃有德官一人，自称毕士麦之代表，声势汹汹，欲强余至大使馆谢罪。余冷笑曰：‘速去，毋扰吾睡！有话可叫毕士麦或恺撒自己来说，谁与汝喋喋者！’德官无奈我何，竟沮丧去。”……

(三三一三四页)

这个引用太长了，而且是译文，但我是为了想加强地说明，在一九一七年(民国六年)以前的八篇文章里面占了四篇的这些译文的内容，是鲜明地说明了那时候的初期反帝情热。一方面是所谓“排满”运动成功后

的表面的兴奋，一方面是由于列强的压迫的愤怒，在“公理战胜强权”的欧战大海里面的青年刘复，在这种情热里面燃烧起来了是很容易想象得到的。在上面所引的激动的记事里面，我们能够看到译者的抑制不住的同感么？

但这个反帝情热还是在“富国强兵”阶段上面，即以所谓市民的要求为基础。在《应用文之教授》(五〇—六一页)和《实利主义与职业教育》(一九—二三页)里面，这个特质就被反映出来了。现在从后者里面引一个例子：——

所谓职业教育与实利主义，我是向来极赞成，极愿提倡，断不敢反对的。我常说：中国的社会与时局，所以闹得如此之糟，都是因为没职业之流氓太多的缘故。“下等人”没有职业，所以要做贼，做强盗，做流氓，做拆白党；“中等人”没有职业，所以要做绅董，要开函授学校和滑头学校，要做黑幕派小说，要发行妖孽杂志；“上等人”没有职业，所以要做官，要弄兵，要卖国！假使职业教育竟能发达了，请问人人到了可以靠着体力脑力以求实利的一天，谁还愿意埋没了良心做那些勾当呢？

(二〇—二一页)

后面还提出了实业和教育应该“两方面同时并进”的意见。不用说，这种的意见是用不着批判的，但我们要晓得，从现象看来，在当时这却代表了一个广大的呼声。

(三)

然而，这个反帝的要求一定要发展成反封建运动，在人生观社会观艺术观等意识形态的领域上掀起一个大的革命。“五·四”的狂风暴雨来了，青年刘复也是在那里面纵横驰骋的一个。

“五·四”时代的风起云涌的关于“人生价值”和“人生态度”的讨论，在这里并没有什么痕迹，只在一九一五年(民国四年)所作的“拟曲”《两盗》和一九一八年(民国七年)所译的《天明》里面可以看出反抗强暴同情弱者的态度，而且他的同情并不是源于什么明瞭的社会见地，这使我们依稀望见了成为那时的思潮之一的人道主义的影子而已。在他里面

并不能看到华丽的人生哲学的高扬。

所以，他的功绩只是在反对文言，反对尊孔，反对迷信，反对林琴南式的翻译，反对旧戏，反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新式国粹派……等具体的斗争上面。在《奉答王敬轩先生》、《辟“灵学丛志”》、《作揖主义》三篇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些精神。而且，由我看来，他的态度算是比较率直勇敢的。《作揖主义》里面有这样的表白：

……我想到前清末年的官与革命党两方面，官要尊王，革命党要排满；官说革命党是“匪”，革命党说官是“奴”。这样牛头不对马嘴，若是双方辩论起来，辩到地老天荒，恐怕大家还都是个“缠夹二先生”，断断不能有什么谁是谁非的分晓。所以为官计，不如少说闲话，切切实实想些方法去捉革命党。为革命党计，也不如少说闲话，切切实实想些方法去革命。这不是一刀两断，最经济最爽快的办法么？

(一二七页)

这当然是很素朴的说法，但这种不妥协的硬朗的态度，恐怕在当时的胡适、周作人等人的文章里面是不容易看到的罢。至于他对于问题的具体理解，并不一定都是粗略的，有时倒也表现了精密切实的见地。例如，在《奉答王敬轩先生》里面由林琴南讨论到了翻译问题，他的意见我以为就是在现在都是有意义的：

……当知译书与著书不同，著书以本身为主体，译书应以原本为主体；所以译书的文章，只能把本国文字去凑就外国文，决不能把外国文字的意义神韵硬改了来凑就本国文。即如后秦鸠摩罗什大师译《金刚经》，唐玄奘大师译《心经》，这两人，本身就生在古代，若要在译文中用晋唐文笔正是日常吐属，全不费力，岂不比林先生仿造千年以前的古董，容易得许多；然而他们只是实事求是，用极曲折极缜密的笔墨，把原文精义达出，既没有自己增损原义一字，也始终没有把冬烘先生的臭调子放进去；所以直到现在，凡是读这两部经的，心目中总觉这种文章是西域来的文章，决不是“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一类的晋文，又决不是“龙嘘气成云”一类的唐文。此种输入外国文学使中国文学界中另辟一个新境界的能力，岂一般没世穷年不免为陋儒的人所能梦见！然而鸠摩罗什大师，还虚心得很，说译书象“嚼饭哺人”转了一转手，便要失去真义。……

(八九页)

现在离他说这段话的时候已经十七八年了，但我们的翻译界还流行着为了“顺”不妨错一点的见解，必要的外国语的句法语法的引入还常常受到过人们的轻视或嘲笑。

(四)

在这里我们需要进一步说明，虽然他的态度率直勇敢，但始终是没有离开所谓“实事求是”的精神(五二页)的。少说不着边际的空话，不弄“观念游戏”，从现实的需要里面找出具体的问题来，切切实实地展开讨论；我们可以把这叫做平凡的战斗主义。他的文章里面是随处表现了这个特色。

这个平凡的战斗主义是“五·四”精神的清醒的现实的一面，和夸大狂是截然对立的。后年在《徐志摩先生的耳朵》(一八一—九三页)里对于徐诗人的“天籁地籁人籁”和“灵性”投下了那么辛辣的嘲笑，在《骂瞎了眼的文学史家》(二五二—二五四页)和《奉答口口口先生》(二五五—二五九页)里面对于自命为中国狄更斯的陈西滢等那样地不留情面，我们是应该在这里面求得解释的。

但这个精神表现得最明显的是在他的文学见解和实践里面。

民国六年(一九一七)他译的文章里面有一篇《琴魂》(三七—四四页)和约翰生(Samual Johson)的文艺短论《诗人的修养》(四五—四九页)。前者是赞美献身艺术的精神，和封建的艺术见解是完全对立的，后者的内容恰好是“五·四”文艺思潮的一种写照。下面引用的是《诗人的修养》里接在诗人应该“……将心中所藏自然界无数印象，摘其关系最重而情状最足动人者……至于意识中认为次一等的事物，却当付诸删削”之后说的：

但诗人观察自然，只还下了一半功夫；其又一半，即须娴习人生现象：凡种种社会种种人物之乐处苦处，须精密调查，而估计其实量。情感的势力，及其相交相并之结果，须设身处地以观察之。人心的变化，及其受外界种种影响后所呈之异象，与夫因天时及习俗的势力，所生的临时变化，自人人活泼康健的儿童时代起，直至其颓唐衰老之日止，均须循其必经之轨道，穷迹其去来之踪。能如是，其诗人之资格犹未尽备，

必须自能剥夺其时代上及国界上牢不可破之偏见，而从抽象的及不变的事理中判断是非；犹须不为一时的法律与舆论所羁累，而超然高举，与至精无上万古不移的真理相接触。如此，则心中不特不急急以求名，且以时人的推誉可为厌，只把一生欲得之报酬，委之于将来真理彰明之后。于是所做的诗，对于自然界是个天人联络的译员，对于人类是个灵魂中的立法者；他本人也脱离了时代与地方关系，独立太空中，对于后世一切思想与状况，有控御统辖之权。

虽然，诗人所下苦工，犹未尽也：不可不习各种语言，不可不习各种科学；诗格亦当高尚，俾与思想相配；至措辞必如何而后隽妙，音调必如何而后和谐，尤须于实习中求其练熟。……

所谓剥夺“时代上”“国界上”的“偏见”，所谓接触“至精无上万古不移的真理”不外是说明了想从封建重压下面脱出的市民社会的情热，虽然说是诗人应“独立太空之中”，但我们应该晓得译者所心契的是“观察自然”和“娴习人生现象”，即和他的“实事求是”的态度相和的现实主义的精神。实际上他的眼睛是落在地上。不过是，表现在这里面的却带有适当的情热，含有很高的积极色彩。

这个现实主义的文学见解，以后经过了怎样的发展，在这个集子里无从看到。不过我们晓得，他的作诗态度和经历却和这译文最后所说的相合。习语言习科学固不用说，所谓“诗格”“措辞”“音调”，似乎他都下了相当的功夫，不断地“于实习中，求其练熟。”我在这里当然不能论到他的成绩，我想说的是，他的工作也是“五·四”后现实主义文艺的一个样相而已。

八年以后他在《读海上花列传》(二二七—二四八页)里面才又提到这个态度：

……我们就不得不注意到两件事：一件是冷静的头脑，又一件是精密周至的观察。

所谓冷静的头脑，乃是无论笔下所写的事物何等纷忙，何等杂乱，在作者总还要一丝不苟，保存他“死样活气”的态度。不然，即使有好材料，也不免毁去。因为用热乱的态度写出来的小说，总是平面的；必须是用冷静的态度写出来的，方是立体的。我用平面立体两个名词来比拟小说，不免有人以为比得不伦不类。

但是我请你想一想：你读到过一种一览了无余味，好像是水面上浮着一层油花的小说没有？一定是有的。你又读到过一种小说，它中间的事事物物，好像能一一站立起来，站在你面前的没有？也一定是有的。既都是有的，你就可以相信我所说的平面立体两个名词；更可从这平面立体上，比较出作者的头脑的冷热。但有一层不要弄错：作者头脑的冷热，并无关于所写事物的本身的冷热。热的事物如《红笑》中所写，总无可更热的了；但作者的头脑，仍还同西伯利亚的冷雪一般的冷。至于把冷的事物写热的，那就不必我来举例，你书架上一定堆放着不少！

(二三九页)

这当然是对于风靡了当时的“热烈的”叫喊声呻吟声作品而说的，但我们可以看到，约翰生的译文里面所有的雄迈的气概已经无踪无影，只仅仅剩下了“死样活气”的“冷静的头脑”。在这本集子里固然找不出什么明确的过程，但八年的时间带来了不小的变化却是无疑的。虽然后来他还提出过对待外国人的“他若踏我一脚，我就还他一口”（一九五页）主义，讥笑过周作人先生的对于溥仪的态度没有逃出“狗抓地毯”的定律，使我们感到了强光的一闪但也终于不过是一闪而已。

(五)

“五·四”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即我们所说的平凡的战斗主义以后有了怎样的发展呢？我觉得大概地说来似乎有这么样的三个支流：

第一，对于一切的麻木，一切的污秽，一切的混乱，随时随地感到难堪或悲愤，用了最大的警惕心去告发，去抨击。无论看起来是怎样小的事情，但不肯妥协也不肯退让，发现了敌人就“一口咬住不放”——所谓韧性的打硬仗主义。这需要对于合理的人生的热爱，需要对于社会现象的认真的凝视，因而它终于是和进步的社会主流汇合的。这表现在文学上是批判的现实主义。

第二，对于一切社会现象，都用着和自己相关联的利害观点去“适应”，冷却了热情，迷失了方向，最大的幸福是“平安”，最高的野心是“功成名就”——这可以叫做小市民社会的平庸主义。文学上身边琐事的“现实主义”是从这个基础来的。

第三，只抓着现象的问题而不能了解它在全体上的意义，想“改革”而害怕矛盾，胡适的由“多谈问题少谈主义”到“好人政府”，就是最好的例子。这可以叫做社会现象的追随主义，这表现在文学上是什么呢？只说一点点罢：那些“隐士”“闲适”“性灵”等，也是和这略有姻缘的。

刘先生是怎样地渐渐失去了他的锋芒，那路径我们无从看到，总之他是没有跳出大多数“五·四”战士们大同小异的运命。刘先生当然不是极端的例子，但他里面的平凡的战斗主义渐渐地离开了“战斗”而只剩有了“平凡”，却是显然的。

从这集子里每篇文章后面所注的年月看来，他是在一九一八年（民国七年）七月至一九二〇年（民国九年）六月之间出国留学去了的。这是“五·四”运动的“逆水行舟”的时期，但战士之一的他却飘然地远走了。他的对于专门学问的兴趣固然也是一个原因，但同时不也就说明了他对于当时的战斗原来就没有很深的执著的么？

出国以后，当然更一天一天地和现实的社会生活隔离，到后来就只有怀念“故乡风物”和隆福寺琉璃厂的书铺（一九四页）了。从下面所引的一段小小的感想里面，我们可以窥见个中的消息：

就《语丝》的全体看，乃是一个文艺为主，学术为辅的小报。这个态度我很赞成，我希望你们永远保持着，若然《语丝》的生命能于永远。我想当初的《新青年》，原也应当如此，而且头几年已经做到如此；后来变了相，真是万分可惜。（一九九页）

在解放运动史上放了那么强的光彩的《新青年》的“变相”，在他看来却是一件“万分可惜”的事情，回想一下当年的他的姿态，无论如何也要使人感到奇异的。

所以，回国以后，嘲笑了一次夸大狂以外就完全烟消火灭了。虽然有“许多事看不入眼”，但只不过是把当年对付老顽固的“作揖主义”（一二四——二九页）拿来对付浮躁的青年罢了。（三一三——三二六页）

（六）

最后，我要谈到他在言语学上的成就。这是他的最重要的一面，如果他的工作对于我们还有活的意义，我以为这虽然不是唯一的但也是最

主要的部分。

他关于这方面的著作，似乎数量很大，只就这集子里的几篇文章看来，那内容就不是可以简单地说明的。在这里只想简单地提出他的几个主要的结论。

一，主张方言的存在权和方言文学——

二，……大约语言在文艺上，永远带着些神秘作用。我们做文做诗，我们所摆脱不了，而且是能于运用到最高等最真挚的一步的，便是我们抱在我们母亲膝下时所学的语言：同时能使我们受最深切的感动，觉得比一切别种语言分外的亲密有味的，也就是这种我们的母亲说过的语言。这种语言，因为传布的区域很小，(可以严格的收缩在一个最小的地域以内)我们叫作方言。从这上面看，可见一种语言传布的区域的大小，和他感动力的大小，恰恰成了一个反比例。这是文艺上无可奈何的事。

(一三五—一三六页)

他实行了这个主张的《瓦釜集》，对于现在的大众文艺作家还是可以借镜的。由于这个主张，对于吴语文学《海上花列传》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二二七—二四八页)加强地提出了文学作品里面的“地域的神味”问题。(二四五页)

关于语言的一般问题，他以为“方言是永远不能消灭的”。(一五四页)

二，关于国语的见解——

他和国语运动里的“武力统一派”的意见是完全不同的，他以为国语应该“超乎方言”，(一四〇页)像国际辅助语对于各国国语一样，(一四六页)所以他用了切实的证据反对以北京语为国语标准语，(一四一—一四七页)主张“我的理想中的国语，并不是件何等神秘的东西，只要是个普及的，进步的兰青官话。”(一四〇—一四一页)他以为现下的“白语文”是“中国语已有的好根基。”(一四四—一四五页)

三，对于注音字母的见解——

虽然他“以为有了三十九个注音字母和一部《国音字典》，我们所希望的国语，已算是呱呱坠地的了”，(一五二页)但实际上他对于注音字母的评价是很低的。“……如注音字母，在普通教育及社会教育上，我承认它有相当的价值，但我并不就因此承认它在科学的研究上有何等的价

值。”(二一〇页)

四、对于汉字罗马化的意见——

……要使字母制的文字实现，无论是用罗马字或另一种字，我总觉得非常困难，虽然这个问题是重要到极顶。我以为我们应当有些耐心。我们应当将这问题用最精细的方法去研究；凡是与这问题有关系的事项，都该一一分别讨论不能放松一点。若不先下这种功夫，贸然就尝试，恐怕结果一定不好。因此就目前说，我们应当把野心收小一点，暂认我们今日所做的统一国语的工作，也是一种差可满意的工作，因为这种工作的本身，也有相当价值在。因此缘故，我在论文中对于汉字罗马化这一个问题，只是在结束处很简略地说了一说，并没有能将诸位提倡人的办法，节要写入。我在这件事上很抱歉，但我希望他们将来提出的办法，能比今日以前的更好，更进步，更完满。在根本上说，我决然不是他们的反对者。

(二一三页)

在这里，他并不是反对汉字罗马化，不过觉得罗马字母并不能使他满意罢了。在前面他还提到，除去少数的罗马字提倡者以外，从事国语运动的再没有什么人主张要什么字母来代替汉字，这使他觉得“奇怪”。他以为“统一读音……是一种预备工夫，使字母制的文字可以实现”，“不能在半路上，就停止。”(二一二页)

五、主张废止四声——

……我在《国语问题中一个大争点》一篇短文里，已有过“国音乡调”的主张。此所谓调，不是语调，是字调，就是四声，既如此，可见我当时虽然没有明说废四声，而四声之可废却已不言可喻。但我也并不说我的国音乡调说实行了以后，大家用国语谈话，竟可以绝对不因没有“国声”之故，而不起纠纷。不过即使有纠纷，也总是很少的，偶然的。虽然我们拈住了一些，就要扯动全体；拈住了偶然，就要概括一切，那就不免什么事都搬不动，办不了。

(一五一页)

他的废止四声的意见，是根据了长期的实际研究，我们还可以找到不少的说明的。

从上面看来，我们晓得他的主张虽然还含有些矛盾或幼稚的理解，但那里面却包含了很多进步的要素。例如“方言永远不能消灭”的见解和他自己的“言语是变动的”(一四五—一四六页)的见解也不能统一，但承认方言的地位，对于国语(普通话)的适当评价，字母制文字的主张，废止四声的主张等，不是和拉丁化运动者对于中国文字语言的意见有了很高的一致么？这些以及他不承认注音字母有科学的价值和对于罗马字以外的本音字母的希望，使我们相信他有接受拉丁化主张甚至雅非言语学(Japhetic Philology)的可能。他的死该是贫弱的中国言语学界的一个损失罢。

除了他在言语学上的研究，从现在看来，他在思想史上的功绩是很小的。但我们不应该忘记了，现在所认为当然的事情，当时却都是费了许多斗争才能够得来的，“她”字的创造就是一个例子。所以，这本杂文对于一般读者虽然没有什么必要的意义，但为了研究或明了“五·四”运动的内容，它却是一本不可少的贡献。

二，十一，一九三五。

(载1935年《文学》月刊第4卷第4号)

刘半农与五四文学革命

汪馥泉

刘复半农先生于七月十四日午后二时一刻在北平逝世了，从此中国苦心研究学术的人又算少了一个，这对于贫弱的中国文化界，当然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刘先生不仅苦心研究而且是极有风趣的学者，关于他的刻苦精神和生活兴趣，自有他亲近的友好去作文纪念他；刘先生是位语言学专家，他不仅在理论上有着辉煌的贡献，而且还制就了好些实验语音用的仪器，以便语言学者的研究，这且待别的机会或别的语言学者来作公正的评价。我在这篇短文中所要讲的，只是刘先生与“五四”文学革命的关系。

刘先生在其《四声实验录》的《序赘》中说：“为什么我对于这问题（指语言学上的问题——作者）似乎癖好甚深呢？这是因为我自己，喜欢胡诌几句诗，更喜欢的是胡诌几句白话诗。……”由此可见刘先生之研究语言学与其文学嗜好之有如何深切的关系了。那么，我们为什么只说他是语言学家，不让他在这文坛上来站一席之地呢。特别是为什么一定要对他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的活动置之不理呢。

白涤洲先生说得好：“刘先生真是多才多艺！他的每一种研究都值得专家作一篇论文来纪念他。”（见《独立评论》110号 白涤洲作《悼半农先生》）我们在哀悼刘先生之下，特将其与“五四”文学革命之关系追述出来，以唤起大家对于刘先生的共感，对于“五四”文学革命的回忆和认识，这也并不是毫无意义的事吧。

一说到“五四”文学革命，除陈独秀、胡适外，当然是不会忘掉刘半农先生的。在当时，刘先生除极力赞成胡适的“八不主义”与陈独秀之“三大主义”外，对于文学革命还贡献了许多新的宝贵的意见；而且，在有些地方可以说是比胡适还要积极的。譬如，刘先生说：“尝谓吾辈做事，当处处不忘有一个我。作文亦然。如不顾自己，只是学着古人，便

是古人的子孙。如学今人，便是今人的奴隶。若欲不做他人之子孙与奴隶，非从破除迷信做起不可。此破除迷信四字，似与胡君第二项‘不摹仿古人’之说相同，其实却较胡君更进一层。胡君仅谓古人之文不当摹仿，余则谓非将古人作文之死格式推翻，新文学决不能脱离老文学之窠臼。古人所作论文，大都死守‘起承转合’四字，与八股家‘乌龟头’‘蝴蝶夹’等名词，同一牢不可破。……吾辈欲建造新文学之基础，不得不首先打破此崇拜旧时文体之迷信，使文学的形式上速放一异彩也。”（见《新青年》3卷3号《我之文学改良观》）对于古文，不仅“不当摹仿”，而且应该将其“死格式”推翻：这样痛快的主张，不但在“五四时代”有很积极的意义，即在目前的“小品文”与“大品文”以及别的关于文体的论争的情形之下，亦是有相当的意义的。

语言、文学是社会的产物；是随社会之发展而发展的。某种语言文学当其产生它的社会已经衰老崩溃，同时，必有另一新的语言文学随着新的社会形态之出现而产生出来。但是，一种新的语言文学却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建立起来的，而是渐渐发展成熟的；况且，新与旧虽是互相矛盾的，但这两者却有不可分离的关系，新文学虽对旧文学加以否定，但新文学中必然包含着旧文学中的一部分因素，因为新文学是从旧文学发展而来的，不然，则新文学之来源和构成便就是不可思议的了。刘半农先生了解这个道理，所以他说：“今既认定白话为文学之正宗与文章之进化，则将来之期望，非做到‘言文合一，或‘废文言而用白话’之地位不止。此种地位，即非一蹴而就，则吾辈目下应为之事，惟有列文言与白话于对待之地，而同时于两方面力求进行之策。进行之策若何？曰于文言一方面，则力求其浅显使与白话相近，于白话一方面，则竭力发达其固有之优点外，更当使其吸收文言所具有之优点，至文言之优点尽为白话所具，则文言必归于淘汰；而文学之名词，遂为白话所独据，固不仅正宗而已也”（同上）。这样把文言与白话立于对立地位，若仅就这几个字的字面看来，似乎是不甚彻底的表现，但刘先生的意思却是在吸收文言之优点，以繁盛白话文，使之成为文学之唯一的工具——这是实际地从进化的观点上来解决问题的办法。

对于接受外国语的新名词的问题，直到如今都还在我们的文坛上论争着。但刘先生在“五四时代”就发表了这样的意见：——

“愚以为世界事物日繁，旧有之字与名词既不敷用，则自造新名词及

输入外国名词，诚属势不可免。然新名词未必尽通，亦未必吾国竟无适当代用之字。若在文字范围中，取其行文便利，而又为人人所习见，固不防酌量采用。若在文学范围，则用笔以漂亮雅洁为主，杂人累赘费解之新名词，其讨厌必与滥用古典相同。然亦未必尽不可用，倘用其意义通顺者，而又无害于文笔之漂亮雅洁，固不必绝对禁止也。”（同上）

接受外国语之文法及其词汇，当然只有尽可能地遂行，不能勉强，所以刘先生的意见在原则上是对的。至于他所说的“通、顺”“漂亮雅洁”等义，虽无一定标准，但在当时的启蒙运动中，用之以作采用新名词及外国名词的条件，依然是进步的办法。

同时在文学的内容与形式问题上，刘先生也有正确的意见。他说“……故文学而不从性灵中意识中讲求好处，徒欲于字句上声韵上卖力，直如劣等优伶，自己无真实本事，乃以花腔滑调博人叫好，此等人尚未足与言文学也。”（同上）真的，文学不仅有其美妙的形式，而且有其一定的思想的内容。因为文学的形式只是其思想的内容之外衣，如果没有思想的内容，那作为其外衣的形式便就没有意义了，所以文学的价值，是要以内容来决定的。过去中国的古文家，因为其生活空虚，思想卑陋，所以不敢亲近文学的内容，即不敢在“性灵中意识中讲求好处”，只是在“字句上声韵上卖力”，拼命追求形式美，这确是如劣等优伶一样，是毫无真正本领的表现。不过，过去的古文学家之如此表现，尚不足怪；所可怪者，是现在还有许多“新”文人在那里努力追求“风花雪月”拥护形式主义。我不知这些新的形式主义者看了刘先生的上面的言论后将作如何感想！

我们知道，“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成就之一，是确立小说在文学上的地位，与改革中国的旧剧和提倡新剧。在这里，刘先生也与陈胡诸人一样，是尽过很大的力的。他赞成“小说为文学大主脑”，对《红楼梦》《水浒传》等优秀的小说作品，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戏剧上，他是完全反对过去中国的旧剧而努力提倡新剧的，他赞同钱玄同的说法，“旧戏如骈文，新戏如白话小说，”但“在白话文尚幼稚的时代，在白话之戏曲犹属完全未经发现”的当儿，他主张改良皮黄以应一时之急需——这种办法与现在有一部分人所主张的暂时（在大众文学未建立起来前）应用章回小说、连环图画的形式来创作以应急需一样，自然是还须讨论的问题。但当时的文化水平是那样的低下，新文学运动又还没有在各方面表示出

它的成绩来，在此情形下，刘先生提出那样一个关于改革戏剧的暂时的变通办法，也是不可多得的。

以上算是刘先生对于“五四”文学革命所产生的一般问题的几点重要贡献。

不过，刘先生在“五四”文学革命中贡献最大的，却是在诗歌方面。

首先是刘先生对于诗之本质的理解，他说：“作诗本意，只需将思想中最真的一点，用自然音响节奏写将出来，便算了事，便算极好。”（见《新青年》三卷五号《诗与小说精神上之革新》）

这是很正当的意见。不仅诗歌，一切文学、艺术都是需要真实的。虚伪的思想与感情当然是妨害诗歌与一切艺术、文学的，因为虚伪的思想与感情绝不能引起人的共感；而艺术、文学、诗歌的成功处，正是在于能使人痛哭流涕、愤慨激昂，即是在能感动人。缺口一首诗，是露骨地表现虚伪思想的，那么她如何能使人感动呢。所以诗是表现“思想中最真的一点”的，能以自然音响节奏将这一点表现出来者，便算成功的诗人。

本此立场，刘先生认为过去的古诗多半是作伪的，只有“国风”和“变雅”是最真的，因为这是“野老征夫游女怨妇”的思想感情之真实的反映。刘先生认为三千篇诗，被孔丘删去了二千六百多篇剩了三百十一篇，（当时对于《诗经》的篇什及删诗问题一般是如此。）把我们的刘先生气坏了，于是，他恨恨地说道：“三千篇‘诗’，被孔丘删剩了三百十一篇，其余二千六百八十九篇中，尽有绝妙的‘国风’，这老头儿糊糊涂涂，用了那极不确当的‘思无邪’的眼光将他一概抹杀，简直是中国文学上最大的罪人了！”

这不仅可以表现刘先生对于诗的意见，与他站在怎样的立场来评价诗作，而且还表现了他在当时的反儒教的精神。

在“五四”文学革命中，对于文体，对于小说、戏剧和诗歌都喊出了改革的口号。刘先生在诗的改革上有两个值得注意的意见：

一“破坏旧韵重造新韵”——如现在我们的诗人们，他们做诗，都依据梁代沈约之《四声谱》，不论今人读之是否押韵，刘先生竭力反对旧韵，在这里，他有一段话说得非常清晰：

“……夫韵之为义叶也，不叶即不押韵，此至浅至显之言，可无须举例证明也。而吾辈意想中之新文学，既标明其宗旨曰：‘作自己的诗文，

不作古人的诗文，’则古人所认为叶音之韵，尚未必可用，何况此古人之所不认，按诸今音又不能相合之《四声谱》，乃可视为文学中一种规律，举无数文人之心思脑血而受制于沈约一人之武断耶？试观东冬二部所收之字，无论以何处方言读之，决不能异韵。而谱中乃分之有二。‘规眉危悲’等字，无论以何处方言读之，决不能与‘友之诗时’等字同韵，而谱中乃合之为一。又胥韵诸字，与有韵叶者多而与马韵叶者少，顾不通有而通马。真文元寒删先六韵虽间有叶者，而不叶者居其十之九，而谱中竟认为完全相通。虽造谱之时，读音决不与今音相同；造谱者亦决无能力予为吾辈二十世纪读音设想。吾辈苟无崇拜古人之迷信，即就其未为吾辈设想而破坏之，当亦为事理之必然。故不佞之意，后此押韵，但问其叶与不叶而不问旧谱之同韵与否，相通与否。……且前人之言韵者，固谓‘音声本为天籛，古人歌咏出于自然，虽不言韵而韵转确’矣。今但许古人自然，而不许今人自然，必欲以人籛代天籛，拘执于本音转音之间，而忘却一至重要之‘叶’字，其理耶？其通论耶？”（《我之文学改良观》）

“古人歌咏出于自然”，诗之来源即在此。不幸的是旧的文人离开自然的歌咏，制造许多韵律格式，以束缚诗的活的生命，这在古时已经是极不自然的办法了。但因过去的中国为贵族势力所统制，在贵族意识所形成的形式主义支配之下，致使那种束缚诗歌的死韵律死格式成为不可改变的诗的规律。及至“五四时代”，旧的贵族势力崩溃了，新的市民生长了起来，于是此种死韵律死格式便不中用了，代表新市民的诗人便提出了否定它的意见。刘半农先生就是第一个出来反对此死韵律死格式的一人。

打破旧韵后，怎样重造新韵呢？刘先生以为最好的办法是：“希望于国语研究会诸君，以调查所得撰一定谱，行之于世。”（同上）接着他说：“或谓第三法（即上述办法——作者）虽佳，而语音时有变迁，今日之定谱，将来必定有不能适用之一日。余谓沈约既无能力予为吾辈设想，吾辈亦决无能力为将来设想。将来果属不能适用，何妨更废之而更造新谱。即吾辈主张之白话新文学，依进化程序言之亦不能视为文学之止境，更不能断定将来之人不破坏此种文学而建造一更新之文学。”（同上）

此种站在进化论的观点上所发的言论，可说是刘先生在当时的一种预言；而且前所讨论的大众语及大众语文学，便是这一预言之证实。

二增多诗体——中国固有律诗排律，在“五四时代”当然以其形式过于陈腐死板，不能有存在地位了。其余如绝诗古风乐府，虽然尚因其形式较为优良，为当时的新文人所采纳，但一则由于其形式仍属故旧，不适于表现新的意识，一则由于诗体太少，有碍于诗之发展，所以刘先生便提出了“增加诗体”的意见，并特别主张除有韵诗外，应增加无韵诗。

同时，刘先生在当时还依照了他自己的意见作了许多新诗。他的《相隔一层纸》、《学徒苦》等诗作，都是不依旧的格式完全用白话写成的，这在当时不消说是不容易做的事。

在“五四”文学革命中，胡适、沈尹默等亦曾作了许多新诗，但其中多半都未完全脱离旧诗的格调：甚至还有夹杂许多文言词句的；而刘先生在《新青年》四卷五号上就发表了他的《卖萝卜人》；这不仅是他初次作无韵诗的尝试，而且是当时最先出现的无韵诗之一。

《卖萝卜人》的题材，是一个住在破庙里的很穷的卖萝卜人被警察赶出庙去的故事。于此刘先生是尽量描写卖萝卜人的苦痛，表同情于他的。这是充满了“人道主义”意识的作品，其描写力也不见得如何高强，在目前看来当然是一篇很平常的创作；但是，在当时的情形下，刘先生能大胆地写出那样的无韵诗，我认为是很不平常的事。

刘先生逝世了，特写此小文，以纪念五四文学革命的先导者。

(载1934年《世界文学》第1卷第1期)

析刘半农诗文中的故土情结

邬红梅

刘半农在为北京大学建校三十一周年而写的《北大河》中写道“我是个生长在南方的人，所谓‘网鱼澹鹭，在河之洲；咀嚼菱藕，拊拾鸡头；蛙羹蚌脔，以为膳羞；布袍芒履，倒骑水牛’，正是我小时候最有趣的生活，虽然在杨元慎看来，这是吴中‘寒门之鬼’的生活。”这段文字中引用的诗句是北朝士人杨元慎在为南朝梁将陈庆之治病时的祷告语，杨其实是在嘲笑南方人的饮食和风俗习惯，而这几句嘲讽在半农看来却是他童年最有意思的生活场景。

刘半农的故乡江阴是位于长江南岸的一座古老的小城，山水秀美，民风淳朴，著名文学家胡山源的诗句对江阴的景致做了最好的描述：“江阴好，山水气势雄，三十三山罗四境，长江滚滚隐蛟龙，四季景无穷……江阴好，最好是吾家，竹外桃花依屋角，篱边杨柳拂檐牙，慈母乐无涯。”而位于江阴西横街刘氏兄弟故居是一座典型的江南民居，狭窄的街道、古朴的院落显得十分幽静安宁。江南水乡的美景、故居恬静祥和的氛围一直是刘半农脑海中挥之不去的美好记忆，是其诗文中取之不尽的源泉。尽管童年时期的生活也存在着各种艰辛和窘迫，但这种甜美与

苦难并存的感觉，是刘半农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真实的生活感受，对刘半农的性格和后来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从半农的许多诗文中均能找到故乡和其少年时期生活的影子。

对家乡山和水的热爱，在刘半农早期的诗文创作中十分多见。对于水，刘半农有特殊的情感，他在《北大河》中谈及其幼年时喜欢画画，父亲十分高兴，常常找几个懂画



的朋友到家里来赏鉴他的杰作：“记得有一天，一位老伯向我说：‘画山水，最重要的是要有水。有水无山，也可以凑成一幅。有山无水，无论怎样画，总是死板板的，令人透气不得。因为水是表显聪明和秀媚的。画一中一有水，就可以使人神意悠远了。’他这话，就现在看来，也未必是画学中的金科玉律；但在当时，却飞也似的向我幼小的心窝眼儿里一钻，钻进去了再也不肯跑出来：因而养成了我的爱水的观念，直到‘此刻现在’，还是根深蒂固。”从这段文字中可见，半农对水的偏爱是从小就有的，并且影响其一生。半农的诗文中从来不乏对水的描写：“一曲横河水，风定波光静。泛泛双白鹅，荡碎垂杨影。”诗中动静结合地描绘了一幅江南春水图，波光粼粼的水面，嫩绿的柳条随风摇曳，一对白鹅畅游泛起阵阵涟漪，正是江南早春的水景，诗人笔下的碧水、白鹅、杨柳是其记忆中最挚爱的故乡的水景。

对于山的描述，半农的诗文中不是很多见，但其对故乡香山的记忆却是深刻的。江阴的山没有巍峨雄伟的气势，也称不上山峦起伏、层峦叠嶂，但却独具江南的秀气和青翠，境内三十三座山各具特色。香山，坐落在北门外离城东二十余里处，风光旖旎，据《光绪县志》载：“香山在县东北三十里……有菴曰梅花堂，其额为东坡书，由麓而上曰采香径，上有祖师殿，绕而东为兜率院，又有最胜塔，越岭而北有涧数十丈，涧植桃名桃花涧。”香山自然风光秀丽，人文资源丰富，历来吸引文人墨客来此观光赏游，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多次登上香山，为这里的山、水风光留下了诗词、文赋，他在《游小香山梅花堂序》中赞叹曰：“千年迹冷荒丘，一旦香生群玉，不特花香、境香、梦亦香，可谓不负此山矣！”现今的香山风景依旧，位于张家港市西陲南沙镇境内。半农年轻时常常去香山游览，对香山的风物人情感怀颇多。

1917年8月他写了《游香山纪事诗》，第一首写道“扬鞭出北门，心在香山麓。朝阳浴马头，残露湿马足”。1926年刘半农挑选他十年来创作的诗歌小品，按时间先后编成诗集《扬鞭集》，即以此诗的头两个字作为诗集的题目。《扬鞭集》是半农十年来对生活的感悟和他对诗歌创新方面不断追求的真实写照，半农在自序中说“十年以来环境的变迁与情感的变迁留下一些影子；又一层是要借此将我在诗的体裁上与诗的音节上的努力，留下一些影子”。我们从《扬鞭集》中不难找到其成长的足迹。半农的《游香山纪事诗》共有三十首，刘半农摘其中十首录入集子中。他写

香山的连绵高耸：“白云如温絮，广覆香山巅，横亘数十里，上接苍冥天。”他写香山上寺庙僧人贫寒而乐观的生活场景：“古刹门半开，微露金身佛。颓唐一老僧，当窗缝破衲。小僧手纸鸢，有线不盈尺。远见行客来，笑向天空掷。”他写渔家平凡而恬淡生活：“渔舟横小塘，渔父卖鱼去。渔妇治晨炊，轻烟入疏树。”他写农家丰收的场景：“场上积新刍，屋里藏新谷。肥牛系场头，摇尾乳新犊。两个碧蜻蜓，飞上牛儿角。”

这些诗中充满了美好的事物，大自然给了诗人以创作的灵感，而普通人家的生活让诗人多了些人生的感慨，诗人以愉悦的心情书写着他眼前和心中的美丽景致和生活画面，然而美景掩盖不了人世间的平不，残酷的现实在半农眼前发生，诗人对官府与地主压迫佃农的暴行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公差捕老农，牵人如牵狗。老农喘且嘘，负病难行走。公差勃然怒，叫嚣如虎吼。农或稍停留，鞭打不绝手。问农犯何罪，欠租才五斗。”表达了半农对公差的愤怒和对老农的同情之心。这是半农诗作中表现生活在中下层劳动人民境遇的开端作品。

刘半农是白话诗的拓荒者，他对新诗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周作人说：“只有两个具有诗人的天分，一个是尹默，一个就是半农。”废名称他为“《新青年》时代新诗作家三大巨头之一”。徐瑞岳先生称其为“新诗开创期的一位早春的播种者，一位披荆斩棘的急先锋”。《游香山纪事诗》就是他早期白话诗歌的代表作，正是基于对家乡山水的热爱之情，他创作了这些白话诗，刘半农并非山水诗人，但故乡的灵秀山水是渗透到其骨子里的，让他无论是作诗还是学术方面都具有诗人的气质和丰富的想象力。

农村的生活是半农童年记忆中抹不去的痕迹，是刘半农无法忘却的情怀，这也是远在国外留学的半农眷恋祖国，热爱家乡，热爱民间民俗文学的重要原因之一。1921年2月8日刘半农于伦敦创作了诗歌《稻棚》，在诗前小序中说道：“记得八九岁时，曾在稻棚中住过一夜。这情景是不能再得的了，所以把它追记下来”。初秋之夜，半农睡在稻棚中，银白色的月光透进来，那一夜的感觉在半农记忆中分外清晰：“一片唧唧的秋虫声，一片甜蜜蜜的新稻浪，这美妙的浪，把我的幼稚的梦托着翻着……直到天上的天上！……”诗人采用真实感受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手法将稻棚一夜的感受写得分外美好，月光、秋虫、稻浪、美梦，一个农家少年所感受到的一切在诗人的笔下充满了梦幻般的意境。同样是描写农家生活的《一个小农家的暮》，则采用了写实的手法描绘了一个普通人

家傍晚的平凡生活。年轻的女主人在灶前煮饭,“灶门里嫣红的火光,映着她嫣红的脸”,丈夫刚刚从田里回来,“屋角里挂去了锄头,硬坐在稻床上,调弄着只亲人的狗。”“孩子们在场上看着月,还数着天上的星:一、二、三、四、……五、八、六、两……他们数,他们唱:地上人多心不平,天上人多星不亮”,诗人虽是描写周而复始、平淡无奇的生活场景,但字里行间充满了一家人的温馨、和谐和欢乐,淳朴的妻子、知足的丈夫、活泼的孩子,一个幸福的农家生活展现在我们眼前。

有评论家说半农的《稻棚》和《一个农家的暮》写的是被诗人理想化的农村生活,我认为并非如此,贫寒的生活依然存在幸福和美满,这两首诗用看似轻松随意的笔调将普通人的生活写得十分真切自然,无装饰和雕琢的痕迹,再现了农家生活的片断,应是半农儿童时期的真实记忆,是他本人亲身经历的生活和感受。

1920年刘半农赴欧洲留学,身处异邦的留学生活是清苦的,半农用他真挚的诗歌表达着他的思乡之情。《扬鞭集》中收录了半农在伦敦写的20余首诗歌,其中多首描写了美丽的故乡和受苦的乡民,除了《一个农家的暮》、《稻棚》外,还有《静》、《饿》、《回声》、《奶娘》等,诗人思念着祖国,回想农村的生活,源源不断的情感尽情地流淌。表达思乡之情最为浓烈的要属《叫我如何不想她》:“月光恋爱着海洋,海洋恋爱着月光。啊!这般蜜也似的银夜,教我如何不想她?”诗文中充满了这种缠绵悱恻的表达方式,仿佛描写的是一对热恋人儿的难舍难分,实际表达的是他与祖国、与故土难以割舍的情怀,这首著名的诗句后由赵元任先生谱曲,至今广为传唱。1921年半农在巴黎创作了《秋风》:“秋风一何凉!秋风吹我裳。秋风吹游子,秋风吹故乡。”微凉的秋风吹皱海外游子的衣裳,也吹起了半农对故乡,对祖国的思念。从半农在欧洲留学期间创作的多首诗歌中,我们窥见诗人对祖国,对故乡,对故乡农村农民的款款深情。

故居的场景、故居的生活也使半农魂牵梦萦无法割舍。刘氏兄弟故居是一座典型的清末民初的江南民宅,故居内处处都留下了半农三兄弟的足迹。故居的天井内,有金、银桂树各一棵,每逢八月时节,桂花竞相开放,香气袭人,当年的三兄弟在铺满桂花的树下尽情嬉闹,1919年9月2日,在北大任教并致力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刘半农正提倡白话诗,便以“桂树”为题,作诗一首,同时表达自己眷恋故乡之情。“半夜里起了暴风雷雨,我从梦中惊醒,便想到我那小院子里,有几株正在开花的

桂树。它正开着金黄色的花，我为它牵记得好苦。但是辗转思量，终于没法儿处置……”故居是诗人心里一块充满柔情的地方，一场大雨让他想起故居内的桂树，担忧着桂花被暴雨无情地冲走，“明天起来，雨还没住。桂树随风摇头，洒下一滴滴的冷雨。”写得十分真切，令人对桂树生出一丝丝的怜悯，诗中借想起家乡的桂树来表达诗人内心深处对故居的牵挂。

刘家后天井的墙角有一口老井，井水清澈，是当年刘家饮用和浆洗之源，这里是三兄弟经常玩耍之处，望着水井中千变万化的倒影，任由想象愉快的飞翔。1923年在法国巴黎过圣诞节的刘半农想起故居的井，想起了母亲和祖母，想起儿时的一幕：“我小时候最喜欢的是看井；一深—深—深—，一块美丽的天，映着个我自己的小圆脸。‘阿彭快来，你又去看井了！’这是我母亲的声音。‘阿彭快来，你又去看井了！’这是我祖母的声音。分明还是眼前的事，可已过了二十五年了。”

刘家的后院有一片竹林，是刘氏兄弟的乐园。他们常在这里捕蝉，捉蟋蟀，掏鸟窝，听虫鸣鸟叫，天华、北茂常在竹林里练琴，吹笛，竹林留给他们太多的欢乐与梦想，多少年后仍念念不忘。1917年初到北京大学任教的刘半农创作了《听雨》，便表达了这种感情：“我到北地已半年，半夜醒来一宵雨。若移此雨到江南，故园新笋添几许。”

半农是一位杰出的具有鲜明“贫富对立思想”的平民诗人，他同情中下层劳动人民，憎恨贫富不均的残酷现实，半农的诗中最为人们称道的是一些表现阶级对立和劳动人民艰辛生活的篇章。他的诗中有农妇、小贩、妓女、车夫、警察、乞丐、奶娘、学徒，他们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半农写他们苦楚的人生、写他们在饥饿和困苦中挣扎，替他们向这个不平等的世界呐喊。半农这种思想观的形成和发展与其微寒的家庭身世以及祖母、父母亲的影响分不开的。

半农家的祖上是读书人家，生活殷实，由于祖父早逝，家道中落，祖母夏氏年轻守寡，孤苦度日，过着极为清贫的生活。父亲是祖母从江阴乡下三甲里一个穷苦的刘姓本家那里去过继来的。母亲蒋氏，是江阴一户贫农的女儿，在她不满周岁时，其父病故，其母因家贫，无法养活，便将其遗弃在冰冻的河中，恰值祖母下乡探亲路过，听见婴儿的啼哭声，便央人把孩子救起，抱回家中当童养媳抚养长大。刘氏三兄弟童年和青少年时期也经历过一段时间家境贫困的生活，由于个人与家庭的境遇使

刘半农鄙弃富贵和权势，接近和同情中、下层人民。

半农小时候贫寒的家庭生活对其影响极大，半农的许多诗中对贫困的人们的苦难生活进行了描述。半农的散文诗《饿》将饥饿的感觉和穷人家穷困的一幕写得极为详尽。“他饿了；他静悄悄地立在门口；他也不想什么，只是没精打采，把一个指头放在口中咬。他看见门对面的荒场上，正聚集着许多小孩，唱歌的唱歌，捉迷藏的捉迷藏。他想：我也何妨去？但是，我总觉得没有气力，我便坐在门槛上看罢。”“他回进门去，看见他妈妈，正在屋后小园中洗衣服——是洗人家的衣服——一只脚摇着摇篮；摇篮里的小弟弟，却还不住的啼哭。他又恐怕他妈妈，向他垂着眼泪说：‘太郎！你又来了！’他就一响也不响，重新跑了出来！”“他真饿了！——饿得他的呼吸，也不平均了；饿得他全身的筋肉，竦竦的发抖！可是他并不啼哭，只在他直光的大眼眶里，微微有些泪痕！因为他是有过经验的了！——他啼哭过好多次，却还总得要等，要等他爸爸买米回来！”这首诗取材于半农的亲身感受，诗中的太郎是半农自己，而摇篮里的小弟弟则是三弟北茂。半农的母亲曾帮人家洗衣以补贴家用。

对于母亲，半农的诗中是常常提及的，“织布织布，朝织丈五，暮织丈五，尚余丈五！”描写的是母亲纺纱织布的情景，“黄昏时孩子们倦着睡着了，后院月光下，静静的水声，是母亲替他们在洗衣裳。”这是1923年8月5日作于巴黎的一首诗，题名《母亲》，在淡远的月光下，母亲为自己洗衣服的身影是永远铭记在心的。半农的母亲蒋氏虽身世可怜，但祖母从小教她识文断字，加之丈夫刘宝珊是晚清秀才，她应当是知书达理、略通文史的，至少对半农三兄弟从小的教育是有帮助的。半农的诗中常常引用些儿歌童谣、民谚俗曲，这也是与其母亲从小给他们唱童谣俗曲有很大关联。

1920年6月6日他在伦敦创作的《三十初度》中“三十岁，来的快！/三岁唱的歌，至今我还爱：/‘亮摩拜，/拜到来年好世界。/世界多！莫奈何！/三钱银子买只大雄鹅，/飞来飞去过江河。/江河过边姊妹多，/勿做生活就唱歌。’……”在异国他乡求学的而立之年的半农想起了儿时唱的歌谣，思念母亲、思念家乡之情，跃然纸上。后来刘半农致力于搜集民间歌谣和用方言创作民歌，母亲对他的影响是不能忽视的。《扬鞭集》中收录了十多首刘半农用江阴方言创作的山歌和拟儿歌，也是童年记忆和故乡情结的体现。

正是由于对故乡的热爱和脑海中挥之不去的对童谣的深刻记忆，使半农对家乡的方言和歌谣情有独钟。刘半农是现代最早提倡搜集民间歌谣的发起人之一，对于喜爱家乡方言和歌谣的原因他有过论述：“大约语言在文艺上，永远带着神秘作用。我们作文作诗，我们所摆脱不了，而且是能于运用到最高等最真挚的一步的，便是我们抱在我们母亲膝上时所学的语言；同时能使我们受最深切的感动，觉得比一切别种语言分外的亲密有味的，也就是这种我们的母亲说过的语言。”他还说：“歌谣的好处在于能用最自然的言词，最自然的声调，把最自然的情感抒发出来”。

1919年8月，刘半农回故乡江阴，休假时也不忘搜集民歌俗曲，还常将民间说唱艺人请入家中，待若上宾，记录民间歌谣。返京途中，他乘船逆流而上，船夫们嘹亮的划船号子曾使其激动得不能自己，他立刻一首一首地记录下来，这便成了后来被周作人称之为“中国民歌的学术的采集上第一次的成绩”的20首《江阴船歌》，收录于《瓦釜集》。他不仅搜集民歌，还运用江阴方言，自己动手创作民歌，摹拟俗曲，写成《瓦釜集》，集子中全部运用了江阴方言和“四句头山歌”的声调写成。题名“瓦釜”，这是因为半农觉得中国的黄钟实在太多了，“要实验一下，能不能尽我的力，把数千年来受尽侮辱和蔑视，打在地狱里而没有呻吟的机会的瓦釜的声音，表现出一部分来”。而《扬鞭集》中的部分诗，也是采用方言、民歌和儿歌的形式创作的。此外，他还和钱玄同、周作人等发起搜集“中国近世歌谣”活动。1918年半农开始在《北大日刊》上刊登亲手编订、注释的歌谣，至第二年共辑录了148首，1922年创办《歌谣》周刊。刘半农在歌谣的收集及民歌写作方面的成就是巨大的，他为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扬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最后录一首《忆江南》的诗句，这首诗是半农于1923年8月在巴黎写的，诗作写的深情款款，字里行间流淌着其对故土的思念之情：

桃花一株红无底，小山青点桃花里。
平湖激响打鱼声，渔歌歇处农歌起。

别此三年三万里，心里抛开缠梦里。
海潮何日向东流，为携几滴游人泪。

（作者：副研究馆员、江阴博物馆科研部主任）

中国文物保护先驱者——刘半农

唐雷霞

1934年7月14日，文学家、语言学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闯将——刘半农因在内蒙古考察时感染回归热，溘然长逝。刘半农是我国实验语音学的奠基人，白话诗歌的拓荒者，同时他博学多才，在书法、摄影、考古学等方面也有突出的造诣。

1989年，刘氏兄弟纪念馆筹建时，刘半农子女将他们保管的刘半农的遗物无偿捐献出来，以此举让更多的江阴人深入了解刘半农，共同来缅怀和学习这位江阴人民的骄傲。其中有他研究语音学亲手创制的语音实验仪器，如乙一、二声调推断尺等；有他创作出版的文学作品，如刘半农1934年1月至6月的《日记》、《欧游回忆录》等手稿，也包括刘半农的相机和摄影作品，打字用的法文打字机等，每一件都记录着刘半农不凡的人生轨迹。其中还有一套十分珍贵的“西北科学考察团纪念邮票”，是由刘半农的儿子刘育伦捐献的。

“西北科学考察团纪念邮票”左右为嘉禾，四角印面值，图案下面有中文和拉丁文字对照，全套4枚同图。1分桔黄、4分橄榄绿、5分玫紫、1角深蓝。这套“西北科学考察团纪念邮票”是为纪念中瑞两国学者成功联合科学考察西北，同时也为西北科学考察团筹集经费，由时任国立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出具公函送交通部核准，瑞典考古学家斯文·赫定邀请国立北平艺专教授杜万里设计，由财政部印制局以雕刻版印制，于1932年6月3日正式发行。画面采用现藏于故宫博物院反映西北风光的中国名画《沙原散牧图》（也称《平沙卓歇图》，作者佚名）。邮票封套上所印的说明列举了此项邮票的三个特点：（1）中华民国政府为学术团体发行

纪念邮票，此为第一次。（2）票中中国文字与拉丁文字对照，此为第一次。（3）票中图画，为故宫所藏元代无名书家所作沙原散牧图之缩本（见故宫周刊第五十八期）；以古名画制邮票，亦第一次。这三个第一足以证明这套邮票在我国邮票发行史上的特殊地位。而这套邮票另外的珍贵之处还在于刘半农为维护中国主权，保护祖国历史文化的卓越贡献这一历史事实的实物见证。

1926年底，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来华与北京政府协商，想去中国西北进行他的第五次中亚考察，为了阻止斯文·赫定的单独考察，北大考古学会与其他学术团体于1927年春创建“中国学术团体协会”，并委派刘半农、翁文灏、马叔平三人与斯文·赫定谈判，力争将考察置于中国学术团体协会的控制之下。曾在欧洲留过学的刘半农成为此次谈判的主力，起到了重要的沟通作用。经过十余次的协商，最终订立合作办法十九条，由中瑞两国学者共同组成“西北科学考察团”。随后刘半农被任命为西北科学考察团理事会常务理事，即最高负责人。1927年5月，“西北科学考察团”从北京出发，正式投入科学考察。刘半农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为中国学术界第一次争得了应有权利。从这次中瑞成立联合考察团开始，凡是外国来中国进行考古发掘或科学考察，都要签订协定，受到中国学术界的监督。

斯文·赫定这位声名在外，曾发现楼兰古城的著名探险家，是第一位同意与中国学术界合作的西方探险家，他以平等对待中国科学家的合作态度，得到了刘半农和整个中国学术界的对他的谅解和尊敬。刘半农在与这位瑞典学者长期的斗争与交涉中，也逐渐互相了解，并建立了一定的友谊。斯文·赫定也非常欣赏和敬佩刘半农的才华、为人和爱国主义精神，两人因而成为一对忘年交。他们还曾一起提议推荐鲁迅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甚至刘半农的离世也与他有着或多或少的关系。

1934年6月，刘半农受国际地理学会之邀代表中国学术界参加为纪念瑞典考古学家斯文·赫定博士七十寿辰而编印的一本世界性的论文集，决定抱病利用暑假赴绥远、内蒙古一带考察方言民俗，不幸感染了回归热而撒手人寰。斯文·赫定在得到刘半农突然逝世的消息后，满怀悲痛，深表悼念。

早在欧洲留学期间，刘半农就对西北文物有了接触。在伦敦学习期

间，曾陪同蔡元培调查了英国探险家斯坦因所获敦煌文物。转学巴黎大学后，还利用业余时间抄录了法国国家图书馆藏伯希和所获敦煌文献104种，并辑成《敦煌掇琐》，成为中国第一部敦煌学著作。而伯希和正是当年刘半农博士论文答辩时的主考官。1925年，刘半农学成回国，继续在北京大学担任教授，也开始了他保护中国文物的事业。尤其在“中国学术团体协会”创建之后，分别代表官方的“古物保管委员会”和代表非官方的“文物维护会”也相继成立，刘半农担任了“古物保管委员会”委员和“北京文物临时维护会”负责人，更是开展了大量保卫西北文化遗产的斗争。

1928年，隶属美国纽约天产博物馆的“中亚考察团”在团长安得思的带领下，拿着只是允许打猎的护照，又一次在内蒙古一带强掘史前遗址，盗取大量文物，打算从北京运往天津出口，途中被刘半农所在的古物保管委员会查到。由于当局的软弱只扣留了其中一部分文物，但同时和他们订了协定，“此后如再往内蒙一带发掘，不得自由行动，须先与中国学术团体接洽，双方订立办法，经由中国政府批准后，方可实行”。但到1929年春，安得思想再去内蒙古，他一方面假装与中国学术团体接洽，另一方面又坚持不按平等协商的原则办事，还怂恿北京各鬼子报，大骂刘半农所在的“文物”、“古物”两会，“妨害文化”、“是中国人不懂科学的表示”。刘半农撰文《北旧》，披露事件的始末，痛斥其强盗行径。

1931年，法国“黄种巡察团”假借与中方组成“一九学术考察团”之名，想在新疆塔里木盆地挖掘盗窃中国文物，并发生了法方违约殴人事件。刘半农在《质问法使参赞韩德威先生》一文中质问法使馆参赞韩德威就法方报载对此事件解释中的种种漏洞，问得法方哑口无言。并在另一篇《介绍黄种巡察团》的文章中，介绍了法方人员的身份及履历，揭露了黄种巡查团成员绝非学者，而是一群以考察为名，行侵略之实的帝国主义分子。撕下了其虚假外衣，将事实昭告于天下。

20世纪上半叶，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中国，是政府腐败无能的年代，刘半农等中华文化保护的先驱们，与帝国主义侵略者进行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展开了一场又一场生死较量，以他们的真实行动争取了中华民族应有的基本利益，并以犀利的笔锋和直观的语言，直击敌

人的痛处。虽然他们的努力因为国民政府的软弱，不能完全阻止帝国主义的入侵，但在一定程度上为帝国主义的盗窃活动设下了障碍，以实际行动唤起了中华民族和中国民众的觉醒。刘半农在侵略者面前的铮铮铁骨，为维护祖国主权而竭尽全力的精神，直至今日仍应值得我们尊敬和学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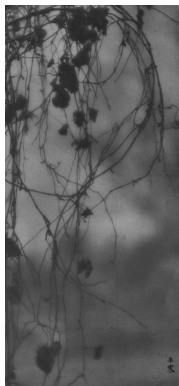
(作者：江阴博物馆藏品保管部)

刘半农摄影作品赏析

王晓娟

我们一提起刘半农先生，大家都知道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文学革命运动的先驱者、初期白话诗歌的拓荒者、我国实验语音学的奠基人。单就这些评价足见刘半农的文化殊勋。其实，他还是一位才华横溢、情趣广泛的人，不仅精通音乐、擅长书法，而且在摄影艺术创作和摄影艺术理论研究上也有很高的造诣。

刘半农从十七八岁开始就喜欢摄影；1923年，在巴黎又进一步研习摄影；从1926年加入“北京光社”后，他的摄影创作热情更为高涨，这一时期，他曾参加了“光社”的第四、第五次摄影展览。刘半农以其才识和成就，赢得了同行的信任，参与了《北京光社年鉴》第一、第二集的编辑工作，并写了序言。这是我国最早发行的摄影年鉴，为研究中国摄影发展史留下了珍贵的资料。刘半农从事摄影创作的同时，还研究摄



刘半农摄



寒林（刘半农摄）

影理论，1927年，刘半农把自己多年研习、探索摄影创作规律的心得体会，以及20世纪20、30年代摄影同仁的创作经验，进行归纳、总结，上升到理论高度进行论述，写成《半农谈影》一书，同年10月，该书由北京摄影出版社出版，从而创立了作为中国之首的摄影艺术理论。与此同时，刘半农始终也没有放弃摄影艺术创作，可见对摄影艺术的执著追求。

刘半农的创作，从人物到风景，题材广泛，技术纯熟，内容意义深刻。从馆藏的他的摄影作品来看，大概可以分为三类：人物摄影、风景摄影、静物摄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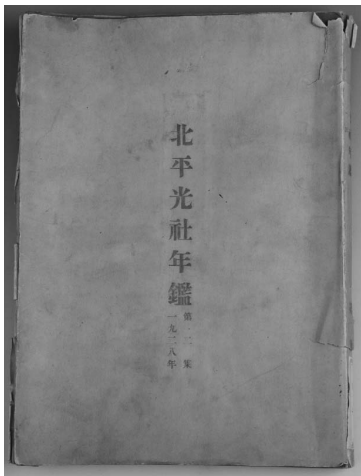
刘半农的人物作品穿插拍摄于各个时期，1920—1925年在英法留学的时候，刘半农常以自己的子女为摄影活动对象，拍摄内容多为孩子们生活、学习的场景，并教授子女摄影冲印技术。

1925年刘半农学成回国后，主要拍摄社会下层人物，表现劳苦大众的生存状态，其中不乏冷落街头而素不相识的老人、流浪的少年，以及许多在逆流中航行的船筏，为生活所迫而撒网的渔民形象，而他十分讨厌那些脑满肠肥、勾心斗角的政客和搔首弄姿的名门闺秀的标准照。

《人与天》是其一，这幅作品是典型的写实风格的黑白摄影，画面清晰，画面中大片的天空和小小的人物形成强烈反差，给人极强的视觉震撼。照片拍摄的是顶着烈日辛苦劳作的农民形象，高高的荒瘠的土地在照片的三分之一黄金比例分割处，剩余2/3的画面被辽阔无边的天空包围着，明晃晃的太阳正当空，巨大的天空营造出一种压抑感，似要把人压垮，然而画面中的劳动人民形象却是不顾环境恶劣辛勤地劳作着，显示着顽强的生命力。通过照片画面，刘半农把自己对劳动人民的感情融入其中，他所追求的意境也就油然而生了。

同类作品还有《捣衣》、《洒水》等在风格和内容上都如此。

在刘半农心目中，摄影是一种高尚的人民艺术，也是体现内心个人



《北平光社年鉴第二集》



人与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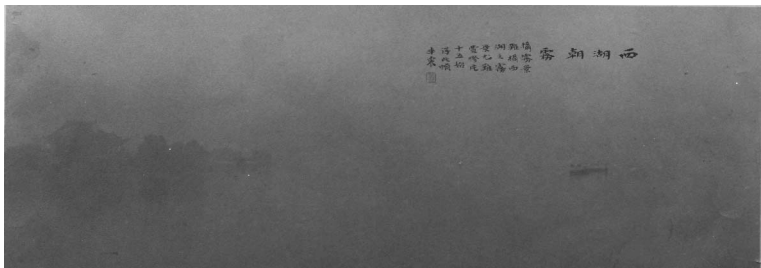


捣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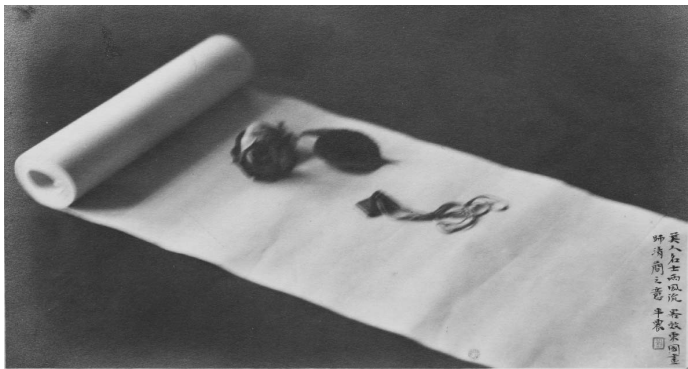
情操的有力工具。刘半农先生就在《北平光社年鉴》第二集的序言里更明确地提出了表彰摄影艺术民族风格，形成“中国气息”的主张。他说：“我以为照相这东西，无论别人尊之为艺术也好，卑之为狗屁也好，我们既在玩着，总不该忘记了一个我，更不该忘记了我们是中国人。……必须能把我们自己的个性，能把我们中国人特有的情趣与韵调，借着镜箱充分表现出来，使我们的作品，于世界别国人的作品之外另成一种气息，夫然后我们的工作才不算枉做，我们送给柯达矮克发的钱才不算白费。”他还说：“诚然，这个目的并不是容易达到的，但若诚心做去，总有做到的一天。”

刘半农的风景摄影作品，按风格可以分为两类：写实和写意。但总的特点是：注重意境的渲染和个性情趣的表达，表现手法变化多样，技法纯熟，思想格调深沉高雅，内涵深刻。

《舞》、《夕照》、《在野》、《枯藤》、《到幽玄之路》、《寒林》等作品在光社的第四、五次影展展出和发表，这些作品基本上仿效中国画画理。《西湖朝雾》最为典型，照片拍摄的是朝雾笼罩中的西湖景色，画面的主景



西湖朝雾



玫瑰与私章

为左侧包围在青翠之中的亭台和右侧的一叶扁舟，两者在宽阔的湖面上相映成趣，相得益彰。画面被浓浓的雾气所萦绕，景物若隐若现，让人看来恍若仙境，刘半农以其敏锐的观察力和娴熟的摄影技术抓住了这美好的瞬间。照片右上角半农的落款也很有意思：“摄雾景难，摄西湖之雾景尤难，费胶片十五，始得此帧。——半农”。他大清早就站在西湖边不停变换着角度，屏气凝神，全神贯注，按下快门的身影一下子就浮现在我们眼前。不满意，再重来，直到满意为止。共费掉15张底片才拍摄成了这么美妙的作品，给我们以美的享受。

刘半农的静物作品常以日常生活场景为拍摄对象，总体看来以写实为主，光线和谐，影调丰富。当刘半农创作时没有合适的自然风景时，常常在书桌上放几件小玩意儿，拍摄富有诗意的景物照，并取个含有诗意的名字，《玫瑰与私章》这幅作品当时刘半农把一册空白画卷平铺在书桌上，上面放上一朵玫瑰花和一枚印章，再打上灯光拍摄的，落款处写着：“美人名士两风流略效东国画师清兰之意——半农”，诗人的情怀跃然纸上。

总而言之，刘半农发挥自己的个性，把作为中国人特有的情趣和韵味，借助拍摄的手段充分表现出来，使中国人的作品有别于其他国家之外形成新的气息，进入自觉的民族艺术的创造时代。

（作者：江阴博物馆办公室）